傳播研究與實踐

第4卷 第2期 2014 年7月

特邀論文

半島禮讚／朱元鴻

專題研究論文／論壇：為臺灣的新聞產業把脈

記者獨立之路：臺灣獨立記者的維生策略與互助機制／陳順孝

超越校園——大學實習媒體轉型社區媒體之探討／胡元輝

資料新聞學興起：後印刷時代應用電腦軟體說故事的新聞挑戰／林照真

從新聞獎看臺灣新聞記者專業角色（1974-2013）／邱家宜

研究論文

虛實之間：Cosplay中的反串行爲與性別認同／何欣、王孝勇

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之概念、方法與方法論初探／施伯燁

口述歷史專題

最後一哩或斷尾求生？數位匯流與臺灣派報業的變化／蕭旭智

S. Hall紀念文

新左派公共知識份子與批判思想遺產——紀念史都華・霍爾／羅世宏

典範與起源之外：側寫霍爾的反新自由主義思想／唐士哲

典籍再現

口語在人間：評述Walter Ong 的*Orality and Literacy*／蘇碩斌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1-24．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09

半島禮讚

朱元鴻 *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要

出於閱讀半島英文網頁，以及收視半島電視英語頻道的個人經驗，本文試圖說明半島報導世界帶來的感受性如何是「個人的即是政治的」，不僅改變個人感受世界的視野，也因此持續參與形塑世界政治。本文試圖說明，半島不僅是另一個躋身 CNN 與 BBC World 之列的全球新聞媒體，而是個衛星電視結合網際網路與部落格等新媒介，影響世界、帶來新挑戰的當代象徵。最後本文將半島現象的啟發，翻譯為想像一個立足華人世界、挑戰西方媒體新聞議程與新聞敘事的全球新聞網，將意味著什麼。

關鍵詞： 半島電視英語頻道、全球新聞網、個人的即是政治的、世界政治、西方新聞霸權

* Email: yhchu8@gmail.com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前言

2010 年春，我首度覺察到半島電視英語頻道（Al Jazeera English, AJE）的英文網頁顯著地改變了我閱讀世界新聞的習性。在學術訪問旅居巴黎的 9 個月期間我沒有電視。活潑的智性社交生活之外，我與世界的日常聯繫是網頁新聞。延續以往在各地居留時平日閱讀養成的習性，我主要瀏覽的新聞網頁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NYT）、《衛報》（*The Guardian*）、*CNN*（*Cable News Network*）、法文的《解放報》（*Libération*）、《世界報》（*Le Monde*）、德文的《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漸漸我發現在閱讀興致與時間比重上，半島英語網逐漸超過了這幾份西方媒體網頁。這一覺察對我自己也來得驚奇。一個自波灣不起眼的城市（Doha）迅速崛起的阿拉伯媒體，自 2006 年開播還未滿 4 年的半島英語網，竟然改變了我的感受，讓我發現那些西方媒體報導世界的侷限與單調。當然，那些西方媒體網頁仍有吸引人的精緻文藝副刊與科技新知，但在世界新聞題材與評論角度上儘管各不相同卻畢竟接近，有許多我不在乎的新聞，例如皇家婚禮或是瑣碎的名人軼事，然而對於歐美之外的廣大世界卻是低度報導。如今，從北韓到南非，從西藏到巴西，尤其是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半島成爲我的優先窗口，其次才是那些西方媒體。即便是東亞、歐洲與北美，半島並非我的主要窗口，我也樂於在其間尋找不同色調的報導與評論。

敘述「半島與我」，似乎是很個人的經驗。但借用半個世紀前女性主義的一個口號：“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本文出於個人經驗，卻試圖說明半島帶來的感受性如何是「個人的即是政治的」，不僅改變個人看世界的視野，也持續參與形塑世界政治。本文也試圖說明，半島不僅是又一個躋身 CNN 與 BBC World 之列的全球新聞網，而是個衛星電視結合網際網路與部落格等新媒介，影響世界、帶來新挑戰的當代象徵。

貳、全球新聞電視頻道

1980 年 CNN 開播，在 1980 年代逐漸成爲第一個 24 小時全球新聞電視頻道。1986 年挑戰者號太空船失事，1987 年德州女童潔西卡落井營救事件，都令人見證了 CNN 新聞直播的巨大效應。我在美國讀書的最後一年，1989 年春季的北京民主運動與 6 月 4 日天安門的血腥「清場」，同年 11 月柏林圍牆作廢，東西德

airiti

人民站上布蘭登堡門的牆頭歡唱，CNN 不間斷的新聞直播，讓全球數億觀眾跟現場群眾共同感受歷史時刻的傷痛與歡樂。

1991 年波灣戰爭，CNN 獨擅全球報導。CNN 全球新聞的巨大影響力各國都看在眼裡，「全球新聞，美國觀點」的政治意涵很快便受到注意。同年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新聞電視頻道（BBC World News）開播，1992 年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英語新聞頻道開播。2001 年 CNN 最早現場直播 911 世界貿易中心遇襲情況。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進行之際，各國政府對戰爭的觀點跟美國政府或 CNN 報導並不一致。於是，必須有自己觀點的世界新聞英語頻道成爲具有戰略意涵的認知，2005 年 Russia Today 及 2006 年 France 24 相繼開播世界新聞英語頻道。這大約就是 2006 年半島電視英語頻道開播之際所加入的競爭場域，也是探討半島獨特成功需要比較參照的場域（見表 1）。

一個國家有或沒有自己觀點的世界新聞英語頻道，究竟差別何在？籌劃 Russia Today 的俄羅斯新聞社（Novosti）社長說：「很不幸，在西方形成的大眾意識裡，俄國形象總不外乎共產主義、冰雪、貧窮，我們希望呈現本國生活更完整的形象」(Seib, 2008: 38)。一位「泛非」（pan-African）英法語頻道的籌劃人說：「我們沒有一個能夠彼此對話並且向世界發聲的新聞網，我們收看國際新聞關於非洲的報導總是很負面：飢荒、戰爭、瘟疫、愛滋病、死亡。這裡當然有正面的事物，卻從不曾被報導」（同上引：39）。俄國、非洲如此，那麼臺灣呢？我可以補充一個見證：1980 年代留學美國期間，世界新聞關於臺灣的報導很稀少，幾個僅有的印象：華航空難、國會打架、臺灣漁船的流刺網破壞海洋生態、臺灣商人在南非濫殺海狗製造壯陽藥。

整飾國家形象，或許是某些國家開辦世界新聞英語網的動機。然而弔詭地，擔負整飾國家形象的任務，卻注定造就不出一個成功而受到重視的世界新聞頻道。Russia Today 正好就是一個例證，延續蘇聯時代爲政府宣傳服務的習性，想

電視網	開播年	財政／經營權
CNN	1980	股票上市公司（屬 Time Warner），受市場、廣告商、持股者約制
BBC World	1991	英國政府補助的公視系統，受國會約制
Deutsche Welle	1992	德國政府
Russia Today	2005	俄國政府
France 24	2006	法國政府控股公司 l'Audiovisuel extérieur de la France（AEF）
Al Jazeera English	2006	卡達王室

表 1：世界新聞英語頻道

airiti

要報導俄羅斯正面形象的新聞，想要抗衡西方對俄國人權問題的指責，想要辯護俄國武力鎮壓車臣的正當性，但是在當今開放的全球新聞市場，這般不脫宣傳習性的世界新聞注定不具有競爭力，自趨邊緣。同樣的結構性問題，我不看好中國的央視網或新華網可能造就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全球新聞頻道。儘管，俄國與中國都十分羨慕半島全球新聞網能夠如此快速崛起並擁有巨大影響力，儘管俄國與中國政府是當今數一數二最富有的政府，資金挹注能力絕不輸給卡達王室，但是他們無法仿效半島的，卻是不以宣傳任務或言論檢禁來干涉新聞專業的編輯自主性。同樣理由，他們也無法仿效如 CNN 這般不隸屬於政府的股票上司公司，或是像 BBC World 這般由國會監督的公共電視系統來經營他們嚮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聞網。

資金之外的必要條件是新聞專業人才。半島得以在 1996 年底脫胎而出，有個戲劇化而深具啓發意義的機緣：由英國與沙烏地阿拉伯聯合創投的 BBC Arabic 電視頻道破局。據說在播出一段處決的紀錄影片之後，出資者沙烏地阿拉伯在新聞編輯自主的問題上起了爭執，認爲 BBC 違犯了阿拉伯文化敏感的禁區。兩邊齟齬惡化，終至拆夥。整組經過 BBC 訓練、政治敏銳、具有西方新聞專業調查報導能力的新聞人員頓然失業。此時，半島的創辦者接收聘用了其中的大部分，約 150 位新聞專業人員，構成了半島新聞團隊的核心。重要的是，半島也承繼了前 BBC 團隊的新聞編輯精神、自由與風格，使得半島新聞報導內容在品質與深度上遠優於中東地區其他的新聞來源 (Powers, 2012: 9)。

資金與新聞專業人才是任何新聞媒體的必要條件，卻並非充分條件。Russia Today 的侷限，以及 BBC Arabic 的破局都說明了徒有雄厚財力，若不能容許新聞專業不受出資者檢查、控制、操弄，不能容許編輯自主的專業精神，不可能在當今開放的全球新聞市場成就具有競爭力的全球新聞網。半島首先能夠在阿拉伯世界迅速崛起，在於其創辦者能夠慧眼認識到在中東地區一個認真、獨立、不偏袒服務任何宗派政黨的新聞媒體是有市場需求的。然而實現這個理想市場的前提是一個不受金主檢查操控，能夠專業自主的新聞團隊。確實，半島獲致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夠享有其他阿拉伯電視頻道所沒有的自由餘地，而資金贊助者卡達王室對於干預的節制是個難得的條件。

參、半島與卡達

卡達是位於阿拉伯半島波斯灣一個小半島上的世襲君主制酋長國，1971 年自英國獨立，王室爲阿爾塔尼（Al Thani）家族。卡達首都多哈（Doha），領土

airiti

僅約臺灣的 1/3，人口僅 200 萬，其中卡達人不到 70 萬，其餘是持工作簽證居留的外來移工；石油與天然氣占出口與政府收入的 90%，卡達人均 GDP 世界第一；官方宗教爲伊斯蘭教，官方語文爲阿拉伯語。

1995 年謝赫 • 哈馬德（Sheikh Hamad）在內閣、軍方、鄰國的支持下發動宮廷政變廢黜了旅居瑞士的父親，成爲卡達君主（Emir）。哈馬德受英國教育，掌權後即籌劃創立一個獨立自主不受政府操控的半島電視網，同時展開一系列自由化改革，賦予婦女選舉權，推動女性受教育，放鬆出版審查，廢除了每個阿拉伯國家都有的、責司廣播電視報紙檢禁言論的情報部，並將新聞自由寫入憲法。

哈馬德投入 1 億 4 千萬美元在 1996 年開播了半島泛阿拉伯電視頻道（Al Jazeera Arabic, AJA），並且保證不干涉新聞專業的編輯自主。5 年之間半島規模已具有 350 位新聞人員，以及分布在 31 個國家的 55 位常駐國外特派員。儘管半島在阿拉伯世界迅速建立信譽且日受歡迎的成功每年已能獲得估計超過 5 億美元的廣告收入，哈馬德仍持續每年挹注 1 億美元 (El-Nawawy & Iskandar, 2003: 33-34)。2003 年春半島爲英語世界推出英文網頁（Al Jazeera Net）；哈佛畢業、受 BBC 訓練的首任主編 Joanne Tucker 宣稱：「我們要成爲全球公民的首頁」（轉引自 Powers, 2012: 13）。2006 年哈馬德再投入 10 億美元開辦半島電視英語頻道（AJE），試圖吸引具有能力、聲譽卓著的國際新聞人才，運用先進科技，以深具野心的嶄新頻道，進一步浸透西方新聞市場。

AJE 的創建團隊有前瞻的宏大目標：「成爲全球公民的新聞門戶」、「透過跨文化新聞敘事，在不同人民與文化之間建立相互理解的橋樑」、「爲國際閱聽人提供獨立、公正的新聞，讓低度報導的區域能以各種觀點發聲」、「平衡南北的資訊流向」。他們也有精準的策略藍圖：「成爲第一個立足中東、瞻望寰宇、與 BBC 和 CNN 完全不同的視野觀點，挑戰支配的新聞敘事與議程，翻轉全球資訊的流向」、「回應世界各地希望不透過西方鏡片的新聞需求」、「不受地緣政治與商業利益的支配，深入孤立偏遠、被忽略的世界角落」(Amin, 2012: 29; Powers, 2012: 18)。稍後我們將探討半島如何在艱鉅複雜的挑戰之下堅持新聞專業精神以實現他們宣示的目標，這裡我們仍對焦於金主卡達王室與半島新聞編輯自主之間微妙的關係。

卡達王室贊助而不干涉半島的新聞專業，難道真的超然於自身的利益嗎？半島獲致的信譽、國際聲望與影響力，成爲卡達追求外交興趣極有助益的資產。卡達在阿拉伯世界裡是蕞爾小邦，受到大國如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的擠壓是地緣政治裡的平常。半島的成功給了卡達王室一隻麥克風，爲卡達政府參與塑造阿拉伯政治持續提供有力的工具。半島讓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有影響力的政治異議人士

airiti

在節目上發聲，潛在動員阿拉伯群眾的威脅讓卡達在政治協商中得以居於上風。前 AJA 主播 Helal 曾比方：「半島猶如核武備選」，其潛在威脅成爲卡達在外交關係上的武器；他的一句名言是：「卡達創造了半島，而今半島創造卡達」（轉引自 Powers, 2012: 11）。

因此，創辦 AJE 當然也有地緣政治的動機。只不過，這樣的投資，既不尋求短期的財務報償，也不同於阿拉伯其他政權直接操控媒體當作其政治利益的喉舌，而是長線搏大魚，放出其他阿拉伯媒體絕對沒有的自由度，以文化開放、進步開明的形象，不干涉新聞專業自主精神，成就了具有獨特競爭力的全球新聞網，贏得國際聲望與廣泛持續的影響力。若不具有這般高瞻遠矚的眼界與節制，世界各地多如過江之鯽的媒體金主，無論在其他阿拉伯國家或是臺灣，不能節制對所屬媒體干涉操控的慾望，結果只會是一個個猶如井蛙的墮落媒體，以及喪失專業精神、自甘工具的新聞雇手。

儘管有著開明的形象，卡達的專制君主仍然成爲有些人質疑半島獨立性的負面包袱。一般媒體通常避免報導可能冒犯其金主或廣告贊助者的故事。那麼，向來不忌憚掀髒衣簍子，設定議題挑釁中東地區各國獨裁者的半島，也會以調查報導來指控卡達王室的獨裁或腐化嗎？我們似乎找不到這樣的報導。一個最近的例子可以用來觀察半島的微妙拿捏。2013 年 10 月，卡達最高法院將詩人 Mohamed Rashid al-Ajami 判刑 15 年定讞，罪名是污辱卡達王室、散播煽動性言論。Al-Ajami 於 2011 年底遭逮捕，因爲他在阿拉伯之春發源的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期間發表了〈茉莉花之詩〉，寫到：「在鎮壓者之前，我們都是突尼斯人……我祈願這場變化會來到那些相信美國武力乃榮耀的愚昧統治者的國家」，暗指出借美軍基地的卡達王室。人們認爲有著半島這麼自由媒體的卡達，不該有這樣的文字獄。在整個審判期間，半島沒有針對此案進行評論，只是中性地報導了此案的審理與結果，並在這項報導的網頁保留了意見紛紜的 50 則讀者評論 (Al Jazeera, 2013)。

肆、平衡報導即多方挑戰

半島一個知名的標語是：「意見，以及另一方的意見」。平衡報導、公正不偏、以多重角度多方聲音探討議題，是半島認真宣示的新聞專業核心價值。當作口號聽來容易，然而在阿拉伯世界的媒體卻是絕無僅有，就如在臺灣同樣是稀有難得。回顧半島 17 年來不間斷地遭受無數的攻擊打壓、封臺禁播、閉館驅逐、記者遭拘留關押、甚至在蓄意轟炸中喪生，我們才能深刻體會新聞專業在堅持這些核心價值時的艱困遭遇，必須付出的代價，以及堅持的勇氣。平衡報導、公正不偏、盡

airiti

其所能聆聽每一方聲音——聽來單純無害，認真付諸實踐之時，不可避免地就是對複雜利益與權力現狀的多方挑戰。沒有其他媒體比起處於中東複雜情勢、又志在挑戰西方媒體霸權的半島有著更多橫逆險阻的歷練，給予啓發的教訓。只有在這個脈絡下，才能理解半島如何贏得聲望與尊敬，以及並非虛得的成功。

自半島泛阿伯電視網（AJA）1996 年底開播到 2005 的 10 年間，卡達收到各國政府表達對半島不滿的正式投訴超過 450 件。卡達官方一貫的答覆是：半島是獨立頻道而非國家頻道。許多阿拉伯國家當局指控半島成爲異議份子與反政府運動的發聲管道，同樣理由阿拉伯民眾卻視半島爲中東地區唯一值得信任的新聞頻道。在探討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的議題時，半島完整播出以色列官員的專訪，在阿拉伯世界一面倒的態度之下，這幾乎是阿拉伯媒體的絕對禁忌 (El-Nawawy & Iskandar, 2003: 23)。半島阿拉伯語論辯節目 Al-Itijah al-Mouakiss（the opposite direction）讓反對派異議份子上台發聲，經常引起阿拉伯各國當局跟卡達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突尼西亞和利比亞曾因此召回大使以示抗議，約旦因此關閉了半島辦公室 (Lahlali, 2011: 86)，阿爾及利亞政府爲了報復這個節目辯論阿爾及利亞政治情境而凍結了半島特派員的活動。沙烏地阿拉伯則呼籲撤出廣告杯葛半島，召回大使，拒絕半島採訪每年的麥加朝聖活動 (El-Nawawy & Iskandar, 2003: 211)。

諷刺地，堅持平衡報導、多方角度探討議題，反而經常招致敵對各方同時譴責半島偏袒對方。2000 年巴林禁播半島頻道，指責半島爲猶太復國主義服務。2009 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譴責半島對巴勒斯坦當局不利的報導並關閉半島辦公室。同年，以色列卻杯葛半島阿拉伯語頻道，指責其在加薩衝突的報導上偏袒哈馬斯，起初考慮宣布半島爲敵對媒體並關閉半島在以色列的辦公室，但經過法律評估後，以色列政府改採更爲世故的手段，拒絕對半島新聞人員續發簽證，也不發給新簽證。2012 年中國當局仿效這個手段，以不明原因拒絕續發簽證給半島駐北京特派員，半島被迫關閉北京辦公室。伊拉克過渡政府曾於 2004 年關閉半島巴格達辦公室，2013 年再禁播半島頻道，聲稱其助長宗派騷動。半島堅持以多重角度、多方聲音探討諸如伊斯蘭律法、阿拉伯民族主義、言論自由等議題，在阿拉伯世界培養了一個公眾討論、政治積極、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 (El-Nawawy & Iskandar, 2003: 28)。各國當局的譴責打壓，正好反襯說明了半島受到民眾信任與歡迎、影響力不容忽視。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埃及當局在反覆革命抗爭的不同時期不同情境對半島的攻擊打壓。2011 年 1 月底，埃及政府下令關閉半島辦公室，國安單位逮捕了 6 名半

airiti

島新聞工作人員，沒收了攝影設備。穆巴拉克政權卻在兩週之內垮台。中東觀察的資深學者認爲在這一波他們稱爲「阿拉伯覺醒」的跨國革命抗爭浪潮裡沒有革命政黨領導，而半島衛視新聞是阿拉伯國家之間關鍵的傳播連結，無可爭議地是主要催化因素 (Dabashi, 2012: 214)。廣受歡迎的半島記者訪問聚集在開羅市中心咖啡館的青年，問何以認爲他們的革命成功了或是否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紛紜的回答，有直截了當、有意味深長、有批評、有懷疑、有前瞻，但都認爲他們能聚集在開羅市中心的咖啡館透過半島向全球觀眾發聲這個事實，就是革命成功最有力的徵候。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此處此刻，已經向全球播出（同上引：98）。

然而 2013 年場景逆轉了。6 月，開羅數十萬人示威要求穆爾希（Mohamed Morsi）總統下台。7 月初軍方宣布廢黜穆爾希總統。半島獨家播出柏克萊加州大學 1 份調查報告顯示美國政府金援部分反穆爾希活動。8 月中過渡政府對支持穆爾希的穆斯林兄弟會示威群眾武力清場，半島是第一個現場報導鎮壓行動造成上百人死亡的國際媒體。9 月初，警方持法庭頒令查封了 3 家穆斯林兄弟會的電視台並逮捕其工作人員，稍後警方同樣查封了半島電視台並拘禁其新聞工作人員。軍方設立的過渡政府指控半島衛視支持穆爾希的穆斯林兄弟會、新聞內容偏頗煽動，半島駁斥這項指控。半島若要堅持「聽另一方聲音」的平衡報導原則，就不可能順從軍方意旨將穆斯林兄弟會消音，無視於那畢竟是個埃及 1/4 人口的重要政治勢力。

2013 年 7 月埃及的政局遞嬗，是否稱其爲政變（coup d’état），判分了兩種立場。對此我可保留暫不擇立場，因爲罷黜穆爾希政權畢竟有大多數埃及民意的支持，而且過渡政府公布了修憲，以及國會與總統選舉的時程表。但是對於查封電視台與報社、拘禁新聞人員，以 2011 年開羅青年感受革命成功的定義——能夠自在地聚集在咖啡館透過半島自由地向全球觀眾發聲，那毫無疑問是革命的挫敗。而接管情報部審查言論，打壓新聞自由的軍方，毫無疑問是反革命勢力。

伍、半島與美國的糾結與試煉

半島堅持平衡報導、多方聲音、不偏袒的新聞專業原則糾結最深的試煉來自美國。一個在中東有廣泛影響力、志在挑戰 CNN 與 BBC 等西方媒體支配新聞議程與新聞敘事的新聞媒體，要如何能夠不被視爲挑起中東地區反美情緒的敵對媒體？另一方面，若半島的戰爭報導遭遇美國政府的指控與關切而審度自身新聞原則做出修正，又要如何回應其他競爭者暗示半島被美國當局收編的中傷？

2001 年 10 月之前，美國國務院已有不少官員每天收看半島節目，很瞭解半

airiti

島在阿拉伯世界有廣大收視人口，影響力深遠。華盛頓的外交、顧問與遊說圈子的人員對半島的自由風格頗有好評。然而這一切對半島的認知在 10 月 7 日阿富汗戰爭開打之後，頓然發生轉折。進入戰爭狀態，對於媒體的報導與編輯裁量登時出現許多敏感的問題[1]。美國外交官向卡達高層正式投訴，指控半島爲反美活動份子如賓拉登與蓋達恐怖組織提供太多播報時間。當時半島是唯一能夠進入塔里班控制區的電視網。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向卡達君主哈馬德表示希望半島調降刺激性言論的音量。會後與鮑威爾發表聯合記者會時，哈馬德說：「我們從美國當局聽到這件事，你們的議會民主生活要求有著自由與可信賴的媒體，而這正是我們試圖做到的」。稍後，半島不客氣地回應：「我們從美國學習媒體的獨立自主，而現在美國官員竟然要我們放棄我們從他們那兒學到的價值」、「我們的批評者似乎忘了賓拉登是這場戰爭中交戰的一方，我們必須爲觀眾呈現這一方的聲音，否則如何能夠稱得上平衡報導？」國際新聞協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也幾乎立即遞交一封信函給鮑威爾國務卿：「任何一國企圖對他國的獨立電視網進行檢查都侵犯了編輯自主，並且對新聞自由有嚴重傷害」(El-Nawawy & Iskandar, 2003: 176-177)。

國務院隨即澄清布希政府沒有影響或控制半島的播放。但在關切半島的前一週，國務院曾企圖干預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訪談塔里班首腦奧瑪（Mullar Omar）的計畫。之後，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更與美國 5 大電視網（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ABC〕、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CBS〕、CNN、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NBC〕、FOX News Channel 〔FNC〕）執行長及美國主要報紙主編進行會議，尋求協議：未經仔細審查不轉播任何賓拉登傳送的訊息。少數美國報紙專欄抨擊這項措施妨害新聞自由，也有國際的媒體自由倡議組織抨擊：「美國加入了中東許多毫不尊重新聞自由的威權政府攻擊半島」。然而，更多的評論將半島描述爲「賓拉登同路人」、「賓拉登最愛的電視網」(El-Nawawy & Iskandar, 2003: 178-179)。

2001 年 11 月 12 日，美國飛彈襲擊喀布爾的半島辦公室，幸好 10 名工作人員於一小時之前離開未有傷亡。2003 年 4 月 8 日，美國飛彈擊中巴格達的半島辦公室，記者 Tareq Ayyoub 喪生，數名工作人員受傷。半島執行董事 Mohammed

1 1982 年福克蘭戰爭期間英國對於新聞自由的檢禁與箝制是我年輕心靈的一記覺悟：即便世故的民主國家如英國，在戰爭期間新聞自由還是個屈從的價值。當時福克蘭隨軍記者團依賴皇家海軍餵食新聞的情況，在兩次波灣戰爭裡英美記者團依賴軍方餵食即時新聞的情況又見到翻版，稱為「嵌入式記者團」（embedded reporters），見下文。

airiti

Jasim Al-Ali 指控：半島早在空襲前數週即向美方報告喀布爾與巴格達半島辦公室的位址座標；意指不可能如美方託詞的是「意外」或狀況不明的誤炸。半島特派員則向他們的 4 千 5 百萬觀眾表示他們認爲這是蓄意攻擊。《紐約時報》與《今日美國》（*USA Today*）分別出現評論，認爲此一悲劇事件是美國與阿拉伯世界公共關係的挫敗，令阿拉伯世界質疑伊拉克戰爭的動機，也影響日後對這場戰爭的認識 (Shapiro, 2003; Steinberg & Rutenberg, 2003)。

半島的戰爭報導令美國當局感到挫折的是持續出現阿富汗與伊拉克平民婦孺傷亡的影像，令阿拉伯人對美國的軍事行動感到憤怒，助長了反美情緒。五角大廈對於整飾戰爭印象有精心的策略：嵌入式記者團，約 600 名各國記者被安插跟隨英美軍事單位，接受軍方餵食的新聞資訊。西方媒體壟斷的戰爭印像，原本該是一場高科技精準攻擊、傷亡微不足道的「乾淨戰爭」（clean war）。這個布局企圖經營的神話卻因爲半島電視網貼近在地的報導與影像而破敗。在新聞用語上半島也堅持自己的觀點。美國媒體逕稱「反恐戰爭」，半島卻稱「美國與他們所謂恐怖主義的戰爭」。半島用語的分際是：911 攻擊世貿大樓是恐怖主義行動，但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拘捕無辜民眾、轟炸民房的手段，不能視爲反恐行動。儘管半島一再否認偏袒塔里班或是反美，強調遵循開播以來一貫的新聞自主與平衡報導，華盛頓智庫「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社長 Gaffney (2003) 表示不論以什麼手段，應該搞掉半島電視，因爲它構成了敵方媒體（enemy media）。國防部長倫斯裴（Donald Rumsfeld），主導「嵌入式報導」（檢禁 + 宣傳）的五角大廈首長，竟然指稱半島播報新聞影片裡的平民死亡影像是編造的，是煽動性的宣傳 (El-Nawawy & Iskandar, 2003: 181)。美國當局對於半島不實攻擊的一個糟糕的效果是暴露了自身說一套做一套的雙重標準：當一個國家沒有新聞自由的時候，批評那是個壓迫的、沒民主的國家；而當一個國家努力實踐新聞自由的時候卻又遭到同樣那些人要求封鎖消滅他們的聲音。打壓半島一個惡劣的暗示是：阿拉伯世界的言論自由對於西方是個威脅（同上引：180，212）。

2006 年底 AJE 開播，在美國電視市場尋求擴張是個重要目標，因爲無論就收視人口、廣告收益、政治影響力，都有顯著誘因。半島在美國沒有被禁。但是直到 2011 年春季之前，半島仍然揮不去被抹爲「恐怖份子傳聲筒」的形象、在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中是個壞蛋的角色。2011 年半島在美國有了戲劇性的時來運轉。我們看到美國政治菁英對半島幾乎是列隊鼓掌地讚美。10 年前企圖施壓干預半島的前國務卿鮑威爾說：「我是個新聞上癮的人，以前總是在有線頻道不

airiti

斷轉台，近來愈少看電視，愈多瀏覽網頁，現在則都看半島」[2]。8 年前指控半島新聞影像是煽動性宣傳的前國防部長倫斯裴說：「半島的觀眾與日俱增，可以成爲與世界溝通的一個重要管道，我很高興你們堅持了你們所做的」[3]。參議員麥肯（John McCain）說：「半島做到了我們每個人長大後都想做到的：貢獻一個可長可久，足以惠及我們未來世代的成就」(Hagey, 2011)。其中被引述流傳最廣的要屬當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說：「半島在美國的觀眾與日俱增因爲那是真正的新聞，你覺得你獲得了環繞世界的真實新聞而不是沒完沒了的商業廣告和名嘴開講」[4]。

2011 年半島在美國感受到春暖的時運，有幾個背景。其一是歐巴馬政府在對待阿拉伯，以及穆斯林的關係上語調更具敏感度。更重要的背景是阿拉伯之春讓美國公眾燃起了前所未有的熱情。歐巴馬及其幕僚持續收看 AJE 來瞭解騷動局勢的發展，認識到半島電視網在中東地區是個民主改革的力量 (Youmans, 2012: 64)。美國國土安全部副部長 Julliette Kayyem 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Lee Bollinger 分別專欄撰文呼籲美國有線電視業者載播 AJE。Kayyem (2012) 認爲美國有線電視業者排除半島頻道所傳遞的惡劣訊息是：美國人對於阿拉伯世界的聲音沒有欲望傾聽，沒有興趣討論。Bollinger (2011) 則認爲，是美國公民需要能夠收視半島，以有助於美國加入跟世界的對話。

2011 年半島在美國的突然轉運讓某些角度的謠言得以渲染，一個來自俄國的暗示：是否半島跟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有了暗盤。插曲是：2011 年 9 月 20 日，極富聲望、領導 8 年的半島總社長 Wadah Khanfar 辭去職務，由一位卡達王室成員接任。隔天 Russia Today (2011) 即播報一則新聞，標題：〈敵人變朋友：美國對半島改變了姿態〉，以「據謠傳」做開場白，整條新聞編織暗示：指稱 Khanfar 因爲維基解密（WikiLeaks）的一筆備忘錄而被迫辭職，暗示半島跟中情局有掛勾，解釋了何以美國對半島態度轉變，也暗示半島報導中東騷動的路線將遵從美國利益，而非半島標榜的新聞自主[5]。

---

2 參考網址 http://www.boston.com/ae/specials/culturedesk/2011/02/an_al_jazeera_fan_sent_by_coli.html

3 參考網址 http://talkingpointsmemo.com/news/how-times-change-donald-rumsfeld-praises-al-jazeera-video

4 參考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zW4AKrOIak

5 2012 年秋季我在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文化研究理論」課上討論到半島效應，一位博生因為維基解密半島相關的報導而質疑半島也是個被美國收編的媒體。我於是仔細檢視了維基解密內容及相關報導，並於次週 email 回覆班上同學，建議不要憑著報導標題而輕信，仔細檢查並沒有見到任何 CIA 掛勾或美國收編的證據，而美國對半島報導伊拉克戰爭的關切與試圖影響是當然可以預期的，那正因為半島新聞的自主報導持續有許多令他們頭痛的內容。半年後收到 Douglas Kellner 寄給我他剛出版的新書，發現他對維基解密插曲與半島的獨立性也有詳細的考察與兩整頁的討論，跟我的判斷完全一致。

airiti

同一天，Kirkpatrick (2011) 在《紐約時報》撰寫了一篇：〈維基解密揭露之後，半島更換高層新聞主管〉。這篇評論仔細分析維基解密所揭露的內容：依據一份 2005 年 10 月的備忘錄，美國大使與半島新聞主管 Khanfar 會議，使館人員交給 Khanfar 先生一份美國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對過去 3 個月期間半島對伊拉克戰爭報導的評析報告，Khanfar 表示卡達外交部已經轉交給他其中兩個月的報告，顯示這是個美國政府、卡達政府、半島電視網的三方諮商。備忘錄顯示 Khanfar 認真看待被美方官員指出半島報導中有反美偏頗之嫌的幾處，撤掉兩幅受傷兒童在醫院的照片，以及一位婦女顏面重傷的特寫影像，表示未來報導伊拉克戰爭時將盡可能做到公平，但不同意簽署任何「協議」（agreement）。維基解密資料裡沒有任何半島掛勾 CIA 或是將爲美國政策服務的證據。考察這段插曲始末 Kellner (2012: 235-236) 指出，若沒忘記當時布希政府是如何激烈攻擊半島，這般暗示半島和美國當局共謀的指控是令人發笑的。即便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的時刻半島報導與美國政策沒有衝突，也是半島決然領先支持阿拉伯之春，對中東地區美國盟友的獨裁者們持續進行批判報導。Russia Today 暗示半島對敘利亞批判，而對巴林柔軟（敘利亞是俄國有海軍基地的盟友，巴林是美國有空軍基地的盟友）。Kellner 指出這般比較的指控完全不實，巴林政府對抗爭者的鎮壓受到半島極爲尖銳的批判報導。經過仔細考察，他認爲 Russia Today 牽拖編織什麼 CIA 掛勾，什麼美國路線的共謀，在維基解密或其他新聞都完全找不出證據，是 Russia Today 中傷一個主要競爭對手的宣傳故事，在全球新聞網競爭的時代，是個可恥的插曲，反證了 Russia Today 的不可信賴（同上引：236，291）。

Khanfar 在給同事朋友的一筆推特裡寫到：「所有關於我辭職的謠傳讓我感到娛樂」(Al Hussaini, 2011)。他不再回應，因爲早在 2004 年接受《紐約時報》的一次專訪 (Abt, 2004) 中已經都說明了：

> 打從開播以來，我們就被指控說我們是由 Mossad（以色列情報局）、CIA 創立的，或是說我們背後是美國在操控、是這個或那個政權在操控、是賓拉登在操控，這些胡扯對我們來說是個徵候：我們做得很對。……我們沒有口號和宣傳，我們只是熱愛新聞工作的普通人。

《紐約時報》給這篇專訪的標題是：〈至於半島，平衡報導經常讓各方都不爽〉。

airiti

陸、突破以色列與西方設定的感性識框

戰爭爲新聞媒體帶來複雜的挑戰，能夠贏得信任尊敬或是證明無足輕重，是媒體判分輸贏的時刻。1991 年波灣戰爭是 CNN 擅場的時刻，就如 CNN 的標語：「世界都在看 CNN」，因爲世界沒有選擇。那時候在 CNN 與一些美歐的新聞提供者之外，全球媒體近乎真空。但在波灣戰爭之後，兩項新狀況將改變西方媒體霸權的現狀。其一是像半島這般衛視頻道的出現，其二是網際網路的普及。考驗與成就半島聲望的事件不僅是美國主導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還有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Second Intifada, 2000-2004）及 2008-2009 年的加薩戰爭。半島衛視的報導，讓阿拉伯民眾能夠不再受西方媒體鏡片的過濾或是政府檢禁的屏蔽。當超過半數的阿拉伯觀眾拋棄了原來收視的頻道，包括西方媒體如 CNN、BBC 與美國之音（VOA），而轉向半島衛視，以色列很震驚地發現，環場的政治氛圍變得對他們而言更爲艱難。

向來，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上，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大致接受以色列政府設定的識框。以色列有非常專業、多方面的資訊機構，相較於巴勒斯坦嘈雜凌亂的發聲，以色列對於西方媒體與世界輿論有著優越而世故的影響力。但是當 2000 年 9 月巴以衝突爆發時，半島以不間斷的影像報導著巴勒斯坦起義的抗爭，以及以色列軍事行動之下未經過濾修飾的死亡、傷害與摧毀，播向全球 12 億穆斯林，也受到 22 個阿拉伯國家及移民歐美亞非各洲的阿拉伯家庭關注的收視[6]。以色列不再能宣稱他們武力鎮壓巴勒斯坦人是合理的。半島呈現了不是那麼回事。以色列不再像是受威脅的弱狗，而像是霸凌弱狗的豪強。一週之後，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以色列過度使用武力。以色列主導的媒體霸權被動搖了。半島成爲阿拉伯公眾家喻戶曉的名字 (Miles, 2005: 68, 80)。傳播研究者也發現阿拉伯觀眾對西方媒體的興趣減弱，CNN、美國之音（VOA）、BBC 都流失了收視戶 (Miladi, 2003: 159)。

2008 年 12 月 27 日，以色列國防軍對巴勒斯坦加薩走廊的哈馬斯目標執行代號「鑄鉛行動」的轟炸，開始了將持續 23 天的加薩戰爭。以色列事前以保障安全爲名拒絕了所有外國媒體，AJE 的巴勒斯坦新聞工作人員是唯一留在現場的媒體見證。冒著轟炸與地面部隊攻擊的危險，克服技術困難，實況轉播轟炸與坦

6 以 El-Nawawy & Iskandar (2003: 66) 訪談的北美半島觀眾為例，我們可以一窺世界其他地方可能略同的狀況：住在巴爾的摩的摩洛哥人與埃及裔美國人，住在阿拉巴馬州的巴勒斯坦裔美國人，南加州與各地阿拉伯人咖啡館、土耳其人咖啡館裡聚集的人，都黏在電視前看半島頻道播報巴勒斯坦起義的新聞。

airiti

克輾過農田的影像，訪問加薩城裡的平民與救援工作者，AJE 突破了以色列的媒體封鎖。AJE 報導轟炸與地面攻擊如何從警察局、公務建築、清真寺隨機地轉向平民的鄰里，戳破了以色列宣傳報導企圖呈現的圖像：一個防衛的戰爭。8 個月後出爐的聯合國調查報告裡指責以色列「蓄意」、「過度地」攻擊加薩走廊帶有「懲罰」、「羞辱」、「震懾」巴勒斯坦平民的意圖（轉引自 Merriman, 2012: 121-128）。

加薩戰爭期間，AJE 的新聞編輯展現出對抗以色列優勢媒體戰的戰略思維。在美國，支持以色列的遊說勢力強大；以色列官方跟「局內人」有深廣的關係，所謂「局內人」指的是具有專業權威與信用、言語世故、能夠跟新聞業者議價或從新聞組織內部控制資訊流向以影響輿論的代表。若就局內人關係的資源，以及政府官方作爲新聞來源，AJE 不如 CNN 與 BBC。但 AJE 相對有較多的巴勒斯坦新聞來源，有更多民間、廣泛而多樣的新聞來源，致力於在報導中容納巴勒斯坦官方的聲音，同時邀請更廣的獨立菁英如分析師、法律專家、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容納更多邊緣團體（包括以色列的少數聲音）作爲新聞發聲的來源。AJE 也邀請以色列政府的官員，但總是在批判性的訪談脈絡下以新聞專業的敏銳對抗以色列政治與軍事菁英設定識框的企圖，暴露以色列政府進行資訊戰的官方編撰背離了加薩的真實情況。這種包容又批判的編輯策略，既符合半島「每一個角度、每一個面向」的新聞原則，又拆解了以色列媒體戰的設框企圖 (Figenschou, 2012: 48-50)。

AJE 敏銳地呈現了美國媒體裡缺少的角度或扭曲的方面：阿拉伯人的挫折，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巴勒斯坦受害者的觀點。相對的，以色列觀點的研究者則指出半島並不如他們自我標榜「聆聽另一方」那麼公正不偏：在加薩戰爭中半島只聚焦於悲劇性後果與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卻不曾批判地質問哈馬斯的意識形態與手段策略，以及加薩人民對所遭受的苦難是否也有責任；在 AJE 記者報導下，好像哈馬斯方面沒有人用武，而死亡的全都是巴勒斯坦的無辜民眾 (Gilboa, 2012: 149, 153)。事實上，AJE 同樣報導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在以色列境內造成無辜傷亡的慘境，這是其他阿拉伯媒體不曾做過的 (El-Nawawy & Iskandar, 2003: 208)。但是加薩戰爭 AJE 選擇的觀點乃至新聞語彙畢竟跟以色列觀點不同。以色列觀點之下，加薩戰爭是清除恐怖份子的軍事操作。但 AJE 呈現的巴勒斯坦鬥爭不是恐怖主義，而是抵抗以色列占領的抗戰，是巴勒斯坦人民尋求自由與獨立的解放鬥爭。因此，AJE 不跟隨以色列與美國媒體以「恐怖份子」來標籤抵抗運動裡的個體。而在以色列鎖定狙殺哈馬斯領袖的事件，以色列與美國媒體都稱之爲

airiti

“targeted killing” 而不會使用 “assassination”（暗殺）一詞，AJE 卻毫不迴避地稱之爲「暗殺」(El-Nawawy & Iskandar, 2003: 207)。

從半島電視阿拉伯語頻道（AJA）報導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到半島電視英語頻道（AJE）報導加薩戰爭，半島證明了自身的重要意義：他們具有凝聚全球阿拉伯人感受性的能力；他們改變了阿拉伯人看電視的方式；他們在輿論與形塑公共政策上有影響力；他們成爲西方（尤其美國）瞭解阿拉伯人對中東事件觀點的重要管道。然而我認爲半島報導戰爭的新聞工作帶來一項遠超過中東地區的影響：對於戰爭的苦難能夠或不能夠感同身受的界線，將不再由西方觀點壟斷設框。

在這個問題半島現象引起我的重視，時間上平行於我關注的一個政治哲學的爭議脈絡。美國政治哲學家 Michael Walzer 在討論正義戰爭（Just War）的脈絡下界定恐怖主義之「邪惡」在於：「不僅是殺戮無辜，而且是將恐懼注入日常生活，侵犯私領域，造成公共空間的不安全感，無休止的強迫警戒」(Walzer, 2004: 51)。人類學者 Talal Asad 反駁他的意見並且質疑：完全依此同樣判準回顧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執行的反恐戰爭，難道不就是由國家執行的恐怖主義嗎？爲什麼自由民主的西方對於自殺炸彈攻擊的邪惡如此敏感地指認爲伊斯蘭的死亡文化，卻對其自身或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執行恐怖與殘酷的死亡事業沒有絲毫感受？ (Asad, 2007) 於是我們遭遇到一個不能迴避的根本問題：對於戰爭苦難能夠或不能夠感同身受的界線在哪兒？是否有可能改變？哲學家 Judith Butler 指出，某些生命若喪失了會受到哀悼（grievable），某些生命喪失則不會受到哀悼（ungrievable），兩者似乎可做個全球的劃分。公共哀悼與否的差別分布是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問題。例如設想：是否可能阿富汗與伊拉克遭到美國以反恐戰爭之名殺害的每一位無辜平民，加薩遭到以色列國防軍以清除恐怖份子爲名殺害的每一位無辜平民，都能夠如同 911 世貿雙塔的 3 千多位受難者一樣，呈現影像、姓名、故事、以及親友同事對他們生命的證詞，讓我們都能看見、知道、感同身受？(Butler, 2009: 38-39)。

美國總統歐巴馬曾一度回想他曾經造訪以色列北部的小城謝莫納（Kiryat Shmona），覺得跟美國郊區很像，「可以想像就像我的女兒那般快樂嬉戲的以色列孩童」。2008 年 12 月以色列對加薩發動「鑄鉛行動」之時，新就任的總統歐巴馬說：「如果有人在我女兒晚上安睡時向我家發射火箭彈，我將盡全力阻止他，我理解以色列也會這麼做」。「鑄鉛行動」以色列國防軍的槍彈砲火造成 313 位巴勒斯坦兒童死亡。爲什麼以色列兒童這麼能喚起對自己女兒感同身受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卻對於巴勒斯坦兒童的苦難處境如此視若無睹、漠然無感呢？哥倫比亞大學思想史學者 Massad (2011) 在半島英文網頁撰寫了一篇〈巴勒斯坦

airiti

兒童是否比較不值〉，引起了 683 篇跟評，以及其他學者的討論 (Dabashi, 2012: 41-44)。這些評論在探討「會受到哀悼」與「不會受到哀悼」的感受劃分，卻同時也在改變這個界分。

文學、藝術、哲學都有可能參與改變對喪失的生命是否哀悼的感受界線。而我認爲半島的戰爭報導帶來感受性的挑戰，是個有力的說明：哀悼與否的差異分布，一個有重要意義的政治問題，首先就是個傳播媒介的問題，新聞議程與敘事鏡頭的問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若是聽不到看不見，那麼喪失的生命很容易被抽象爲統計數字或無感的術語，戰爭免不了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

柒、「半島與我」的經驗省察

回到「半島與我」的個人經驗上，有些是傳播研究學者不會觸及的面向，或者說，那是些「私房的」省察。2010 年春季當我覺察閱讀半島改變了我閱讀世界的習性，首先，半島讓我覺察到我每日瀏覽的西方報紙網頁對於歐美之外的廣大世界是如此低度報導、稀少貧乏。這個覺察是不可逆的，這些西方報紙再也不能滿足我了。當然我知道他們有些什麼，需要的時候還是能熟悉地造訪，但半島取代他們成爲我每天優先瀏覽的窗口。接著，我開始反思我自身的養成，爲什麼還會因爲遭遇到半島而帶著驚訝的新鮮感著迷於之前不曾看到的世界。

我成長於20世紀後半，這個世界主要的框架叫做「中西」。中西文化的差異、衝突、交流、融合……大概就包涵了這一代人思考世界的多數旨趣。學院裡的文學分中國／西洋，歷史分中國／西洋，哲學分中國／西洋。博物館或參考書裡有中西對照年表。這樣養成，我們不曾察覺這個世界的圖像裡還缺少什麼。直到稍晚我才發現，世界上沒有其他人呼應著我們這樣的世界框架。除了少數專業漢學的人，西方沒有人將「西中」當回事。他們的世界框架是「西方」跟「其餘」（the West and the Rest），而中國只是「其餘」的一個角落。哈佛歷史學者 Ferguson (2012) 的近作裡中國一章的標題不用 “Middle Kingdom” 而用 “Mediocre Kingdom”（平庸國），不知幾分諧謔幾分認真，他指的是明清縱令是繁榮盛世之際也還是故步自封，不知轉眼即將樓塌。我後來理解，「中西」世界架構是 19 世紀中葉以來樓塌之後的創傷後世界觀，創傷是遭到西洋的闖入。而我們卻仍未覺察「中西」世界架構依舊十足是個地方狹隘（parochial）的世界觀。

再反省我的專業養成：社會學帶給我的世界。古典社會學背景是 19 世紀中後期歐洲，社會變化急遽、問題重重卻活力充沛。我們學著用資本主義、民族國

airiti

家、階級形構、宗教倫理……這些概念來看世界，其實是古典社會學者面對歐洲社會紋理的思考工具。沿著社會理論裡的觀念與思想史脈絡，我們回溯上探啓蒙運動、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封建社會與古代羅馬希臘社會；人物、事件、思想、社會背景，瞭解歐洲的經緯愈織愈細。美國社會學帶給我的世界則是芝加哥學派精采生動的都市民族誌，透過街角社會、移民社區、貧民窟、幫派、遊民移工、酒吧舞孃、旅館流鶯的民族誌作品，我們熟悉 20 世紀快速發展的城市如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嘈雜混亂又熱力繽紛的摩登時代。階級、族群、性別角色……我們最熟悉的是美國與歐洲的例子。這個世界的養成並非僅從書中獲得，也來自我重度旅遊的習性。1980 年代在美國留學，1995 年之後在歐洲的學術活動與訪問居留，每當有一、兩個月的旅遊，那麼之前半年是沈浸在文學與歷史中的神遊籌劃，之後半年則是泡在書堆裡求解旅程中發生的驚異與問號。旅遊的開啓，經常醞釀其後數年的教學研究與創作。我書房牆上一板巨幅世界地圖，歐洲與北美兩塊幾乎已插滿了大頭針。

這麼敘述好像在展示什麼，是的，我在展示空白與缺漏，也就是解釋遭遇半島時的發現與省察。我相信我的個人經驗不是個人的。因此，半島宣示要將沒有聲音、不被看到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聲音帶出來、帶給世界，翻轉全球不平衡的資訊流向，是個遠見而又準確的反霸權策略。或許因爲跟 AJE 競爭，近來 CNN 與 BBC World 紛紛增加了中東與非洲的報導。但是 AJE 對於中東、非洲、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在無數議題上深入的調查性報導，仍遠勝於其他競爭對手。AJE 也製作了許許多多獲獎的紀錄影片，例如對南非最大醫院的急診室製作八集的系列紀錄片，很難想像 CNN 或 BBC 會出現這樣的議程 (Arsenault, 2012: 82-83)。AJE 網頁上每天有將近 10 篇評論文章，經常來自對「其餘」地區具有深厚背景的學者作家，例如 Richard Falk、Hamid Dabashi……。在關於「其餘」世界的議題，AJE 經常邀請研究者、紀錄片製作者與藝術家參與評論節目，無論在聲音的多樣或是探討的深度，經常是西方媒體做不到的。

AJE 大大拓展了我的視野。近 3 年各種題材愈來愈常成爲我與研究生分享或是課堂教學討論的材料[7]。在沒有半島之前，社會科學裡對於非西方世界的理解，

7 僅舉數例：種姓制度在當代印度社會持續演化的狀態；西非社會持續存在毒殺巫童的習俗，較古代希臘社會研究中 “pharmakos” 遺棄殺害或放逐「替罪羊」的宗教習俗；緬甸佛教徒對於 Rohingya 穆斯林的迫害，討論宗教國家多數迫害少數的人權問題；埃及政治諧謔電視節目與穆斯林兄弟會主導政府的鬥爭，討論伊斯蘭共和國與世俗國家方向的鬥爭；穆斯林社會關於「褻瀆」（blasphemy）律法的鬥爭，比較英國直到 1920 年代最後的褻瀆罪判例，以及歐洲經歷從宗教律法到世俗法律的過程；南亞、中東、非洲仍普遍的童婚制度，比較 Magery Wolf *The House of Lim* 1950 年代臺北縣的田野中一半女性角色曾是童養媳的時代，討論小農社會童婚制度的社會經濟理由。

airiti

往往得仰賴爲數稀少的西方人類學者的田野著作。而今半島貢獻了當代的、影像的深入報導與評論，就如在指尖之下的寶藏，豐富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擴展了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問題與思考。

捌、結論

在結論中我不再做歸納或摘要，而是將半島的啓發扼要翻譯爲我對華人全球新聞的夢想。我不是新聞學與傳播學者，對於新聞業的實做所知甚少，我只能以一個愛看新聞的觀眾讀者來夢想。

直到 1990 年代，因爲臺灣社會日趨自由開放，我們對於臺灣在華人世界中的文化創造潛力深具信心。就如臺灣的流行音樂伸展於華人世界那般的自然實力。我不能理解同樣的社會條件之下，爲什麼新聞事業卻不僅未能光照華人世界，反而轉趨退化，日漸墮落猥瑣。我們曾經如同今日中國大陸，苦悶於新聞媒體沒有專業自主精神而淪爲婢侍統治者的喉舌。而今，或許臺灣進步到執政黨與行政權知所節制不再粗魯操弄新聞媒體，然而我們卻沒感到寬慰，因爲新聞媒體大多依舊不知何謂專業自主精神，自甘婢侍於不同山頭的政黨意識型態與派系金主。其結果是，不忍卒睹的新聞及新聞談話節目。第四權之能夠尊貴，前提在於專業價值的警覺與自主精神的堅持，否則只剩下瑣碎的詬罵、陳腐的叫囂、處心積慮的派性編織。臺灣的世界新聞稀少單薄、幾乎不存在，社會新聞無聊猥瑣，這十幾年，我感到自己是被臺灣新聞遺棄的觀眾。不僅是我，周圍的同事、研究生、甚至大學生，提到臺灣的新聞與新聞談話，也都悵然無語。即便是名人如李安導演十分按耐的含蓄批評，也僅兩天就如船過水無痕。似乎沒人知道該怎麼振作這個醬染腐蝕整個世代的局面。

半島崛起的故事，給了樂觀的啓示。當大家都沈悶失望、感到被無聊新聞遺棄的時候，是否有人能具有半島創辦者那樣的慧眼認識：一個認真、獨立、不偏袒服務任何政黨派系的新聞頻道是有市場的！不必費神期待或是操心改造那些既有頻道的習性，他們就如半島出現之前上百個同類的阿拉伯頻道一樣。一旦有了新水準出現，生態自然改變，也不會有人有興趣再去探問那些井蛙溝鼠今日如何。這個新生的頻道應該如半島一樣，專門設定爲臺灣幾乎不存在的世界新聞。不要誤會，世界新聞與本地新聞並不互斥，而是不同層次的議程脈絡。例如臺灣的國會議長司法關說、同性婚姻平權運動、兩岸服貿協議乃至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等議

airiti

題，都可以在世界新聞的議程脈絡裡獲得不一樣的關注與層次不同的討論，參與發聲的方面不再侷限於本地政黨派系的刻板觀點。

參考半島崛起的時程，第一個 10 年專注於全球新聞華語頻道。目標在於獲得全球華人觀眾的信賴與歡迎。任務則分兩頭努力：報導（covering）與被收視（reaching）。報導工作應盡可能涵蓋臺、中、港、星、以及東南亞、北美、歐洲、拉美等有相當華人人口的地區，儘管在中國的報導工作有可能遭遇到跟半島一樣的對待（拒發簽證）。在被收視上，除了節目內容的競爭力之外，各地有線電視業者是否願意載播，有著各地文化、政治與商業因素的挑戰。而在政府掌握所有媒體的中國大陸估計被容許收視的可能性不大，或許需要翻牆擷取網際網路。

一個能堅持「多方聲音、平衡報導」的全球新聞華語頻道意味著什麼？我們將有超乎想像地多樣、令人興奮的新聞發聲來源，不僅統獨不是禁忌，人權、憲政、貪腐問題、同性戀，可能都在此鳴放，特別是華人若不限於漢人，那麼方面更爲複雜。依據半島經驗，可以預期臺、港、星執政當局的抱怨、甚至杯葛，中國當局的打壓，從輕的拒發簽證到重的外交壓力、拘禁記者，都是可能的遭遇。但是若真能克服艱困險阻堅持做到，因而獲得各地華人觀眾信賴的聲譽，那麼會是廿一世紀華人文化創造的一件成就，會如麥肯參議員讚美半島的：是我們長大後都想做到的，一件可長可久、嘉惠未來世代的成就。

那麼新聞專業人才這項條件呢？創立這麼一個全球新聞華語頻道，會需要 3 百至 5 百位具有調查報導能力、專業自主精神、知識上進取、政治敏銳的新聞工作人員，不是嗎？而臺灣平日看到的新聞記者那德性，行嗎？我倒是比較樂觀。首先，這些新聞專業人才當然不僅限於臺灣，也跨國地來自於全球華語人口的人才庫。其次，臺灣或許還是人才的主要來源之一，我提到社會自由開放的條件仍是因素。再說，平日看到許多電視頻道新聞記者或主播的德性，爲他們難過，但是若有出資者誓言並做到不干預不控制編輯自主，生態上不需要婢侍派系老闆，而是強調專業精神與能力，那麼相信志在從事新聞工作的青年在前瞻抱負上也必然不同，或許整個新聞專業的養成也將因爲有全然不同的展望而抖擻振作。

全球新聞華語頻道開播的同時推出中文網頁，數年略有規模之後推出英文網頁，包括新聞內容的英譯，以及新聞影片的英文字幕。這不僅培養日後英語頻道的收視人口，也會優先吸引廣大英語世界對華人世界有興趣而不能聽讀中文的讀者。我估計這樣的潛在讀者數量不小。關鍵是這個新聞網的新聞內容比現有的央視英文網更具競爭力，而我倒不認爲這是難事，因爲自由開放絕對是新聞競爭力的優勢。

airiti

全球新聞華語頻道 10 年有成之後，進一步創立華人的全球新聞英語頻道。這是進階參與世界對話，加入全球新聞英語網大聯盟，跟 CNN、BBC、AJE 競爭的重要一步。收視目標設定在全球每一位英語使用者，吸引全球英語新聞專業菁英的加入，跟臺灣與中、港、星的優秀新聞人員並肩工作。此後華語頻道英語頻道共同存在，相互支援。議程設定、新聞來源與評論參與的多樣，都提升到一個不同的層次，但不會跟本地事件更爲疏遠。重複一遍我們的例子：如臺灣的國會議長司法關說、同性婚姻平權運動、兩岸服貿協議乃至 TPP、RCEP 等議題，都可以在全球新聞議程的英語脈絡裡獲得不同層次的關注與討論。在觀念、價值、判斷上，我們將聽到與今日臺灣名嘴刻板立場的陳腐議論非常不同的論辯。將本地日常的事件，置入全球公共論辯的脈絡，這是半島效應提升阿拉伯人精神生活的重要貢獻。BBC 在卡達首都多哈製作的節目 Doha Debates 也是同樣的例子：阿拉伯的女兒可不可以自由戀愛結婚？國家該不該規定公共場合必須或不可穿戴頭罩面紗？這些是在地關切的問題，現場聽眾大部分是在地的阿拉伯男女青年，卻在每週的國際論壇上聆聽精采的辯論，議題因此具有了哲學與文化的深度。

如果這個立足華人世界的全球新聞英語頻道能夠成功，那麼我們預期有三方面的相對挑戰：其一，挑戰西方媒體領導界定東亞情勢的新聞議程與新聞敘事，例如可以設定議程批判地討論美國重返東亞的意涵、釣魚台主權爭議及其責任、日本修憲問題，以及未結束的戰後責任問題，評論方面納入美國、日本右翼之外的少數聲音，以及中國在官方民族主義之外的另類聲音。這個方向的挑戰相對的也可能引起美國當局的關切與施壓。其二，對臺、中、港、星等華人政府的治理持續進行批判報導，可能形成華人共同的公民意識，催化改革。相對的可能招來相關政府程度不一的抱怨、杯葛、打壓、查封，但這樣的鬥爭將進入全球新聞關注的脈絡，甚至獲得競爭友台聲援支持，就如近日 CNN 與 BBC 加入聲援要求埃及過渡政府釋放幾名被關押的 AJE 記者。其三，若前兩方面的挑戰能克服艱難險阻獲得成功，那麼這個衛視網可能成爲全球華人普遍信賴、歡迎、甚至離不開的頻道，成爲凝聚全球華人感受性的文化創造。否則，可能無足輕重。但是目標必須不止於報導「四海都有華人」的世界角落，也要深入報導特別是不被聽聞的全球南方，深入評論，製作深入的紀錄片。這個任務要勝過原本低度報導其餘世界的西方媒體並不難，要有志以半島爲競爭對手，同時也是攜手共同翻轉「西方及其餘」資訊流向的反霸權努力。可以一舉拋棄那創傷後自憐又狹隘的「中西文化」世界格局。這將是 21 世紀的當代文化創造。

最後，這個夢想的資金來源。粗略揣想 BBC 那樣公共電視系統的模式並不合適，其一，臺灣立法院的眼界格局可以信任嗎？其二，與環繞世界多個新聞中

airiti

心靈活合作的模式似難相容。其三，在必然會遭遇其他政府尤其是中國當局外交施壓的情況下，不必成為政府未必挺得住的責任或包袱。如果是私人資本，那麼除了口袋夠深，還要兩個條件：其一是出資者能夠克制不干預新聞專業與編輯自主；其二是能夠不受中國當局的支配或牽制。不過，這個問題我能夢想的不多，留給別人夢想吧。

參考書目

Abt, S. (2004). For Al Jazeera, balanced coverage frequently leaves no side happy.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4/02/16/business/for-al-jazeera-balanced-coverage-frequently-leaves-no-side-happy.html

Al Hussaini, A. (2011). Qatar: Wadah Khanfar resigns as Al Jazeera head. *Global Voices*. Retrieved from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11/09/20/qatar-wadah-khanfar-resigns-as-al-jazeera-head/

Al Jazeera. (2013). Qatar court upholds poet's jail sentence. *Aljazeera*.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10/qatar-court-upholds-sentence-against-poet-20131021123723850815.html

Amin, H. (2012). The nature of the channel's global audience. In P.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9-40).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Arsenault, A. (2012). Covering and reaching Africa. In P.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79-96).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Asad, T. (2007). *On suicide bombing*.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llinger, L. C. (2011). Al Jazeera can help U.S. join conversation: Lee C. Bollinger. *Bloomberg*. Retrieved from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3-15/al-jazeera-can-help-u-s-join-conversation-commentary-by-lee-c-bollinger.html

Butler, J. (2009).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New York, NY: Verso.

Dabashi, H. (2012). *The Arab spring: The end of postcolonialism*. London, UK: Zed.

El-Nawawy, M., & Iskandar, A. (2003). *Al-Jazeera: The story of the network that is rattling governments and redefining modern journalism*. Cambridge, MA: Westview.

airiti

Ferguson, N. (2012).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UK: Penguin.

Figenschou, T. U. (2012). Content: The messages of AJE's news. In P.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41-56).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Gaffney, F. J., Jr. (2003). Take out Al Jazeera. *Fox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foxnews.com/story/2003/09/29/take-out-al-jazeera/

Gilboa, E. (2012). Covering Gaza, 2008-2009: An Israeli view. In P.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43-16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Hagey, K. (2011). Pelosi, McCain salute Al Jazeera. *Politico*. Retrieved from http://www.politico.com/blogs/onmedia/0511/Pelosi_McCain_salute_Al_Jazeera.html

Kayyem, J. (2012). Let US see Al Jazeera. *Boston.com*. Retrieved from http://www.boston.com/bostonglobe/editorial_opinion/oped/articles/2011/02/14/let_us_see_al_jazeera/

Kellner, D. (2012). *Media spectacle and insurrection 2011: From the Arab uprisings to occupy everywhere*. New York, NY: Bloomsbury.

Kirkpatrick, D. D. (2011). After disclosures by WikiLeaks, Al Jazeera replaces its top news director.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1/09/21/world/middleeast/after-disclosures-by-wikileaks-al-jazeera-replaces-its-top-news-director.html?_r=0

Lahlali, E. M. (2011). *Contemporary Arab broadcast media*.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Massad, J. (2011). Are Palestinian children less worthy? *AlJazeera*.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1/05/201152911579533291.html

Merriman, R. N. (2012). Covering Gaza, 2008-2009: A Palestinian view. In P.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21-14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Miladi, N. (2003). Mapping the Al-Jazeera phenomenon. In D. K. Thussu & D. Freedman (Eds.), *War and the media* (pp. 149-160). London, UK: Sage.

Miles, H. (2005). *Al-Jazeera: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Arab news channel that is challenging the West*. New York, NY: Grove.

Powers, S. (2012). The origins of Al Jazeera English. In P. Seib (Ed.), *Al Jazeera*

airiti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5-28).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Russia Today. (2011). *Foe to friend -- Changed US stance on Al Jazeera*. Retrieved from http://rt.com/news/changed-us-stance-aljazeera-077/

Seib, P. M. (2008). *The Al Jazeera effect: How the new global media are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Dulles, VA: Potomac.

Shapiro, W. (2003). True test of victory comes after the war. *Pundic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ltershapiro.com/3606/true-test-of-victory-comes-after-the-war

Steinberg, J., & Rutenberg, J. (2003). A nation at war: The media; deaths of journalists bring accusations and concern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3/04/09/world/a-nation-at-war-the-media-deaths-of-journalists-bring-accusations-and-concerns.html

Walzer, M. (2004). *Arguing about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Youmans, W. (2012). AJE after the Arab spring: The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57-78).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pp. 1-24, July 2014

In Praise of Al Jazeera

Chu, Yuan-Hor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personal viewing experiences of Al Jazeera English, this essay explores Al Jazeera as a global news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personal as political" serves as the keynote of news reporting. Thus, Al Jazeera not only invites viewers to experience the world differently, but also participates in shaping world politics. Being a global establishment comparable to CNN and BBC World, it has become a symbol of daring spirits integrating new media such as satellite TV, internet Website, and blogs.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a scenario for the Chinese World: Is an equivalent global presence possible at all, strong enough to challenge the Western hegemony in news agenda and news narratives?

Keywords: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network, the personal as political, world politics, Western news hegemony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25-54．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0

記者獨立之路：臺灣獨立記者的維生策略與互助機制

陳順孝 *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探討獨立記者如何生存發展？如何互助培力？如何與大眾媒體互動？筆者分析 21 位臺灣代表性獨立記者的實踐經驗及其所處傳播生態，結果發現：

獨立記者幾乎都是組合式工作者，組合多樣工作和財源來維生。主要財源包括：供稿給大眾媒體和獨立媒體的稿費、出書版稅、政府補助或委辦、公益組織贊助、學術機構支持、公眾捐助、演講等專業服務，以及產品開發和銷售等。

獨立記者從單打獨鬥走向相互扶持。weReport 幫忙募集採訪資金、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開課培力，新聞從業人員工會處理勞保健保等問題。獨立記者和這些組織形成相輔相成、共存共榮的生態系。

獨立記者在大眾媒體外部實踐專業，但與堅持獨立精神的大眾媒體及其記者密切合作。獨立記者供稿給這些大眾媒體、或與這些媒體合製新聞；並且和這些記者一起爭取勞動權益、一起壯大獨立新聞生態系。

關鍵詞：獨立記者、自由新聞工作者、獨立媒體、獨立新聞

* Email: chen328@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 年 2 月 6 日
接受日期：2014 年 5 月 2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導論

朱淑娟，1998 年開始擔任《聯合報》記者，2001 年起主跑環境保護路線，處理過阿瑪斯號擱淺漏油等重大新聞；2009 年初，報社緊縮人事，她遭到資遣。朱淑娟不願放棄報導，有一天和部落客聊天時忽然想到：「如果成立一個部落格，那我繼續寫報導，好像也可以的樣子」。就這樣，她離職後開設「環境報導」部落格，深耕中科 3 期、中科 4 期、國光石化等環境議題，隔年年底，她以獨立記者身分一舉贏得卓越新聞獎、曾虛白先生新聞獎 3 大獎項，傲視大眾媒體記者（朱淑娟，2010）。

林慧貞，臺南農村出生、臺北都會區長大，唸新聞系大三時，採訪農民上凱達格蘭大道抗議的新聞，開始想為農民發聲。2012 年，朱淑娟等人發起成立「獨立媒體學院」，開課培訓獨立記者，林慧貞大學剛畢業，報名成為第一期學員，課程結束後加入馮小非、汪文豪等人創辦的獨立媒體「上下游」新聞市集，專注報導農業、食品安全議題，短短 1 年後，就與汪文豪以揭發 9 成米粉含米量不足的調查報導，共同贏得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侯惠萱、陳靖宜，2014 年 3 月 12 日）。

楊虔豪，從小夢想當新聞主播，高中時對朝鮮半島感到好奇，開始鑽研韓國事務。2010 年就讀大二開始往返韓國採訪政經社會議題，包括脫北者（逃離北韓的居民，即北韓難民）、韓國 MBC 電視台罷工抗爭、2012 總統大選等；大學畢業後長駐韓國採訪，創立 MW24 網站，供稿給大眾媒體，2014 年 1 月，他在 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提出年度募款計畫，短短 2 個月，獲得 130 位民眾贊助 20 萬元，支持他繼續以獨立記者身分報導韓國議題（馮小非，2013；劉奕霆，2014 年 3 月 13 日）。

朱淑娟、林慧貞、楊虔豪的獨立記者實踐，為陷入黑暗期的臺灣新聞界點亮燭光。

臺灣報紙接觸率從 1991 年的 76%，一路下降到 2012 年的 39%，發行量、廣告額同步下滑（動腦編輯部，2013）。2003 年，《蘋果日報》登臺挑戰臺灣報紙；2005 年 10 月起，短短 1 年間，《中時晚報》、《大成報》、《中央日報》、《臺灣日報》、《星報》、《民生報》先後停刊，倖存的報紙也紛紛裁員、減薪，並且競相炒作八卦來刺激銷路，甚至幫政府和企業做置入性行銷來賺取收入，新聞記者有的遭到資遣、有的趨權附勢、有的苦守專業、有的毅然請辭，有志從事新聞工作的青年學子則茫然無措，看不到專業前景。

所幸，朱淑娟、林慧貞、楊虔豪的經驗顯示，離開大眾媒體仍能發展新聞事

airiti

業、沒進大眾媒體照樣能夠贏得專業肯定、不向廣告主折腰也能獲得維生經費，記者可以獨立報導、建立個人品牌，可以互助培力、設學堂募眾資，可以研發實驗、翻新營運模式；換言之，今天的記者可以在大眾媒體外部生存、發展，可以採取有別於傳統的報導、學習、營收模式來發光發熱，「獨立記者」已經成為新聞專業發展的新路。

本研究因此探討獨立記者專業發展之路，具體鑽研 3 個問題：獨立記者如何生存發展？如何互助培力？如何與大眾媒體互動？筆者希望藉此瞭解獨立記者所需條件、所處情境、可行策略，幫助現職記者、離職記者和青年學子探尋可大可久的專業出路。

貳、文獻探討

獨立記者並非新興事務。1950 年代，假反共之名整肅異己的麥卡錫主義席捲全美，異議記者史東（I. F. Stone）被迫離開報界；他不屈不撓，在 1953 年自辦《史東週刊》，每天埋首閱讀政府檔案和報紙新聞，從中發掘政府說謊和違法的證據，獨家揭露許多弊案。他獨力辦報 18 年，訂戶從 5 千 3 百成長到 7 萬，直到健康亮起紅燈才停刊（黃怡，1987）。

最近這波獨立記者浪潮，則和經濟、科技因素有關。

一來，大眾媒體從 1980 年代開始盛行彈性雇用，派遣勞動、臨時聘僱、兼職打工氾濫，勞動條件每下愈況，以美國為例，2000 年彈性雇用比例高達 30%（劉昌德，2008，2012）。許多記者因此失業，或轉為彈性雇用，或辭職而去。

其次，大眾媒體——特別是報業——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漸趨沒落，大批媒體倒閉、破產、裁員，單單美國，2009 年 1 年就有 142 家報社破產、1 萬 5 千人失業，許多記者被迫離開新聞崗位。

第三，網路媒體在 21 世紀爆炸性成長，部落格（blog）、微網誌（如 twitter）、社群網站（如 Facebook）、影音平台（如 YouTube）免費、簡單、強大，任何人只要能用電腦上網，就能創辦自己的媒體、產製自己的新聞（Gillmor, 2004 ／陳建勳譯，2005）。在每個公民都可以是記者的時代，部分公民利用網路科技打造自己的媒體，成為獨立記者，如楊虔豪；部分大眾媒體離職記者也藉由網路科技延續新聞專業，轉型為獨立記者，如朱淑娟。

本文討論的獨立記者是指不受大眾媒體全職聘僱、以報導新聞為主業，而且獨立於政府、政黨、財團的報導者，包括供稿大眾媒體的自由新聞工作者

airiti

（Freelance Journalist, FJ）、自行創辦媒體的獨立媒體工作者；他們可能是大眾媒體的離職記者，也可能是未曾進過大眾媒體的公民寫手。

獨立記者發展出多樣的生存維生策略，並且互助、結盟，以專業、創意和大眾媒體競爭、合作。

一、獨立記者的維生策略

獨立記者可以粗略分爲供稿給大眾媒體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以及自己辦報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兩類。

（一）自由新聞工作者

國際記者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1999 年的調查顯示，歐洲 29 國中，有接近 11 萬名自由新聞工作者，約占記者總數（47 萬名）23%；歐洲記者協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EFJ）2003 年調查發現，18 個歐洲國家有超過 10 萬名自由新聞工作者，占記者總數（33 萬名）的 31%，2011 年的調查更發現，自由新聞工作者在某些國家中記者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已經高達 6 成、較低的也有 1/4（EFJ, 2011; IFJ, 1999；轉引自劉昌德，2012）。

自由新聞工作者供稿給大眾媒體維生，他們的工資、工作權、契約保障、團體代表與協商權，以及各項福利等勞動條件，都明顯比大眾媒體雇用的正職記者爲低，在義大利，他們的薪資只有正職記者的 22%、其他國家在 7 到 9 成之間、只有英國和全職記者相同，儘管如此，仍有 2/3 自由新聞工作者無怨無悔（EFJ, 2011; IFJ, 2006；轉引自劉昌德，2012）；美國的研究更顯示，高達 9 成 2 受訪者喜歡自由新聞工作，最滿意自己當老闆、自由調配工時與在家工作，美國電視新聞自由工作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滿意度，更明顯高於正職記者（ASJA, 2005; Ryan, 2008, 2009；轉引自劉昌德，2012）。

（二）獨立媒體工作者

獨立媒體的數量很難估計。2008 年全球部落格已達 1 億 3 千 3 百萬個 (Technorati, 2008)，包含許多獨立媒體；奈特公民新聞網絡（Knight Citizen News Network, KCNN）收錄的資料顯示，2014 年 1 月 16 日，單單北美就有 1 千 3 百 34 個獨立媒體網站 (KCNN, n.d.)。

薛佛（Schaffer）在 2006 年調查美國近 5 百家獨立媒體發現，網站建置經費

airiti

43% 來自創辦人、11% 來自現有新聞組織挹注、14% 個人贊助、不到 3% 得到創投眷顧；在營收方面，48% 主要來自廣告、25% 得到社區或企業贊助、16% 個人捐助、不到 5% 依賴訂閱收入。這樣的收入是否足以永續經營，38% 不確知、42% 入不敷出、14% 表示若不計算志工費用則收入超過支出、7% 表示即使計算志工費用仍有盈餘（Schaffer, 2007；轉引自胡元輝等，2010：18-19）顯然，創辦媒體容易，業餘經營不難，但要作爲全職工作仍顯艱辛。

自由新聞工作者和獨立媒體工作者並非截然劃分，許多獨立記者兼營兩者，例如馬歇爾（Joshua Marshall）。馬歇爾是美國布朗大學博士、專長歷史，曾在自由派雜誌《美國前景》做過記者，後來離職，他一面當自由新聞工作者，供稿給《紐約時報》、《紐約客》、《華盛頓月刊》、《大西洋月刊》等傳統媒體；一面創辦自己的獨立媒體「論點備忘錄」（Talking Points Memo），建立個人品牌，他的「論點備忘錄」曾被媒體選爲年度最佳部落格。2002 年，即將接任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羅特發言讚美種族隔離主義者，隔天報紙和電視隻字未提，只有馬歇爾在「論點備忘錄」痛加抨擊，其他部落客隨即加入圍剿，幾天後電視與報紙跟進追擊，最後連布希總統都出面表示不以爲然，羅特只好辭去多數黨領袖職務，顯見馬歇爾的影響力（王健壯，2004）。

獨立記者的工作形態儼然就是管理學大師韓第（Charles B. Handy）倡議的組合式工作者（portfolio worker）。韓第認爲，工作形態不只一種，除了進大機構工作、向一位雇主支領一份全薪外，還可以脫離大機構，同時服務多個客戶、執行多項工作，再將多項工作、多個收入組合起來，就像股票投資組合一樣；韓第指出，組合的工作主要有 5 類，有償的薪資工作（按時間計酬，wage work）和計費工作（按結果計酬，fee work），以及無償的家政工作、志願工作、研習工作，組合式工作者不像大機構雇員一樣安穩領取固定薪資，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充滿不確定性，但擁有更多的自由和熱情（Handy, 1989 ／方海萍等譯，2006; Handy, 2001 ／潘東傑譯，2002）。

二、獨立記者的互助培力

獨立記者各自奮鬥的同時，也互助合作、自主培力，並且尋求資源，以集體力量提升勞動權益和傳播能量。

首先，獨立記者會成立互助和培力組織。

在美國，線上記者協會（Online News Association, ONA）1999 年成立，目

airiti

前擁有 2 千多位會員，藉由培訓、舉辦新聞獎來推動新聞敘事創新、爲網路記者尋求資源 (ONA, 2014)。

在英國，尼柯爾森（David Nicholson）設立自由新聞工作者網站，匯集房地產、體育、商業、科技、媒體、金融、政治和旅行等領域的寫手，合力拓展工作機會 (FJ, 2011)。

2009 年 7 月，27 個非營利的獨立媒體聚集在紐約共商調查報導的未來，結果共同成立「調查新聞網絡」（The Investigative News Network, INN），成員共享內容和資源、共同提升專業、發展獲利模式，到 2014 年 1 月，成員已經超過 80 個，並從北美擴及世界各地 (INN, n.d.)。

其次，獨立記者也會尋求社會資源。

獨立記者可能和非營利組織結盟，例如 ProPublica。ProPublica 是由山德勒基金（Sandler Foundation）所主要資助成立的網路媒體，2008 年創刊，聘請了 30 多位專業好手，在每年約 6 至 8 百多萬美元的預算下從事調查報導。2010 年，上線不到 2 年的 ProPublica 榮獲普立茲調查報導獎，開創網路媒體獲得普立茲獎的首例（胡元輝，2012）。

獨立記者也可能向社會大眾募集小額捐助來支付報導開銷。

募資可以個人進行，例如美聯社前記者亞布里頓（Chritopher Allbritton）2003 年在個人網站募資前往伊拉克報導戰事，共有 320 人捐了 1 萬 4 千多美元給他 (Bowman & Willis, 2003: 51)。

募資也可以透過平台進行，例如 2008 年 11 月上線的 Spot.Us 網站，讓報導者在網站上提出採訪計畫，接受大眾捐助，開站前兩年就有 5 千人贊助超過 160 個採訪計畫（胡元輝，2012）。到了 2013 年底，贊助者超過 2 萬 2 千人。

這些互助培力機制，形成一個支援系統，支持獨立記者提升專業、獲取收入、拓展傳播通路。

三、獨立記者與大眾媒體的互動

獨立記者雖在大眾媒體外部，卻和大眾媒體若即若離，雙方在內容上、在勞動權益上合作。

獨立記者在內容上和大眾媒體合作，例如爲大眾媒體供應新聞稿、撰寫專欄、合製報導，或透過大眾媒體發送新聞。

供應新聞稿，是前述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常態，自由新聞工作者藉此獲取收入，大眾媒體藉此取得物美價廉又多元多樣的稿件。

airiti

撰寫專欄，是大眾媒體邀請獨立記者開專欄，引進傳統記者欠缺的視野和觀點。例如，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化名為帕克斯（Salam Pax）的伊拉克青年，用部落格 Where is Raed ？記錄自己在戰爭中的親身見聞，他既批判海珊政權，也反對美國入侵，常把國際媒體的消息拿來和當地實況對照，挑出偏頗之處，補上在地觀點，迅速引起全球注目，英國《衛報》就邀請他撰寫專欄（Pax, 2003／楊瑞賓譯，2005）。

合製報導，最具代表性的是調查報導獨立媒體 ProPublica。ProPublica 先後和《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報》、《洛杉磯時報》、CNN 等大眾媒體合作調查報導，2010 年 PrePublica 和《紐約時報雜誌》合製的新聞還贏得普立茲獎的調查報導獎項 (Sorrel, 2010)。

發送新聞，例如，2009 年，《美聯社》宣布協助傳送 ProPublica、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與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orkshop 等 4 個非營利調查報導機構的報導，提高獨立記者報導的能見度（胡元輝，2012）。

獨立記者在勞動權益上和大眾媒體合作，主要是共同爭取權益。

例如，英國記者聯盟（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和美國專業記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都將自由新聞工作者納入保護範圍，協助處理酬勞、合約、版權、勞動權益、保險等等事宜 (NUJ, 2014; SPJ, n.d.)。

四、研究問題

從上述國際經驗來看，網路時代的記者，不一定要留在大眾媒體內部，而可以在外部以自由新聞工作者身分供稿給大眾媒體來賺錢，也可以創辦獨立媒體、發展多元營收模式來維生；他們可以成立互助培力組織，自主研發、自我教育，並尋求非營利組織和群眾資助；他們和大眾媒體既競爭又合作，藉由供稿、寫專欄、合製新聞、傳送新聞等方式連結大眾媒體。

本文接下來要回到臺灣，借鏡國際經驗檢視臺灣的獨立記者之路。臺灣的獨立記者是指以臺灣為主要傳播對象——包括在臺灣採訪報導、以及在海外採訪報導但以臺灣民眾為訴求對象的——獨立記者。

本研究將探討三個問題：

（一）臺灣獨立記者如何生存發展？——他們如何以自由新聞工作者或獨立媒體工作者的方式實踐專業？如何獲取收入來維生？

airiti

（二）臺灣獨立記者如何互助培力？——他們如何建立自我教育、共同成長的組織？如何爭取社會資源來提升報導能量？

（三）臺灣獨立記者與大眾媒體如何互動？——雙方在內容產製、勞動權益等面向上如何競爭或合作？

參、研究方法

要研究臺灣獨立記者，先得找到臺灣獨立記者。

臺灣的獨立記者，學界、業界還未進行普查或大規模調查研究，本研究因此先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獨立記者作爲樣本，進行初探性研究。

本研究所指的臺灣代表性獨立記者包括五類，一是全國性新聞獎個人獎項得主、二是學術論文個案研究對象、三是書籍專章報導對象、四是新聞社群個案探討對象、五是獨立記者組織的理監事；選擇這五類，是希望找到專業表現受肯定、工作模式受重視、具有聲望的獨立記者，藉此瞭解獨立記者可以發揮的傳播能量。

本研究藉由以下方式發掘獨立記者。

新聞獎項部分，檢視最近 10 年的卓越新聞獎、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得獎名單，發現朱淑娟、李惠仁、孫窮理、汪文豪、林慧貞、鐘聖雄、胡慕情等 7 人。

學術論文部分，以「獨立記者」、「獨立媒體」、「獨立報導」、「公民記者」、「freelancer」等關鍵字，在 Google 學術搜尋、「中華傳播學會歷年傳播年會論文」查詢、《新聞學研究》、《中華傳播學刊》、「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期刊文獻資訊網」等網站進行檢索，發現江一豪、朱淑娟、周富美等 3 人。

在書籍部分，檢視《我的小革命：相信夢想，相信自己內在的力量》、《我的小革命：永續生活》、《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等專書，並以「獨立記者」、「獨立媒體」、「獨立報導」、「公民記者」、「freelancer」等關鍵字在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檢索，發現江一豪、馮小非、張正、胡慕情、李取中、吳國城等 6 人。

新聞社群部分，檢視臺灣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網站、臺灣新聞記者協會《目擊者》電子報、傳播學生鬥陣網站，發現楊士範、李濠仲、楊虔豪、莊豐嘉、李惠仁、陳昆龍（大暴龍）、劉瑋婷等 7 人。

在專業組織方面，檢視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理監事名單，發現馮小非、黃哲斌、鄭國威等 3 人。

綜合上述方法，本研究共計發掘 21 位臺灣代表性獨立記者，包括：江一豪、

airiti

吳國城、李取中、李惠仁、李濠仲、汪文豪、周富美、胡慕情、孫窮理、張正、莊豐嘉、陳昆龍、馮小非、黃哲斌、楊士範、劉瑋婷、鄭國威、鐘聖雄、朱淑娟、楊虔豪、林慧貞。

本文以這 21 位臺灣獨立記者爲研究對象，蒐集他們的自述文章，以及有關他們的報導、研究報告、人物介紹，再參考有關臺灣獨立記者的學術論文，然後進行分析。

資料分析之外，筆者運用參與觀察所得進行研究。筆者 1997 年創辦公益新聞網站、2004 年起參與推廣公民新聞、2009 年參與創辦莫拉克獨立新聞網、2011 年出任 weReport 執行委員、2012 年共同發起「獨立媒體學院」，熟悉臺灣獨立記者發展脈絡，並與上述 21 位獨立記者中的 19 位有直接往來，熟悉他們的經歷和表現。

筆者以參與觀察所知，對照文獻資料，再就矛盾、疑問、疏漏之處進行採訪。採訪方式是使用電郵或 Facebook 私訊詢問，採訪重點爲獨立記者營收情況，主要問題有三：一、你目前的收入來源有哪些？最主要收入來源爲何？各類收入比例大約多少？二、你目前的收入大約有多少：每月最高曾收入多少、最低多少、平均大約多少？三、對於未來想要從事獨立記者的人，你有何建議？ 對於獨立媒體負責人則加問媒體營收情況、員工人數和薪資。筆者先後向 21 位獨立記者中的 15 位提問，得到 13 位書面答覆。

筆者根據資料分析、參與觀察和書面採訪所得，綜合探討臺灣獨立記者如何生存發展、如何互助培力、如何與大眾媒體互動。

肆、研究發現

本文選取 21 位臺灣代表性獨立記者，研究他們的維生策略、互助方式、與大眾媒體的互動關係，結果發現：

一、獨立記者的維生策略

獨立記者的維生策略多樣，依其主要經濟來源可以分爲供稿給其他媒體的自由新聞工作者、自營媒體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兩大類。

（一）自由新聞工作者

自由新聞工作者不爲單一媒體服務，他們供稿給多家媒體，並以多元營收來

airiti

維持生活、支撐報導工作。依其收入來源，又粗略分爲報導工作維生者、業外收入維生者兩類。

1. 報導工作維生者

以新聞報導工作維生者，包括朱淑娟、黃哲斌、周富美、胡慕情、李濠仲、李惠仁、楊虔豪。

朱淑娟離開《聯合報》後，在經營「環境報導」的同時，以多重收入來維持生計。她和大眾媒體合作，例如與公視「我們的島」節目合製專題、供稿給《商業周刊》；她也和網路媒體、非營利組織合作，例如供稿給環境資訊中心、幫台達電基金會經營的「低碳部落格」寫專欄；她還在社區大學教課，並且受邀到大學演講；她的工作幾乎都來自過去的人脈，多到應接不暇，她堅持只有能讓她發揮獨立報導精神的案子才接（郭姵君，2010）。

黃哲斌，1965 年生，曾任《中國時報》記者、編輯、《中時電子報》副總編輯，2010 年 12 月 13 日，爲了抗議政府和大企業收買媒體、置入行銷，宣布辭職，並發起「反對政府收買媒體，以『置入性行銷』欺瞞人民」行動，贏得傳播學者和民眾連署聲援，促使立法院修法禁止政府部門買新聞。黃哲斌辭職後，婉拒專職邀約，只擔任《天下雜誌》特約記者，並爲《獨立評論@天下》、《財訊》撰寫專欄，也受邀演講。

周富美，1973 年生，曾任《勁報》、中天新聞台、《自由時報》記者，跑過醫藥、社福、環境等路線新聞，2007 年因堅持採訪環保署閉門會議，與官員發生肢體衝突，報社要將她轉調內勤，她憤而辭職；辭職後擔任「苦勞網」特約記者，並且接案維生，接案範圍不僅在臺灣，也包括大陸的《南方周末》、《南都周刊》，她還寫書出版，包括書寫女性視障者故事的《媚力新視界》、爲律師作傳的《林穆嚴：謙和樂仁律師之光》（郭姵君，2010）。

胡慕情，1983 年生，2005 年進入《臺灣立報》擔任記者，隔年開設部落格「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深耕環保、人權、農村、救災重建、土地正義等議題，之後轉任公視「我們的島」文字記者數年，2013 年 4 月爲了專心撰寫苗栗灣寶對抗土地徵收的專書，辭職成爲獨立記者。辭職後收入主要來自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創作補助，以及《獨立評論@天下》專欄稿費，其他的稿約和演講邀約幾乎都推掉。

李濠仲，1976 年生，曾任《新新聞》、《聯合晚報》政治組記者，2009 年隨著任職外交部的妻子遠赴挪威，繼續以獨立記者身分採訪新聞，進行挪威與臺

airiti

灣之經驗對照（黃文慧、杜亞潔、馮小非，2013）。他以寫書爲主，平均 1 年出版 2 本書，並爲《獨立評論@天下》、《聯合報》、《大誌雜誌》寫專欄，也接受其他報章雜誌邀稿，返臺宣傳新書期間也接受演講邀約，並且加入挪威外國記者協會成員，偶爾向當地作家協會申請撰稿補助。

李惠仁，1969 年生，曾任民視和三立等新聞台攝影記者、東森電視專題製作人，爲了調查禽流感疫情辭去工作，擔任獨立記者和紀錄片導演，他在家人支持下獨力調查 8 年，揭發政府掩蓋禽流感疫情黑幕，震撼社會，完成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祕密》榮獲 2011 年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他調查禽流感疫情，曾獲優質新聞發展協會補助，之後也曾在 weReport 向公眾募資，此外，他幫公視等單位拍攝紀錄片、爲廣播電台製作專題、當廣播代班主持人、到大學兼課、到學校或其他單位演講，並且受邀撰寫防疫、農業方面稿件，邀稿者包括《新新聞》、《今周刊》、《財訊》、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想想論壇、《YAHOO! 奇摩新聞》專欄等。

朱淑娟、黃哲斌、周富美、胡慕情、李濠仲、李惠仁的收入來源，都與過去任職大眾媒體時累積的人脈、經驗有關。但是，大眾媒體經驗、人脈並非不可替代，未曾進入大眾媒體的楊虔豪就以其獨特的韓國報導，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楊虔豪的收入主要來自採訪報導、專欄評論，約占 7、8 成，其餘 2、3 成來自校訂韓國議題的書籍或寫書序、幫忙韓國電視台安排採訪、演講、上電視節目等。他主要供稿對象爲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新頭殼、《獨立評論 @ 天下》、想想論壇，其餘對象包括《財訊雜誌》、《蘋果日報》論壇、《新新聞》、《看雜誌》，以及香港《陽光時務》、《主場新聞》、《彭博商業週刊》等。

2. 業外收入維生者

不以報導維生，而以業外收入支撐報導工作的人，則包括江一豪、陳昆龍。

江一豪，1979 年生，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蘋果日報》記者 2 個月，離職後一邊當搬家工人、一邊當「苦勞網」特約記者，並經營部落格「生活，就是抗爭」，長期報導被遺忘在緬甸的中華民國「國民」、東菱電子關廠員工、數度被拆遷的三鶯部落原住民，2008 年入圍了卓越新聞獎。他以搬家所得來支持報導工作（何榮幸，2009a）。

陳昆龍，綽號「大暴龍」，高雄旗山蕉農子弟，大學攻讀都市計畫、畢業後進入資訊業，但他渴望改變，辭職當「家庭煮夫」，並擔任公民記者，在公視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報導新聞；2010 年，苗栗縣政府強制徵收大埔農地，派遣怪

airiti

手毀壞即將收成的稻田，陳昆龍取得農民自行拍攝的影片，又補拍部分畫面，製作成〈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報導，引爆網民熱議、輿論譁然、民眾抗議，成為近年最重大的新聞事件之一。陳昆龍全職報導，卻非賴此維生，雖有社區大學講師費、稿費等收入，但主要靠家人支持。

（二）獨立媒體工作者

獨立媒體工作者創辦獨立媒體或受僱於獨立媒體，這些媒體包括紙本媒體和網路媒體，經營方式可以是非營利模式、社會企業模式或商業模式，以下分獨立媒體負責人、獨立媒體報導者兩部分敘述。

1. 獨立媒體負責人

獨立媒體負責人創辦媒體，並承擔營收重任，他們兼管編務和財務，收入與整個媒體的營運狀況密切相關，例如吳國城、李取中、孫窮理、馮小非、張正、鄭國威、楊士範。

吳國城，1979 年放棄文化大學新聞系助教工作，與同學吳鎮坤返鄉創辦《山城週刊》，報導臺中的東勢、新社、石岡、和平、卓蘭五區新聞，依靠訂戶、廣告收入維生，1999 年 921 地震後，訂戶繳費和廣告收入銳減，幸好獲得新聞局補助製版印刷費、郵資費才度過難關，《山城週刊》在 2005 年榮獲卓越新聞獎社會公器獎（何榮幸，2009b）。

李取中創辦《大誌雜誌》。他生於 1970 年，東海大學物理系畢業，曾任奇摩入口網站創始員工，之後創辦《樂多新文創線上誌》，2010 年開辦 *The Big Issue* 臺灣版《大誌雜誌》，以社會企業形式經營，將雜誌交給遊民販售，每本售價 100 元，遊民分得 50 元，另 50 元支應編採印刷成本，創刊 2 年後，每月發行量直逼 3 萬份（何榮幸，2011；梁瓊丹，2013b）。

孫窮理創立「苦勞網」。他 1968 年生，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曾任清潔隊員、《臺灣立報》教育組組長，1997 年因為報社大量資遣員工而離開，同年創辦「苦勞網」，報導邊緣族群社會處境、提倡非主流觀點，2013 年以〈《服貿》爛透了？沒錯！這就是「自由貿易」〉一文贏得卓越新聞獎新聞評論獎；「苦勞網」創立初期幫公司架網站，一年曾有百萬收入，2005 年之後架站生意競爭激烈，一度承接政府專案，但為避免利益衝突，很快改以小額分散式捐款為主（孫窮理，2007；翁書婷，2013）。

airiti

馮小非，1969 年生，曾任《臺灣日報》家庭婦女版主編，1999 年 921 地震後深入災區創辦《中寮鄉親報》，2004 年接受行政院新聞局地方新聞處委託創辦小地方臺灣社區新聞網，報導農村、漁村、山村訊息；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與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陳順孝等人共同創辦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監督重建工作；2011 年 9 月，馮小非又與汪文豪等人創辦「上下游」新聞市集，深耕農業、環境和食品安全問題，並開發和銷售小農產品。「上下游」收入來源有三：一是「共同辦報人」每人每月 3 百元的捐款；二是基金會（如建蓁基金會）和個人贊助，贊助記者人事費；三是產品開發和銷售所得。這些收入支付 3 位記者、5 位行政人員薪資，馮小非自己支領低於記者的月薪。

張正，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2006 年在《臺灣立報》發行人成露茜支持下創立越南文《四方報》，之後陸續推出泰文、柬埔寨文、菲律賓文、印尼文版。張正自嘲是「文盲辦報」，仰仗多位通曉越泰語文的志工譯寫新聞，新聞之外，超過半數篇幅由移民移工投稿構成。《四方報》1 年成本約為 1 千 5 百萬元，其中 50% 收入源自捐款與政府補助或專案、35% 來自廣告、15% 來自報紙銷售、其餘則是賣 T 恤等活動收入（梁瓊丹，2013a；陳宜萍，2013）。張正原本在《四方報》支領總編輯薪水和獎金，2013 年辭職改領顧問費，《四方報》之外，他製作電視節目「唱四方」、主持廣播節目「越來越幸福」，另有稿費、演講費、審查費。

鄭國威，生於 1981 年，2004 年就讀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期間，開始經營部落格「龜去來嘻」，隔年創立 *Global Voice* 中文版《全球之聲》並出任 *Global Voice* 多語言計畫負責人，退伍後歷任 im.tv 我視傳媒社群部主任、蒙藏基金會「遊牧綠」專案經理；之後出任臺灣數位文化協會內容中心主任，2010 年起在協會支持下接連創辦泛科學、NPOst 公益交流站等網站。泛科學收入主要來自專案合作，另有贊助、廣告、商品販售、專書出版、活動等，前 2 年虧損，2013 年轉正；NPOst 公益交流站主要由聯合勸募補助。鄭國威支領協會薪資，負責這兩個媒體，也處理其他事務。

楊士範，1980 年出生，曾任 *CNET Taiwan* 執行主編、《商業周刊》資深編輯、《大誌雜誌》、《電腦王》、《樂多線上誌》等專欄作家，也開過咖啡館，熱愛運動與電影；2013 年與朋友共同創辦關鍵評論網，強調編輯的能量，一面過濾、整理、摘要、分析新聞，一面邀請各領域專家提供觀點和意見。關鍵評論網目前有 6 位編輯、實習生約 12 位、作者 175 位，主要收入來自廣告。

airiti

2. 獨立媒體報導者

獨立媒體報導者可能是共同創辦人，也可能是受僱者，他們專心編採新聞，不需承擔營收責任，通常有固定薪資，例如汪文豪、林慧貞、劉瑋婷、鐘聖雄、莊豐嘉。

汪文豪與馮小非共同創辦「上下游」，他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曾任《聯合報》和《天下雜誌》記者，跑過社會、農業、保育、環保、政治、司法等領域，曾三度獲得亞洲出版人協會環境報導獎；創立「上下游」後，專責報導，2012 年以「校園午餐調查報導」入圍曾虛白先生公共服務報導獎、2013 年和林慧貞共同以「揭開假米粉真相系列調查報導」獲得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陳薏云、陳奕伶、詹亭華，2014 年 3 月 11 日）；他支領「上下游」固定月薪，並曾代表「上下游」在 weReport 提案募資。

林慧貞則是「上下游」雇用的記者，專職採訪新聞，與汪文豪一樣領取「上下游」月薪。

劉瑋婷，雲林農家女孩，2009 年八八水災時，她大四，參與馮小非、陳順孝等人發起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籌備工作，之後擔任全職記者，長駐莫拉克重災區採訪 4 年。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第 1 年經費由馮小非募款，第 2、3 年由陳順孝申請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補助，並藉由 weReport 向公眾募資，第 4 年則在浩然基金會資助下出版專書《在永久屋裡想家》義賣籌資。劉瑋婷在第 1、4 年支領記者薪水，第 2、3 年支領國科會助理薪資。

鐘聖雄，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青年樂生聯盟成員，曾任《電子時報》IT 週報採訪編輯，2009 年八八水災後，擔任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記者，深入重災區採訪，之後全職爲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採寫新聞，每月支領固定稿費。2010 年以採訪大陸舟曲地震新聞的「舟曲報告」入圍卓越新聞獎國際新聞報導獎，2013 年以記錄六輕空氣污染的攝影作品「南風」贏得卓越新聞獎新聞攝影獎，並與許震堂共同出版專書《南風》。

莊豐嘉曾任《臺灣日報》總編輯、中央通訊社副總編輯，2009 年與蘇正平、胡元輝等人共同創辦「新頭殼」，廣泛報導政治、財經、司法、媒體、環保、中國等議題，營收主要來自廣告費。莊豐嘉支領總製作薪水。

（三）維生策略

綜觀 21 位代表性獨立記者的收入來源，可以發現相當多樣，至少包括 9 種（見圖 1）：

airiti

1. 大眾媒體：許多獨立記者供稿給大眾媒體，常見供稿對象是公共電視和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天下雜誌》與《獨立評論@天下》、《商業周刊》、《財訊雜誌》等，都是臺灣專業度較受肯定的媒體。
2. 獨立媒體：也有獨立記者供稿給獨立媒體來獲取稿費，供稿對象包括：「新頭殼」、《大誌雜誌》、「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等。
3. 出版：如李濠仲以版稅作爲主要收入來源，馮小非以出書所得支付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記者薪水，鄭國威的泛科學和鐘聖雄也出書增加收入。
4. 政府相關單位：如新聞局曾委託馮小非創辦「小地方」、補助《山城週刊》印製費和郵資，國科會補助馮小非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政府捐助成立的國藝會補助胡慕情寫書；此外，張正的《四方報》也接受政府補助。
5. 公益組織：如浩然基金會資助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建蓁基金會資助「上下游」、聯合勸募資助 NPOst 公益交流站、臺灣數位文化協會支付鄭國威薪水、台達電基金會的「低碳部落格」提供朱淑娟和楊虔豪稿費。
6. 學術機構：如世新大學支持張正創辦《四方報》、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陳順孝與馮小非共同創辦莫拉克獨立新聞網並取得國科會兩年補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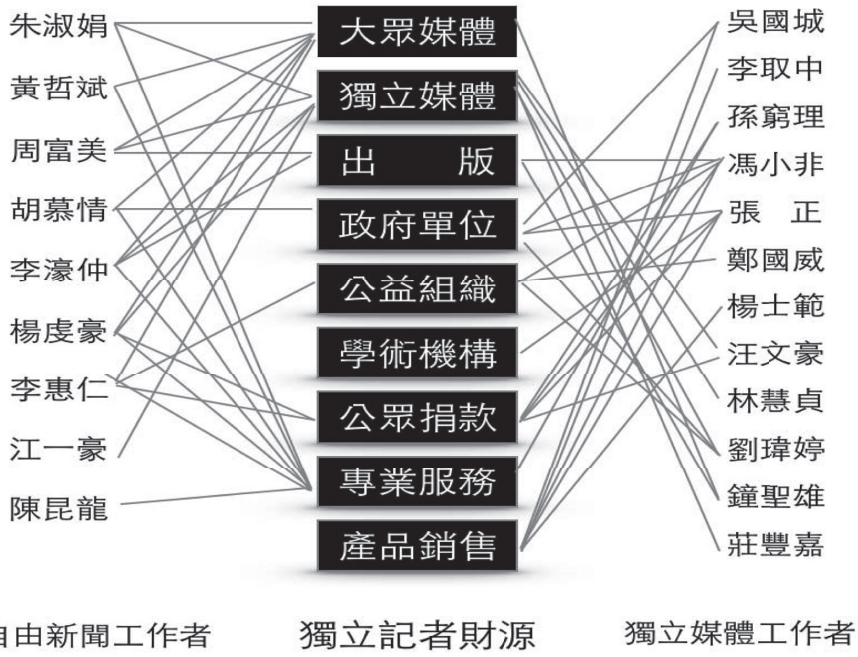

圖 1：獨立記者的收入來源

airiti

7. 公眾捐款：如孫窮理的苦勞網以小額捐款爲主要財源、馮小非的「上下游」接受「共同辦報人」和個人捐助、楊虔豪也透過 weReport 募集年度所需經費。
8. 專業服務：多位獨立記者或多或少受邀演講，也有人受邀擔任評審或審查人。
9. 產品銷售：如媒體廣告和訂費收入，又如馮小非的「上下游」開發小農產品、張正的《四方報》賣 T 恤。

每位獨立記者的收入來源和各來源占收入總額比例不同，這顯示獨立記者就是韓第所指的「組合式工作者」，組合多項工作、多項財源來實踐專業、維持生活。

那麼，獨立記者的實際收入究竟有多少？

答覆筆者詢問的獨立記者透露，實際收入起伏非常大，有位獨立記者最高月入曾達到 10 萬元，最低時只有 3 千元；平均來看，資淺者月入約有 3 萬多元，資深者在 4 萬到 9 萬元之間。一位資深獨立記者告訴筆者，他平均月入約有 7 萬 7 千元，另一位資深獨立記者則透露，他幾年前剛當獨立記者時，年收入約 50 萬，去年已經倍增到百萬。

不過，收入高低關鍵因素不在資深資淺，而在個人品牌力和掙錢積極度。

個人品牌力，是指獨立記者建立的人脈、知名度、權威度和獨特性。認識的人越多、能見度越大、專業威望越高、內容越獨特，通常能贏得越多的稿約、越高的稿酬，這需要長期累積，也需要銳意經營。出身大眾媒體的獨立記者能夠延用過去的人脈、知名度、權威度，但需持續經營，並且建立獨特性；未進大眾媒體的獨立記者一切從零開始，需要投入更多時間、更大努力來發展個人品牌。

出身大眾媒體的李濠仲說明自己如何建立獨特性：

> 對獨立記者來說，我想「風格化」是頗為重要的一環，可能是建立起自己的「文風」，或者是「專精的議題」。國內有很多知名的獨立記者皆是如此，我就不多贅述了。而我個人，則是透過介紹北歐的生活百態，試圖傳遞出另一種文明的面向，讓有興趣的讀者自行內省參酌。

未進過大眾媒體的楊虔豪描述自己從零開始的發展策略：

> 我認為要有線上記者沒有或缺乏的能力，比如說外語、圖表製作

airiti

或符合專業卻能讓閱聽眾耳目一新的報導呈現方式，並且需要深耕固定議題，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

另外，從事獨立記者前必須先存一筆錢，利用那筆錢做報導，然後試著利用網路上發布或投稿給媒體，直到專業性與獨特性凸顯出來後，未來才會有人主動找上來洽談合作。

掙錢積極度，則是獨立記者個人對工作、生活的選擇。有人積極接案賺錢，也有人「不想變成寫稿機器」，拒絕過多稿約。一位品牌力極強的獨立記者，就婉謝許多邀約，他說現在的收入大約只有在大眾媒體全職工作時的一半，「不過，與全職工作相比，我目前花不到一半時間在工作，所以並不覺得吃虧」。

質言之，品牌力是獨立記者獲取收入的必備條件，品牌條件太差，獨立記者難以維生，品牌條件夠強，獨立記者才能存活，有了存活能力之後，獨立記者可以決定自己要做多少工作、要賺多少錢。

無論如何，隨著大眾媒體待遇每下愈況，品牌夠強的獨立記者收入與大眾媒體差距日小，而且不必忍受政商勢力和老闆干預、可以自己決定工作量，獨立記者大多甘之如飴。獨立記者周富美就透露「我的收入不及過去的 1/2，但是我的快樂比過去還要多了 1/2」（郭姵君，2010），這和歐美自由新聞工作者安於較低薪資的情況一致。

二、獨立記者的互助培力

獨立記者各自奮鬥的同時，也相互串連、互助合作、共同培力，他們先後成立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等互助培力組織，也與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等友好社會組織密切合作，逐步發展成一個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獨立記者生態系（見圖 2）。

（一）互助培力組織

1. 優質新聞協會 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成立於 2011 年 4 月，主要成員是共同創立「新頭殼」的蘇正平、胡元輝、莊豐嘉等人，以及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成立後積極獎助調查採訪計畫，協助專業記者和公民記者做好報導，曾經補助獨立記者李惠仁揭發禽流感疫情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祕密》，也曾獎助獨立記者陳香蘭進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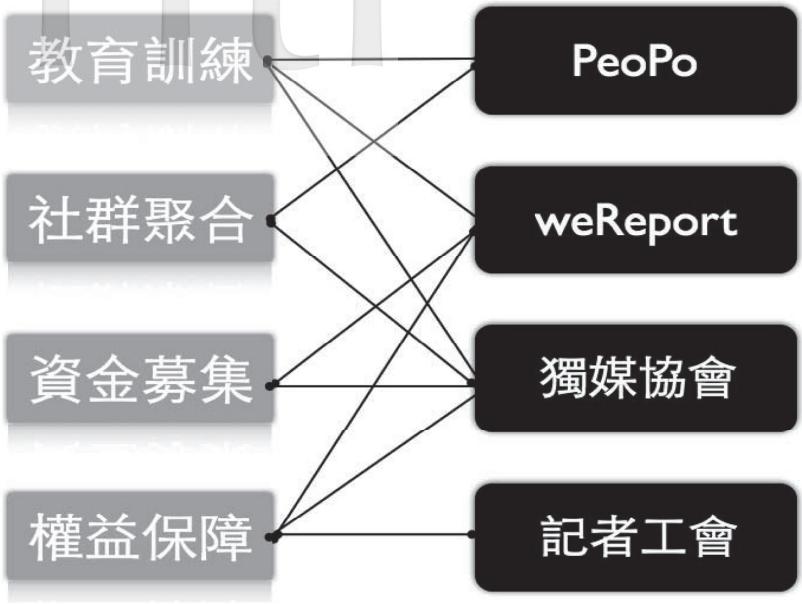

圖 2：獨立記者互助培力組織及其工作重點

行「大學圈地運動」調查報導；2011 年 12 月更創立 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由胡元輝、羅世宏邀請陳順孝，以及臺大新聞所教授林麗雲、資深記者賴秀如組成執行委員會負責營運。

weReport 以「你支持、我報導」（You support, we report）爲宗旨，目標是讓有決心、有能力從事優質報導的人能夠向公眾提案，在說明採訪計畫和所需預算後，從公眾手中取得所需資金。除了大眾媒體編制內的全職記者外，它歡迎任何人來提案，特別歡迎自願或非自願離開大眾媒體、但對新聞仍然懷抱熱情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獨立記者來提案募資、接受委製，提案人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團隊（羅世宏，2012）；除了幫獨立記者募集採訪資金外，weReport 從 2013 年 10 月起也開始幫獨立媒體募集創辦費和營運資金，每年最多可募 20 萬元。

截至 2014 年 3 月底止，weReport 累計進行了 44 項提案，其中採訪計畫募資 40 項、新創媒體募資 2 項、獨立媒體營運資金募集 2 項，累計捐款人次 763 次人，募得的資金將近 150 萬元。

筆者分析這 44 項計畫的提案人背景，發現有 12 項由全職獨立記者或獨立媒體團隊提出、5 項由業餘公民記者提出、14 項由學生和學生團隊提出、3 項由非政府組織成員提出、4 項由大陸報導工作者提出、6 項是一般民眾提出。這個分析結果顯示，weReport 的群眾募資模式正在幫助全職獨立記者募集資金，支持業

airiti

餘公民記者和學生增進報導功力，也鼓勵非政府組織成員、一般民眾和大陸人士加入報導行列，這有助於獨立記者生態系的茁壯。

此外，在 44 項提案中，本文討論的 21 位臺灣代表性獨立記者參與了 7 項，包括李惠仁提案 2 項、楊虔豪提案 2 項、馮小非和汪文豪的「上下游」提案 2 項、馮小非和劉瑋婷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提案 1 項。

獨立記者不僅在 weReport 募資，也開始回饋。李惠仁就將《不能戳的秘密》DVD 發行版稅全數捐贈 weReport，回報優質新聞協會 2011 年給他的補助。

2. 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

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則是朱淑娟、馮小非和汪文豪發起的組織。

朱淑娟離開報社，以獨立記者身分贏得三大新聞獎項後，開始想要成立「獨立媒體聯盟」，因爲獨立媒體單兵作戰艱辛，時常有身分不被認同的焦慮，希望組成聯盟來共享資源、克服採訪時的身分困難；後來，她在演講場合常被學生問到：「我們沒有採訪經驗、也沒有經濟實力，如果我們一畢業就想跟你一樣成爲獨立媒體記者，可以嗎？」，她漸漸轉向思考成立「獨立媒體學院」，自行培訓獨立記者（朱淑娟，2012）。

在此同時，馮小非和汪文豪也在思考自行培養農業獨立記者，將這個構想告訴朱淑娟，雙方一拍即合，他們分別邀請獨立記者黃哲斌、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陳順孝，以及公共電視製作人柯金源、于立平等人，在 2012 年 6 月共同發起成立「獨立媒體學院」，開班授課；2013 年 12 月學院轉型爲社團法人組織，成立「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由馮小非擔任理事長，汪文豪、黃哲斌、鄭國威、陳順孝、柯金源、于立平等人擔任理事。協會工作重點在開課培育新秀、報導獨媒動態、促進專業對話、觸發獨媒合作等。

開課培育新秀，採取師徒制教學。學員先上 6 至 8 堂概論課，然後提報採訪計畫，接受業師 3 個月指導，完成並發表報導作品。截至 2014 年 3 月底止，共開設 4 期課程，第 1 期培訓環境和農業記者，第 2 期開始分班上課，課程包括網路編輯、司法新聞、財經新聞、農業進階、環境藝術，第 3 期課程有資訊圖表、調查報導、紀實攝影、打造媒體，第 4 期則開設海洋報導與觀察、社區媒體經營課程，四期學員合計 243 人[1]。第 1 期學員林慧貞、楊鎮宇結訓後先後加入「上下游」擔任全職獨立記者。

1 學員主要背景為：獨立記者與公民記者 12%、媒體相關工作 18%、學生 34%、非政府組織工作者 15%、其他行業 21%。

airiti

報導獨媒動態，是在協會網站開闢「獨立媒體／人專訪」專區，介紹新舊獨立媒體，例如訪談老牌獨立媒體「苦勞網」、「新頭殼」，採訪新興獨立媒體「攝影之聲」、「臺灣社會事件信息圖表」、「行南」，專訪海外獨立記者楊虔豪、李濠仲等；此外，也介紹網路社群「零時政府」的開放資訊（open data）實踐，放寬視野，探索獨立記者、獨立媒體更多可能性。

促進專業對話，是舉辦一系列對話會、分享會，讓獨立記者與大眾媒體記者、學者、學生和社會對話。先後邀請李惠仁和何榮幸對談「記者如何監督政府」、曾任多年記者的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林照真和《壹週刊》總編輯邱銘輝對談「調查報導讓當權者顫抖」、孫窮理和馮小非對談獨立媒體的經營策略，還邀請校園獨立媒體《臺大意識報》、原住民網站 MATA TAIWAN、社區文化雜誌《咱誌》負責人交流媒體經營經驗。

這一系列活動，讓獨立媒體社群日漸凝聚，進而展開合作。2014 年 1 月，協會邀集「上下游」、「泛科學」、「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生命力新聞」、「健康世界」等獨立媒體進行 Facebook 粉絲專頁聯合行銷實驗，參加實驗的媒體各自到其他加盟媒體挑選好文，每週三晚上 9 點，在自家媒體的粉絲專頁推薦他家媒體的好文，藉此相互拉抬流量；這個實驗將邀請更多獨立媒體參與。

此外，協會也計畫育成更多獨立媒體。協會理事們認爲臺灣獨立媒體在環境、農業、勞工等領域卓然有成，其他領域還有待發展，因此正在籌募經費支持更多新秀在尚待開發的領域創辦媒體。目前規劃草案是：每年舉辦 1 到 2 次公開徵選，受理新創獨立媒體提案申請，邀請專業人士進行評選，獲選者每月給予臺幣 5 萬元補助，原則上補助 1 年，最多延長半年，延長期補助減爲 3 萬元。資金補助外，協會也將提供獨媒營運模式和網站建置的建議，幫助新獨媒儘快站穩腳步。獨媒創業育成計畫已經募到第一筆資金，預定 2014 年上半年開始公開徵案。

（二）友好社會組織

1. 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是臺灣新聞記者協會成員在 2012 年 8 月另行成立的姊妹組織。

臺灣記協創立於 1995 年，以「爭取新聞自由、提升專業水準、保障新聞工作者獨立自主、落實新聞媒體爲社會公器之責任」爲宗旨，服務對象爲印刷、廣播和電視新聞媒體記者、編輯及其他新聞從業人員，2008 年開放網路媒體記者申請入會（莫忘初，2008）。

到了 2012 年，臺灣記協「鑑於新聞內容由獨立記者、自由撰稿者所生產，

airiti

然而無特定僱主的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經常缺乏保障」，因此成立職業工會，「期能在專業探討，並在版權歸屬、合約建立、保險服務等各方面，讓工作者無後顧之憂專注於新聞事業」（臺灣新聞記者協會，2012）。

職業工會可以提供勞保健保的投保服務，獨立記者最基本的保險問題，終於能夠解決；其餘版權歸屬、合約建立也可望以集體力量推動。

2.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PeoPo 是胡元輝在擔任公共電視總經理期間，於 2007 年成立的公民新聞平台。

PeoPo 開放公民和非營利組織架站發稿，截至 2014 年 3 月底止，已有 7 千 4 百多位公民記者、累計報導超過 9 萬篇公民新聞。

PeoPo 積極為公民記者培力，首先，深入各地舉辦公民新聞工作坊、公民記者地方聚會、公民新聞論壇、暑假實習營等；其次，製作「公民記者 123」、「PeoPo 講堂」等線上教學影片，並且每週邀請學者專家、資深記者擔任「客座總編輯」，評介公民記者的報導；第三，串連大學新聞傳播系所實習媒體組成校園採訪中心、每學期召開總編輯會議；第四，每年舉辦公民新聞獎，獎勵優秀報導；第五，在公共電視頻道製播「PeoPo 公民新聞報」節目，選播優秀報導並發給稿費。

PeoPo 在以業餘為主的公民記者和以全職為主的獨立記者之間搭起橋樑，許多有志擔任獨立記者／公民記者的人，先在 PeoPo 架站、發稿、學習，再到獨立媒體學院去上進階課程，獨媒學院學員就有多位是在 PeoPo 註冊的公民記者，部分公民記者更從業餘轉向全職，陳昆龍（大暴龍）就是全職的公民記者。

（三）獨立記者生態系

weReport、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和 PeoPo 的努力，讓獨立記者從單打獨鬥，漸漸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傳播生態系統。這些組織幫助獨立記者解決採訪資金和合理酬勞、專業精進和創業育成等等問題，讓獨立媒體生態漸趨健全，也讓獨立記者能夠以此為志業，不僅實踐專業、獲得溫飽、更能贏得社群支持和社會肯定。

在這個獨立記者生態體系中，新進記者可以在 PeoPo 架站發稿、研讀線上教材、參加新聞營隊、參與外拍活動、爭取在公視播放自製新聞的機會。

新進記者還可以到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上課，在師徒制下，學習調查報導、環境新聞、農業新聞、視覺報導等進階知能。

若需要經費，可以到 weReport 提出報導計劃，向民眾募資。

想要保障，可以加入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取得勞健保等保險。

airiti

要證明能力，更可以報名 PeoPo 公民新聞獎，甚至挑戰卓越新聞獎。

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第 1 期課程學員林冠吟，結訓後到 weReport 提案募資進行大肚溪污染報導，這個報導贏得 2012 年 PeoPo 公民新聞獎；李惠仁在拍攝《不能戳的祕密》紀錄片過程中，得到優質新聞協會補助，完成的作品贏得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並以 DVD 形式發行，他再將發行所得捐給 weReport。這些故事都顯示，獨立記者共存共榮、相輔相成的生態系已經形成。

三、獨立記者與大眾媒體的互動

獨立記者主動、被動離開大眾媒體，或未曾進入大眾媒體。他們雖在大眾媒體外部，卻和大眾媒體若即若離，雙方在內容產銷、勞動權益上密切合作。

在內容產銷方面，如前所述，許多獨立記者供應稿件給大眾媒體，供稿方式包括撰寫新聞稿、撰寫專欄、合製專題（如朱淑娟和公視「我們的島」節目合作報導）等。獨立記者供稿給大眾媒體，可以爲獨立記者賺取維生的稿費、增加社會能見度；也能爲大眾媒體注入活水，提供大眾媒體記者欠缺的訊息和觀點。

此外，獨立媒體和大眾媒體也合作傳送新聞。《蘋果日報》在 2014 年 1 月 15 日宣布和「上下游」、「新頭殼」、「苦勞網」、「泛科學」、「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5 家獨立媒體合作，在蘋果即時新聞平台刊播獨媒的報導和評論，並且連結獨媒網站，《蘋果日報》尊重獨媒自主權，不審核其標題及內文，甚至「可以罵《蘋果》、罵黎智英都沒有關係！」。《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說，許多網路獨立媒體都有很優秀的報導，與商業媒體可互補，他將邀請更多獨立媒體加入合作，並歡迎其他獨立媒體主動尋求合作（唐鎮宇，2014 年 1 月 16 日）。

在勞動權益上，如前所述，大眾媒體記者發起成立的臺灣記協在 2012 年成立姊妹組織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開放獨立記者入會，共同爭取版權歸屬、合約建立、保險服務等權益。職業工會的成立，讓獨立記者可以解決勞健保等基本問題，進而爭取更多權益；獨立記者的加入也讓職業工會吸納更多會員、擁有更大代表性，能夠更強有力的爭取大眾媒體記者和獨立記者的共同權益。

另一方面，當獨立記者發起獨立媒體學院、成立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時，以公共電視爲主的大眾媒體記者也扮演重要角色，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 9 席理事中，就有 3 席是公視記者（柯金源、于立平、吳東牧），3 席監事中也有一席（陳信聰）是公視記者[2]。

2 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 9 位理事：馮小非，陳順孝，于立平，黃哲斌，柯金源，鄭國威，汪文豪，吳東牧，林于凱。3 位監事：洪貞玲，鄭宇君，陳信聰。

airiti

獨立記者既和大眾媒體分庭抗禮，又和大眾媒體緊密合作，這看似矛盾、實則不然，因爲相互合作的獨立記者和大眾媒體記者，同樣強調獨立精神——獨立於政府、政黨、財團之外進行專業報導的精神。換言之，他們區分「我們」和「他們」的標準，不是看你是否在大眾媒體裡邊，而是看你是否堅持獨立精神。

更具體的說，獨立記者與大眾媒體的合作，不是全面性的，而是有選擇性的，他們主要和堅持獨立精神的大眾媒體合作：獨立記者供稿的對象，是公共電視、《天下雜誌》、《商業周刊》、《財訊雜誌》、《蘋果日報》這些堅持不做置入性行銷的媒體；參與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的大眾媒體記者，也是柯金源、于立平、吳東牧、陳信聰這樣堅持獨立精神的記者。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發布新聞時，就經常將獨立記者與「具有獨立精神的大眾媒體記者」並列（獨媒協會，2013，2014b）。

獨立記者和堅持獨立精神的大眾媒體合作，雙方分進合擊、相輔相成，成爲新聞專業延續、再生的關鍵力量。

陸、結論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探討三個問題：獨立記者如何生存發展？如何互助培力？如何與大眾媒體互動？筆者分析 21 位臺灣代表性獨立記者的實踐經驗、及其所處的傳播生態，結果發現：

（一）臺灣獨立記者如何生存發展？

獨立記者的工作形態可以粗略分爲供稿給其他媒體的自由新聞工作者、自營媒體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兩大類。獨立記者的收入來源包括供稿給大眾媒體和獨立媒體的稿費、出書版稅、政府補助或委辦、公益組織贊助、學術機構支持、公眾捐助、演講等專業服務、以及產品開發和銷售等，幾乎每位獨立記者都是「組合式工作者」，組合多項工作、多項財源來實踐專業、維持生活，但每人組合的財源不同。

（二）臺灣獨立記者如何互助培力？

獨立記者相互串連、並連結友好社會力量。他們創立 weReport 募集新聞採

airiti

訪和媒體營運資金，成立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進行教育訓練、促進獨媒對話和合作；他們可以加入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取得勞健保等勞動權益，還可以從 PeoPo 公民記者中找到許多熱中報導新聞的同志。獨立記者個人和這些組織，漸漸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生態系，以群體力量支持個別獨立記者去實踐專業、賺錢維生、贏得社會肯定。

（三）臺灣獨立記者與大眾媒體如何互動？

獨立記者在大眾媒體外部實踐專業，但與堅持獨立精神的大眾媒體及其記者密切合作。獨立記者供稿給這些大眾媒體、或與這些媒體合製新聞、或藉由這些媒體的通路傳送新聞給大眾，獨立記者賺得稿費和能見度，這些媒體則得到自己欠缺的訊息和觀點；獨立記者還和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大眾媒體記者一起爭取權益、並與具有獨立精神的大眾媒體記者共同運作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他們在大眾媒體內外分進合擊，共同延續新聞專業、探索傳播新路。

二、研究討論

臺灣獨立記者接連贏得新聞獎項、在重大社會議題上發揮影響力，而且發展出足以溫飽的維生策略、形成共存共榮的生態體系，他們的努力，證明獨立記者不僅可以作爲全職的志業，還可以作爲突破大眾媒體困境的新路，獨立記者應該得到傳播學界、新聞業界、公益組織、政府部門更多的重視和支持。

在傳播學界，新聞傳播系所除了培養大眾媒體的雇員記者外，也應該增進學生獨立報導、自主謀生的獨立記者知能。如前所述，獨立記者已經成爲一種職業選項，在臺灣有越來越多人以此維生，在某些國家，獨立記者占記者總數比例甚至達到六成，新聞傳播教育不能忽視這個浪潮；即使是大眾媒體記者，在變動不拘、而且每下愈況的新聞產業環境中，也可能自願或非自願、短期或長期失業，培養學生獨立記者知能，才能幫助他們因應未來的挑戰。具體作法可以是開設獨立記者相關課程，也可以和獨立媒體組織合作，2014 年暑假，獨媒協會邀集 8 家獨立媒體聯合試辦新聞系所學生實習計畫，就是可行的起步（獨媒協會，2014a）。

在新聞業界，越來越多記者因爲大眾媒體裁員、倒閉、背棄專業而被迫或主動離職，無論因何離職，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只要有心繼續新聞工作，就可以在大眾媒體外部繼續報導新聞、賺錢維生，若能建立專業性、獨特性，稿約就可能

airiti

源源不絕而來，收入甚至不輸在大眾媒體工作，即使無意當寫稿機器，也能在掙到維生收入後，享受較大眾媒體記者悠閒的生活。記者不必因為離開大眾媒體而失落，可以改以獨立記者的身分開創新局，朱淑娟的成就就是顯例；也可以透過集體力量來爭取勞動權益，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成立，就是重要的一步。

在公益組織方面，本研究發現浩然基金會資助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聯合勸募資助 NPOst 公益交流站、建蓁基金會贊助「上下游」記者人事費、台達電基金會「低碳部落格」提供獨立記者稿費，此外，臺灣數位文化協會支付鄭國威薪水、優質新聞發展協會補助李惠仁並建立 weReport 平台讓獨立記者向公眾募資。這些案例顯示，臺灣公益組織除了從事慈善事業外，也開始參與新聞傳播事業，不過，這樣的參與相較於美國山德勒基金資助成立 ProPublica，讓它每年有數百萬美金從事調查報導，仍顯不足。獨立記者似乎可以更積極接觸基金會、公益組織，幫助他們瞭解獨立報導的價值，爭取他們挹注更多資金、提供更大助力。

在政府部門方面，獨立記者抗拒政府、政黨、財團干預，但不必然不能接受政府資助。本研究發現，馮小非經營小地方和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吳國城經營《山城週刊》、張正經營《四方報》、胡慕情寫書都接受政府或政府相關基金會的補助，但都無損他們的獨立性。換言之，關鍵不在是否為政府資金，而在能否確保編採自主，只要編務獨立不受侵犯，獨立記者和獨立媒體可以接受、甚至可以爭取更多補助，畢竟，政府資金就是全民納稅錢。不過，為了確保編務不受干預、也為了消除公眾疑慮，政府有必要建立透明、超然的補助制度，由不具官方色彩的評審團、委員會來審查、發放、稽核經費開銷，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學術審查模式就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三、研究侷限與建議

本研究雖然發現記者在大眾媒體外部能夠發展專業、甚至發展的更好，但是，本研究的發現有其侷限。

首先，本研究只討論幾個較知名、較成功的個案，並未全面研究所有獨立記者，其他獨立記者的處境為何？成名成功的要件為何？邁向成功的路徑為何、策略為何？不同的獨立記者適合什麼路徑、策略？仍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其次，獨立記者範例，大多數進行不到 5 年，如朱淑娟 2009 年離職、楊虔豪 2010 年起步、馮小非的「上下游」2011 年才誕生，他們的營運模式能否永續？在發展歷程中將會面臨多少考驗？有待持續觀察。

airiti

第三，獨立記者互助組織——weReport、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成立都不滿 3 年，他們的工作剛剛起步，雖有讓人眼睛一亮的個別表現（如獨立媒體學院第一期學員贏得卓越新聞獎），但能否更全面、有效的支持獨立記者前進？能否長久、持續地支持獨立記者發展？也還有待觀察。

總之，獨立記者的表現不乏亮點，但如何從點、到線、到面擴大發展，還有待努力、有待研究。

參考書目

方海萍等譯（2006）。《工作與生活的未來》。北京，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Handy, C. B. [1989]. *Age of unreason*.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王健壯（2004）。〈部落格進城了〉。取自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Coffee/0,3406,112004121800533+1105130102+20041218+news,00.html

朱淑娟（2012）。〈《獨立媒體學院》不能沒有你！〉，《環境報導》。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2/05/blog-post_23.html

———（2010）。〈【開始獨立媒體】(1) 我還會留在地球〉，《環境報導》。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0/12/blog-post_22.html

何榮幸（2011）。〈李取中辦雜誌 幫遊民拿釣竿〉，何榮幸、謝錦芳、黃哲斌、郭石城、高有智、楊舒媚（合著），《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頁 30-39。新北市，臺灣：八旗文化。

———（2009a）。〈江一豪：一人媒體發聲〉，何榮幸、黃哲斌、謝錦芳、郭石城、高有智（合著），《我的小革命：相信夢想，相信自己內在的力量》，頁 40-49。臺北，臺灣：時報文化。

———（2009b）。〈吳國城：山城週刊寫下 30 年傳奇〉，何榮幸、黃哲斌、謝錦芳、郭石城、高有智（合著），《我的小革命：相信夢想，相信自己內在的力量》，頁 174-183。臺北，臺灣：時報文化。

侯惠萱、陳靖宜（2014 年 3 月 12 日）。〈林慧貞爲民發聲 揭開米粉真相〉，《生命力新聞》。取自 http://www.vita.tw/2014/03/blog-post_12.html#.UzDvfK2SwZE

胡元輝（2012）。〈網路再造調查報導新契機？——美國新興非營利新聞組織經營模式的探討〉，《傳播研究與實踐》，2（2）：67-99。

胡元輝、李岳昇、韋苡爭、陳雅萱、陳佳君、陳威諭等（2010）。《新聞革命進

airiti

行式：全球崛起的公民媒體》。臺北，臺灣：允晨文化。

唐鎮宇（2014 年 1 月 16 日）。〈5 獨立媒體 加入《蘋果》即時〉，《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116/35582758/

孫窮理（2007）。〈苦勞十年，請支持我們繼續走下去〉。取自 http://www.blackdog.idv.tw/wordpress/index.php/2007/05/21/coolloud10years/

翁書婷（2013）。〈揭開新聞另一面真相：網路獨立媒體勇敢發聲！〉，《數位時代》，5：94-103。

動腦編輯部（2013）。〈傳統衰退，線下媒體逆風成長〉，《動腦雜誌》，443：92-103。

梁瓊丹（2013a）。〈四方報：一解思鄉愁的異鄉人報紙〉，胡哲生、梁瓊丹、卓秀足、吳宗昇（合著），《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 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戰故事》，頁 191-213。臺北，臺灣：新自然主義。

———（2013b）。〈大誌：幫街友自力更生的熱血雜誌〉，胡哲生、梁瓊丹、卓秀足、吳宗昇（合著），《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 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戰故事》，頁 214-233。臺北，臺灣：新自然主義。

莫忘初（2008）。〈陳香蘭任記協新會長，網路媒體可申請入會〉，《苦勞網》。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17881

郭姵君（2010）。《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三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形塑與實踐》。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宜萍（2013）。〈爲異鄉人發聲的報紙 —— 四方報〉，《社企流》。取自 http://www.seinsights.asia/story/250/795/1089

陳建勳譯（2005）。《草根媒體》。臺北，臺灣：歐萊禮。（原書 Gillmor, D. [2004].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ebastopol, CA: O'Reilly.）

陳薏云、陳奕伶、詹亭華（2014 年 3 月 11 日）。〈主流轉獨立 汪文豪捍衛臺灣土地〉，《生命力新聞》。取自 http://www.vita.tw/2014/03/blog-post_11.html#.Uz6kuK2SyNQ

馮小非（2013）。〈楊虔豪：華人世界第一位，駐韓獨立特派員〉，《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取自 http://www.indiemedia.tw/posts/769

黃文慧、杜亞潔、馮小非（2013）。〈在挪威的新聞獨唱— Solo journalist 李濠仲（上）〉，《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取自 http://www.indiemedia.tw/posts/992

airiti

黃怡（1987）。〈終身的反對者——I. F. 史東〉，黃怡（著），《終身的反對者》，頁 3-22。臺北，臺灣：久大文化。

楊瑞賓譯（2005）。《巴格達部落格》。臺北，臺灣：好讀。（原書 Pax, S. [2003]. *Salam Pax: The baghdad blog*. London, UK: Guardian Books.）

臺灣新聞記者協會（2012）。〈健全專業及保障權益 新聞產、職業工會上路〉，《臺灣新聞記者協會》。取自 http://atj.twbbs.org/tai-wan-xin-wen-ji-zhe-xie-hui-da-shi-ji/ji-xie-gong-gao2012/%E3%80%90gonghuihuixun%E3%80%91jianquanzhuanyejibaozhangquanyixinwenchan%E3%80%81zhiyegonghuishanglu

劉昌德（2012）。〈非典型新聞勞動：臺灣與中國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之勞動過程與工作條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101-2410-H-004 -095 -MY3）。臺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2008）。〈大媒體，小記者：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新聞學研究》，95：239-268。

劉奕霆（2014 年 3 月 13 日）。〈募資 20 萬 楊虔豪的韓半島新聞平台啓動〉，《新頭殼》。取自 http://newtalk.tw/news/2014/03/13/45218.html

潘東傑譯（2002）。《大象與跳蚤：預見組織與個人的未來》，臺北，臺灣：天下遠見。（原書 Handy, C. B. [2001]. *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looking backwards to the future*. London, UK: Hutchinson.）

獨媒協會（2014a）。〈103 年度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暑期實習辦法〉，《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取自 http://www.indiemedia.tw/posts/1948

———（2014b）。〈獨媒春夏大事：重回地方與海洋〉，《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取自 http://www.indiemedia.tw/posts/1834

———（2013）。〈【獨媒講堂】媒體人對談（1）記者如何監督政府？（李惠仁 VS 何榮幸）〉，《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取自 http://www.indiemedia.tw/posts/1222

羅世宏（2012）。〈臺灣的優質新聞巴萊需要天使 從構想到實踐〉，《司法改革雜誌》，89：46-49。

ASJA. (2005). *Executive summary: Survey of freelance journalis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sja.org/pubtips/050324a.php

Bowman, S., & Willis, C. (2003).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hypergene.net/wemedia/

EFJ. (2011). *Managing change in the news indust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j.org/assets/docs/247/180/1265ff7-f512fb4.pdf

airiti

FJ. (2011). *Welcome to freelancejournalist.co.uk*. Retrieved from http://freelancejournalist.co.uk

IFJ. (2006).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 global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atypical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61547.pdf

-- (1999). *World survey: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freelance journalis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j.org/en/articles/world-survey-social-and-economic-status-of-freelance-journalists-final-report-december-1999?format=print

INN. (n.d.). *About INN*. Retrieved from http://investigativenewsnetwork.org/about/

KCNN. (n.d.). *Community news sit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kcnn.org/citmedia_sites/full_list

NUJ. (2014). *Freela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nuj.org.uk/work/freelance/

ONA. (2014). *About*. Retrieved from http://journalists.org/about/

Ryan, K. M. (2009). The performative journalist: Job satisfaction, temporary workers and America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10*, 647-664.

-- (2008). Temporary resistance: Strategies of freelancers in American network news. In R. Sickels (Ed.), *Business of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pp. 125-142). Westport, CT: Praeger Press.

Schaffer, T. (2007). *Citizen media: Fad or the future of news? The rise and prospects of hyperlocal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www.kcnn.org/research/citizen_media_report/

Sorrel, A. L. (2010). *Pulitzer Prize awarded to physician for Katrina covera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amednews.com/article/20100510/profession/305109958/7/

SPJ. (n.d.). *About SPJ*. Retrieved from http://www.spj.org/aboutspj.asp

Technorati (2008). *State of the blogosphere / 2008*. Retrieved from http://readwrite.com/2008/09/22/state_of_the_blogosphere_2008#awesm=~oHCdrvKl2idiaQ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pp. 25-54, July 2014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in the Internet Era: Their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Mutual Assistance Mechanisms

Chen, Shun-Hsia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net era brings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Taiwan journalists looking for more 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 from mainstream media.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1 representative cas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ir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mutual assistance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tend to survive on a combined mode, with multiple jobs and incomes for maintaining livelihoods. Their sources of incomes include: freelance payments by mainstream media and independent media, royalties from their published books or related products, earnings from activities subsidized by governm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or from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academic institutes, etc.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who used to struggle alone have started to cooperate among themselves with mutual supports. Now they have weReport raising funds for news interviews,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offering training programs, and Journalists Union taking care of their insurance needs. They share a relationship of symbiosis with these various forms of organizations.

While working outside of mass media, these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could still cooperate with those who share similar independent spirits, media organizations or journalists alike. Normally, they would freelance to these media, co-produce news with their journalists, and fight together for their common labor rights, hoping to strengthen the ecosystem of independent journalism.

Keywords: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freelance, independent media, independent journalism

---

* Email: chen328@gmail.com
Received: 2014.02.06
Accepted: 2014.05.02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55-92．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1

超越校園——大學實習媒體轉型社區媒體之探討 *

胡元輝 **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要

新聞業面臨劇烈衝擊的今天，大學是近年來另一股參與新聞業重建的力量。本研究針對美國此一發展中的現象進行探討，發現許多美國大學基於大學角色的認知與社區發展的重要性，已透過多元途徑，將原有的校園實習媒體轉型為服務校園所在地區的社區媒體。對同樣面臨新聞生態重建需求的臺灣而言，則不存在類似的變化，臺灣的大學實習媒體不乏以社區或地方為其定位者，惟多視為教學場域的延伸。實習媒體的指導教師雖多肯定「向社區轉」的價值，亦認為障礙重重，有賴長久的努力方足以致之。

關鍵詞：實習媒體、社區媒體、公民新聞、公民參與

* 本論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大學是新聞生力軍？－校園實習媒體轉型社區媒體之探討》（NSC 102-2410-H-194-054）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謝本刊匿名評審提供之寶貴意見。
** Email: telyhhu@ccu.edu.tw
投稿日期：2014 年 2 月 7 日
接受日期：2014 年 5 月 2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除了新聞教學之外，學院與大學正在製作與分享足以促進新聞與資訊健康流動的內容。

——Fancher (2011: 38)（前《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總編輯）

人類社群愈來愈相互依存，高等教育必須特別緊急的聚焦於對大眾命運有深遠影響的問題。

——Boyer (1990: 77)（已故卡內基教學推進基金會主席）

壹、前言

新聞業面臨劇烈衝擊的今天，許多與實際新聞產製原無積極關係的領域，如今都已「跨線」參與新聞業重建的行列，其中，被討論相當多的是政府的角色。究竟作爲媒體監督對象的政府，如何能夠一方面維護新聞自由與市場機制，另方面又能協助新聞業順利度過經營危機或轉型挑戰，委實爲民主國家的兩難。儘管如此，許多國家的政府仍跨越了傳統政府與媒體間的界線，大抵而言，歐洲國家較美國積極，若干歐洲國家的政府採行直接補助措施，美國政府的介入則相當有限（羅世宏，2010）。

另一個捲入新聞業重建的力量來自民間基金會與慈善家們。傳統商營新聞業由於經營利潤的考量，一旦面臨經營壓力即縮減商業利益較小卻有高度公共價值的新聞類型，例如地方新聞與調查報導等，導致進行社區與慈善服務的民間團體出現資訊傳播的斷層，無法順利推動其業務。而許多基金會的負責人與慈善家則認爲，好新聞乃社會進步的重要支柱，對新聞業捐助其實與基金會的宗旨或慈善服務的目標並不牴觸，因此近年來已有愈來愈多的基金會與慈善家跨入新聞領域，特別是支持非營利的網路新聞業（胡元輝，2010，2012a）。但是，此類捐助的數額尚屬有限，其能發揮的功能有待觀察。

雖然還有許多重建新聞業的新做法，例如集結群力、凝聚群智的群眾資助（crowd-funding）或公共委製（public commissioning）模式（胡元輝，2012b），但近年來，另一股參與新聞業重建的重要力量則是來自大學，特別是美國的大學。許多美國大學都將原有的校園實習媒體轉型爲服務校園所在地區的社區媒體，甚至在既有實習媒體之外另行建構新的媒體。這些社區媒體絕大多數是網路媒體，其中並有相當比例的媒體結合公民參與，使大學所支持的新興社區網路媒

airiti

體，成爲公民新聞與接受專業訓練的學生間一個極佳的融合實驗場。除了社區媒體之外，有的大學更發展難度較高的調查報導，希望能填補商營新聞業退卻下來的重要新聞文類。

有意思的是，媒體被指爲「第四權」，除了行政、立法機構被要求參與到新聞業的重建之路 (Benson, 2010; McChesney, 2013)，連被視爲「第五權」的大學，亦在某種程度上「跨線」進入傳統新聞業的運作領域，其中理據爲何？大學教育與社會參與之間的「圍牆」其實已經在多個領域遭到打破，但爲何這堵實習媒體的牆到今天被拆除得更爲徹底？其中緣由何在？著實值得探究。本文針對美國此一發展中的現象進行探討，藉以瞭解大學參與實質新聞生產，經營社區媒體的發展脈絡，以及其之所以「跨線」經營的理念與影響。本文並將瞭解臺灣各大學校園實習媒體的現況，以及是否意識到參與實質新聞生產的意義與必要，進而採取行動？其研究問題包括：

一、美國大學經營社區媒體的背景、思維與價值。

二、美國大學參與新聞業重建的方法與類型。

三、臺灣大學實習媒體的運作現況及主事者的認知。

四、臺灣大學實習媒體是否存在向社區媒體轉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貳、美國大學實習媒體轉向的意涵

透過許多學界與業界人士參與的廣泛討論，美國的 Knight Commission on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in a Democracy (2009) 發表總結報告指出，數位時代正在創造資訊與傳播的復興，但它並未能平等的服務所有美國人及其地方社區，美國需要擁有能滿足個人與公民需求的「資訊通達的社區」（informed communities）。爲了達到此一目標，該委員會呼籲應致力讓所有美國人及其社區更易於取得相關及可信資訊，而且來源應包括重要性可能愈來愈高的非營利與非傳統媒體。在 5 項具體建議之中，委員會更將高等教育在社區新聞上所能扮演的樞紐角色，列爲其中一項重點，主張應予促進。

不僅前述計畫得到此項結論，同年，由《華盛頓郵報》副社長 Leonard Downie, Jr. 與學者 Michael Schudson 所進行的研究與調查亦提出具體呼籲，主張公立或私立大學都應成爲其所在地方與州的持續的新聞來源，並將問責式的新聞報導做爲其教育任務的一部分。他們應該經營自己的新聞機構，爲其他非營利新聞和調查報導記者提供一個平台，爲積極的個別記者提供教職，並且在新聞資訊的蒐集和

airiti

分享上成爲數位創新的實驗室 (Downie & Schudson, 2009)。凡此皆具體顯示大學在新聞業重建中的功能，已受到普遍重視。

大學爲何會在近年來積極參與實質新聞的產製，將以往實習概念的校園媒體，轉型爲服務地方的社區媒體？原因自與新聞生態的變化有著密切關係，若非新聞業的經營環境與營運模式面臨劇烈衝擊，以致社區與調查報導類的新聞大量縮水，大學積極介入實質新聞生產的趨勢似乎不會如此積極。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研究生院前院長 Neil Henry 即表示，近年來的報紙併購和裁員已使舊金山地區的報紙記者減少一半，新聞危機至爲迫切，舊金山需要一個更有企圖心的區域報導行動 (Downie & Schudson, 2009: 61)。大力支持新聞教育和學生新聞報導計畫的奈特基金會新聞計畫副主席 Eric Newton 亦指出，「許多新聞系教師相信教新聞時需要真槍實彈上場，才能帶來真正對社區有用的真新聞」（同上引：59-60）。顯然，此一趨勢的背後猶有其豐富的意涵。

一、大學的社會角色與公民使命

大學與社會的關係一直是西方學界至爲關心且探討不休的議題，根據 Scott (2006) 針對大學使命（mission）所做的歷史研究，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建立之後，大學在教學與研究使命之外，相繼發展出國家化、民主化與公共服務的使命。其中，以服務民族國家內的公眾爲宗旨的公共服務使命，乃是 19 世紀後半葉至 20 世紀初所逐步發展而出，其內涵在於透過應用研究、校外課程、社區諮商與分析、服務學習等外部的服務活動，將高等知識傳給公眾。此一使命後來並吸納了民主化的使命，後者的訴求以今天的話語來說，就是開放近用、平等教育機會及多元化等。

不過，20 世紀後期，歐美國家質疑大學公共服務使命遭到貶抑的聲音趨於強烈，許多方面不約而同反思大學的社會功能，有的人擔心西方大學已淪爲屈從於市場力量的產業，有的人則認爲大學已走進研究至上的歧路。大學行政主管的反思可以前哈佛大學校長 Derek Bok 爲代表[1]，他在 1990 年出版的專著「大學與美國的未來」（*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中強調，大學是一個社會性的機構（social institution）而非產業，學術機構應檢討是否在解決美國社會問題，以及培養學生公民責任感的工作上善盡職責？基於此種質疑，他具體主張大學應與企業、政府機構、社會組織等協力促進社會的進步，擴充與改善社區服務

1 Derek Bok 於 1971 至 1991 年擔任哈佛大學校長，並於 2006 至 2007 年間再度代理校長職務。

airiti

課程。例如：將社區服務結合對政府政策或政治的探討，或在一般課程中加入社區服務項目，讓學生透過理論探討、社區實踐，產生對公民參與的動力與熱誠。即使到 21 世紀，Bok 仍持續就上述主張進行呼籲 (Bok, 1990, 2006)。

除了大學的行政管理階層，學者的反思性批評與研究亦相當多，且以研究型大學的角色錯置爲重點。例如社會學者 Checkoway (2001) 分析，即使是研究型大學，其創建時亦負有公民使命（civic mission）：讓學生對多元民主的主動參與做好準備，以及發展有助於社區改善的知識。不過，現在已經很少有大學的高層行政主管願意持續認同此一使命，導致大學在社區中扮演不相稱的角色，教師未做好公共角色的準備，社區團體亦難以尋求大學的協助。人類學者 Bird (2011) 檢討近期美國預算緊縮下的大學政策，亦對追求利潤型大學（for-proflt university）的興起不以爲然，主張作爲博雅教育的大學應重視學生參與及社區參與。她並強調大學應透過涉世研究（engaged research）與社會連結，所謂涉世研究係指學者與公民協同進行研究，聽取他們的意見，並讓他們協助界定研究的議程 [2]。

不過，各種對大學定位的檢討中，來自基金會與智庫的呼聲顯現出更爲強大的影響力。卡內基教學推進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在前主席 Ernest L. Boyer[3] 的推動與主持下，於 1990 年提出「學術再思考：教授職務的優先順序」（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報告，企圖賦予學術更寬廣而有效的意涵，引發相當多的討論與迴響。該基金會的研究團隊認爲，100 多年來，美國高等教育所宣稱的使命雖然包含教學、研究與服務三大塊，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研究已益發受到重視，教學則獲得愈來愈少的回報，至於將知識延伸至校園以外的服務傳統，更演變成只是在社區工作有需要時助一臂之力而已 (Glassick, Huber, & Maeroff, 1997)。基於理論可以引導實踐，實踐亦可引導理論，以及最佳形態的教學同樣可以形塑研究與實踐的觀點，Boyer (1990) 主張大學教師的工作應區分爲 4 種獨立但亦重疊的功能，分別是發現（discovery）、整合（integration）、應用（application）與教學（teaching）等 4 種學術。

其中在應用的學術（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上，Boyer (1990) 強調，人類社會愈來愈相互依存，大學與所處的社會乃至世界亦復如是，大學的學術性服務對於社會上巨大而難以處理的問題特別有其需要。他認同 Bok 所言，大學教

2 學者 Mary Walshok 將涉世研究與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予以區隔，強調後者係以公民為研究主題，並將社區當作實驗室 (Bird, 2011)。

3 Ernest L. Boyer 於 1979 年起擔任基金會主席，直至 1995 年去世為止。

airiti

師可以扮演社會哨兵（society's scouts）的看法，在眾人未覺察之前即指出社會迫近的問題，但大學卻鮮少能發揮此一功能，其原因自與學術工作被狹隘化，未能重視應用的學術或涉世的學術（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有密切關聯[4]。Boyer (1996) 認為，大學教師應該成為學者 Donald Schön 所謂的「反思的實踐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出入於理論與實踐之間，讓理論得以更為真實，也讓知識得以更為有用。因此，大學校園不應被學生與教師僅僅視為「孤立的島嶼」（isolated islands），它也應該是「行動的集結地」（staging grounds for action）；更進一步，大學還應藉由學術與公民文化持續而創意性的溝通，開創出一種有助於擴大人文論述空間與充實人類生活品質的特殊氣候。

同樣從知識生產的角度出發，跨國學者 Gibbons et al. (1994) 所提出的 Mode 2 知識生產方式，對於變遷中的學院科學亦帶來相當的衝擊。他們認為由科學社群所主導的，在單一學科內進行的同質的傳統科學，亦即 Mode 1 知識生產模式，已經逐漸被跨學科的、異質的，不侷限於學術社群的 Mode 2 知識生產模式所取代。既然關鍵性的知識會在知識可應用的社會脈絡下產生，成為社會分配型的知識（socially distributed knowledge），那麼大學所擁有的知識壟斷地位自然不復存在，其轉型也就勢所必然。Gibbons 等人的主張雖然被批評為新自由主義的推手，但同樣可以視為知識生產民主化的助力。Mode 2 所強調的大學教授必須走出學院，與異質行動者共同從事知識生產，在某個意義上，與 Boyer 的應用學術觀隱然呼應。

即使到了 21 世紀的今天，高等教育及大學的研究者仍延續上述反思，此一領域的著名英國學者 Barnett (2011) 在解析所謂知識型大學（knowledge university）的概念時，亦批評知識型大學淪為研究型大學（research university），並將研究狹隘為科學，以致人文學科及相關形式的知識必須掙扎求存。他提出生態大學（ecological university）的概念，主張大學必須瞭解自己已經以多重形式與其所處環境相互連結，而且對這樣的連結懷有責任。

不僅來自教育領域的反思，呼籲大學應建立與其所在社區及社會的緊密關係，新聞學界同樣出現一股重新定位校園與社區關係的呼聲。參與 WEtown.org 社區型網站運作的美國賓州伊莉莎白鎮學院教師 Johnson (2010: 102) 即指出，該校推動成立該網站的目標除了開展小型大學參與公民新聞的新實驗，提供傳播學生運用多媒體技巧，以及提供伊莉莎白鎮居民的社區資訊服務之外，他也強調，

4 Boyer 於 1996 年去世後方發表的文章中將「應用的學術」發展為「涉世的學術」。該文係依據 1995 年的一場演講改寫而成。

airiti

此一計畫與該學院「教育以服務爲目的」（educate for service）的校訓吻合，可以說是課程規劃的自然延伸。

Johnson 的說法顯示，大學積極參與實質新聞業不僅有其絕佳的利基點，更重要的是，其爲大學社會責任的展現與承擔。Downie & Schudson (2009) 的看法異曲同工，他們強調大學應該發展成專業新聞報導中心，並爲此類新聞機構提供所需的設備、管理費用和募款協助。他們更進一步認爲，雖然日常新聞報導有很多是常規性的，但獨家與問責式新聞報導可以讓新的資訊見光，能夠繼續增長成改變社會的工作，與做出原創貢獻知識給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並無二致。因此，大學參與實質新聞生產時所作出的優秀作品，不僅是大學社會責任的良好實踐，亦爲大學的日常教學和研究任務提供了寶貴材料。

教育界對大學的社會角色雖有爭論，但大學不應成爲象牙塔內的知識生產機構，已在相當程度上取得普遍認同。如今，社會型態一則愈趨多元與複雜，再則益趨連結與互動，大學事實上已無法建立與世隔絕的高牆。更何況，相對於其他學術領域，新聞與傳播科系原本就是大學體制內與社會互動比較密切的單位。但誠如 Downie (2011) 所言，仍有太多的新聞科系將自己倒退於學術圍牆之內（academic isolation），卻不知道傳統新聞組織面臨困境的今天，正是它們展露身手的時刻。若然，大學新聞與傳播科系應是「沒有圍牆的大學」的最佳實踐者。

二、社區、民主與媒體

社區（community）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一直被視爲民主的重要基石，基本緣由就在於社區是人民自治的基礎，人民若無成熟的社區意識及積極的社區參與，將不可能有健全的民主運作。而社區意識的培育及社區參與的促進，若無社區資訊的流通作爲支持，亦根本不可能存在 (Robinson, DeShano, Kim, & Friedland, 2010)。學者 Schuler (1995) 即指出，社區可以視爲一種生命系統（living system），若要維生必須仰賴 6 種核心價值：文化與社交、教育、強民主、健康與社會福利、經濟平等、資訊與溝通，而社區資訊對於社區網絡至爲重要，能夠支持核心價值的資訊更是值得珍視。

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原亦爲地方與社區資訊的提供者，但利潤掛帥的商業媒體不只因財務考量而屢屢削弱地方或社區新聞的報導，而且新聞同質化、一元化的現象日趨鮮明，致使強調公民參與及媒體近用的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扮演益爲重要的角色。社區媒體意涵廣泛，指涉多元，可以包含各種意圖補充、挑戰或改變主流媒體的社區媒體活動，亦可涵蓋社區廣播、參與型影音、獨立出

airiti

版或線上溝通等不同型態的媒體 (Howley, 2005, 2010)。學者 Rennie (2006: 3-7) 除了強調非專業者的參與及社區成員的近用爲多數社區媒體的特徵之外，亦將非爲營利（not-for-proflt）的組織性質及社區成員參與內容產製的運作型態，歸納爲多數社區媒體的共通特質。有鑒於社區新聞定義上的歧異，Lowrey, Brozanz, & Mackay (2008) 則從動態程序的觀點，認爲社區媒體乃是在社區持續發展過程中，既聽取多樣觀點亦協助創造社區意識的媒介。

除此之外，社區媒體由於所處的政治、社會與地緣文化脈絡有所差異，面貌亦相當多樣，例如在商業媒體具支配地位的美國，社區媒體主要係以非商業的另類媒體角色而存在，對受到主流商業媒體壟斷的言論生態形成彌補與制衡；但在西歐、加拿大與澳洲等地，社區媒體則反而是以衡平公共廣電業者的姿態在運作，挑戰後者所形塑的統一的、同質的全國性身分認同 (Howley, 2005, 2010)。甚至，不同地區的社區媒體亦因著重點的差異而有不同稱呼，例如歐洲國家多將社區媒體形容爲地方媒體，而第三世界則常稱之爲參與型媒體 (Rennie, 2006: 3)。

對於社區媒體的存在功能與價值，專研社區媒體的學者 Howley (2005: 1-38) 認爲，媒體產業專注於如何擴增市場占有率與利潤，卻犧牲公共問責與社會價值，已導致閱聽眾廣泛不滿。尋求媒體民主化的社區媒體，一方面反映出地方住民希望媒體能與自己的每日生活具有相干性的切身需求；另方面亦是對媒體所有權日趨集中，以及跨國媒體日益壟斷資訊流動的回應，希望能保有地方自主與地方認同，因此社區媒體的存在與推動可以視爲「溝通民主」（communicative democracy）運動的一環，亦爲抵制與適應全球化發展的一種「社會文化中介」（socio-cultural mediation）。

地方性（locality）或場所感（sense of place）是探討社區媒體存在功能的重要立論，Howley (2010: 8-10) 即強調，即使是所謂全球化的時代，人類對鄰里、城市、地區與國家所建立的場所感仍然在其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只關乎個人主體性的建立，亦是人類經由溝通與文化所形成的社會建構。Howley (2005: 264-269) 並借用文化研究學者 Raymond Williams 的「可識社區」（knowable communities）理念[5]，認爲社區媒體作爲社區成員個別或集體自我表達的場所，不僅可以顯現成員之間的差異，更可以讓彼此的共通性與依存性受到瞭解，進而促成社區成員的歸屬意識與責任感，產生類似「可識社區」的功能。因此，主流

5 Williams 是在分析 19 世紀英國小說時創用「可識社區」一詞，指涉人們所形成的具整體性且可相互認知的社區，惟因工業革命所產生的廣泛社會、經濟與政治轉型，此種社區認同已出現問題 (Howley, 2005: 264-269)。

airiti

媒體雖然隱蔽了社會關係中的相互連結與依賴性，但結合民主結構與參與信念的社區媒體卻可以促使社區產生凝聚（solidarity）與意義（signiflcance）。

同樣強調場所感有其重要民主意涵的學者 Friedland (2001) 則從 Jürgen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出發，提出他的「溝通性整合社區」（communicatively integrated community）概念來論證社區的民主價值。Friedland 指出，Habermas 將社會分爲系統（system）與生活世界（lifeworld）兩個層次[6]，而社區正好位於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銜接處（seam）。今天的社區乃經由整合性的溝通架構所形成，民主若要從社區層次發展，就必須要有一個能夠進行民主討論，建構公共領域，並促成公民行動的地方溝通生態系統。Aldridge (2007: 16-21) 亦在 Friedland 的觀點上進一步指出，要發展強盛的審議或參與式民主確實要從社區開始，畢竟再巨大的全球性變遷，其影響都是在地方，而且每個地方的調適結果也都展現出相當的特殊性。因此，地方性乃民主展現之處，地方議題需要地方性公共領域，而地方型溝通媒體對於建立地方性公共領域至爲重要。

Friedland 與 Aldridge 的論證點出另一個探討社區媒體意義的重要理論視角：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不同於前兩人的取向，一些探討公共領域的學者強調，只有極少數的公共領域能符合 Habermas 所建構的標準，亦即公民能以平等、積極的參與方式進行理性批判的論辯。而且現實社會並不存在單一的布爾喬亞式公共領域，尚有對抗性公眾（counter publics）所發展出的另類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s），與其視公共領域爲單一而統合，不如以多元、重疊與競爭性的公共領域概念來看待現代社會的溝通，就此而言，社區媒體的重要意義即在於提供邊緣化論述進入公共領域的機會。而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社區媒體乃是由公民社會所生成，又可以再生公民社會的中介機構，因爲它是公民參與的產物，亦是各類型公民團體與公眾溝通，並對公共機構作出反饋的場所 (Howley, 2010: 71-77)。

無論是地方性或公共領域的討論，其實都清楚指向社區媒體在民主運作中的重要功能。Rennie (2006: 190-195) 從 Stephen Coleman 的「直接代表」（direct representation）及 Anthony Giddens 的「對話民主」（dialogic democracy）理念，對社區媒體的民主功能做了細緻的闡述。Rennie 指出，並非每個人都有意願花費時間投票決定所有政策，甚至就是有意願，亦可能出現資訊不全下的錯誤抉擇。

---

6 在 Habermas 的二層次社會觀裡，系統層次是指透過金錢與權力所整合的政治與經濟系統，生活世界層次則是指經由溝通行動以形成文化、個性與制度合法性的社會領域，Habermas 強調要透過溝通行動遏止系統侵蝕與殖民生活世界。

airiti

同樣的，並非每個人都想直接和代表自己的政治人物討論政策，但民眾確實希望政治人物能對大眾所處的情境有同理心的瞭解，並對民眾的心向更具反應能力，此則需要政府與公民之間存在充分且雙向的溝通。因此，「直接代表」與訴求每個人直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直接民主並不相同，「對話民主」亦與訴求公民直接參與政策討論過程的審議民主有別。人類社會若要實現「直接代表」與「對話民主」理念，媒體民主就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已經擁有數位工具並蘊含自我表現精神的社區媒體。事實上，社區媒體的存在已具體證明，只要政治是以公民自己想要的方式以及自己所有的網絡來進行，民眾並不會變成政治冷漠，而一旦民眾之間能有更頻繁的溝通與對話，公民社會與民主就有機會得到更好的成長。

上述論證俱皆顯示，社區確實是民主的重要基地，而社區媒體則是社區運作的關鍵力量。因此，在地方新聞業遭到嚴重衝擊，社區資訊大量衰退的情況下，大學校園媒體伸出援手，已被許多學者與實作者視爲一個具有可能性及必要性的作爲，一些進行中的個案亦已成爲具體的驗證。

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新聞暨大眾傳播學院學生近年所進行的「自由市連結」（Liberty City Link）報導計畫，是大學參與實質新聞產製對社區形成正面效益的具體例證。根據該學院說明，向來被主流媒體忽略的自由市（liberty city），被視爲邁阿密最貧窮與危險的地區，絕大多數爲非裔美國人，另有少數加勒比海人。在佛羅里達國際大學教師的新聞課程推動下，許多從未踏入過自由市的學生進入該地區採訪，結果這些原先帶著興奮或驚恐心情的學生，不僅經歷了被稱爲改變生命的體驗，而且讓這個被媒體邊緣化地區的居民獲得應有的資訊服務。該學院因而表示，具有新聞技能的學生若能正確的報導社區，將有助於地區居民的培力[7]。以下即就美國各大學如何參與新聞業的重建，並將實習媒體轉型爲社區媒體的發展樣態進行整理與探討。

參、美國大學參與新聞業重建的實踐

國內外大學新聞與傳播科系設立校園實習媒體，已有相當長的歷史。無論是平面媒體、廣播電台或是電視，主要目的都是作爲學生的訓練場域，希望以接近實務操作的環境，培養學生的技能與經驗。有的校園實習媒體雖然會將校園周遭的事務納入報導或討論範圍，但真正成爲地方新聞業長期而穩定的成員者並

7 Liberty City Link 計畫可見於該學院官網的介紹，http://journalism.fiu.edu/students/student-work/liberty-city/index.html。

airiti

不多見。美國的大學實習媒體則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出現一些鮮明的變化，Downie & Schudson (2009) 的調查中指出，已有愈來愈多的美國大學正在記者出身的教授指導下，透過編採課程的作業實質參與新聞的產製，而且其內容主要是關於學校所在的州、市和社區的新聞報導。前《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總編輯 Fancher (2011: 38) 同樣指出，「學院與大學在教導新聞之外，亦正在創造與分享能增進新聞及資訊健康流動的內容」。學生所提供的新聞內容類型，不只包括即時新聞與專題報導，甚至難度較高、耗時較長的調查報導亦在產製之列（羅世宏，2012；Downie, 2011）。前《奧瑞崗人報》（*The Oregonian*）主編 Rowe (2011: 16) 即形容：「深度與調查報導的夥伴關係如雨後春筍般在大學校園萌發」。

美國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所此一新興的新聞參與趨勢，可以依據「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及「公民是否參與」兩個標準，區分爲以下數種型態：

一、大學自設以學生作品為主的媒體

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生院（Columbi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是此種型態的代表。該院透過不同課程，在老師指導下經營多個以學生報導爲主的社區新聞網站，其範圍皆集中於整個紐約或特定市區。以 2014 年爲例，運作中的社區網站即包括以紐約布魯克林、曼哈頓與皇后區爲報導範圍的 News York；以布朗克斯、曼哈頓與皇后區的鄰里，及紐澤西的城鎮爲報導範圍的 The Bridge；以布魯克林街區爲報導範圍的 The Brooklyn Ink；以布朗克斯區的突發新聞及深度報導爲內容的 The Bronx Ink；以整個紐約市爲主要報導範圍，並有西班牙文版的 The Columbia Journalist；以運動及賽馬爲題材的 Columbia Sports Journalism.com；關注紐約不同移民與族群社區議題的 Global City NYC；報導紐約曼哈頓、布魯克林、布朗克斯與皇后區地方新聞的 The Metropolitan Monitor；聚焦紐約市中心西區的 The Midtown Gazette；以紐約都會、商業、教育、環境與科技等議題爲取向的 Narrative NYC；著重紐約水道與住民關係的 The New York Current；以紐約市警政、文化、市長監督等爲報導重點的 NY City Lens；以北曼哈頓鄰里新聞爲範圍的 Northattan；報導紐約 Harlem、Washington Heights、Inwood，以及南布朗克斯地區新聞的 The Uptown Chronicle；處理上曼哈頓社區不受一般媒體關注議題的 The Uptowner 等[8]，總計網站數量高達 16 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研究生院（Berkele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8 相關網站資料可見於學院官網的學生作品簡介，http://www.journalism.columbia.edu/page/162-student-work-online/701

airiti

的學生，同樣於 2008 年創設了 3 個社區網站，以多媒體的數位工具來爲日益減少的地方與社區新聞服務。包括專注舊金山 Mission District 的 Mission Local；以及在福特基金會贊助下以加州 Temescal、Rockridge 與 Golden Gate 等地爲報導範圍的 Oakland North，以及以加州 Richmond 市爲報導重點的 Richmond Confldential[9]。

哥倫比亞大學與加州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並不只是產製社區新聞，他們也製作調查報導等類型的作品，並以不同方式參與新聞業重建。不過，兩校都以課程結合方式付出相當心力於社區事務的報導，積極進行在地連結。兩校之外，許多美國大學亦都設有自己的新聞網站，作爲學生作品的展示平台，而由於網站的近用性，這些以社區、鄰里爲報導對象的新聞，自然成爲社區民眾資訊來源的管道，也成爲商業媒體逐漸棄守地方與社區新聞的替代品。

二、大學自設學生與公民協作的媒體

由於公民新聞的迅速發展，過去數年來，許多美國大學都成立了社區公民新聞網站，一方面作爲教學工具，再方面則鼓勵社區居民參與新聞產製。美國大學會積極設立公民新聞網站，與 Jan Schaffer 主持的 J-Lab：The Institute for Interactive Journalism 有關，該中心在奈特基金會（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的支持下，自 2005 年以來透過新聲音贊助計畫（New Voices Grant Program）[10]，催生了多個大學院校的公民新聞提案。這些大學包括 Miami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Kent State University、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 Los Angeles、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Temple University、Columbia College、Ohio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等 (Johnson, 2010)。

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的公民新聞網站可以說是各大學的先鋒，該校在 2004 年即在 Clyde Bentley 教授主持下設置了以學生爲編輯、公民爲寫手的社區新聞網站 MyMissourian，並與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自 1908 年創立以來即開辦的《哥倫比亞密蘇里人報》（*the Columbia Missourian*）相互合作。此一網站雖於 2012 年 2 月結束，並將所有公民的作品轉移到《哥倫比亞密蘇里

9 相關網站資料可見於學院官網的社區報導簡介，http://journalism.berkeley.edu/

10 該計畫係以創新型的社區新聞事業作為贊助對象，自 2005 至 2010 年，總計支持了 55 個提案。其贊助金額以 2010 年為例，每個計畫第一年可獲得 17,000 美元，執行沒有問題，第二年可續獲 8,000 元贊助。參見該計畫官網 http://www.j-newvoices.org/

airiti

人報》的網站——ColumbiaMissourian.com，但後者仍開闢 From Readers 網頁，繼續接受公民的投稿 (Bentley, 2005, 2012)。

芝加哥的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則是在 2006 年推出了 ChicagoTalks 網站，由學生與社區成員提供芝加哥居民所需的超地方型新聞（hyper-local news）。該網站是由教師 Suzanne McBride 與 Barbara K. Iverson 所創立，希望以經過訓練的公民記者來增進芝加哥的鄰里新聞。每週平均產出 5 至 6 則新聞，有的新聞尚屬調查性質，所有新聞事先都經過審查，爲此，兩位教師都花了不少時間 (McBride, 2010)。該網站也與其它地方性新聞組織合作，並分享內容[11]。

座落於麥迪遜（Madison）的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新聞暨大眾傳播學院，同樣於 2006 年創設 Madison Commons 網站，則是屬於「專業／業餘」（pro-am）協作型媒體，以收集、提供麥迪遜地區新聞與資訊爲目標，以市鎮共有地（town commons）[12] 爲取向，致力於將社區居民連結起來，關注彼此的共同及獨特經驗。該學院初期係以來自基金會的捐款支持平台的營運，由研究生擔任類似編輯的工作，並鼓勵學生報導鄰里議題。儘管面臨公民參與不足的挑戰，Madison Commons 還是取得一些成功，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公民與社區組織間的關係 (Robinson et al., 2010)。

2008 年 4 月上線的 WEtown.org（原名 We-town.com），則是由位於賓州的伊莉莎白鎮學院（Elizabethtown College）所贊助成立，而且是由傳播、電腦科學與資訊科技服務等 3 個系聯合推動。伊莉莎白鎮是個只有 1 萬餘居民的小鎮，而伊莉莎白鎮學院則是只有 2,000 個學生的小型大學。WEtown.org 網站選擇公民產製作品而無須經過編輯審查的營運型態，傳播系的學生則在網站創設階段協助擬定內容製作的規程與流程，撰寫使用者說明，進行優使性測試，製作早期示範性的內容，以及展開網站宣傳計畫等 (Johnson, 2010)。

三、大學與其他媒體合作設立新媒體

基於力量的整合與新聞傳布管道的需求，許多大學選擇與媒體合作，推出新的社區或全國性媒體，而非由學校自己設立。

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新聞暨大

11 ChicagoTalks 的運作情形可見其官網簡介，http://www.chicagotalks.org/about/

12 共有地的概念係指網站不屬於任何政府或私人機構，對所有人開放，並可供大眾自由使用。

airiti

眾傳播學院與當地小報《哈茨維爾信使報》（*Hartsville Messenger*）於 2005 年 10 月所合作創辦的公民新聞網站 Hartsville Today。在此一大學與傳統媒體的合作案例中，南卡羅來納大學的團隊負責網站設計的規劃與協調、公民供稿者的訓練與晉用，以及網站營運分析等工作，而《哈茨維爾信使報》則負責網站的推廣，廣告的銷售，獲益的研究，以及訓練場地及特約人力的提供等。

由於網站供稿並不需要經過事前審查，而且南卡羅來納大學新聞暨大眾傳播學院的學生亦不必然要參與新聞產製，因此，對南卡羅來納大學而言，Hartsville Today 的創辦在相當程度上是學術機構對新聞業發展可能性的一種實驗[13]，藉以「檢視此種事業的機會與缺陷，將之報告出來，讓其他小型報紙得以從中學習」。基於此一構想，南卡羅來納大學的教師 Doug Fisher 與哈茨維爾信使報的發行人 Graham Osteen 聯合完成一本提供小報如何發展公民新聞的指南手冊，希望以自身經驗對後繼者提供具實用性的協助 (Fisher & Osteen, 2006)。

四、大學透過課程或學程提供新聞給校外媒體

美國許多大學也透過課程或學程的安排，將學生產製的新聞提供媒體刊播，讓學生作品進入實質新聞流通的領域，並與媒體形成協作關係。學生作品在老師指導下，都具有一定的品質，有的作品更因爲其調查的深入，揭露許多不爲人知的內幕或改變社會的既有認知，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華特 • 克朗凱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Walter Cro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自 2007 年開始經營「克朗凱新聞服務」（Cronkite News Service）[14]，爲該州 30 家報紙、電視台及網站提供學生有關亞利桑納州的報導。「克朗凱新聞觀察」（Cronkite NewsWatch）[15] 則是由學生製作的 30 分鐘晚間新聞，每週 4 天進行現場直播，經由該州數位頻道、公共電視與有線電視傳送給 100 萬以上的州民。這兩項新聞服務都是由專業新聞工作者領導，並以學生爲主體所進行，而學生的採訪地點則包括大學所在地的州首府鳳凰城及華府。該學院並於 2010 年設立「克朗凱新聞」（Cronkite News）網

13 根據 Hartsville Today 主持人之一的南卡羅來納大學新聞暨大眾傳播學院教師 Fisher (2009) 表示，該網站在經過近四年的經營之後，於 2009 年 10 月因主機問題而告一段落。

14 Cronkite News Service 的運作情形可見該學院網站關於此項服務的簡介，http://cronkite.asu.edu/experience/newsservice

15 Cronkite NewsWatch 的運作情形可見該學院網站關於此項服務的簡介， http://cronkite.asu.edu/experience/newswatch

airiti

站[16]，爲亞利桑那州州民每週提供原生性（original）的新聞、特寫與調查報導，其新聞來源包括 Cronkite News Service、Cronkite NewsWatch 以及學生的作品。

馬里蘭大學菲利普 • 美林新聞學院（Philip Merrill College of Journalism）的「首都新聞服務」（Capital News Service），與「克朗凱新聞服務」類似，係由該學院學生在專業人員指導下，爲馬里蘭州州民提供新聞。它們在華府、馬里蘭州首府安納波利斯市（Annapolis）及學院所在地的大學公園市（College Park）設有新聞分社，每學期製作數百則該州和聯邦政府的新聞報導，並製作晚間電視新聞，提供給馬里蘭州各地願意付費購買新聞內容的新聞媒體及自己設立的網站。同樣的，「首都新聞服務」所提供的新聞內容包括突發新聞、深度調查報導與獨家新聞等。該服務若從最早開始的時間算起，已達 20 年，如今不僅涵蓋文字與影音新聞，還有多媒體形式的新聞內容[17]。

西北大學的梅迪爾學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s Medill School）研究生亦分別在芝加哥與華府進行報導。在華府的新聞研究生關注公共政策如何影響人民的生活，並著重於利用電腦與資料揭露有權者的錯誤行爲。他們所製作的新聞透過合作網絡提供給全國的印刷、廣電與網路媒體，以及自己的網站 Medill Washington[18]。而位於芝加哥的新聞研究生則將他們所產製的新聞提供給該市及周邊地區的印刷與網路媒體，並刊登於自己設立的 Medill Reports 網站[19]。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新聞暨大眾傳播學院的學生則自 2009 年 1 月開始提供新聞給南佛羅里達的主要報紙。同樣由麥克考米克基金會贊助成立的「南佛羅里達新聞服務」（South Florida News Service），迄 2014 年初已產製包括網路影音新聞在內的 300 則報導，並將新聞服務的範圍擴及「斯克里普斯珍寶海岸報系」（Scripps Treasure Coast Newspapers）。如今的「南佛羅里達新聞服務」已於 2012 年春天整合爲正式的課程，並聘有出身實務界的專職主管，希望發展爲南佛羅里達與邁阿密地區的新聞中心，提供一般性與深度、調查報導給地方、全國與國際媒體[20]。

大學參與產製的新聞不僅包含一般類型的新聞，更有許多大學專注於調查

16 Cronkite News 的內容與運作可見官網簡介，http://cronkitenewsonline.com/about/

17 Capital News Service 的運作情形可見該學院網站關於此項服務的簡介， http://merrill.umd.edu/cns

18 Medill Washington 的運作情形可見於官網簡介，http://medilldc.net/about/

19 Medill Reports 的運作情形可見於官網簡介，http://news.medill.northwestern.edu/chicago/page.aspx?id=3103

20 South Florida News Service 的運作情形可見於官網簡介，http://sfnsonline.com/about-us/

airiti

報導的製作。例如柏克萊加州大學新聞研究生院於 2006 年起長期建置的調查報導學程（the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Program），以及於同年成立的哥倫比亞大學史泰博調查報導中心（Stabil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都與許多知名媒體合作，刊播學生們所產製的調查報導，並獲得包括普立茲獎在內的諸多新聞獎肯定。其它如前《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得獎調查記者 Walter V. Robinson，曾任美國非營利組織「更好政府協會」（Better Government Association）調查員的 David Protess，以及在《匹茲堡新聞郵報》（*Pittsburgh Post-Gazette*）服務的 Bill Moushey，都與大學授課班上的學生合作完成許多精彩的調查報導，提供媒體刊播，其中，David Protess 還戲劇性的將許多被冤判的死刑犯回復清白 (Marshall, 2011: 202-205)。

五、大學成為非營利新聞機構的基地

近年來，已有愈來愈多的大學成爲非營利新聞機構的基地，它們雖設置在校園之內，卻是一個獨立運作的單位，除了所在大學的支持外，它們主要的經費來源是基金會與個人。就學校來說，它們付出了若干資源，但學生們也得以從專業工作者身上獲得直接的學習機會，而就社會而言，他們所協力產製的新聞報導，透過各種合作媒體及傳布管道刊播之後，直接成爲公眾的資訊來源。特別有意義的是，由於這些非營利中心多係以深度或調查報導爲職志，因此它們所提供的新聞不只具有高度公共價值，而且常常產生重大影響力，使公共政策受到關注或改革。

例如坐落在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的「新英格蘭調查報導中心」（New England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是在兩位波士頓資深調查記者 Joe Bergantino 及 Maggie Mulvihill 的推動下，與該校傳播學院（College of Communication）於 2009 年所合作成立。波士頓大學提供電腦、辦公室空間、資料庫的免費使用、1 名大學生助理以及 2 人的部分薪資。大學的學生則獲得親身參與調查報導的學習機會，以及署名於報導的榮譽。所有調查報導都是在基金會與個人的贊助下，由有經驗的專業記者結合學生所完成，而所有完成的作品則係經由每月發行的訂閱服務「公眾之眼」（The Public Eye）傳布，同時刊播於麻州與新英格蘭地區的報紙與電台[21]。兩位創辦者希望中心的經費來源不要只依賴贊助或新聞銷售，而是像一個小型新創事業，擁有多種收入來源，因此它們同時開辦調查報導工作坊，提供高中學生有關知識與訓練 (Fleming, 2011)。

2009 年 1 月成立的「威斯康辛調查報導中心」（Wisconsin Center for

21 「新英格蘭調查報導中心」的使命與運作可見其官網上的自我簡介，http://necir-bu.org/about/

airiti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也是坐落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非營利組織，由前威斯康辛州報調查記者安迪・霍爾（Andy Hall）創設，聚焦於政府是否正直與生活品質議題。截至 2014 年 1 月爲止，此一中心已經發出超過 125 則主要報導，並被 230 個以上的新聞組織所引用或刊播，觸達人數估計超過 3,000 萬人。除了調查報導的產製以外，中心的工作尚包括教育及訓練學生成爲調查報導工作者，協助包括族群媒體在內的商業媒體進行自己的調查，以及提供能夠分享調查發現、新聞技巧，進行溝通討論的論壇[22]。

關注資料驅動新聞學（data-driven journalism）的「新聞來源調查中心」（Investigative Newsource），則是坐落於聖地牙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同樣是使用大學設施、並與教師和學生合作的非營利機構。該中心成立於 2009 年 8 月，由《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San Diego Union-Tribune*）前資深主編 Lorie Hearn 所領導創設，原名「看門狗中心」（the Watchdog Institute），於 2011 年 9 月改爲現名。截至 2012 年底爲止，這個以產製調查報導，賦予南加州住民充足資訊爲使命的組織，透過與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所屬公共電視台 KPBS 等媒體的合作，已完成百則以上的報導[23]。

六、小結

從上述各類型的具體案例來看，美國大學實習媒體的轉型雖可上溯 1990 年代，卻在近年呈現明顯而快速的成長，並發展出多樣類型，其中尤以向社區媒體轉向的趨勢最爲鮮明。從大學所扮演的角色來看，這些學生參與社區資訊產製的新興作爲不僅包括建置大學具主導性角色的自主型媒體，亦有與既有地方媒體協力的合作型媒體，相對而言，有的大學則僅扮演純粹的新聞或資源供應者角色。因此，學生作品所刊播的媒體，不僅限於大學自己所設置的新聞網站，並擴及地方的公共與商業媒體，其中一些媒體還以付費方式刊登學生作品。

大學參與實質新聞產製所需的經費雖頗多來自於基金會或個人的贊助，並發展出多種資金來源模式，惟無論哪種模式，大學仍須投入各種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包括提供空間與其他服務，並負擔不同程度的人事支出。至於與大學合作的獨立非營利新聞機構，不僅大學的公信力有助於該機構尋求外部的贊助，充沛的

22 「威斯康辛調查報導中心」的運作情形可參見官網的自我簡介，http://www.wisconsinwatch.org/about/what-we-do/

23 「新聞來源調查中心」的運作情形可參見官網的自我簡介，http://inewsource.org/about-us/

airiti

學生人力更成爲實質新聞產製的重要支柱 (Rowe, 2011)。此種大學積極參與社區真實新聞產製的趨勢，具體反映出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所對新聞業重建的責任認知，視大學爲新聞業重建的生力軍。Downie & Schudson (2009) 即明言：「現在是時候了，其他學院和大學應採取下一個步驟，以創造一個完整而全面的新聞機構。……大學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機構，它們應在美國新聞業的重建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這些將實習媒體轉型社區媒體以參與新聞業重建的努力，亦緊密呼應了有關大學社會角色與社區媒體價值的省思。例如前舉 ChicagoTalks 網站主持人 Iverson & McBride (2008) 向贊助者提出的報告中即指出，該網站在激勵公民參與新聞產製上雖然存在瓶頸，但他們確實相信，當新聞工作者與公民所產製的新聞能夠被刊播時，社區與民主就會愈強大。在哥倫比亞學院任教的 McBride (2010) 並在她的論文分析中表示，公民參與的成效雖尚難判斷，但這些網站正試圖讓公共生活更美好。創設 Madison Commons 的威斯康辛大學教授 Lewis A. Friedland 亦認爲，建構一個能讓各種溝通性網絡整合的新網路平台，連結私領域的個人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性面向，可以讓社區興盛起來 (Robinson et al., 2010)[24]。

不過，大學實習媒體轉型爲社區媒體並非毫無障礙。從技術性的問題來看，學生並非專職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尚須修習其他課程，亦存在新聞中斷的假期問題。因此，前舉的學生新聞服務多是在學期中運作，但一些新聞學院正在進行實驗，讓它們在假期和暑假也能繼續運作，其方法包括付錢給願意在學校休假期間去地方新聞媒體實習的學生 (Downie & Schudson, 2009)。

至於層次更高的必要性或價值性問題，自無可避免地存在爭議。例如大學參與新聞產製能否有效填補商營新聞業衰退後在地方新聞與調查報導上所留下的空隙？即出現判斷不一的現象。已有若干研究試圖對此提出評估，以大學推動公民新聞的情形而言，Johnson (2010: 101) 指出，雖然已擁有一些經費、智慧與熱情，但是經驗顯示，在導引公民參與的部分仍面臨問題。至於調查報導的推動，雖然有愈來愈多的大學支持調查報導，加上其他的努力如創意網路投資、新興非營利媒體等等，使日益衰退的調查報導看到希望的訊號，但 Marshall (2011: 213) 認爲，

24 儘管有些研究者認為，網際網路等新興媒體反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傷害社區的運作，使社會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並形成普遍的去連結意識（sense of disconnection），而人際溝通的減少亦可能導致脆弱的團體聚合，但 Madison Commons 的主事者們認為，社區連結（connectedness）的品質與層次才是網路是否能對社區產生正面功能的重要關鍵。在一個益趨零碎的多模式社會（multimodal society）裡，網際網路具有重建或至少增進相互關係的潛能，因此，Madison Commons 希望創造一個覆蓋地理區位的虛擬社區，既開拓社區居民的人際網絡，復讓彼此的結合網絡更為鮮明。這就不只要促成溝通，還要促進審議 (Robinson et al., 2010)。

airiti

仍不足以彌補主流媒體過去所執行的調查報導的量，倒是調查報導的未來已因大學的參與，顯現出更有活力的脈動。

肆、研究方法

從上述整理可知，近年來美國已有不少大學有意識的加入社區或地方新聞的產製，轉型成爲實質新聞生態系統的一員。臺灣的大學校園實習媒體又是如何運作？是否出現類似美國的轉型現象？其原因何在？本研究透過現存資料分析暨深度訪談法，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在文獻資料的蒐集上，由於國內以往有關大學實習媒體的研究相當有限，且主要集中於數位科技對實習媒體教育模式的衝擊，如許瓊文（2007）以行動研究法反思科技匯流在大學實習媒體教育上的衝擊；位明宇（2010）同樣以行動研究法探討學生媒體在整合新聞課程設計上宜有的對策等。因此，有關現存資料分析主要是以各大學校園實習媒體的紙本或網路內容爲對象，藉以瞭解其主要定位及歷史沿革。深度訪談則是以實習媒體的指導教師爲對象，俾期深入各媒體的實際運作情形與背後理念，並藉而瞭解他們對實習媒體轉型的看法。本研究依據大學所在地區、規模與性質的差異，挑選 7 個學校傳播相關科系實習媒體的指導老師進行深度訪談（如表 1）。就地區而言，7 個學校分布在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分屬都會與鄉村；就規模而言，該校有設立傳播相關學院者，亦有僅建置單一科系者；至於性質的分別，則涵蓋公立與私立大學。

7 個學校傳播相關學系的實習媒體多包涵報紙、廣播與網路等型態，有的並擁有電視台，惟無論擁有何種媒體載具，幾乎都已進入多媒體的實習狀態。本研究係以新聞性的實習媒體爲主要對象，其中，世新、輔仁與佛光大學均出版報紙，且多與其他實習媒體協同，關注社區事務。國立中正大學與靜宜大學相似，皆以網路平台呈現多媒體的實習成果，亦皆關注地方與社區事務，相對而言，其實習媒體歷史較短，前者創設於 2003 年，後者成立於 2008 年，但已於 2014 年初劃上休止符。至於 2013 年 11 月 13 日方才設立的國立東華大學實習網路廣播電台則是成立最晚的實習媒體，其內容雖包含地方事務，惟原住民元素乃特色所在[25]。相對的，國立政治大學的實習媒體雖然歷史悠久，但特殊的是，它是從社區報轉型爲非社區報，且於 2012 年停止發行報紙，僅以「Uonline 大學線上」網站作爲學生作品的發表平台。

25 見東華之聲電台簡介，http://www.radio.ndhu.edu.tw/files/11-1049-83.php

airiti

訪談對象	所屬單位	大學特質	實習媒體
指導教師 A	國立政治大學	北部、公立、設傳播學院、具新聞系或學程	Uonline 大學線上 不具社區性，定位爲大學社群的媒體
指導教師 B	世新大學	北部、私立、設傳播學院、具新聞系	《小世界週報》 具高度社區性
指導教師 C	輔仁大學	北部、私立、設傳播學院、具新聞系	《新莊報導》 具高度社區性
指導教師 D	佛光大學	東北部、私立，設傳播學系（非純粹新聞系）	《蘭陽報》、《蘭陽網路報》、「佛大之聲」網路廣播電臺 具高度地方性
指導教師 E	靜宜大學	中部、私立、設大眾傳播系（非純粹新聞系）	《靜報》 具地方性
指導教師 F	國立中正大學	中南部、公立、設傳播學系（非純粹新聞系）	《中正 E 報》、「荆聲荆事」無線廣播電台 具地方性
指導教師 G	國立東華大學	東部、公立、設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非純粹新聞系）	「東華之聲」網路廣播電台 具地方性與族群特色

表 1：深度訪談對象列表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伍、臺灣大學實習媒體運作暨轉型可能性

依據教育部統計，臺灣於 102 學年度計有 122 所大學、25 所獨立學院，其中約有 27 個學校設立逾 60 個以上的傳播系所，爲數頗多[26]。這些分布在臺灣各地的傳播相關系所，頗多設置不同型態的實習媒體供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用。實習媒體的種類依據系所性質與目標的不同，包含報紙、廣播、電視與網路等，近年來隨著數位匯流的推進，其中更不乏多媒體的訓練。這些實習媒體雖非大學校園唯一的媒體，惟因此類媒體得到系所的支持，又有傳播科系學生的參與，一般而言，其規模與影響均較大。

一、大學實習媒體的定位

各大學院校傳播相關系所設立的實習新聞媒體雖都負有教學的基本任務，惟定位仍有相當差異。有以大學校園事務爲主要報導對象者，如國立政治大學的「Uonline 大學線上」；有以本校事務爲主要內容者，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大觀報》；有以傳播產業動態爲主要報導範圍者，如銘傳大學的《銘報》；當然也

26 參考教育部統計處 103 年 1 月 2 日發布之「大專校院各校科系別概況」，https://stats.moe.gov.tw/files/detail/102/102_sdata.xls

airiti

有若干學校的實習媒體係以所在社區或地方的事務爲主要報導內容，如世新大學的《小世界週報》、輔仁大學的《新莊報導》、國立中正大學的《中正 E 報》、靜宜大學的《靜報》；另有學校納地方與校園資訊於一爐，如佛光大學的《蘭陽報》；不過，也有許多學校兼容並蓄，其內容既有學校的動態，亦包含地方消息、外地新聞或其他議題，如國立交通大學的《喀報》、文化大學的《文化一周》、國立東華大學的「東華之聲」網路廣播電台。

世新大學的《小世界週報》可以說是實習媒體定位爲社區報的代表。開學時間每周出刊的《小世界週報》，創刊於 1965 年 1 月 2 日，中間經過幾度改版與更名，直到 1997 年確立爲現今的社區報定位，以學校附近的文山與新店地區爲主要報導範圍，目前除了發行以世新大學全校師生、畢業校友及大文山地區居民爲對象的紙本週報之外，另製播網路、電視與廣播新聞，同樣是以社區新聞爲主[27]。鑒於經費考量及閱聽環境的改變，目前《小世界週報》的紙本發行份數，已由早期的 1 萬 5 千份降爲 8 千份以下。報紙是免費贈閱，派送由學生負責，每人都有其責任點，派送地點則包括店家與機構等。

輔仁大學的《新莊報導》是另一個擁有多年傳統的社區媒體。根據指導教師提供的資料顯示，該份報紙前身爲《傳播者》，於 1972 年創刊，係該校新聞傳播系第 1 屆校友因爲興趣而創辦的班刊，後雖陸續轉型爲系刊與校刊，但直到 1985 年，方將報導層面由校系、傳播界及文教界擴大爲學校所在的新莊地區，並於 2 年後向政府登記爲社區雜誌，正式易名爲現今的名稱。2004 年 11 月，《新莊報導》的網路版正式上線，2012 年起提供 PDF 檔供讀者下載，並開始實驗性的產製影音新聞。目前《新莊報導》每期印製 3 千份，以讀者付費訂閱方式發行，並於大新莊地區各公家機關及部分超商門市免費提供索閱。

由於建校時間較晚，創刊於 2009 年 10 月的佛光大學《蘭陽報》，是受訪學校中發行社區報時間最短的一份。該實習媒體明確定位爲宜蘭地區的社區報，不過亦涵蓋一定篇幅的佛光大學相關新聞，作爲「佛光大學對外發聲的窗口」。比較特殊的是，在目標讀者群的設定上，該報特別側重宜蘭地區的教育文化從業人員及公教人員，因此教育新聞的比例不少。該報兩周發行一次，每次發行量 5 千份[28]，除在校內發行，也在宜蘭各級政府機構及客運、臺鐵車站發放。《蘭陽報》與校內另 2 個實習媒體——《蘭陽網路報》、「佛大之聲網路廣播電臺」，與世

27 見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網站系所簡介，http://e01.shu.edu.tw/a08.htm

28 見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網站之《蘭陽報》簡介，http://fgucom.fguweb.fg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53

airiti

新大學的《小世界週報》類似，是三合一組織，亦即基本上是由共同的學生團隊在相互支援的體制下運作（牛隆光，2012）。

上述幾個大學實習媒體以社區或地方爲其定位，主要考慮之一在於可以增進實習教育的真實感，並強化大學的在地連結。例如《新莊報導》的指導教師就將真實世界的新聞工作比喻爲在大海中游泳，而學生的社區採訪則如同游泳池的游泳，可以藉此讓學生「試一下水性」。「新莊八十幾個里，每個學生都要分到三到四個里，一定要跑，每一期一定要有一個鄰里新聞，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好的新聞都是來自鄰里」。（指導教師 C，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7 日）

除了真實社會的接近性外，社區資訊有助居民社區意識的提升，並可以對社區發展產生正面效益，亦爲實習媒體社區化的重要考慮。再以《新莊報導》爲例，其指導教師即指出：地方政府改制之後，「現在新莊區公所已經不是一個市了，是一個區，變成呈轉單位，沒有自己的任何決策功能。」所以《新莊報導》可以把社區居民的需求反應出來。譬如該報曾報導獨居老人的送餐服務，在其他縣市都是一日 2 餐，但新莊卻只有 1 餐，此一報導雖引來承辦單位的不快，但是不到 2 個月，送餐政策就改了。（指導教師 C，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7 日）

其他建置歷史較淺，且未發行報紙的傳播科系實習媒體，其以地方或社區事務爲定位者，所持理由亦相若。例如主要以大臺中地區爲採訪對象的靜宜大學實習媒體《靜報》表示：「希望學生透過參與，實地觀察、採訪與報導大臺中的新聞，建立與在地的連結，瞭解與關懷在地人們生活的各種面貌」[29]；國立東華大學新近建置的「東華之聲」網路廣播電台，同樣「希望學生用專業的傳播知識去回應在地的需求，……希望你（學生）在東部，那你要去關懷東部各個地區的各種問題，嘗試跟東部的社區或部落對話，或甚至幫他們解決問題」。（指導教師 G，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9 日）

相對的，國立政治大學的實習新聞媒體反而是從社區報變成不以社區爲其定位。該校新聞系於 1973 年將新聞系刊物《學生新聞》改版爲《柵美報導》，成爲臺灣第一份登記有案、服務小眾的社區報紙。1991 年，該報擴增並轉型爲《大臺北報導》，但此一地方報的定位在 1993 年改名爲《大學報》之後做了轉變，變成以大學社群和大學師生發生與關心的事爲主要報導內容[30]。該報指導教師分析，政大學生在實習媒體的運作裡擁有高度自主性，他們之所以不以社區爲定位，應

29 見《靜報》網站的自我簡介，http://epaper.pu.edu.tw/main.htm?pid=22

30 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網站的《大學報》簡介，http://www.jschool.nccu.edu.tw/09uonline.asp

airiti

與政大所處的地理環境難以形成社區，以及學生對政大所在地並無強烈的社區感有關。

儘管發行報紙需要相當的印刷費用（派送係由學生處理），以數位裝置接收資訊的比例亦逐漸提升，但《小世界週報》、《新莊報導》與《蘭陽報》都認爲數位落差仍然存在，紙本仍有其利基（如中高齡讀者）與功能，因此 3 校迄今都仍發行紙本。

二、新聞生態劇變與大學實習媒體

新聞業經營生態的改變對於在大學執教的教師而言，確實感受深刻。雖然有教師提及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自製的地方資訊服務，對年長的地方閱聽人存在一定的吸引力，不過，多數實習媒體的指導教師都明確感受到全國性報紙在地方新聞人力配置及版面上的縮減，多數也都認爲全國性的衛星新聞頻道與廣播新聞，以及地方系統業者與地方廣播電台所提供的新聞資訊，並不足以擔負完整的地方或社區資訊服務功能。

以宜蘭的全國性報紙爲例，佛光大學《蘭陽報》的指導老師指出：

> 《中國時報》第一個收地方版，他把地方中心整個裁撤掉了，原本我們在宜蘭那個 3 大報，像《聯合報》大概 8、9 個記者，《中國時報》也有 7、8 個，《自由時報》也 7、8 個，所以這 3 個報加起來就有二十幾個，結果《中國時報》版面收了，現在 (記者) 才大概 1、2 個人，《聯合報》沒收，《自由時報》沒收，可是他們人數減少。（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至於少數運作於學校所在地區的地方或社區報紙，對受訪的大學教師而言，其對社區資訊的服務功能亦未見樂觀，有的地方甚至連經營多時的社區報亦難以支撐而結束營運。例如《蘭陽報》所在的宜蘭地區原有《宜蘭時報》、《宜蘭日報》、《宜蘭在地報》等，如今都已劃下休止符；《小世界週報》所在的文山地區，曾有發行近 40 年的《文山報導》，亦於 2014 年 2 月正式熄燈[31]；《新莊報導》所在的新莊地區雖有新的紙本媒體創刊，惟其功能仍待觀察。

31 創刊於 1975 年 8 月 2 日的《文山報導》，是臺灣歷史悠久的社區報，其報導範圍為大文山地區，「雖然報社經營的收入總是無法彌補支出」，仍歷經開放報禁與「媒體娛樂化、網路化等等變化」而不輟，近以「階段性任務已達成」為由宣布停刊。見 http://wenshan-weekly.blogspot.tw/2014/01/40.html

airiti

不過，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針對地方或社區資訊而設立的網路媒體有愈來愈多的跡象，但同樣的，或因品質參差不齊，或因經營規模不足，這些網路媒體多未能常態性提供完整的地方或社區資訊。一位受訪的教師即以某網路媒體靠公關新聞爭取費用的例子指出：「網路報要生存其實也不容易，你可能就是要有一些網路的經營模式。就我來看，我覺得網路進入的門檻比較低，但是你要發展到有成就比較難」。（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也有教師提及社群媒體的興起讓使用者得以掌握部分社區或地方資訊，但他認爲此種新興的傳播模式對社區居民的需求而言仍是不足的。

> 大概五年來，因為社群網站的興起，大家慢慢在那個地方找到一個 solution 了，然後他們就一起在那邊取暖。可是這樣的發展其實是滿詭異的，我並不是特別看好這樣的狀況，因為如果大家都躲回去自己所成立的那些社團，自己呼朋引伴找出比較趣味相投的一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並不會讓這個社會更熱情，其實還是會冷漠，因為他們很容易只專注在自己想專注的議題上面。這個其實還滿可怕的。（指導教師 F，親身訪談，2013 年 12 月 11 日）

不同學校所在地區的媒體生態，變化未必相同，各校實習媒體指導教師對媒體生態變化的影響，自亦認知有別。惟整體而言，受訪的實習媒體教師對地方或社區資訊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多無強烈感受，此與原本較注重地方新聞的報紙影響力日趨下降固有關係，與社區媒體一直未能在臺灣取得蓬勃發展，亦有關係。

三、大學與社會的關係

大學與社會或所在社區的關係爲何？多數受訪的大學實習媒體指導教師贊同大學並非孤立的社會絕緣體，相反的，應強化社區連結與在地實踐。有的教師甚至強烈批評現在的大學走向根本扭曲了大學教育的本質，包括所謂研究型大學與學用合一概念的曲解。

> 臺灣很多自命是研究型的老師好了，對教學生就不是那麼認真，其實不管你是哪一型的，你到學校裡面還是要以學生為本位嘛！他是學生嘛！講白一點，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們繳了學費來，你才有薪水可領，私立學校尤其是這樣，所以應該把學生教好，那才是最重要該做的事。（指導教師 C，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7 日）

airiti

我們的大學都只注重研究，所以早期我們幾個校長跟地方都不來往，地方說希望跟我們學校來往，他們都不看重，因為他們都是國立大學校長或是老師畢業（註：應是指退休）過來的，他們覺得大學不是在跟社區做互動，是要拿出研究 paper 的實力。（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教育部可能很在意他（學生）畢業以後有沒有進到媒體、就業率如何，所以我們必須去跟企業做結合，那我就覺得我們的理想會愈來愈沒有，因為我們要訓練學生成為一個會批判思考，會真的對社會有正面貢獻的（人），但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實習媒體還是課程，它的導向其實就是要幫企業訓練有技能的學生，讓他出去可以找到大公司（就業）最好。（指導教師 B，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0 日）

即使是傳播教育，一位受訪教師亦強調，所謂重視實務，並不只是要學會機器操作，還要有人文關懷。「學校教你的也足夠讓你在業界至少前 3 個月是可以立足穩固的，剩下靠自己，但你多了一個所謂的人文關懷，這個是長久的，你心裡面有這種想法就是長遠的」。（指導教師 C，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7 日）

有的教師更強調大學應有引領社會變革的理想性。「大學應該就是要有理想，它應該要跑在社會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後面去收爛攤子。現在的社會面臨太多的問題，所以至少我覺得大學教書的這些人，其實是應該保有一些理想性存在的」。（指導教師 B，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0 日）

值得注意的是，幾位受訪教師都談到了所屬大學已經對在地連結有所省思，並付諸行動。例如世新大學新聞系多年前經過討論，決定以「社區新聞學」爲該系發展重點。此外，國立東華大學爲了推動在地實踐，亦於 2012 年 11 月成立「社會參與中心籌備處」[32]。不過，是否能真正帶動風氣，改變大學定位，尚待觀察。

四、大學實習媒體向社區轉的必要性

臺灣需不需要社區或地方媒體？受訪教師對此角度不一。有人認爲社區報的需求與地區風氣有關，不同社區會有不同的社區意識，民風比較純樸或是封閉的

32 社會參與中心籌備處強調「將社區當作學習的對象，把大學當成社會責任的實踐場所」，見官網簡介，http://www.spc.ndhu.edu.tw/files/11-1086-9912.php

airiti

地區，有無社區媒體對他們並無太大影響。相反的，也有幾位教師分析，位處偏鄉的學校比較能掌握地理區塊的力度或準度，處於社區資訊不發達地區的大學，亦比較容易發展社區定位的實習媒體。另位教師則以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社區報紙能夠發揮高度的社區服務功能爲例，主張相對於幅員廣闊，社區凝聚力較強的美國，臺灣社區媒體的發展條件雖然較弱，但並不意謂臺灣就不需要社區媒體。相反的，她主張大學應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居於政府與社區居民的中間位置。也有教師強調，社區資訊對臺灣民眾仍有其需要，只不過大學實習媒體進入社區的定位要與其他類型的媒體劃分清楚，例如要能夠深入鄰里。

儘管臺灣民眾的社區意識可能與其他國家不同，對社區媒體的需求也可能有別，但多數教師仍認爲，實習媒體「向社區轉」有其必要。整體而言，多位教師認爲社區媒體與社區發展具有密切關係，可以提升社區居民的社區意識與公民意識，進而有助於臺灣的民主運作與公共生活。《新莊報導》與《蘭陽報》的指導教師則分別提及，良好運作的社區媒體可以帶動公共討論的理性化與地方言論的多元化。

也有教師以全國性媒體喜從臺北看臺灣來反證社區媒體的價值。「在地人可能覺得重要的議題，希望得到全國的奧援、聲援，希望讓全國人來看到我所在的這個地方發生這麼重大的一個議題，但這樣的議題不一定會受到北部編輯台掌握新聞產製的那些守門人的青睞」。（指導教師 F，親身訪談，2013 年 12 月 11 日）此外，電視臺駐地記者人力的單薄以及拷帶慣習的存在，亦使全國性新聞頻道無法真正滿足地方資訊的需求。

除了積極看待社區媒體的功能，幾位教師不約而同指出，藉由大學實習媒體在社區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可以帶給學生正面的教育功能，同時發揮引領商業媒體的示範作用。

> 我覺得臺灣的社會媒體，商業媒體會這麼差勁，很大一部分的因素是因為公民素養很差，太低，以致於民眾會願意去消費，我覺得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這麼混亂的環境底下，大學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高等教育事實上就應該要有理想性存在，大學就是要去執行這樣一個理念。……實習的社區媒體……就是一個工具，它其實有學校老師，又有錢，所以它其實是資金、人力、設備上面是完全都存在的。（指導教師 B，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0 日）

airiti

其實臺灣的媒體都有一些問題，如果說學校辦媒體，尤其是專業的媒體，我覺得是不是比較能起一種導正或示範的作用。譬如說現在講黑心的商品，如果有一家是不賣黑心商品的，這至少讓人家會有一個選擇，那如果我們設有傳播科系的大學都能夠辦出一個專業的媒體，至少第一，讓這些老師有印證所學的機會，第二，也做一個品牌，不要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另位教師除以「社會的良心」來比喻大學的角色，肯定實習媒體社區化、地方化的必要性之外，也以「開枝散葉」的比喻來強調經過地方參與洗禮的學生，可以在畢業後將此體驗運用於工作之上。「對於整個臺灣的未來，比如說他們開枝散葉了，他們到全國各地去就業了，甚至有可能在中央政府的一個體制下，他們用過去在這邊的一個生活體驗，……或許就有機會能夠提出一些比較因地制宜的 policy 出來」。（指導教師 F，親身訪談，2013 年 12 月 11 日）

不過，實習媒體的指導教師對於實習媒體「向社區轉」是否能改變當前的新聞生態，發揮更大的資訊功能，並無一致看法。已經定位爲社區媒體的輔大指導教師以自己的經驗爲例，認爲社區型實習媒體雖有其功能，擁有特定閱聽族群，新聞內容也可能被商業媒體運用。但受限於實習媒體的本質，如新聞時效性不強、無直接反映管道等，尚無法影響整個新聞生態。而世新實習媒體的指導教師則強調，民眾的公民素養可以慢慢培養，社區居民閱聽或參與社區型的實習媒體，可以激勵他們產生有力量改變事情的公民意識，過程雖然緩慢，但至少可以在他們的心中植下想法。

此外，也有教師強調，「向社區轉」並非只要報導即時的或有趣味的訊息，還要深入結合社區居民，讓他們參與到公共議題的討論或媒體的運作，才能真正發揮社區媒體的功能。另有教師認爲，社區媒體最好是由社區人士自己來做，大學則是站在協助的角色，同樣的，大學在協助社區人士發展社區媒體時，亦不宜過度介入單一社區，以免誤觸社區之間彼此存在的利害關係。

五、大學實習媒體向社區轉的可能性

基本上，臺灣各大學的實習媒體都是透過課程來支持，因爲有課程才有產製內容的學生，但是除了少數以幹部方式繼續參與的學長級學生外，實習媒體的主力幾乎都是新手，這些新手不僅多數來自外地，對地方事務未必有深入瞭解與感情，也都是需要更多教育訓練並有其他課程安排的「兼職工作者」，要滿足地方

airiti

或社區媒體的完整功能需求，顯然有賴更多條件的支持。何況，以課程來支撐的實習媒體若要穩定而常態的運作，就必須克服寒、暑假的學生休假問題。極少數能於寒、暑假維持運作的實習媒體如輔大《新莊報導》，則是於學生放假期間不出刊報紙，但仍發行電子報，其新聞來自排班輪值的學生。

一位受訪教師以「外人」來形容學生、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另位教師則生動指出：

> 學生報刊最重要的不是報刊兩個字，而是學生兩個字——他們是學生，他們不是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尤其一年換一次，所以他們在採訪地方新聞的時候會受到很多限制：第一個是消息來源，他們根本沒有認識幾個人，你知道當一個記者，沒有認識人，根本跑不出新聞，光新聞在哪邊都不知道。（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經費是另外一個問題，目前各大學的實習媒體多仰賴系所或學校各單位的經費支持。以輔大《新莊報導》爲例，該報 1 年 8 期，學校共編列 20 萬元支應，雖然有廣告收入，但相當有限。即使如此，它的指導教師仍指出，定位爲社區媒體的大學實習媒體較一般地方媒體容易生存，「因爲學校有資源，不然早就倒了」。事實上，20 萬的經費並不包括幾乎等於免費的編採人力資源——學生，實習媒體若要真正成爲常態運作且品質穩定的地方或社區媒體，自然需要獲得更充足的經費支持。

有了經費的支持，多位受訪教師表示實習媒體就可以聘用專職人員或特約記者來充實實習媒體的內容。

> 特約記者就是你可以訓練出來比較好的那個學生，透過實習之後，養成訓練之後，你用特約的方式去簽他，然後他不能有寒暑假，必須長期的經營那條線，這樣子才能夠真正做出一個比較能夠運作的一個媒體。（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有了專職的人員，一位受訪教師指出，也才有辦法製做出比較有深度的地方新聞。

然而，實習媒體若要解決人力資源與經費問題，多位教師提及學校、教師與學生等三個部分，都有必須克服的觀念與體制問題。

airiti

就學生而言，能否真正瞭解地方、融入地方是多位教師提及的要務，無論是已經經營社區的實習媒體要向社區深入紮根，或是尚未關注社區的實習媒體要重新定位爲社區媒體，他們認爲都必須讓學生感覺到轉向的意義與重要，要讓學生不只將實習媒體當成一個獲取學分的課程，猶必須當成一種社會服務的參與。「學生要對新聞事業有興趣」，「調整不是只有老師的想法，更多在於學生怎麼想」，「學生要能夠跟閱聽對象對話」等等，是受訪教師對實習媒體能否成功發展爲實質性社區媒體所提出的關鍵要素。

此外，幾位實習媒體的指導教師亦指出，如果教師的觀念不能理解學校教育與社區結合的重要性，同樣會是困難重重。一位受訪教師頗爲傳神的指出：

> 它（實習媒體）的老闆叫學校，如果你要改它的風格，你要去改變定位，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必須要有很大的心力投注在裡面，你要去 fight 它的所有的規定啊！……現在大學裡面的老師自主性都這麼高，我常常講說大學老師是全世界最難溝通的人。（指導教師 B，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0 日）

至於學校方面，一位受訪教師直言，長久不和社區互動的大學要立刻向「社區轉」有其體制與文化上的困難。

> 現在整個時代變了。第一個，公立大學是面臨較育部補助減少的問題，私立大學是面臨生員減少的問題，所以大家都要增加跟這個社會的互動，所以現在才在想說要怎麼增加跟地區的互動。其實這條路還很長！（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另位教師亦以該校成立廣播電台的經驗爲例，認爲公立學校推動社會參與有其實踐上的困難。他因此認爲，如果私立大學願意把實習媒體作爲一個特色，將會比公立大學更容易建置一個功能齊全的地方媒體。

尚有教師認爲，過度強調國際化的大學政策，也會降低在地事務的關注度。

> 我覺得政大的學生這幾年我遇到的，都是朝國際化的方向去思考他自己的未來，甚至他在規劃大學四年的時候，絕對不會想去一個社區幹麼，但他一定會想說我要交換、出國，那跟學校的政策有絕對的

airiti

關係，因為你一直在 promote 這個嘛！（指導教師 A，親身訪談，2013 年 12 月 5 日）

有教師進一步建議大學所興辦的地方或社區媒體可以和公共電視合作，形成一個公共電視群，以擴大其影響力。但這就需要政府經費的支持。

> 我覺得我們都是分散在各地，應該要把它集合起來，集合變成一個集團的力量。學校應該也是一種公共媒體的類型，因為它是非營利的。……那如果加入進來，至少我們的新聞市場當中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東西讓觀眾可以選擇。（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不過，也有教師提醒要注意「來幫忙的這隻手會不會也成爲來干擾的這隻手？」（指導教師 F，親身訪談，2013 年 12 月 11 日），所以經費的來源最好還是大學本身，而非校外的企業或基金會。

臺灣民眾是否具有社區意識是另一個被考量的點。有的教師認爲與其他國家相較，臺灣民眾的社區意識並不強，一位教師就直言：

> 我覺得民眾的公民素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其實並不關心這樣的（社區）新聞內容，他覺得無所謂在他身邊的小事。事實上大事他也管不起，但他就是喜歡去看，所以這些小事對他們就無關痛癢，所以他愛看不看的。（指導教師 B，親身訪談，2014 年 1 月 10 日）

另位教師亦指出，就算要培力社區居民，訓練公民記者，也要克服他們的意願問題。這幾位教師因此都有類似的感想：大學實習媒體要「變成地方媒體或地方的強勢媒體，我覺得還有一段很長的路！」（指導教師 D，親身訪談，2013 年 11 月 21 日）。

儘管對社區居民公民意識的成長潛力，認知未必相同，但多數教師仍都同意社區與公民意識是可以培養的，有的學校傳播系所並會透過其他課程來結合實習媒體的社區定位，世新大學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會透過社區與傳播、公共新聞學等課程，提升社區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

airiti

六、小結

整體而言，臺灣各大學新聞與傳播相關系所的實習媒體確實呈現多元類型，惟大學所在社區的事務雖或多或少會成爲實習媒體內容，但真正聚焦於社區活動與公共事務的實習媒體仍屬有限。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及指導教師的訪談結果顯示，讓學生進入採寫、製作與編播的擬真教學情境，仍普遍是各大學實習媒體運作的主導邏輯，但鮮少有學校將之視爲研究與服務的重要場域；而且，教師們雖已理解新聞生態的劇烈變化，但對大學應有相對作爲以資因應乙節多無強烈感受。

對於大學實習媒體所能發揮的社區功能，多位社區導向的實習媒體教師則是予以肯定，認有助於社區意識的提升，並對社區發展足以產生正面效益。不過，實習媒體社區化的走向雖可爲多數受訪教師所接受，但對於「向社區轉」的必要性則呈現強度不一的支持，並認爲若要增加其可行性，應排除技術、觀念與政策等不同層面的障礙。以下將從美國與臺灣的對比做進一步探討。

陸、結論

臺灣各大學的實習新聞媒體究竟只是教師傳授及學生學習專業技能的場域？抑或猶有其它大學可以扮演的角色？即使就傳統的研究、教學與服務等三大大學任務而言，實習媒體是否只具有狹隘化的教學功能，顯然已不無疑問。從以上的探討可以發現，西方國家（特別是本文主要研究的美國）與臺灣的大學傳播系所的實習媒體，雖然都負有教學的功能，但有鑒於傳播生態的轉變及大學角色的認知，許多國外的大學實習媒體其實已有意識的跳出大學圍牆，成爲公眾實際的新聞資訊來源與溝通平台。

相對而言，臺灣的大學實習媒體雖不乏以社區或地方爲其定位，且具在地連結與社區服務的理念，但從某個角度來說，此種定位主要仍屬「應用式教學」，換言之，只是將教學場域延伸到校園之外而已。一方面，這些實習媒體並無法有效成爲地方或社區民眾的新聞替代來源；另方面，亦未將之視爲理論與實踐連結之地，因此既乏深刻的研究與服務意涵，亦鮮少創新的教學作爲。至於諸多並非定位於社區或地方的實習媒體，雖有其歷史緣由或資源考量，但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就因此更少了掛鉤之處。美國與臺灣兩地爲何有此差異？是兩地實習媒體「向社區轉」存在不同的技術障礙？還是彼此對傳播生態的轉變看法有別？對大學角色的認知存在差異？

airiti

一、學生與經費的障礙

多位臺灣的大學實習媒體指導教師在接受本研究訪談時，針對大學實習媒體「向社區轉」所提出的實踐障礙，如學生特質與經費來源的問題，確實都是有待克服的障礙，但這些問題並非臺灣所獨有，美國經驗亦顯示此非無可解決的難題。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研究生院的社區實習媒體爲例，學生作品的品質問題仰賴指導教師或專責人員把關，學生暑期休假的問題則是以付費給學生的方式來處理，至於新舊學生的經驗與知識交接問題，亦有賴教師或專責人員的傳承。該院院長並表示，上述工作只需一位專職的新聞工作者即可應付 (Waldman & the Working Group on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2011: 195)。柏克萊的情形未必適用其它大學，因而也未必是臺灣可行的模式，但該校經驗顯示，學生與經費問題應屬技術層面的障礙，相對容易克服。

另外，有關經費來源的問題，雖然美國的大學可以藉由產製的作品或提供的服務獲取若干收入，不過，經費來源主要仍靠自己編列及基金會贊助。例如加大柏克萊分校即從福特基金會獲得 2 年共 50 萬美元捐助，用以聘任 2 名多媒體的專家來教導學生。克朗凱新聞學院則在 3 年中從多個基金會募得 1,800 萬美元贊助，用來購置鳳凰城錄影棚所需的新設備 (Waldman & the Working Group on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2011: 196)。臺灣的大學實習媒體能否獲得基金會的經費支持，或許尚待觀察，但要大學自身編列經費，顯然就必須政府與學校有此體認才行。

二、新聞生態重建的急迫感

不可諱言，臺灣的傳播學術界雖然對新聞生態的劇變有所認知，甚至亦有若干教師已開展實驗性的創新教學，並進行實務場域的深入研究，以期連結理論與實踐。但整體而言，似乎對新聞生態的重建缺乏急迫感。美國許多傳播科系行政負責人及教師常以危機（crisis）或下墜（decline）形容該國新聞業的處境，前述加大柏克萊分校新聞研究生院前院長 Neil Henry 所稱的「新聞危機至爲迫切」，可謂美國學界眾多聲音的代表，但臺灣傳播學界在此一方面的聲量似乎低許多。

事實上，臺灣新聞業所面臨的經營問題與信任危機絕不下於美國，近十餘年來，停刊的報紙與所有權易主的媒體不在少數，民眾對新聞媒體的評價亦是江河日下，惡評不絕於耳（羅世宏，2010），甚至公民媒體與獨立媒體亦如雨後春筍般崛起，顯示閱聽眾對當前新聞生態確實存在相當程度的不滿，以致需以直接的

airiti

行動謀求解決或對抗。若干大學實習媒體的受訪教師對此雖有所感，但也同時對改善此種生態顯露了某種程度的無力感，他們普遍認爲，無論是政府政策、大學環境或是社區民眾，都存在改變的障礙，實習媒體的轉型與擴張雖有價值，實非一朝一夕可成，亦恐作用有限。無力感可能是臺灣傳播學界缺乏急迫感的重要背後因素。

三、大學角色認知的侷限性

從幾位受訪教師對大學社會角色的期許及整體校園氛圍的批評來看，大學傳播科系教師之所以對新聞業重建缺乏急迫感，更深沉的原因恐來自於政府與學界對大學角色的侷限性認知。無論認同或不認同，亦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許多大學教師已將自身角色定位於研究，而且是所謂科學的研究，符合主流期刊規範與需求的研究。不僅對於從社會實踐進行辯證，與社會成員進行協作的「涉世的研究」（engaged research）缺乏瞭解或興趣，更無意從事連結社會場域的教學，以及尋求社會變革的服務。

2010 年 4 月，美國 13 所新聞學院院長聯名致函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對一些新聞學院與地方媒體合作藉以承擔新聞工作的做法提出說明。他們表示，這些做法雖然同樣會著重教育目的與良好的專業實踐，但它會愈來愈像目前大學的教學醫院 (Waldman & the Working Group on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2011: 194)。新聞學院的院長們提出教學醫院模式，固然是對當前新聞生態的反應，亦何嘗不是對大學教育的反思。本研究受訪的實習媒體指導教師對美國新聞教育的變化雖有不同感受，但若干位教師已點出大學定位的問題，並認爲唯有大學政策進行更大的轉變，否則新聞或傳播教育的改革仍將受到限制。

相對於美國新聞與傳播教育在實習媒體上的變化，臺灣各大學的實習媒體機制確實顯得被動與單調許多，既鮮有實習媒體發展成有效運轉的社區或地方媒體，更談不上與其它機構或媒體合作，訓練公民記者，開創新型媒體，或提供非營利新聞業作爲發展基地。就此而言，臺灣的大學實習媒體或許還有很多的事可做，很多的路可走。美國 FCC 不久前就社區資訊的需求進行委託研究，在這份於 2011 年發表的報告中明白指陳：美國加上波多黎各約有 483 所大學與學院擁有新聞與（或）傳播學系，2008 年秋季，共有 21 萬 6 千餘名學生在學。而 2008/09 學年度則有 5 萬多名學生取得新聞學士學位，近 4 千 5 百名碩士生畢

airiti

業。以此數字看來，此份 FCC 報告認爲，如果美國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所的教學醫院模式發展成功，將可對一些社區的資訊需求產生相當的幫助 (Waldman & the Working Group on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2011: 195)。

臺灣的社區環境與民眾的社區意識固與美國有別，但社區資訊與社區意識的意義與需求當無二致。美國大學新聞與傳播教育體系正發生中的重要變化，當有其可資參考或借鏡之處。本研究在研究範圍（未及於非新聞性實習媒體）、訪談對象（未及於大學主管、實習媒體學生、社區居民等利益關係人）與社區傳播（未及於地方網路媒體的發展）方面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惟已顯露臺灣實習媒體乃至傳播教育的若干問題及可行之道，甚至亦對實習媒體如何發展爲臺灣新聞生態系統的有力成員提出若干創意性的思考。誠如一位受訪教師所言：改革之路雖長，但值得堅定的走下去。

參考書目

牛隆光（2012）。《校園新聞媒體經營與課程實踐》。臺北，臺灣：學富文化。

位明宇（2010）。〈新聞整合操作：學生媒體行動研究〉，《新聞學研究》，105：167-203。

胡元輝（2012a）。〈網路再造調查報導新契機？——美國新興非營利新聞組織經營模式的探討〉，《傳播研究與實踐》，2（2）：67-99。

———（2012b）。〈群眾資助新聞業：從資訊協作到經濟協作的公民參與〉，作者（編），《公眾委製新聞的時代來臨：weReport 調查報導平台的意義與展望》，頁 77-115。臺北，臺灣：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2010）。〈當慈善事業跨入公共領域：探索基金會與慈善家在新聞業重建中的新角色〉，羅世宏、胡元輝（編），《新聞業的危機與重建——全球經驗與臺灣省思》，頁 86-117。臺北，臺灣：先驅媒體。

許瓊文（2007）。〈數位化媒體教育課程實驗初探與省思：以某大學實習媒體爲例〉，《中華傳播學刊》，11：3-47。

羅世宏（2012）。〈調查報導的困境與前景：從西方回望東方〉，胡元輝（編），《公眾委製新聞的時代來臨：weReport 調查報導平台的意義與展望》，頁 47-75。臺北，臺灣：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2010）。〈報業／新聞業前途與政府責任〉，羅世宏、胡元輝（編），《新聞業的危機與重建——全球經驗與臺灣省思》，頁 44-85。臺北，臺灣：先驅媒體。

airiti

Aldridge, M. (2007). *Understanding the local media*.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Barnett, R. (2011). *Being a university*. Oxford, UK: Routledge.

Benson, R. (2010). Futures of the news: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further reflections. In N. Fenton (Ed.), *New media, old news: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pp. 187-200). London, UK: Sage.

Bentley, C. H. (2012). MyMissourian to become a new section, from readers. *MyMissourian*. Retrieved from http://mymissourian.com/

-- (2005). Reconnecting with the audience. *Nieman Repor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eman.harvard.edu/reports/article/100566/Reconnecting-With-the-Audience.aspx

Bird, S. E. (2011). Surviving through engagement: The faculty responsibility to defend liberal education. In B. Zelizer (Ed.), *Making the university matter* (pp. 64-72). Oxford, UK: Routledge.

Bok, D. C. (2006).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yer, E. L. (1996). The 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 *Journal of Public Service & Outreach*, *1*, 11-20.

-- (1990).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Checkoway, B. (2001). Renewing the civic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2*, 125-147.

Downie, L., Jr. (2011). Big journalism on campus.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ajrarchive.org/article.asp?id=5200

Downie, L., Jr., &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www.cjr.org/reconstruction/the_reconstruction_of_american.php?page=all

Fancher, M. R. (2011). *Re-imagining journalism: Local news for a networked world*. Washington, DC: The Aspen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media/uploads/publication_pdfs/Re-imagining-Journalism-Local-News-for-a-Networked-World.pdf

airiti

Fisher, D. J. (2009). Hartsville today -- RIP, but being reborn. *Common Sense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commonsensej.blogspot.tw/2009/10/hartsville-today-rip-but-being-reborn.html

Fisher, D. J., & Osteen, G. (2006). *Hartsville today: The first year of a small-town citizen-journalism si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kcnn.org/images/uploads/HartsvilleToday_Year1.pdf

Fleming, C. (2011). New England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Hard-hitting investig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Boston area.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www.cjr.org/news_startups_guide/2011/01/new-england-center-for-investigative-reporting.php

Friedland, L. A. (2001).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and democracy: Toward a theory of the communicatively integrate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 358-391.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Schwartzman, S., Scott, P., & Trow, M. (1994).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UK: Sage.

Glassick, C. E., Huber, M. T., & Maeroff, G. I. (1997). *Scholarship assessed: Evaluation of the professoriat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Howley, K. (2010).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media*. Thousand Oaks, CA: Sage.

-- (2005).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verson, B. K., & McBride, S. (2008). Final report for J-Lab: Grant 2006-2008. *New Voic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j-newvoices.org/images/uploads/CreatingCommunity_NV-Jlab-Finalrep-sentversion.pdf

Johnson, K. A. (2010). Citizen journalism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classroom. In J. Rosenberry & B. St. John, III (Eds.), *Public journalism 2.0: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a citizen-engaged press* (pp. 99-112). New York, NY: Routledge.

Knight Commission on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in a Democracy. (2009). *Informing communities: Sustaining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Washington, DC: The Aspen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knightcomm.org/wp-content/uploads/2010/02/Informing_Communities_Sustaining_Democracy_in_the_Digital_Age.pdf

airiti

Lowrey, W., Brozana, A., & Mackay, J. B. (2008). Toward a measure of community 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1*, 275-299.

Marshall, J. (2011). *Watergate's legacy and the press: The investigative impuls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cBride, S. (2010). The changing face of news in a major U.S. city: Hyper-local websites try to flll the void in Chicago. In J. Rosenberry & B. St. John, III (Eds.), *Public journalism 2.0: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a citizen-engaged press* (pp. 113-125). New York, NY: Routledge.

McChesney, R. W. (2013). Farewell to journalism? Time for a rethinking. In B. Franklin (E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pp. 20-32). Oxford, UK: Routledge.

Rennie, E. (2006). *Community media: A global introduc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leld.

Robinson, S., DeShano, C., Kim, N., & Friedland L. A. (2010). Madison commons 2.0: A platform for tomorrow's civic and citizen journalism. In J. Rosenberry & B. St. John, III (Eds.), *Public journalism 2.0: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a citizen-engaged press* (pp. 162-175). New York, NY: Routledge.

Rowe, S. (2011). *Partners of necessity: The case for collaboration in local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ambridge, MA: Joan Shorenstein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hks.harvard.edu/presspol/publications/papers/discussion_papers/d62_rowe.pdf

Schuler, D. (1995). Creating public space in cyberspace: The rise of the new community networks. *Internet World*.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n.org/commnet/iwdec.html

Scott, J. C. (2006). 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Medieval to postmodern transformation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7*, 1-39.

Waldman, S., & the Working Group on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2011).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The changing media landscape in a broadband age*. Washington, D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fcc.gov/document/information-needs-communities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pp. 55-92, July 2014

Beyond Campus Borders: Transition from Campus-Focused Media to Community-Oriented Media

Hu, Yuan-Hu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While journalism today confronts a challenging future under strong impac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one of the new forces shap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ws industry in the U.S. Intrigued by this developing phenomenon,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how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their roles in the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ny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cognize their important role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ndeavor to transform their campus media through multiple approaches. Previously student-run and campus-focused, these school media gradually become community-oriented and serving their neighborhoods.

In strong contrast, campus media in Taiwan do not seem to share similar transformation. Currently, they still serve mainly as student internship vehicles, even if the local news industry, facing drastic change and under similar impacts, anticipates its share of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Whil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campus media who cover and serve their neighborhoods, they mostly consider themselves as extensions of classroom teachings. Many faculty supervisors of these campus media d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embracing the community." Nonetheless, obstacles remain and determination for a transformation is still delayed.

Keywords: campus media, community-oriented media, citizen journalism, citizen participation

* Email: telyhhu@ccu.edu.tw
Received: 2014.02.07
Accepted: 2014.05.02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93-116．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2

資料新聞學興起：後印刷時代應用電腦軟體說故事的新聞挑戰

林照真 *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資料新聞學為新興名詞，被視為印刷業發展後期的新聞類型。資料新聞學強調運用科技、軟體、視覺設計來報導新聞，必須將電腦軟體應用與傳統新聞技能進行結合，這對新聞工作是一項新挑戰。本論文採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法，試圖探討新聞背景與資工背景研究生間的互動，以做為未來新聞教育的參考；本論文並認為臺灣若想建立資料新聞學，有效整合新聞與資訊專長將是非常重要之事。

關鍵詞：資料新聞學、電腦軟體、說故事、後印刷時代、數位科技

* Email: carolinelin@ntu.edu.tw
投稿日期：2014 年 1 月 12 日
接受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研究源起

西方媒體深刻體會數位媒體氣勢銳不可擋，已成爲傳統媒體轉型的可行方向（林照真，2013a，2013b）。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一方面數位的網路傳播加速傳統平面媒體（報紙及雜誌）的發行量快速減少，以致印刷媒體必須求變方能生存；另一方面數位網路平台提供大量空間，傳播科技更帶來多元的資訊設計形式，尤能吸引網路上聚集的年輕社群，也讓印刷媒體充分體認數位傳播時代已經來臨。驚人的傳播科技促使新聞面貌發生徹底改變，如今網路已成爲眾人獲得資訊的最主要來源。從歷史來看，廣播花了 50 年時間，才使得聽眾增加到 50 萬；電視則是花了 15 年才達到 50 萬的收視戶。網路卻能以增加數十億閱聽眾的速度來計算 (Saxena, 2004: 209)，自然不能忽視它的發展潛力。但是，網路媒體卻伴隨網路使用者大多不願意付費看內容的弔詭 (Schroeder, 2004)，這使得企圖與網路進行數位整合的新聞媒體，面臨嚴峻的經濟挑戰，必須尋找出路。

值此數位科技與匯流潮流下，數位說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已成爲新興且重要的發展趨勢。Herbert (2000: 7-14) 在他的《數位時代的新聞學》（*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一書中便直接斷言：「新聞本身就是新科技的結果」。已言明科技在當今新聞產製中的重要性。本論文企圖探討的資料新聞學（data journalism），同樣是因爲創新與日益普及的電腦科技，才可能興起。

這個契機的形成實有極大的時代背景因素。傳統新聞面臨轉型之際，大型資料（big data）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開始發展。人們現在有許多 “big data” 一詞，雖還是無法明確定義 (Lazar, 2013)，但已明白大量數據可以幫助人們找到問題的相關性。只要能夠抓住相關性，就有可能抓住機會（Mayer-Schönberger & Cukier, 2013／林俊宏譯，2013：77）。

儘管民族誌研究者一樣可以長年研究一個小社群，但使用電腦獲得大量資料來分析，更可以幫助人們獲得資訊。大數據是指資料量的規模已經超越一般軟體可以處理的規模；又因爲科技發達，現在使用一般電腦軟體與大型電腦處理的界線正逐漸消失中 (Manovich, 2011)。5 到 10 年前，想使用數據來進行新聞報導是困難的，畢竟這需要更多的電腦技術，通常只有調查報導才有機會處理大量資訊，大部分的記者與編輯多是依賴外界提供的數據來報導。換言之，過去這類事只有像是調查記者、社會科學工作者、統計員、分析師等專家才做得到。

現在情形不同了。網路上可看到大量且多數是免費的資訊，又有更多處理大型資料的工具，因爲有不少免費軟體如 Google Fusion Tables、Datawrapper、

airiti

Google Charts 或者是 Timetric 等，都可以提供許多工具來分析資料，有一定技術的人便能完成。這些工具可以更快速地處理大量的數字，各種網路的應用程式也能幫助人們分享與認定資料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2010)。資料新聞學重點在於處理新聞故事背後的資料；資料新聞學更被認爲是可以改善新聞的做法，維基解密創始人 Julian Assange 因而將資料新聞學稱爲「科學的新聞學」（scientific journalism）(Gray, Bounegru, & Chambers, 2012: 22)。

因爲資料新聞學處理的資料量龐大，往往須以視覺圖表爲主要呈現方式，「資訊視覺化」已受到西方媒體高度重視。平面媒體尤其能感受到這個趨勢，並企圖從網路上巨大的數位資料量發現契機。在英國《衛報》負責編輯 Datablog 的 Rogers (2013: 10-11) 就談到，資料新聞學在這 2 年期間，已經變成新聞行業的標準，也是《衛報》報導故事的方式。資料不僅僅是新聞組織的業務，也是新聞媒體公司能夠推動全球發展的希望，本身極具獲利的潛能。他相信，資料新聞學的面貌因爲不同領域的人不斷加入，不但自身在改變，同時也改變了新聞、改變了世界。

此刻，資料新聞學的影響力仍不斷擴大，許多大學教育也開始探索。發展資料新聞學可以爲未來的新聞發展帶來新的生命，記者在資料處理中扮演的是意義創造者（sense-makers）的角色，並且可以拉近新聞與社會的距離；如果做得好的話，還可以帶來新的商業模式，讓新聞媒體有重生的機會。在這樣的情形下，歐洲新聞中心（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與英國 Amsterdam 大學開始組織資料新聞學領域的發展。這個工作共有 3 個環節分別是：找資料（data mining）、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與多媒體報導（multimedia storytelling），並要在過程中設想各種可能性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2010)。臺灣目前已有「新聞優質發展協會」關心此事，並已出版《資料新聞學開講》專書（林麗雲，2013）。此外，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則已有林照真開設「資料新聞學」課程（林照真，2013a），則是國內首次開設新聞相關課程。

同時，新聞產業也非常看重資訊圖表，認爲可以帶來商機，進而建立商業模式。其中的思考在於，網路必須具有傳統媒體無法提供的內容或服務，才可能增加附加價值，與資料新聞學有關的「互動資訊圖表」（Interactive info graphics），就被認爲具有如此的附加價值。《紐約時報》、《衛報》、《經濟學人》都經常使用資料報導，目前亦有 Bloomberg 公司以提供財經資料給使用者而獲利；《紐約時報》因此估計 2008 年美國的相關產業產值可達 63 億美元 (Gray et al., 2012: 58-59)。特別是，當平面媒體與電視只能呈現靜態的、或是線性的資訊圖表時，網路的互動性可以讓使用者像個指揮者（director）一樣使用圖表。視

airiti

覺在內容客製化上更是重要，互動資訊圖表尤其是 (Schroeder, 2004)。如此更可明白，資料新聞學有 2 個構成要素，即是使用程式軟體來處理大量的初始資訊，並且加以視覺化 (Gray et al., 2012)。經過這樣的程序，當讀者在網路上接觸到資料新聞時，常會讚嘆資訊竟能如此優美。

由以上可知，資訊視覺化是海量資料最後的呈現方式；在視覺化之前的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都將成爲資料新聞學前置作業的 2 項重要工作。這個工作在西方已有數十年的發展，西方能有這樣的發展並非偶然，其實是需要相關法令的配合。以美國爲例，美國的「自由資訊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於 1966 年誕生，內容規範除了負面表列的 9 項限制以外，其餘的政府資訊都必須公開（林照真，2006）。此一工作爲所有的資料分析奠定了最好的基礎。反觀臺灣，則是遲至 2005 年才通過施行「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政府有義務開放資料。目前各國政府的資料開放情形不一，Lee (2012) 便以五顆星來說明政府公開資料的不同等級。以此來看，臺灣政府公布的情形還有許多改進空間。例如常見不同政府單位以 PDF 檔、甚至提供紙本，這些根本無法使用既有的電腦軟體進行分析。而且開放的資料簡陋，民眾要求提供經常遭到拒絕等。可見臺灣的政府資訊開放還有極大的改進空間。同時，臺灣新聞界並不常使用此一方法要求政府提供資料，加上傳統新聞技能的訓練並不包括電腦軟體程式的運用，以致政府資料開放至今未受到新聞界重視。有趣的是，臺灣目前反而是具有電腦軟體的資工背景人員對此一問題頗爲關心，以非政府組織「零時政府」來說，便強調該組織致力推動資訊透明化、言論自由與資訊公開，也標舉以程式改造社會的理念（零時政府，n.d.）。另一 Code for Tomorrow (n.d.) 組織，也一樣強調資料的開放，其組成人士也以資訊背景者爲主。

這真是非常少見的現象，在臺灣關心政府資訊開放的相關人員，竟然是由資訊人員展開，而非新聞實務界、或是新聞學界。在這些資工人員已有一定努力、並舉辦活動帶動更多年輕人加入時，卻發現這些資料分析的「新聞角度」較弱。就有新聞實務界人士私下指出，若干費了好多工夫分析資料後的發現，是新聞界早已知道的事實；有時也發現只是將大量資料視覺化，並未能從中找到有意義的新聞現象。而相關資工背景人員也認爲他們面對資料時，常常不知該從何處下手，並直言新聞背景的人參與太少。以致，「零時政府」已開始嘗試邀請具有新聞背景的熱心人士，能加入他們的專案分析工作。

由此可知，資料新聞學其實是想從開放資料中尋找更多新聞，以取代傳統只能進行個案訪問、或是呈現小規模真實的方式。若要達到此種功能，使用者必須

airiti

具有使用電腦軟體處理大量資料的能力；並具有一般性的新聞感，能從資訊分析中尋找有意義的新聞，最後再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這對當今新聞界與新聞教育來說，都是極大的挑戰。然而，由於資料處理涉及不同領域的整合，又涉及大量資料的處理與分析，必然需要電腦軟體的相關認知與應用。在今日臺灣新聞教育缺乏數位訓練的前提下，勢必得設法結合資訊專業，才可能實踐資料新聞。本研究因此想探討在實踐資料新聞學的資料蒐集、分析、資訊視覺化等步驟時，如何進行新聞與資工的跨領域合作。為了瞭解合作的可能性，本研究採取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法，並以資訊視覺圖表的實作為目標，從中觀察新聞與資訊背景的研究生如何協力合作，研究期間為 3 個月。本研究目的在於從中獲得若干經驗，作為未來資料新聞學在新聞產業與新聞教育進一步發展的參考基礎。

貳、理論文獻

一、認識資料新聞學

資料（data）一方面是個枯燥的名詞，一方面卻也是個相當流行的名詞。其實資料的概念並不新，不管是資料庫、電腦檔案，或是眾人熟悉的各式圖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曾以不同程度接觸過各式各樣的資料，這在圖書館學已有較多的發展 (Frederiksen, 2012; Ovadia, 2013)，現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愈來愈關心這個議題。以新聞領域來說，新聞記者在工作中與資料關係密切，經常得設法運用各種關係以得到資料。這時，資料的定義很廣，記者也不會設限，但就是不會將資料與數位化相提並論。

然而，數位的轉向（digital turn）正深深影響所有的學術領域，同時也影響著新聞產業，以及閱聽眾參與的方式 (Holliman, 2011)。近十年的時間裡，國外新聞媒體已大量使用數位科技處理新聞 (Thornburg, 2011)，利用大筆枯燥資料創造有趣新聞的案例，一直在發生。同時，這類的資訊多數是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使得資料的處理與視覺化圖表的關係密不可分。國外研究以實驗法區分年輕的大學生與年紀較大的觀賞者，就他們觀看電視新聞的電腦動畫圖表（computer animated graphics）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對於不同年齡的觀眾，資訊圖表均有助於接收電視資訊 (Fox et al., 2004)。

「資料新聞學」也是個新名詞，指的是新聞資訊的處理須結合視覺化的數位工具，以便生產數位新聞。換言之，是一個將原始「資料」轉變成「資訊」的過程。其中，資料與資訊的差別在於資料（data）常是理解為可為電腦使用並以數位

airiti

儲存的基本象徵（symbols）。資訊則是資料整合後，成爲人們可以理解的訊息 (Wigand, Shipley, & Shipley, 1984)。Egawhary & O'Murchu (2012) 兩人則認爲，資料新聞學是關於數字的新聞學。有關圖表與數字的工作並不是新聞的新型態，卻是當今每個記者都必須能使用的技能。他們認爲「資料新聞學」指的是分析與檢查數字的能力，以便能夠管理大量的數字並且正確解讀。一般而言，資料新聞學有兩個構成要素，即是：（一）使用程式軟體處理大量初始資訊（raw data）；（二）加以視覺化 (Gray et al., 2012)。經過這樣的程序處理資訊，當讀者在網路上接觸到資料新聞時，不但可接收資訊量較大的新聞，也常能體會到資料新聞學獨特的視覺效果。更重要的是，資料中常可爬梳出重要新聞，以致資料新聞學還是調查報導的源頭，更是當今新聞領域努力的方向。

資訊視覺化在傳統上是當成資料探索或是假設形成的工具。然而，像資料新聞學這樣的數位新聞，絕對不能只看科技單因的變化而已，而是許多因素的聚合（convergence）(Fenton, 2010: 5)。不過，由於它的根基爲科學推論，以致傳統上就將視覺化當成是意義形成的工具。最近幾年，不論是主流媒體或是網路的民主化，都非常強調資訊視覺化。又因爲電腦軟體也有助於藝術的生產，藝術家與設計師也把資訊視覺化當作是藝術與美學的實踐 (Viegas & Wattenberg, 2007)。做法並不難，只要利用家中的電腦，將資料進行藝術呈現即可。

因爲電腦的使用爲資料與視覺處理的必要條件，於是有人又將資料新聞學稱爲「電腦新聞學」。意思是指將電腦運用到新聞中，相關技術包括使用電腦軟體處理大量資料，以便重現資訊。這時，則要釐清把電腦當成工具、與把電腦化當成理論（computers as tools and computation as theory）各是何意義。把電腦當工具意即要活用電腦，將電腦當成分析的工具；但電腦運算可延伸出理論，又已超越工具的層次。因而像電腦新聞學、或是資料新聞學的重點在於搜尋、尋找資料相關性、過濾、與確認形態等過程，正說明電腦化一定超過工具的單純意涵。還有，電腦運算的新聞可以結合新聞工作者與資訊人員一起工作，其中更蘊涵生產意義的人文觀點，自然富有更多的創造性意義在內 (Flew, Spurgeon, Daniel, & Swiff, 2012: 158)。可知資料新聞學一方面把電腦當工具，一方面又因爲新聞的產出而具有更多的思考。

又由於傳播科技快速進步，能將簡易的資訊軟體運用到各個領域的情形愈來愈普遍；目前可以使用的軟體固然很多，有時用 EXCEL 就已經可以做很多工作 (Gray et al., 2012)。以處理資訊爲產業核心的新聞媒體，也已開始發展資料新聞學。挪威幾個新聞機構的實驗經驗就發現，新聞記者使用電腦的技術與工具，與

airiti

傳統新聞時代已經非常不同；但新聞的價值與目的，與傳統新聞其實是完全相同的 (Karlsen & Stavelin, 2014)。

二、資料、新聞與視覺化圖表

資料必須處理好才能使用，如果都用 spreadsheets（試算軟體）整理好，對使用者而言將更容易；又或者，如果每一個物件或分類都已有電腦代碼，在電腦上將更容易分析，接著便可以進行報導。因爲資料新聞學經常涉及幾千筆、幾萬筆的資料，資料量極大，以致又以視覺化圖表爲最主要呈現方式。早在遠古與文藝復興時代，就已出現資訊視覺化的概念。而且，圖畫可以獨立於當地文字之外，就像雖然沒有共同語言，圖表、地圖一樣可以爲人理解 (Ward, Grinstein, & Keim, 2010)。在電腦化時代，資訊的圖表化可以發揮的空間也愈來愈大。

從定義來看，凡是使用圖表再現做爲資訊的傳播方式，即爲「視覺化」（visualization）。視覺圖表是一包含資訊、資料、與知識的視覺表達方式，這類圖表可以快速與清楚地呈現複雜資訊。以地圖爲例，傳統地圖須使用數學等正確呈現地圖，但是往往忽略視覺的要求，以致使用者必須花更多時間閱讀。由於傳統的主幹地圖不能滿足使用者認知大量資訊，因此資訊圖表設計（design）的概念興起，其他與空間有關的視覺圖表開始出現，包括字體、呈現、顏色、圖表與圖畫都得設計 (He, Tang, & Huang, 2011)。這些資料又因爲均是以豐富多樣的不同視覺圖表呈現，再加上數位互動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在易於使用的圖表上，進行自己有興趣的資料探詢，以致資料新聞學徹底是個數位產物。視覺化也是一個由人類參與的認知活動（cognitive activity），它在人們的心中進行，是人類的內在活動 (Spence, 2001)。或是，視覺化本來是指在心裡建構出視覺形象；現在它更像是資料（data）與概念（concept）的再現 (Ware, 2000: 1)。從心理學角度而言，視覺化正是從外在的人工製作來支持內在的決定。

資訊視覺化在傳統上被當成是資料探索或是假設形成的工具，不論是主流媒體或是網路的民主化，最近幾年都非常強調資訊視覺化。資料視覺化經常被當成分析推理的工具，這反映它的根基是科學 (Viegas & Wattenberg, 2007)。視覺化有一個清楚的流程圖。即：（一）建立資料化模組，也就是要將資料視覺化，不管這樣的資料是來自檔案或是資料庫，都必須首先將資料結構化，才有助於視覺化作業。（二）資料的選取。即要以使用者可以運用爲判斷標準，確定這些資料是否可以視覺化。（三）資料變爲視覺圖。（四）獨立於資料之外的顏色、聲音、

airiti

或是 3D 等進一步考量 (Ward et al., 2010: 28)。視覺化要讓資料適當呈現，第一步就是認識資料。這些資料可能從普查、或是調查中獲得，也可能還是未整理的資料（raw data），必須進一步分析整理 (Ward et al., 2010: 45)。

資料新聞有一定的技術要求，有時候必須去挖（scrape）資料，其他時間就要使用某些程式去視覺化呈現自己的發現。卓越的資料新聞包括有經驗記者的新聞眼光、以及有關數位科技的知識 (Gray et al., 2012: 47)。互動資訊圖表必須是可以讓使用者感到友善的（user-friendly），同時讓網站中的訊息接收者有主動的控制權 (Schroeder, 2004: 564)。

視覺化的優點有：（一）視覺化提供瞭解大量數據的能力，像是百萬筆以上的資料可以很快被理解。（二）視覺化所呈現的特質極其豐富，無法預期。（三）視覺化可使資料呈現的問題清楚可見。不僅關於資料本身，也關於資料如何蒐集。（四）視覺化可以同時呈現大型資料和小型資料。（五）視覺化有助於假設形成，對研究極有幫助 (Ware, 2000: 2)。資料視覺化最大的好處是如果圖表呈現得好，量化數據便可以很快被理解。同時，由於資料已被視爲是文化論述的一部分；拜網路之賜，只要輕輕點一下，就可在電腦中獲得複雜的資訊，網路本身就是一個豐富的資料庫（database）。更甚者，政府與企業的資訊，在許多國家的公民生活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Viegas & Wattenberg, 2007)。這樣的團隊角色更像個解釋者，幫助人們更瞭解資訊，並且用有效的方式呈現。當然也有一些問題，如有些變數可能沒有被算在內 (Ware, 2000: 1-2)。另一方面，資料也會出現資料不全、解讀錯誤、侵犯個人隱私等若干問題，都是資料新聞學面臨的問題 (boyd & Crawford, 2012)。

然而，由於新聞界企圖使用資料來改善新聞品質，就會更常使用資料。一如 Rogers (2013) 指出的，《衛報》從 1821 年就開始發展資料新聞，新聞的理解可以從新聞事件擴大到情境報導（situational reporting）。例如，使用人口普查的資料庫時，新聞記者的報導就會從特定、孤立案件，移轉到能夠提供意義的情境（context）上。現在《衛報》的團隊每天會用 spreadsheets 分享所有的資料，接著就是視覺化與分析資料等工作，然後再提供給報紙與網路使用 (Gray et al., 2012)。

三、資料新聞學與程式軟體分析技能

早在 2001 年時，《紐約時報》、《紐約郵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平面媒體，就已有報紙記者或是研究員使用各種軟體程式，來進行資料的搜尋與整理。雖然不是每一個記者都擅長，但新聞室一定有人精於此道（林

airiti

照真，2006）。當時，這些記者主要是使用 Spreadsheet 來分析資料。這個軟體其實不難，關鍵在於資料的開放。由於美國早已有政府資訊公開的法令，因而美國新聞界向政府要求提供資料的情形非常普遍。這些資料有的可以免費索取，有的必須付費；有時無法順利從政府手中取得重要的資料時，新聞界就得和政府打官司。因此，循法律途徑要求政府公開資料，是新聞界常用的手段。

又因爲報導時很需要資料，若干資訊能力較強的記者，都會養成儲存原始資料的習慣。他們在進行傳統採訪時，除了設法取得意見外，也會向特定人士索取更多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在電腦上打開時是長長一大串的 word 檔數字（非 PDF 檔）。接下來，就要看記者自己處理資料的能力了。而在今日，資料已比過去普遍，這方面的發展不但需要資訊自由化的資料建制與法令配合，已涉及不同領域的整合；另外更涉及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問題。西方政府均已展開資訊更加開放的行動，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09 年宣布成立 data.gov 新網站，數以千計的套裝資料已經開放人們使用。英國也在 2010 年的聯合政府選舉時就承諾開放海嘯資料（tsunami of data），做爲政策透明化的一部分。2012 年英國政府又再一次強調政府的透明度，因而對外公布政府資料。每一個英國地方政府也被強制要求公布超過 5 百英磅的個人消費資料，這對原本景氣並不樂觀的地方新聞而言，等於是突然出現的資料寶藏 (Rogers, 2013: 33-37)。同時，資料公布的事不盡然只限於政府單位，目前由於資訊自由流通等法案通過，全世界已掀起資料開放（open data）運動。換言之，一般人就可以從很多來源取得資料。

要從資料中發覺新聞，首先要有新聞的問題意識，然後才在相關資料中挖新聞。這些資料可能從普查、或是調查中獲得，也可能還是未經整理的資料，都必須進一步分析整理 (Ward et al., 2010)。新聞記者以自己的新聞感，比對出有用的資料後，並且找出問題的形態（pattern），就可以找到更好的新聞。

問題是，當資訊以數位的方式儲存，數量可以到數千、數萬筆時，爲什麼有把握可以將資訊視覺化？而且，又爲什麼這個工作在以前爲不可能，現在卻完全可以視覺化形式出現？

很自然的前提是，首先，因爲數位時代出現一些軟體工具（software tool），本身就是非常合適用來呈現資訊。必須說明的是，今日人們不再需要強大的電腦，或是要懂得 C++ 才能做視覺化；相反地，人們可以使用便宜的硬體去創造複雜的視覺化軟體。因而，以處理資訊爲產業核心的新聞媒體，自然會開始發展新聞資訊。

前美聯社新聞主管 Burt Herman 認爲，因爲資料新聞學一定關係到電腦科學，

airiti

其中一個辦法是設法提供駭客（Hacks/Hackers）經費，由駭客社群負責探索如何使用科技（technology）與新知（know-how），以更加認識這個世界。他並提供 Hacks/Hackers 的網站（http://hackshackers.com），該網站的目的正是結合技術人員與新聞記者，以促使這兩種專業人士可以面對面交換觀念，並發展合作的可能性。另外一個方法則是採取史杜飛（Storify）方案（http://storify.com），這個網站的目的就是希望發展簡單的軟體工具，來協助更多人應用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2010)。以上，都已說明資訊專業仍有一定門檻。

如果希望資料新聞學能在未來發展，就需要新聞記者對資料能產生共鳴；並且歡迎開發者（developer）、或是資料發掘者一同參與；更多的記者自然必須擁有新聞專長，對於問題要能清楚掌握。Herman 進一步認為，最好能有真正專業的程式設計師（programmers）參與其中，這個人也可以是記者。這種需求，就像我們需要一個真正專業的攝影師、剪接師、製作人的道理是一樣的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2010)，如此新聞才真的可能提升品質。如果希望資料新聞學的發展能夠超越今天，以上幾點將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在進行資料新聞工作時，也要關注會發生在資料上的相關問題。因為當資料具有巨大的數量，就更需要強而有力的工具來發掘資料中的新聞；有關這方面的認知或許不難，卻是臺灣新聞教育的缺口。本論文一方面認為資訊視覺化有機會為臺灣的新聞產業帶來生機；同時也主張應在新聞產製的教育中，教授更多數位技能。本研究採取歐洲新聞中心的研究觀點，充分體認資訊科技與新聞整合的重要性；並認為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落實資料新聞學，作為未來新聞教育與新聞實務改進的依據。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企圖結合新聞與資訊等不同領域的研究生，一同學習新聞資訊與視覺化等工作，並從中瞭解新聞工作者進行資料新聞學可能產生的問題。本研究者自 2013 年 4 月至 2013 年 7 月，分別邀請新聞、資訊、美術設計等不同領域的研究生共 11 人參與。其中包括 5 名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4 名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所學生、1 名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研究所研究生。新聞與資訊領域研究生以抽籤決定夥伴，兩兩配對，每個月須完成一個資訊視覺化作品。本研究為配合國科會能源計畫，因而以「氣候變遷」與「能源」為主要議題。除新聞、資訊同學共 10 人外，尚邀請 1 名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同學負責美

airiti

術視覺。在本研究進行至 6 月時，有 3 名資工同學因忙於其他計畫而退出，本研究於是又邀請具有資訊背景的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機械所 2 名研究生立刻補位。在分工時，本研究者首先言明任務分配原則，即新聞所同學負責資料蒐集，資訊專長同學負責資料處理；兩方討論視覺呈現方式時，則可邀請應藝所同學參與。最後 5 組共完成 11 個資訊視覺圖表，相關作品請見「拯救地球網站」（savearth.ntu.edu.tw）。

研究過程中，研究成員每兩個禮拜開會見面，一同討論問題與檢討作品，本研究者得以參與觀察；部分同學也會在研究過程中即時反映問題。同時，在研究結束後，本研究者又以開放式問卷蒐集參與研究生的意見，計有 7 名同學以書面正式回答研究者提出的問題。受訪名單與時間如表 1：

受訪對象	受訪身分	回答問卷時間
受訪者 A	新聞所研究生	2013 年 9 月 26 日
受訪者 B	資工所研究生	2013 年 9 月 27 日
受訪者 C	新聞所研究生	2013 年 9 月 27 日
受訪者 D	資訊背景研究生	2013 年 9 月 27 日
受訪者 E	新聞所研究生	2013 年 9 月 27 日
受訪者 F	資工所研究生	2013 年 9 月 28 日
受訪者 G	新聞所研究生	2013 年 10 月 4 日

表 1：受訪者資料

爲瞭解新聞、資訊同學在參與資料蒐集、分析、與視覺化等工作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互動問題。本論文提出的問題如下：

一、請問你（妳）覺得在資料蒐集、資料分析、與資訊視覺化過程中，新聞所同學找資料、資工（或有資訊背景）的同學負責完成視覺圖表，是否是好的合作方式？

二、請問你（妳）覺得在合作過程中，不同領域間的溝通是否有困難？可否舉例說明？

三、請問在合作過程中，你（妳）覺得自己的專長可以充分發揮嗎？

四、請問你（妳）覺得這樣的合作模式，優點是什麼？缺點是什麼？

五、可以告訴我，你（妳）對資料蒐集、資料分析、資料呈現等製作資訊視覺化的改進想法嗎？

六、請告訴我任何你（妳）的感想。

airiti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抽籤決定組員，一開始就是任務導向，完全讓同學在工作中相互合作，由於 1 個月就得生產出 1 個作品，以致同組的新聞與資工同學並沒有輕鬆交流的機會。同時，參與本研究的新聞與資訊同學均爲第一次合作，過去並不認識，對於對方領域與專長亦不甚瞭解。受訪者 B 說：「優點是分工簡單，缺點是彼此並不真的知道對方在做什麼。」因此在研究過程中，一直有一些問題出現。主要現象爲：

一、新聞所同學覺得與資訊同學溝通困難

由於這個計畫的發動者在分工設計上是從新聞資料蒐集開始，因此新聞所同學必須就各種來源尋找相關資料，還得想到新聞點，當下資工同學並無法參與。而當新聞所同學將資料交給資訊同學時，新聞所同學一樣無法參與運用資訊軟體的流程。又因爲雙方專長差異極大，新聞所同學因爲對於程式、網頁等知識認知過少，溝通並不容易。新聞所 E 同學說：

> 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溝通有些困難，有些資訊科系的同學並不太清楚「能做什麼」，或是誤會「新聞點」的意思，造成兩方覺得「值得做」的內容不太一樣，兩方必須溝通很久。

看來，資料新聞要落實前，最困難的地方恐怕就在於兩方如何真正充分合作。在研究進行之前，新聞與資訊兩方同學對於視覺化呈現資訊新聞的作法都非常陌生，即使已經看過許多國外案例，學生本身並沒有執行的經驗。新聞所研究生 G 說：

> 新聞所同學因為不清楚電腦程式技術，想像的呈現方式可能在實做上有困難，因此成果往往跟想像中有些落差，也降低圖表資訊呈現的效果。這次使用了許多網路上的開放原始碼，是製作資訊圖表最簡便的方法，然而如此一來也限制圖表呈現的形式，無法按照原先的草圖呈現。此外，非新聞領域的同學對「新聞性」的概念模糊，會把重點放在互動性，以為可以做成像遊戲一樣。

airiti

新聞所研究生 C 也說：

> 在對資料的呈現上有時會有落差，新聞所同學會認為資工同學有能力呈現出新聞所希望的互動圖表，但資工同學卻說很難達成，或是找不到相關的套件來改寫，最後只好屈就於現有的套件來進行思考，而無法呈現新聞所同學最希望的互動圖表。資工同學多半是建立在已經存在的套件上，去進行最大限度的修改，來符合彼此希望呈現的樣貌。

過程中可以感覺到新聞所同學的心情有些失落，但是資工同學也很委屈，認爲新聞所同學提出了難以達到的要求。資訊同學會認爲新聞所同學其實不清楚他們的專長。資訊專長的研究生 D 說：

> 新聞同學可能認為網頁設計就像空白畫布一樣，想要有什麼就畫什麼上去便可。其實設計上得尋找網路上的各種模板，瞭解如何運用後，再加以調整產生需要的圖表。例如有一份世界地圖的作品，新聞所同學希望地圖上點到某個國家後，在視覺上能有浮起來的效果，網路上沒有人有相關的應用程式能讓我們使用。如果真的要花時間去寫程式，必須花很多時間，等寫出來研究計畫也結束了。

此外，由於新聞所同學無法理解資訊同學的能力、以及工作所需時間，以致無法明確訂定交稿時間。就有資工同學私下抱怨，爲達到新聞所同學想達到的網路效果，他熬夜兩天才做了出來；但新聞所同學卻認爲「他很混」。新聞所同學 A 因此說：

> 不同領域間的溝通確實有困難，我們有新聞的敏感度與專業，資工同學也有自己的專業。當各自堅持自己的專業時，就容易僵持不下。舉例來說我們認為有新聞點的資料，他們會反過來質疑為什麼要找這類資料；我們認為網站可以如何呈現，他們又會以資訊圖像化的專業來質疑我們，整個溝通過程較不順暢。還有，資訊背景同學一直覺得自己比較像工具，我們新聞所同學又無法瞭解他們寫程式的程度，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做出怎樣的成品，必須反覆嘗試。

airiti

因爲這樣，雖然彼此還是維持和諧的合作關係，卻總是存在無法有效溝通的現象。新聞所同學因爲和計畫主持人爲同所師生，心理壓力較大，又不知如何有效改善工作效率。加上計畫主持人認爲應由新聞背景同學，就像新聞實務界的文字記者一樣，必須負起作品成敗責任。因而新聞、資訊兩方同學心情差異極大，感覺得出新聞背景的同學較爲焦慮。

二、新聞所同學面臨尋找資料、資料處理等困難

因爲新聞所同學缺乏使用應用軟體處理大量資料的概念，因此多半得從多元管道找資料，卻不一定可以派上用場，挫折感很強烈。新聞所同學 G 說：

> 製作資訊圖表最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要有概念。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經常找了很多資料、卻看不出有什麼新聞；或是本來想的新聞點被資料推翻，常常做白工。

由此可以理解，尋找資料是新聞背景同學須面臨的極大挑戰。新聞所同學花不少時間上網，也要與政府單位交涉，深深明白資料得來不易。同時，同學找到的數位化資料可能上千筆，新聞所同學得先檢視這些初始資料，找到一定新聞點後，再交由資訊同學往下做，以致新聞所同學必須進行初步的資料分析工作，但這個環節其實非常困難。新聞所同學 E 說：

> 在資料蒐集這塊想當然是新聞背景同學的責任，但是當資料量非常大的時候，其實是很大的困難。若把資料整理給資訊背景的同學做，資訊背景同學的負擔將會太大；可是我在資料整理時其實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資料整理沒有想像中簡單，當資料量達上千筆的時候，不可能一筆一筆處理。所以新聞背景的同學必須學會一些資料整理的技巧，或是強化 EXCEL 的學習。

因爲前端的新聞資料取得不易，連帶影響後端資工同學的士氣。過程中也有資工同學私下反映，他們的工作不該在尾端才出現，他們也可以和新聞所同學一起想新聞點、一起找資料，而不是被動地一直等著。資訊專長研究生 F 說：

airiti

> 資訊系有專門領域做人機界面或互動；也有做資料圖像化的。這其實是細分之後的領域，一般資訊系訓練出來出來的學生不一定有這樣的技能。我在資訊系做的比較偏向資料分析，就是拿到一筆資料後去看裡面可以找到什麼好玩的事。只是新聞所同學資料蒐集不易，以致資訊系同學沒辦法馬上實作。

原來，受訪者 F 的專長正是分析大量資料，以求發現新的現象，但是新聞所要拿到原始資料就要花很多時間，資工同學的專業要很慢才能派上用場。加上資料蒐集本來就有極大的難度，以致造成資工同學無法參與更深。資訊專業同學 F 便說：「我覺得我們拿到的資料實在太有限了，以至於想呈現的內容，可能礙於資料不足而無法呈現」。

因此，新聞所的同學也開始意識到，資訊視覺化對新聞所同學而言，就是要努力在其中找到新聞。受訪者 G 就說：

> 這次的經驗讓我瞭解，製作一個好的資訊圖表，除了必須挑選本身就適合用圖像呈現的新聞，也要在數據中找出顯著的新聞點，這都是需要非常敏銳的新聞鼻與分析能力才能順利、有效率地完成。過程中，找資料和想新聞點其實相輔相成，也是花最多時間的。

透過以上訪談可知，資料新聞學第一步的資料處理部分，其實需要新聞與資工同學相互合作。新聞所的同學要設法找出原始資料，並與資工所同學一起分析資料，再從中找到新聞，工作才有可能順利完成。在資料分析過程中，新聞與資工同學必須一起合作，才可能真的達到從資料中找到新聞的效果。

三、新聞工作者有必要強化資訊設計概念

因爲資料新聞學包含資料蒐集與資訊視覺化兩個部分，在資料蒐集之後，新聞所同學會希望能與資訊同學一起專注於視覺化的呈現上。但是新聞教育既有的訓練並不包括資訊視覺化這一部分；資訊教育也不包括資訊視覺化部分。以致新聞與資訊兩方同學，都面臨資訊設計的問題。在這方面，資訊同學得自己去找模組來改寫與運用。資訊背景的受訪者 D 則補充說：

airiti

> 我覺得這還是較好的合作方式。不過由於資工在寫網頁、美感設計上比較薄弱，中間需要一起規劃網頁呈現的大致架構，如排版、使用者互動設計等，最後再讓資工的同學做成網頁。

但資訊背景的同學想法差異較大。資訊專業的受訪者 B 就提到：「資工的同學專長不是視覺表現，資訊視覺化應該要有一個過程，即夥伴共同決定作品應該以何種方式呈現、以何種方式互動」。資工背景的受訪者 F 也提到：「在這個計劃中，是把拿到的資料作呈現，所以我覺得我是在學新的技能，而非使用現有的專長」。

總體來看，新聞所與資訊所同學在合作過程中，多能互相尊重與學習，但因爲資料新聞學必然涉及一定的資訊專業，讓新聞所同學有些力不從心，也讓雙方的對話難以交集。資訊專業背景的 F 同學就說：

> 上了研究所之後很難認識其他科系的朋友，這是個好機會。在聊天的過程中，也可以瞭解不同領域的訓練過程有什麼樣的差異，也發現彼此有些習慣與認知的差異。譬如說新聞所同學可能比較不能接受圖表以 log scale（對數掃描）呈現，但在資訊系的圖表中，這個呈現方式是很常用與直覺的。

不但資工同學有此感受，新聞所的同學感受亦相同。受訪者 C：

> 文字與圖表呈現間的轉換，其實真的不容易。資工同學受限於時間，並無法專心的從無到有寫出一個程式，加上圖表的產生也需要美術相關人才同步進行，建議應擴增團隊人數，讓新聞與資工同學都有瞭解相同資料的同學可以一同討論。雖然每次聚會可以有意見分享，但是畢竟做的主題不同，有時很難突破瓶頸。設計人才應該多一點，並且容易聚會討論。

在本計畫中，由於負責美術的只有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1 名學生，必須新竹、臺北兩地跑，因此經常無法就近討論，這名負責的同學多是在新聞、資訊的同學已經大致決定樣貌時，才有機會參與。但因爲很多部分都已定案，因此無法做太大幅度的調整。這名同學私下便說：「大部分同學只把我當美工，多

airiti

半是希望我來幫他們把圖畫得更好看些而已」。但其實，在資訊視覺化過程中，設計的重要性已令參與者深深有感，卻又不是他們的專長。

幾個新聞背景同學最後認爲，這個工作其實可由新聞背景的同學擔任。受訪者 A 就說：

> 我認為製作資訊視覺化應該是由一個小組進行，這次的嘗試問題可能在於人數太少，只有 2 個人，我們也沒有美術專業，單靠交大應藝所同學要處理我們 5 組的呈現會較吃力。我認為以後可以由 2 名新聞所同學搭配 1 名資訊背景同學，在製作過程中 3 人可以反覆討論，意見也會比較多元。3 人也可以一起找資料，同時可以學習如何用程式製作資訊視覺化，互相學習會比較適當。

另一新聞所同學受訪者 G 說：

> 製作圖表新聞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大量資訊轉化為圖表、讓讀者更好理解，但過去未上過相關的訓練及課程，比較難在短時間內看到一堆數據就找出新聞點。我覺得在這次的合作上，身為新聞所的學生（我）在這方面發揮得沒有很好。雖然找資料是新聞所同學該具備的能力，但做到後來感覺有點機械化的在複製貼上那些數據而已，甚至有時需要把資料轉成程式碼的形式，這就跟新聞專長較無關。若新聞所同學能自己學會圖表製作技術，製作過程中應會更有成就感。

爲了真正落實資料新聞學，本研究透過參與觀察與問卷訪談瞭解新聞與資訊背景一起工作時，可能出現的問題，並設法進行歸納，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困難，讓新聞與資訊的跨領域合作真的可以達成。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目標在於理解如何強化新聞人員與資訊專業人士的合作關係。透過同學訪談可以明白，本研究雖然採取清楚的分工概念，促成新聞與資工的同學相互合作，同學們也已準時產出資訊圖表。但過程中不同專長同學未能有充裕時間相互瞭解，以致新聞、資訊、藝術背景等參與同學，對合作情形並不滿意。未來如果真想做到成功的資料新聞學，或許可以從這次經驗中得到改善的靈感。

airiti

先從資訊蒐集的方面來看，這方面問題較小，新聞所同學多能體認在資料蒐集一事上，新聞所同學責無旁貸。新聞所同學也較擅長與新聞對象打交道，過程中會發現新聞所同學不斷透過電話、信件、出公文等方式與政府單位聯繫，其中有的成功、有的失敗，這部分雖然科技成分很低，卻是資料新聞學是否得以實現的第一步。這部分，實爲新聞所同學的專長。

在取得資料後，緊接而來的資料分析工作，就有賴新聞與資訊同學充分合作了。在本研究中，雖然有的新聞所同學會進行資料的初步處理，但因爲本計畫並未事先教授新聞所同學使用資訊軟體，以致分工中多是將這方面的工作交由資訊專長同學進行。因爲新聞所同學無法參與，也就無法在眾多資料中參與資料處理的工作，以發現可能隱藏的新聞。同時，由於臺灣的政府資訊開放較不完整，經新聞所同學要回來的資料，有的是簡單的資料，以致資訊專長的同學會認爲根本不必再用軟體處理，只要將其視覺化呈現即可。

而在資料分析工作結束後的視覺化呈現上，對新聞、或是資訊專業的同學都算是新的專業。這部分的專長不歸屬於新聞、也不歸屬於資訊，即使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同學在視覺美學上有一定訓練，對於如何透過視覺化讓資訊產生新聞感，一樣感到陌生。由於資訊專長同學必須完成互動功能等最後的呈現，因而必須自學才能達成，於是有人反映：「資訊人學到新的專長」。而新聞所同學因爲新聞技能中極少視覺與圖表訓練，在這方面也是全新的摸索。過程中發現各組新聞與資訊同學中，有的能充分溝通與合作；也有同學因爲溝通不良，面對截稿時間實備感壓力。

透過這樣的實驗過程，對於在數位時代亟思求變的臺灣新聞教育，實可引發極大的啓發與反省。本研究者充分感受到，未來若想發展資料新聞學，必須做到以下幾項工作。一、強化新聞所同學的資訊處理能力；新聞背景的同學若能擁有一定的電腦分析能力，本身可以就規模不大的資料量，進行初步的分析；二、強化新聞所與資訊同學的合作，必須設法讓雙方更明白彼此專長；新聞背景同學雖然可能具有一定的電腦分析能力，但如果資料複雜、資料量龐大時，一定需要資工專長的工作者協助，兩方若能有效合作，就能很快就能從中掌握有意義的訊息。三、強化資訊視覺化工作；這方面多數涉及軟體模組的改寫與套用，新聞專長的同學也能學會；但更重要的在於掌握圖表呈現重點，也可以自行繪製草圖後再交由美編人員處理。

這三個環節的工作重點，都是傳統新聞教育未曾關注的部分。本研究強調新聞人員必須學習與資訊人員合作，也必須強化自己的數位專長，如此不但可以讓新聞工作更能與數位接軌，也能改善與資訊人員的互動關係。

airiti

而在現階段，本研究認爲新聞教育最可以著墨之處就在於第一個部分，即雖然新聞背景同學可以找到資訊同學協助分析資料，但如果新聞所同學也能獲得一定的程式知識，就可以獨力進行資料分析；唯當力有未逮時，則可請專業的資訊人員爲後盾。因而，新聞所同學有必要增加自己的電腦識讀（computer literacy），將是未來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新聞工作想要有更好的發展，未來的新聞教育與新聞實務，都應開放更多資訊專長的人才參與，才能真正提升新聞記者的能力。由此可預見未來新聞記者既有的專業內涵將會有所調整，新聞人才的來源也會更多元化。

因爲有這樣的經驗前提，本研究者在接下來的課程中，均已開始增加有關程式分析資料的部分，以便調整、增加新聞所同學的新聞技能。本研究者建議臺灣的新聞系所可以開設「資料新聞學」的相關課程，除要求新聞所同學必須學習蒐集資料外，更責成新聞背景的同學必須學習使用電腦軟體分析基本資料，如新聞系所同學應學習 Spreadsheet、Google Refine、QGIS、HTML 等基本的軟體運用。因爲強調運用，新聞所同學很快學會操作，更可提高學習動機與興趣，對於資料處理會更有信心。同時，也可以學習使用基本模組，製作新聞的視覺圖表。換言之，新聞所同學必須學習獨力完成資料新聞學的所有工作。此外，爲改進傳統新聞技能欠缺數位能力的訓練一事，本研究者也在不同課程中補上運用程式以分析資料的基本訓練。例如，在訓練同學進行調查報導時，已開如要求同學運用 Spreadsheet 軟體來分析政府公布的資訊，並且可以在 Spreadsheet、QGIS 等免費軟體上進行不同資料的比對。相信如此一來，都可增加同學認識更多的新聞來源。

同時，本論文更建議，新聞教育不能中斷與資工等領域的合作。本論文已呈現第一次新聞與資工合作的過程，也充分明白，新聞與資工兩者間要進行前所未有的跨領域合作，並真正有效溝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因此事非做不可，因而本研究者在記取第一次的失敗教訓後，1 年後又展開新聞與資工同學的第二次合作。這時，本研究者已完全明白，資工同學可以在資料量極大時協助分析，前來參與的同學也是真正專長資料檢索的同學，以致已可開始嘗試處理較大的資料量，資工同學也能協助改進新聞內容的視覺呈現形式。雖然目前還在進行中，但情形已比第一次順利許多了。

整體而言，本研究者認爲資料新聞學已是未來非常重要的新聞發展趨勢，但需要發展這項不同於傳統的新聞技能，更需要新聞所同學進行跨領域的學習。然而，這並不是要新聞系所同學疲於奔命，什麼都要學。跨領域的學習是要新聞所同學明白，數位化新聞報導的工具愈來愈多，這些都有助於新聞品質的提升與增

airiti

加新聞閱聽眾的參與。現在資料新聞學已是美國《紐約時報》與英國《衛報》非常重要的說故事方式，也因此拉高了這兩家傳統媒體在數位時代的影響力，這可說是全球傳播史上，後印刷時代非常重要的發展趨勢。臺灣媒體若有決心提升新聞品質，已經不可迴避資料新聞學的挑戰，更不能不強化應用電腦軟體說故事的新聞挑戰。

參考書目

林俊宏譯（2013）。《大數據：「數位革命」之後，「資料革命」登場：巨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革新》。臺北，臺灣：天下文化。（原書 Mayer-Schönberger, V., & Cukier, K. [2013].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London, UK: Murray.）

林照真（2013a）。〈課堂中的資料新聞學：臺大新聞所的實踐經驗〉，林麗雲（主編），《資料好神，敘說故事千百樣：資料新聞學開講》，頁 79-93。臺北，臺灣：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2013b）。〈當代聚合對傳統報紙轉型的影響與衝擊：有關《紐約時報》與《衛報》的比較研究〉，「中華傳播學會 2013 年年會」論文。臺灣，臺北。

———（2006）。《記者，你爲什麼不反叛》。臺北，臺灣：天下雜誌。

林麗雲（2013）。《資料好神，敘說故事千百樣：資料新聞學開講》。臺北，臺灣：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零時政府（n.d.）。〈零時政府網站首頁〉。取自 http://g0v.tw/

boyd, d., & Crawford, K.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cholarly phenomen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662-679.

Code for Tomorrow. (n.d.). *Code for tomorrow website*. Retrieved from https://github.com/codefortomorrow

Egawhary, E., & O'Murchu, C. (2012). Data journalism. *The centre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www.tcij.org/sites/default/files/u4/Data%20Journalism%20Book.pdf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2010). *Data-driven journalism: What is there to learn?* Retrieved from http://mediapusher.eu/datadrivenjournalism/pdf/ddj_paper_final.pdf

Fenton, N. (2010). Drowning or waving? New media,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N.

airiti

Fenton (Ed.), *New media, old news: Journalism &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pp. 3-16). Los Angeles, CA: Sage.

Flew, T., Spurgeon, C., Daniel, A., & Swiff, A. (2012). The promise of 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6*, 157-171.

Fox, J. R., Lang, A., Chung, Y., Lee, S., Schwartz, N., & Potter, D. (2004). Picture this: Effects of graphics on the processing of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8*, 646-674.

Frederiksen, L. (2012). Big data. *Public Services Quarterly*, *8*, 345-349.

Gray, J., Bounegru, L., & Chambers, L. (2012). *The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 Cambridge, MA: O'Reilly.

He, M., Tang, X., & Huang, Y.-M., (2011, June). *To visualize spatial data using thematic maps combined with infograph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eoinformatics, 2011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hanghai, China.

Herbert, J. (2000).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broadcast, print and on-line media*. Boston, MA: Focal.

Holliman, R. (2011). Advocacy in the tail: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climategate" for science journalism and public debate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ism*, *12*, 832-846.

Karlsen, J., & Stavelin, E. (2014). 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in norwegian newsrooms. *Journalism Practice*, *8*, 34-48.

Lazar, N. (2013). The big picture: Big data computing. *Chance*, *26*(2), 28-32.

Lee, T. B. (2012). *5 ☆ open data*. Retrieved from http://5stardata.info/

Manovich, L. (2011). Trending: The promises and the challenges of big social data. In M. K. Gold (E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p. 460-475). Minneapolis, M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vadia, S. (2013). The role of big data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ehavioral & Social Sciences Librarian*, *32*, 130-134.

Rogers, S. (2013). *Facts are sacred: The power of data*. London, UK: Faber and Faber.

Saxena, S. (2004). *Breaking news: The craft and technology of online journalism*. New York, NY: Tata McGraw-Hill.

Schroeder, R. (2004). Interactive info graphics ineurope -- Added value to online mass media: A preliminary survey. *Journalism Studies*, *5*, 563-570.

airiti

Spence, R. (2001).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London, UK: Addison-Wesley.

Thornburg, R. M. (2011). *Producing online news: Digital skills, stronger stories*. Washington, DC: CQ.

Viegas, F. B., & Wattenberg, M. (2007). Artistic data visualization: Beyond visual analytics. *Proceeding: OCSC'07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nline communities and social computing* (pp. 182-191). Berlin, DE: Springer.

Ward, M., Grinstein, G., & Keim, D. (2010). *Interactive data visualization: Foundation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Natick, MA: A K Peters.

Ware, C. (2000).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London, UK: Morgan Kaufmann.

Wigand, R. T., Shipley, C., & Shipley, D. (1984). Transborder data flow, informatics, and national polic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 153-175.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pp. 93-116, July 2014

The Emergence of Data Journalism: Applying Computer Software to Journalistic Storytelling in the Post-Print Age

Lin, Chao-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new term, data journalism refers to an emerging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the post- print age. Involving digital technology, software, and visual devices in news reporting, it takes a special journalistic storytelling sensibility that would combine both computer software and traditional crafts as seamlessly as possible. Based 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aduate students from journalism and those from computer science, hoping to find something inspiring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bringing together people from these two backgrounds, if data journalism is to develop smoothly in Taiwan.

Keywords: data journalism, computer software, journalistic storytelling, post-print age, digital technology

* Email: carolinelin@ntu.edu.tw
Received: 2014.01.12
Accepted: 2014.04.16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117-173．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3

從新聞獎看臺灣新聞記者專業角色（1974-2013）*

邱家宜 **

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從臺灣幾個主要新聞獎歷屆得獎作品，及得獎者的自我理解書寫中分析發現，2000 年以前的臺灣社會，新聞獎的給獎邏輯在新聞專業意理的倡議與鼓吹上是落後於個別記者的專業自覺與社會實踐的；2000 年之後，情況卻翻轉過來，透過發掘堅持專業意理或充滿實踐動能的非主流另類媒體及媒體工作者，頒給新聞獎，幫助他們在困難的現實條件中繼續前進。如同行動者在實踐中面對結構限制所經常會出現的緊張與拉扯，2000 年之前承載國家政治力下向蔓延機制功能的新聞獎，作為新聞記者所處社會大環境的結構，與記者個人經由新聞教育、草根互動，以及不斷自我反省所醞生的個體實踐行動之間，已經明顯出現緊張與衝突。但這種緊張與衝突，必得等到結構出現鬆動後才能獲得解決。

關鍵詞：新聞獎、新聞記者專業、臺灣新聞記者角色變遷、結構限制、管制機制

---

* 感謝三位匿名評審的批評與建議，讓本文得以更清晰述的論述軸線呈現於讀者面前。

** Email: eve59chiu@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 年 2 月 21 日
接受日期：2014 年 5 月 2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問題的源起——對新聞記者角色的期待

對於新聞記者專業表現的不同期待，起因於對其所應扮演的社會角色理解的分歧，記者理想的專業角色究竟應該是何等樣貌？源自西方的近代自由報業有其基本的一套論述，認爲新聞媒體是民主社會中的第四權，扮演著監督權力者（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角色，而新聞記者的工作自然就是要發揮這個角色。但基於種種歷史情境與條件的限制，這個在近代新聞教育中被普遍供奉的新聞記者專業角色的理想，在特定時空脈絡的新聞實務上未必能夠被實踐。實際的狀況是，在言論環境不夠自由、新聞媒體組織框架儼然的工作條件下，記者經常被賦予政治宣傳、權力化妝的任務，也經常必須服務既得利益，而不是挑戰既有權威。在戰後臺灣社會的歷史脈絡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種新聞記者專業角色在理想與現實兩造之間拉鋸的軌跡。

1950 年，臺北市報業公會、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通過接受馬星野（1909-1991）在 1942 年中日戰爭期間，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新聞事業處處長時所擬定的《中國報人信條》（後改稱《中國記者信條》；王洪鈞，1967：151）。信條中除將奉行三民主義視爲最重要任務，並提出「不作任何有妨害建國工作之言論與記載；於國策作透徹之宣揚，爲政府盡積極之言責」的要求[1]。馬星野曾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新聞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張詠跟李金銓指出，曾經在密蘇里大學新聞系求學的馬星野所制定的《中國記者信條》，雖受他留學美國所帶回來，資本主義自由報業典範的「密蘇里模式」新聞學的影響，但從晚清王韜、梁啓超等人就開始的，將辦報作爲推動中國現代利器、辦報救國的傳統深植其中，即使言論立場最獨立的《大公報》，在對日抗戰的國難當頭期間，也願意接受政府的新聞檢查 (Volz & Lee, 2009)，在戰時氛圍下，記者應宣揚國策、爲政府喉舌的文字會進入記者信條的文字中，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這個信條在 1949 年國府遷臺之後，被移植到因國共長期處在內戰狀態而繼續實行戰時體制的臺灣。1954 年創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並曾長期主持《中央社》社務（1950-1964），對臺灣的新聞教育及新聞實務影響頗深的曾虛白

---

1 《中國記者信條》共 12 條，第 1 到 3 條分別為：
(1) 吾人深信：民族獨立、世界和平，其利益高於一切。決不為個人利益，階級利益，派別利益，地域利益作宣傳，不作任何有妨害建國工作之言論與記載。
(2) 吾人深信：民權政治，務求貫徹。決為增進民智、培養民意、領導民意、發揚民氣而努力、維護新聞自由，善盡新聞責任，於國策作透徹之宣揚，為政府盡積極之言責。
(3) 吾人深信：民生福利，急待改進。決深入民間，勤求民瘼，宣傳生產建設，發動社會服務，並使精神糧食，普及農村、工廠、學校及邊彊一帶。
參考網址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150031003700-0000101

airiti

（1895-1994），則進一步闡釋記者擔負政府政策宣傳功能的角色。他認為，記者是溝通政府與人民的橋樑，人民如同有權力但無知的阿斗，政府則像是處處為阿斗著想的諸葛亮，記者的任務就是要如何把諸葛亮的苦心讓阿斗明白，不要誤會、辜負了諸葛亮的一片忠心赤忱，所扮演的是溝通政府與人民的「橋樑」與「潤滑油」角色（曾虛白，1990：741）。曾虛白對記者專業角色的演繹，延續抗戰國難時期救亡圖存之民族主義立場高於（西方自由主義式）新聞專業義理的調性，只是敵人由二戰時期的軍國主義日本，轉變為臺灣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中國。

相較於這個 1949 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位居黨國宣傳機構與新聞高等教育優勢位置的新聞傳統對記者專業角色的認知與期待，另一個也曾經在臺灣社會中活躍過，記者對自我專業角色的理解，可以吳濁流（1900-1976）來舉例。出生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新竹的吳濁流，原本是日制公學校教員，在中日戰爭期間曾經前往日本占領下的中國南京擔任日本人所辦的《大陸新報》記者，中日戰爭結束前返回故鄉臺灣後也曾在《臺灣日日新報》供職，戰後因爭取臺籍員工與外省籍員工同工同酬，得罪從重慶來接收報社的李萬居（1901-1966），在 1946 年 10 月《臺灣新生報》取消日文版時離開官報，不久又進入民營的《民報》擔任編輯[2]。他描述剛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脫離的臺灣新聞記者的心情：

> 上海的商人在西門町大世界館隔鄰開了一家國際飯店，幹起舞廳生意。我們以堂堂筆陣口誅筆伐，把那兒出入的人們當作國賊般地斥罵。效果很快地顯現出來，生意一落千丈。我們也經常睜大眼睛，一發現不正當接收，馬上揭露，以大標題刊出。在公務員方面，只要有敢化公為私，也必定是大小不論，都加以揭發。例如有人公車私用，載自己的小孩上下學，便寫出車牌號碼，指謫其公私不分。不管官有多大，這件事必不放過。（吳濁流，1995：155-156）

吳濁流認為，臺灣在戰後到 1947 年 228 事件發生之前，「報紙確實是自由的，言論方面絕不比文明國家差。當時的新聞記者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同上引）。他描寫的雖然是他自己，以及在《臺灣新生報》日文版同

2 二戰期間（1944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下令將《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臺灣新聞》、《臺南新報》、《高雄新報》、《臺東新報》等 6 家主要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由日本的大阪《每日新聞》派員接管（吳濁流，1988：120；葉榮鐘，1985：275-276），為《臺灣新生報》前身。吳濁流的自傳體小說《無花果》中，對這段過節有具體描述（吳濁流，1988：195），但吳濁流對李萬居的整體評價仍然是肯定的（邱家宜，2012：128）。

airiti

事們的狀況，但應該也相當程度可以代表當時臺灣社會對新聞記者角色的正面期待，以及記者對自身角色之所以能貢獻社會的理解。黃順星曾指出：「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媒體經驗，是站在被壓迫的被殖民者立場而發言與批判。報刊紮根於民間，爲普羅大眾代言的立場顯而易見，……」（黃順星，2013：120）。這種承襲自殖民地時期臺灣社會對抗殖民統治的新聞媒體經驗，在戰後的臺灣社會，一度也透過《民報》等民營報刊繼續維繫了一段很短的時間（1945-1947），《民報》的報導與評論是勇於進行社會批判，挑戰當權者的（李筱峰，1996）。而這種臺灣知識份子從被殖民經驗中開展的報業經驗與傳統，由於在當時政治社會權力關係中的相對位置，似乎一開始便具有較接近西方自由報業理想的，獨立與面對權力者的抗議精神。

但在 228 事件之後，臺灣的新聞業經歷一場大整肅，本土報業與報人受創最深（呂東熹，2010：51-60），上述傳統也幾乎中斷。1949 年國府遷臺前後，許多大陸新聞從業人員陸續來到臺灣，他們之中有許多屬於國民黨文宣或政府機關報系統，也有少部分非屬黨報、政府報系統。當時，新的報紙如雨後春筍般創立，不少報館都爲軍人背景或情治機關出身者所創辦（同上引：60-61）。由於國共鬥爭過程中，國府在文宣戰場上曾經吃過大虧，痛定思痛，新聞媒體於是被認爲是必須堅守的輿論陣地。在政治與軍事上不斷強調要反攻大陸的 1950 年代初期，報人團體「臺北市編輯人協會」所發行的《報學》雜誌的內容中，經常出現新聞工作需以反攻大陸爲最高前提的論述與觀點。該刊物的發刊辭即開宗明義：

> 大陸變色，公私報業全被劫奪，自由報人慘遭迫害……吾人慶幸未遭毒手，並慶幸能以餘生為反共抗俄而鬪爭，吾人更因此而珍惜此碩果僅存之新聞自由的萌芽，因臺灣而能絕續滋長，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小心地培植它，使它發揚壯大，隨著反攻勝利，重新移植到大陸去。（報學編輯委員會，1951：1）

新聞自由雖也是此新聞專業團體認爲要努力維護的，但很清楚的，服膺反共國策並爲「反共抗俄」而鬥爭，是這個隨著國府遷臺的報人群體所認爲的，當時臺灣新聞記者的第一要務。在曾虛白之前擔任《中央社》社長的蕭同茲（1895-1973），也在對記者演講中強調：「新聞自由好比一個武器，國家很鄭重的把這武器交給了我們，用之得當便能善盡我們教育社會的責任，用之不得當只製造罪惡貽害國家和社會」（蕭同茲，1951：32）。在大陸陷共後遭受集體流亡的痛苦，

airiti

讓這種記者是受國家賦權、服務於政治前提，新聞寫作必須服務於反攻大陸政治目標的「反攻大陸新聞學」站上歷史的檯面（邱家宜，2012 年 5 月），相當呼應了前面所提到馬星野的《中國記者信條》中，新聞記者必須宣揚國策，以及曾虛白認爲記者應爲先覺（政府）覺後覺（人民）的「三覺論」。

從以上的相關歷史脈絡鋪陳可以看出，回溯臺灣社會的近代報業經驗，新聞記者專業角色的兩個傳統：一個來自中國大陸親國府一系的報業傳統；一個則是來自日治時期就已開始萌發的臺灣近代報業經驗。前者長期處在救亡圖存、漢賊對立的心理狀態下，後者則以反抗殖民壓迫爲基底。其中雖然都具有民族主義意涵，但前者不免爲對抗外部敵人（日本軍國主義政權、中國共產黨政權）而自我限縮新聞自由，或爲政治宣傳與護翼；後者則表現爲批判殖民統治或後來的當權者的色彩。接下來，將嘗試從臺灣幾個主要新聞獎的得獎作品與得主中，來觀察這兩個源自不同脈絡的對記者專業角色的理解與期許，是否以及如何反映在各個新聞獎的給獎中？中間出現過哪些變化？並進一步解釋這些現象所反映的政治社會意義。

雖然獎項成立的背景與資源所來之處，難免會影響給獎的取向，具官方色彩的新聞獎與非官方新聞獎在給獎的考量上也可能會有不同，不同獎項之間也許存在微妙競爭關係。但總體而言，獲得新聞獎的肯定，表示給獎單位認爲獲獎者在新聞專業上表現傑出，自然也反映出給獎當時，給獎單位所代表的政治或社會觀點對於記者所應有作爲的認定與期許。新聞記者的專業角色究竟應該是社會的木鐸、警鐘，還是宣揚反共國策，戮力於全民精神武裝的文宣鬥士？如果兩者出現角色衝突時（例如：批評政府施政將會削弱政府威信與政權合法性，不利反攻），要如何選擇與取捨？新聞記者又是如何理解本身的社會角色？下面將透過分析與比較歷來臺灣幾個主要新聞獎的給獎對象（新聞工作者及其新聞作品），來檢視臺灣自從有新聞獎以來（從 1974 年「曾虛白先生新聞獎」設立算起）到晚近，獲得新聞獎肯定的記者與呈現他們工作成果的新聞作品，究竟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期待？以及這些被視爲優秀傑出的新聞記者，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專業角色？

在進行這樣的分析之前，必須要先釐清的是，每年新聞獎的得獎作品絕非該年新聞作品的代表性抽樣，因爲不是所有的新聞媒體的所有作品都會參加新聞獎的角逐，有些新聞媒體一定不會參加（例如政治解嚴前的黨外雜誌），會參賽的作品往往也經過一定程度的篩選（不論是由媒體機構或新聞工作者個人），這些篩選過程可合理視爲參賽者對新聞獎給獎方向的某些想像或預期，而這些想像或預期，應該也都是奠基在與給獎結果互動之後的經驗基礎上。由於無法蒐集到歷來所有參與各個新聞獎角逐的所有作品，所以必須以可蒐集到的，差堪完整的得獎作品清單來進行研究，但這個研究上的限制，或許可以用一個合理的假設來加

airiti

以彌補，那就是：雖然臺灣社會每年都發生許多影響重大的新聞事件，理論上這些重大新聞事件的相關報導與評論應該最可能會出現在新聞獎的參賽清單中，但如果影響重大的事件，基於某些因素，未必是得獎機會最高的，甚至因其所凸顯的衝突性反而不容易得獎時，報社或媒體機構很可能會選擇得獎機會較高的作品參賽，即使這些根據過去經驗得獎機會較高的作品，未必與當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新聞事件有關。本文稍後將會再對這個部分做進一步的分析。

爲避免資料過於龐大，並考慮平面類媒體的給獎歷史較久，相對較具有比較的基礎，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將聚焦於平面媒體的得主及得獎作品。在分析開始之前，有必要對本文所針對的幾個主要新聞獎做一扼要介紹。

貳、介紹臺灣幾個主要的新聞獎

一、曾虛白新聞獎

曾虛白新聞獎是臺灣幾個主要新聞獎中成立最早的。係由倡議記者角色「三覺論」的曾虛白，在 1974 年間，捐出他 80 歲生日時所收到的賀禮，成立「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金會」，由他曾經長期擔任社長的《中央社》負起給獎的實際執行工作[3]，《中央社》社長依慣例均兼任「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負責籌措每年給獎所需經費。曾虛白新聞獎除設立「新聞學術獎」鼓勵新聞專業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獎項設計也直接以「公共服務」爲名，強調得獎作品在公共服務上的貢獻，是該新聞獎的重要特色。從 1974 年開始頒發，到 2013 年已頒發了 39 屆（歷屆得獎名單見附錄一）。剛開始獎項只頒給平面媒體，1986 年開始增設廣播電視獎項，仍一貫強調得獎者及其作品在公共服務上的貢獻。1997 年開始，增設「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以及「公共服務獎報紙攝影獎」，此一規模維持到 2008 年。

2009 年起連續 4 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委由 2002 年才成立的「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辦理，獎項縮減爲學術獎及公共服務獎 2 項（平面、廣播、電視混合評獎）。2013 年，「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金會」又將獎項再度交由《中央社》辦理，並接受民間企業台達電冠名贊助，整體獎項改稱「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暨臺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除公共服務獎，另增設「臺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強調環境與生態題材的報導，並設「公民記者組」，將獨立媒體記者納入給獎對象。

3 曾虛白在 1964 年卸下《中央社》社長，轉任《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64-1972），在《中央社》共任職 22 年。

airiti

二、行政院「金鼎獎」中的新聞類獎項（1980-2000）

金鼎獎是行政院新聞局在 1976 年為獎勵優良出版品所設立的官方獎項，從 1980 年開始設置新聞類獎項，到 2001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由張俊雄內閣的新聞局長，新聞記者出身的蘇正平下令廢除新聞類獎項，前後共頒發 20 屆（歷屆得獎名單見附錄二）。金鼎獎的新聞類獎項設計，一開始就包括新聞報導、新聞評論、新聞攝影三個部分，但給獎數量每年不同，獎項也屢有變動。1981 年增設「副刊專欄獎」（從 1981 年到 1985 年，只頒發了 5 年），1984 年增設「公共服務獎」。1989 年開始，區分一般報導與專題報導獎項，1990 年再區分個人獎項與團體獎項，但僅實施 1 年。這種獎項變動的情形，或與新聞局主事者變動有關，但也牽涉對新聞文類的思考。1991 年之後獎項基本上不再變動，採訪報導、專題報導、評論、攝影、公共服務的給輪廓大致維持不變，從其獎項的演變，也可以看出當時對於主要新聞文類的看法已趨於穩定與一致[4]。

三、吳舜文新聞獎

吳舜文新聞獎成立於 1986 年，是由當時主持裕隆集團的吳舜文（1913-2008）女士獨資創立「財團法人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每年頒獎給平面類媒體，到目前為止已頒發 27 屆（歷屆得獎名單見附錄三），2013 年開始將電視媒體納入給獎範圍。吳舜文以企業家獨立創辦新聞獎，係與她早年跟報業的一段淵源有關。1953 年《自立晚報》因錯誤報導國府前財政部長孔祥熙即將來臺消息，被省新聞處停刊 7 日。為挽救因停刊而更加惡化的財務狀況，當時的《自晚》發行人李玉階商請臺元紡織公司總經理嚴慶齡提供金援，並邀請他的夫人，也是李玉階江蘇常州的小同鄉吳舜文女士來擔任社長，協助報社度過危機（呂東熹，2010：325）。吳舜文投入報社經營時間雖然不長，但一度全力投入經營的結果，卻讓她因此對新聞事業情有獨鍾，在接續丈夫事業之後，創立了臺灣獎金最高（每獎 25 萬獎金）的新聞獎（溫曼英，1993）。希望：「鼓勵恪遵新聞專業倫理，而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的從業人員。……使新聞界更加發揮公正客觀的專業精

4 臺灣新聞獎的給獎文類多少都以最著名新聞獎「普立茲新聞獎」為標竿，普立茲新聞獎的新聞類獎項，以 1991 來說，金鼎獎的 5 個獎項對應於普立茲的 14 個獎項（以括弧內英文表示），大概可對照出：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即時新聞（spot news reporting、national reporting）、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explanatory journalism、feature writing、specialized reporting）、新聞評論（commentary、criticism、editorial writing、editorial cartooning）、新聞攝影（spot news photography、feature photography），唯一缺少的獎項文類是國際新聞獎（international reporting）。參考網址 http://www.pulitzer.org/awards/1991

airiti

神，不畏強權與干擾，保障全民『知』的權利，進而帶動社會朝向更開明、更理性與更進步的境界邁進」[5]。

吳舜文新聞獎的獎項屢經變更，剛開始設評論、採訪、特寫、攝影 4 個獎項；1989 年增設漫畫獎；1991 年取消特寫獎，同時增設「文化專題報導獎」與「地方新聞報導獎」；1992 年增設「雜誌新聞報導獎」；1999 年將採訪獎區分爲專題報導與採訪報導。2004 年吳舜文之子嚴凱泰接棒擔任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董事長，當年該新聞獎停頒 1 年，2005 年再度恢復頒發時，新聞漫畫獎取消，新增「國際新聞報導獎」，獎項仍維持 8 個，獎項名稱略微調整，「新聞採訪報導獎」改爲「新聞即時報導獎」，「新聞專題報導獎」改爲「新聞深度報導獎」，「雜誌新聞報導獎」改爲「雜誌專題報導獎」。2008 年取消「雜誌專題報導獎」，將攝影分爲即時與專題兩類。2011 年將「國際新聞報導獎」改爲「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2012 年取消「新聞評論獎」、「文化專題報導獎」與「地方新聞報導獎」，增設「公共服務獎」，獎項減爲 6 個[6]。可以看出其獎項經過多次斷變動後，還是回歸到前述新聞獎的幾個基本文類上，唯獨將新聞評論獎取消這點是比較特別的。

四、卓越新聞獎

最後要介紹也是最晚成立的「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所頒發的「卓越新聞獎」（簡稱「卓新獎」）。2000 年臺灣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政府的第二任行政院長張俊雄任命前《自立早報》總編輯蘇正平出任新聞局長，曾經擔任「臺灣新聞記者協會」（簡稱「記協」）會長的蘇正平[7]，在會長任內曾經呼籲記協會員拒領官方頒發的新聞獎，出任新聞局長後，他立刻要求停頒由新聞局所主辦的「金鼎獎」（獎勵平面及有聲出版品）與「金鐘獎」（獎勵廣播、電視節目）中與新聞有關的獎項，並積極奔走向民間企業募集捐款，邀請傳播學界大老、社會賢達組成董事會，在 2002 年正式成立了「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該基金會在「源起與使命」中表示：「由官方頒發媒體新聞獎，過去在臺灣社會被視爲常態，但新聞媒體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監督政府，由政府頒獎鼓勵新聞媒

5 取自「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官網網頁 http://www.vivianwu.org.tw/01-1.php

6 關於吳舜文新聞獎的獎項變更沿革，系根據「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官網所整理的資料 http://www.vivianwu.org.tw/01-1.php

7 臺灣新聞記者協會（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ATJ），於 1995 年 3 月 29 日正式成立，成立宗旨為「爭取新聞自由、提升專業水準、保障新聞工作者獨立自主、落實新聞媒體為社會公器之責」。目前會長為陳曉宜。參見記協官網網頁 http://atj.twbbs.org/guan-yu-ji-zhe-xie-hui/aboutatj

airiti

體，實非恰當」。顯示其作爲獨立於官方影響力之外的給獎機構的自我期許，與過去官方新聞獎（金鼎獎），或半官方新聞獎（由政府編列預算之《中央社》負責執行的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的思維明顯不同。

「卓新獎」除了強調獨立於政府之外，由於其成立之初，臺灣已經歷政治解嚴、政黨輪替等轉變，新聞媒體經營日益市場取向，新聞商品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當今新聞媒體常自許爲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第四權，但是新聞工作者若無法堅守新聞倫理與專業，也未能對社會透過善盡責任，以樹立新聞工作的主體性，其所提供的新聞內容且常被經營者視爲增加收視率及爭取廣告的工具，則新聞的商業主義，勢必隨著政治力撤退的真空，趁虛而入，進而主宰新聞媒體運作」[8]。因此該獎項強調新聞媒體作爲社會公器，應同時獨立於政治力影響以及經濟力收買。

卓新獎成立迄今共頒發 12 屆（歷屆得獎名單見附錄四），獎項也經過幾次變革。其平面類獎項從一開始就分爲即時新聞、專題報導、新聞評論、新聞攝影，除了未設「公共服務獎」，獎項設計明顯繼承已經停辦的「金鼎獎」新聞類獎項。爲鼓勵製作成本較高的國際新聞，2003 年開始設立「國際新聞報導獎」，2004 年將即時新聞與專題報導合併爲「採訪報導獎」，2009 年又再度分成 2 個獎，並將「新聞評論獎」調整爲「新聞評論（漫畫）獎」，將新聞漫畫也列入評選。2011 年首度增加「調查報導獎」（但第 1 年給獎從缺），特別強調以「揭露」爲最主要功能的調查報導文類的重要性。2012 年，應歷屆新聞攝影組評審要求，將攝影獎分爲「單張」與「系列」2 個獎，也由於業界近年在新聞漫畫方面缺乏表現，而將「新聞評論（漫畫）獎」，又改回「新聞評論獎」。

參、從新聞獎得獎作品中找線索

一、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得獎作品分析

即使回溯最早成立的「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其出現的時間也要到 1970 年代的中期，當時距離 1958 年臺海「823 炮戰」之後，國府與美國簽訂承諾「不以武力反攻大陸」以換取美國承認與軍事保護的「中美聯合公報」已經將近 20 年（張淑雅，2001），期間（1960 年）雖然還發生了因「反攻無望論」被羅織入罪的「自由中國」雷震案文字獄（薛化元，1996），但衡諸維持臺海現狀的客觀現實，「一切爲反攻」的社會氛圍已逐漸淡去，不過由於當時臺灣主流新聞媒體的黨國侍從

8 取自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官網「基金會源起與使命」網頁 http://www.feja.org.tw/modules/tinyd/

airiti

性格已然確立[9]（林麗雲，2000），政治力的控制在 1988 年報禁解除之前，依然如影隨行。但值得探究的是，這個從 1974 年開始頒發的新聞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給獎對象卻似乎反而有刻意迴避政治議題的傾向。從其歷來得獎作品可以看出，得獎最大宗是與民生消費、食品安全、醫藥衛生、生態環保相關的議題。

另一個有趣的對照點是，幾乎是在與曾虛白新聞獎設立的同時，臺灣的言論場域開始有「黨外雜誌」的出現（第一本黨外雜誌《臺灣政論》創刊於 1975 年），各種經常被警總查禁的異議媒體不斷在政治、社會、文化各場域對當時既有的體制進行批判，政治場域的衝突場景隨著黨外政治勢力的崛起而不斷上演，但在這個階段，曾虛白新聞獎以「公共服務」爲標榜，給獎對象卻幾乎是徹底迴避了較具衝突性的政治性議題。

從蒐集到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間，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的得獎作品所涉及的新聞議題包括：臺北市公車聯營、進口藥價過高、公路局金馬號煞車性能瑕疵、津津鮮奶廣告不實、撫遠街爆炸案醫院拒收傷患暴露醫療系統缺失、多氯聯苯毒油、鼓勵國中畢業生留在地方升學、臺灣北部出現疥瘡、機場空廚垃圾處理不當、食品有效期限標示不實、竊嬰案、福壽螺危害農田、飼料奶粉流入食品、翡翠水庫集水區汙染問題、彩色電視機與汽車售價偏高、廢除票據法惡法、石門水庫大壩沉陷、配方奶粉引發嬰兒低血鈣、餿水油、毒物管制、住院保證金應廢除、B 型肝炎防治、器官移植、救援雛妓、關心農漁民處境、非法外籍新娘、登革熱防治（見附錄一）。其中，除了由地方媒體《屏東周刊》點出的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問題（1981 年獲獎），以及翡翠水庫集水區汙染議題（1984 年獲獎）牽涉土地分區使用規劃及國家環境政策立法，其他鮮有牽涉政治或社會結構性層面的議題，而與這段期間政治或社會場域上重要衝突性事件相關的新聞作品則是掛零，這在跨越解嚴的 1970 到 1980 年代，政治與社會衝突不斷的臺灣，實在很難說是真正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真正重大的時勢變化或最重要的新聞事件[10]。

1990 年，「揭發臺灣屠殺野生動物的現場調查」作品獲獎，呼應當時在臺灣社會開始萌芽的動物權議題，相當程度衝擊既有的社會觀念。接下來獲獎的西部沿海地層下陷、河川保育議題，則牽涉較廣泛的國土規劃政策，但公立學校職員任用資格、失蹤兒童協尋、進口蘋果殺蟲劑殘留、醫院院內感染問題、搶救國

9 李金銓則是用「資本主義的威權媒體」（capitalist authoritarian media）來形容臺灣當時的主流報業 (Lee, 1994)。

10 從 1974 年到 1989 年間，臺灣重要的政治、社會事件包括：中壢事件（1977）、美麗島事件（1979）、機場事件（1986）、520 農民運動（1988）、反核電運動（1988）、無住屋運動（1989）等等。

airiti

寶級景觀道路、性侵害防治、地下水汙染、假溫泉等議題雖牽涉制度缺失與人謀不臧，但多非結構性問題，社會衝突性較低。1990 年，臺灣在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政爭的同時，發生了促成國會全面改選的「野百合學運」，對往後政局與社會發展影響深遠，但在曾虛白新聞獎中，並未出現反映出當年風雲盛況的作品[11]，大體上來說，1990 年代的得獎作品屬性與 1980 年代差異不大。

2003 年，《中國時報》記者張瑞昌以「追擊港都賄選風暴」獲頒曾虛白「報紙評論獎」（1997 年開始設評論獎）[12]，是該新聞獎創立以來第一次頒給具衝突性與爭議性的政治議題。在民主政治尚不成熟的臺灣社會，賄選是歷來地方選舉人盡皆知，但卻不能拿上檯面的秘密，報紙據實報導尚且要多所顧慮，更遑論相關議題能獲得新聞獎的肯定。不過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情況似乎有了轉變[13]。繼張瑞昌之後，2005 年《中國時報》記者何榮幸以「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獲頒曾虛白「報紙評論獎」，呼應當時傳播學術界與文化界共同倡議的，以扶植公共媒體來解決媒體壟斷與新聞商品化問題的媒體改革運動，社會運動意味濃厚。2006 年，從 1970 年代即積極參與臺灣民主化運動，以短評精闢見長的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以其在《蘋果日報》的專欄「司馬觀點」獲頒「報紙評論獎」，這位向來以批判當權見長，當年「黨外」第一健筆的獲獎，似乎徹底宣告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與其創辦人曾虛白的記者專業角色的「三覺論」分道揚鑣。

二、金鼎獎新聞類獎項得獎作品分析

相較於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算是「半官方」性質，1980 年開始頒發新聞類獎項的金鼎獎，則是一個「純官方」的新聞獎，雖然就新聞作爲民主社會第四權的立場，官方新聞獎絕對有球員兼裁判的問題，但實際狀況卻是，金鼎獎因爲挾公部門的資源與影響力，當年幾乎是最受平面媒體新聞從業者重視的新聞獎。

金鼎獎從 1980 年開始頒發新聞類獎項，當年報導、評論、攝影 3 個文類共開出 11 個獎，《中時》、《聯合》、《中央》、《中華》、《青年》、《新生》、

11 1986 年開始的吳舜文新聞獎得獎名單中，也一樣看不出野百合學運的痕跡。1980 年開始頒發的金鼎獎，在 1990 將「新聞報導團體獎」頒給中國時報的「凝聚朝野共識、規劃改革藍圖——國是會議專題報導」，是關於學運之後召開的「國是會議」的報導，但不是針對學生運動本身。

12 由中央社所提供的歷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得獎名單，目前尚缺 1999 年到 2002 年的資料，作者另外從聯合報記者張耀懋的簡介中得知他在 2000 年到 2002 年曾連續 3 屆獲得曾虛白新聞獎，但無得獎作品名稱。

13 中央社為國家通訊社，大部分營運經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董事會組成係由過去的行政院新聞局（目前已廢除）提報行政院決定，而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實際上歷屆均由中央社辦理，因此政黨輪替牽動中央社董事會改組，自然也會影響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的給獎方向。

airiti

《新聞》、《臺日》等主要公營、黨營，以及兩大民營報紙通通有獎，若說沒有分配的思考，似乎也未免太過巧合。得獎的作品都屬社會服務、肯定政府施政，或對政府積極建言的內容。1981 年仍維持 11 個獎項，但增加了「副刊專欄」獎，由徐佳士（筆名徐曉）等 3 人獲獎，攝影獎得獎作品之一爲「總統愛民，涉水勘災」，政治意味似乎壓過攝影專業。1982 年獎項縮減，每個文類各頒一獎，馬以工跟韓韓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獲副刊專欄獎，顯示臺灣社會對環保議題逐漸重視（曾虛白新聞獎 1984 年才頒獎給翡翠水庫汙染問題，較金鼎獎晚了 2 年）。1985 年《自立晚報》駐高雄記者蔡翠英以「請還給下一代乾淨的大地」等 26 篇關於高雄重工業污染的報導，獲頒 1984 年起增設的「公共服務獎」，這是具有政治異議色彩的《自立晚報》第一次獲獎，也顯示在 1980 年代政治解嚴前夕，環境議題已獲得社會普遍重視，政治異議色彩濃厚的新聞媒體，雖仍無法以政治議題作品獲獎 [14]，但仍能在環境議題上有斬獲 [15]。

1990 年給獎數目增加，由在野黨政治人物康寧祥所創立的《首都早報》記者方儉等 5 人，以「媒體與不實廣告」報導 15 篇獲頒金鼎獎的「公共服務獎」。1992 年《聯合報》雷顯威以「國內發現罕見黑面琵鷺爭取設保護區」獲頒「新聞報導獎」，開啓黑面琵鷺的保育風潮。1994 年的得獎作品包括都市邊緣違建弱勢居民、都市原住民，是繼 1990 年的「臺灣漁業補破網」後又一弱勢關懷演出。1996 年《中國時報》記者呂紹煒以「中正機場二期航站黑道圍標、綁標報導」獲獎，爲揭發大型公共工程弊端的題材敲開新聞獎之門。1997 年，《民生報》韓乃鎮、邱勤庭的「臺灣海岸濕地現況調查報導」獲獎，延續對環境、生態議題的偏好。《聯合報》主筆黃年在 1998 年、2000 年連續以兩岸關係議題的社論寫作，獲頒評論獎（見附錄二）。

從上面的摘要整理可以發現，相較於曾虛白新聞獎在 2004 年之前，從未頒獎給《中時》、《聯合》兩大報系，以及《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以外的媒體機構（只有 1981 年頒給《屏東周刊》是例外），金鼎獎對於《自立晚報》、《首

14 《自立晚報》對註 10 所羅列的，1970 到 1980 年代的幾個重大政治社會事件都曾有大篇幅的報導（例如：美麗島軍事法庭開庭過程），1990 年也大篇幅報導野百合學運，其他報紙當然也一樣不會不處理這些大消息，但這類作品不會出現在得獎名單上，甚至可能不會參與角逐。美麗島事件發生的隔年（1980），金鼎獎開始頒發新聞獎項，聯合報主筆楊選堂（楊子）以「從經濟的角度看當前國是專輯」共 10 篇社論獲獎，社論中對美麗島事件的主事者大加撻伐，與當時官方立場一致，後文會再加以詳述。

15 由於無法獲得所有的參賽者資料，無法確知《自立晚報》在 1984 年之前是否曾經參賽，但可以確定的是，在 1984 年之後，《自立晚報》就經常參加新聞獎的角逐。本文作者在服務於《自立晚報》擔任記者期間，曾分別於 1992 年獲頒金鼎獎「專題報導獎」、1993 年獲頒吳舜文新聞獎「地方新聞獎」，作品都是環境生態相關議題（見附錄二、附錄三）。

airiti

都早報》、《自由時報》等在野媒體也不吝給獎[16]，但這些新聞媒體藉以得獎的，都不是在該些媒體中角色最凸顯的，與政治議題有關的作品。當然也可能是它們並未選擇以政治議題作品參賽，果真如此，也可以理解爲透過之前參賽的經驗，讓它們理解官方新聞獎所能容忍的議題尺度。而在最能突現意識形態取向與立場的評論獎方面，財經議題是得獎常客，似乎顯示迴避政治議題，還是當時新聞獎的某種潛規則，在相對少數得獎的政治議題方面，鼓掌建言的多於監督批判的，這對一個官方新聞獎來說，不算意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9 年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金鼎獎的「新聞專題報導獎」、「新聞攝影獎」分別頒給《聯合報》的文字記者王震邦等 8 人的「天安門事件特別報導」55 篇，以及攝影記者程思迪的作品「民主之春——撤而不退」（該作品同年也獲吳舜文新聞獎）。反映當時臺灣社會對六四事件的普遍高度重視，各大媒體都派出精銳人馬前往採訪、持續大幅報導，與目前兩岸關係改變，基於對岸相關有力人士感受的考量，六四事件在主流媒體反成需審慎處理之敏感議題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三、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分析

吳舜文新聞獎從 1986 年開始頒發時，已經是政治解嚴前夕。當時臺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已經風起雲湧，各場域的社會運動也陸續萌發。但從得獎作品中觀察，能反映當時政治社會巨大變遷能量的還是少得可憐。1988 年石齊平在《工商時報》以「經濟力、社會力、政治力——我們對臺灣政經社體制改造的觀察」等 16 篇獲頒評論獎，是對剛解嚴之後臺灣社會的整體觀察；1989 年《自立》報系林奎佑（筆名「魚夫」）以「解嚴之後李總統主政之臺灣時局」獲「新聞漫畫獎」，1990 年羅慶忠（筆名「CoCo」）又在《自立晚報》以「海峽兩岸漫畫系列」獲獎，政治味十足，以誇大的戲謔諷刺方式表達時事的新聞漫畫連續獲得該獎評審團的青睞，顯示在當時劇烈變動的環境中，新聞漫畫文類一度爭取到不小揮灑空間。

1992 年《中國時報》張平宜的「愛滋病防治系列」獲採訪報導獎，反映當時這個牽涉很廣（多元性向、人權隱私、公共醫療，甚至社會文化）的問題開始廣獲社會重視。除了特別獎勵文化新聞，專門設立「文化專題報導獎」之外，與前兩個新聞獎類似，吳舜文新聞獎也經常頒獎給環境生態議題：1992 年「從濫墾到農業上山看草嶺潛伏的山林環保危機」《自由》、1993 年「隨水逝去的鄉

16 當然也不排除這些在當時具有在野性格的新聞媒體，過去從未參加過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的可能。

airiti

愁——美濃客家庄反水庫記要系列」《自立》、1993 年「土地之怒」《天下》、1996「我的海岸我的愁」《自由》、1997「窮山惡水悲家園」《自由》、1998「氣候風暴」《天下》、1999「不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育，侈談生技產業」《聯合》、2001「全球沙漠化風暴強烈吹向臺灣系列——阿公店水庫更新計畫」《天下》、2002「臺灣水產品重金屬污染世界第一」、2003「戰慄土石流」《中時》、2007「關渡平原土壤砷污染調查系列報導」《聯合》、2007「全球暖化——臺灣不願面對的真相」《天下》、2008「丹頂鶴一家四口來臺記事」《中時》、2009「煙囪裡的秘密——雲林麥寮高罹癌率追蹤報導」《自由》、2010「毒水危機：高雄仁武廠地下水毒物超標 30 萬」《自由）、2011「變調的蘭陽溪」《聯合》，以及 2012 的「臺灣海岸浩劫」《商周》。

相較於在環境生態議題上擁抱許多挑戰現況的報導，呼應臺灣社會的改變，吳舜文新聞獎在政治議題上的取向一致性很高，反映在評論獎的給獎上面，除了財經議題之外，《聯合報》主筆黃年曾 5 度獲獎（1997、2000、2008、2009、2011），而除了 1997 年的「修憲，不可毀憲」是批判李登輝任內的修憲舉動，其餘得獎作品均爲有關兩岸關係議題的立論（見附錄三），似乎顯示給獎單位在此政治議題立論上具有一定的偏好。2012 年開始，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宣布不再頒發新聞評論獎。

四、卓越新聞獎得獎作品分析

在「卓越新聞獎」得獎作品方面，這個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才出現的新聞獎，從一開始便宣稱與較早成立之新聞獎的不同思維。比較其給獎取向與之前的金鼎獎，以及同時平行存在的曾虛白獎、吳舜文獎，可以發現：雖然這三個新聞獎都頗偏好環境生態議題，但 1980 年代就開始在臺灣興起的反核電運動，在 1990 年代不斷在街頭（遊行、公民連署）與立法院（預算審查）引發劇烈的社會與政治衝突，並多次牽動敏感的公投議題（施信民，2006：3），是臺灣環境新聞中長期占據舞臺的主角級事件，新聞媒體的報導堪稱汗牛充棟，但直到 2002 年卓新獎頒發之前，在其他三個新聞獎中，卻從未有核電相關議題的報導得過獎，相較於其他的環境議題經常被青睞，這毋寧是不尋常的。而 2002 年「卓越新聞獎」第一次頒發，核電相關議題的作品就得獎——「核安何時能安——核四工程弊案追追追」《中國時報》。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給獎的思考與過去已有不同。同樣是環境生態議題，核能安全問題所牽涉的是臺電、原能會等龐大科技官僚體系治理黑箱，以及保護此黑箱始終不被掀開的龐大跨國採購利益的臺

airiti

美關係敏感地帶。從核四問題一直到經歷兩次政黨論替的現在，已糾纏二十多年都還未解決，2013 年還曾因公投議題引發政治危機來看，其所涉及問題的深廣，在許多其他的環境生態議題之上。也就是說，核電議題相較於其他環境議題，更深刻的挑戰了既有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問題，而在過去，新聞獎會避免頒獎給這類具有顛覆既有體制結構潛力的作品[17]。

2004 年，探討早已深入臺灣大城小鎮的東南亞外籍配偶議題的「南洋新婦過臺灣」系列報導《聯合報》得獎，突顯了臺灣社會新一波移民潮的盛況，以及所引發的社會文化、人權議題相關思考，這也是外配風潮在臺灣持續多年，規模已達相當數量之後，第一次有從多元文化角度探討此一議題的作品得獎[18]； 2006 年「從林明樺案看媒體報導綁架新聞的脫序演出」，探討新聞記者在採訪綁架案中的工作倫理，強調新聞界應有自我反省意識。這讓人回想起 1997 年臺灣發生令人髮指的白曉燕綁架案，當時臺灣新聞媒體爲搶先報導，不顧人質安危的離譜作爲令人髮指，隔年《聯合報》以「引導改變白曉燕案兇嫌陳進興行爲取向並進行損害控制」社論系列獲曾虛白評論獎，多少反映了這個重大的社會事件。但罪犯之外也該被糾正的新聞論理問題的相關作品，直到 9 年後才在新聞獎得獎作品中出現；2007 年「中國傾銷下的傳統產業調查採訪」《中央社》，2008 年「中國變了，臺商大逃亡」《商業周刊》，都是從經濟活動角度，探討兩岸關係現實面的作品。對照同一時期其他兩個新聞獎的給獎對象，卓新獎明顯偏好具有趨勢性、前瞻性的作品，對臺灣的社會變遷也顯示出較爲敏銳的觸覺。

這一點也反映在其對新媒體科技所帶來的，記者工作型態與新聞生產位置的改變所做的調整與回應。根據其官方網站所公布的歷屆獎勵辦法發現，卓新獎從 2008 年開始在平面類的給獎中，開始接受只刊登於專業新聞網站（沒有紙本發行）的作品參賽[19]。2010 年，作品主要發表於網路媒體，並以「獨立媒體記者」身分參賽的前《聯合報》環境記者朱淑娟，以「中科四期」的徵地風波獲頒「即時新聞獎」，是臺灣自有新聞獎以來，第一位沒有所屬媒體機構的自由撰稿人獲

17 「反核就是反獨裁」是早期反核電運動中重要的口號，其對核電廠賴以營運的跨國採購黑箱與科技官僚體系的共犯結構不斷提出尖銳的質疑與挑戰，而發展核電與發展核武之間的技術可跨越性，以及核廢料儲存所牽涉到的蘭嶼達悟族生存權利問題，都讓反核電議題從一開始的複雜性就遠超過單純的環境議題。

18 之前的另一件相關議題得獎，是曾虛白新聞獎 1988 年頒給「國內同鄉會大量出具不實之華裔單身證明，掩護東南亞國家女子來臺結婚並設籍定居」，揭發外籍新娘弊端的作品，跟「南洋新婦過臺灣」的角度完全不同。

19 曾虛白新聞獎從 2009 年開始連續 4 年由卓新獎基金會承辦，同時也開始納入網路新聞作品。吳舜文新聞獎則目前仍不接受純網路新聞作品參賽。

airiti

得新聞獎肯定，她同時也獲得由卓新獎基金會受託頒發的曾虛白先生新聞獎中的「公共服務」獎項，她的獲獎在當時造成了不小的轟動[20]，也在主流媒體經營的思考，已被商業化市場機制逐步占領的新聞媒體生態下，攻下了一座保衛新聞專業陣地的灘頭堡；2013 年，「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的汪文豪、林慧貞以「揭開僞米粉真相系列調查報導」獲得 2011 年開始設立的「調查報導獎」。由於汪文豪等人是以新聞網站方式來推動結合友善環境概念、產銷公平義理的新飲食文化運動[21]，相當程度突破了以往記者工作形態的框架，「調查報導」雖是傳統的新聞文類，但結合運動理念的新聞網站對傳統主流媒體卻是具顛覆性的，汪文豪等人的得獎，再度顯示卓新獎對充滿實驗性質之新媒體與作品的勇於肯定。

在與意識形態關係最明顯直接的評論獎方面，卓新獎頒發 12 屆以來，除了兩屆從缺，共頒出 10 個評論獎，其中《工商時報》社論獲獎 6 次，分別由康復明（1 次）、曾巨威（3 次）、于國欽（2 次）3 位主筆獲獎。曾巨威以財稅學者專業，撰寫的都是與稅制公平與改革相關的議題，康復明、于國欽則都是在財經專業報紙的社論版面上，就宏觀的層面對政府施政提出批評與諍言。而除了 2003 年由《經濟日報》于趾琴獲獎，其餘則由中時報系的《中國時報》獲獎（見表 1）。倪炎元（2002）談言論自由，夏珍（2009）檢討二次政黨輪替後的馬政府施政。這些得獎社論主要是站在批評當時執政者的立場（不論是民進黨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強調媒體應監督政府的評獎標準不言可喻。2013 年，由網路媒體「苦勞網」主筆孫窮理獲獎，孫窮理在「《服貿》爛透了？沒錯！這就是『自由貿易』」一文中，以左翼立場大批兩岸服貿協定不利勞工的反民主本質，不論在媒體通路或寫作風格上都與傳統社論有明顯差別，也讓新聞獎評論獎的評審標準出現不同於以往的位移。

五、從得獎作品看社會期待

幾乎沒有例外，新聞獎通常都會對參與角逐獎項的新聞記者及其作品提出新聞專業意理的要求，而這些專業意理主要是在新聞教育機構中被傳授與再生產，並透過在新聞專業教育機構中傳授這些意理的學者們參與新聞獎的評審陣容來發

20 在同一年的卓新獎得獎名單中，還包括朱淑娟與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製作團隊合作拍攝的「水的難題系列報導」（電視類專題新聞獎），一人同時獲得 3 個獎，相當受到矚目。參見新聞報導網頁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448734

21 關於「上下游新聞市集」的介紹，參見其網站網頁 https://www.newsmarket.com.tw/aboutus/

airiti

年／屆	得獎人	發表處	獎項	作品名稱
2002／1	倪炎元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超越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對立的迷思。
2003／2	于趾琴	《經濟日報》	新聞評論獎	一往無前：金融改革可調整但不可停。
2004／3	從缺			
2005／4	康復明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政治紛擾不斷，苦日子難免再來。
2006／5	曾巨威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最低稅負制與稅改的持續動能。
2007／6	從缺			
2008／7	曾巨威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推動本土性的稅改與 EITC。
2009／8	夏珍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漫畫）獎	舉步蹣跚的「二次政黨輪替」一周年。
2010／9	曾巨威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漫畫）獎	財政改革須要宏觀與創意。
2011／10	于國欽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漫畫）獎	政府施政準則應置於社會正義的基礎上。
2012／11	于國欽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治國之本在熱情而不在數字。
2013／12	孫窮理	「苦勞網」	新聞評論獎	《服貿》爛透了？沒錯！這就是「自由貿易」。

表 1：卓新獎平面類新聞評論獎歷屆得獎者及得獎作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四整理而成。

揮影響力[22]。所以不論是民國初年馬星野等人從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移植但加以「中國化」，並於 1949 年之後沿用到臺灣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或是他的得意門生，在明尼蘇達及史丹佛大學受過美式新聞教育薰陶，並撰寫臺灣第一本「大眾傳播理論」教科書，也擔任過政大新聞系主任的徐佳士所強調的新聞記者除採寫的專業能力（報導能力），還應有專業自主權（報導權力）這樣的新聞專業意理（徐佳士，1997：61-64），似乎都在某種程度上對各個新聞獎的評審結果起了作用[23]。

22 各新聞獎慣例都會邀請傳播學者擔任評審，卓越新聞獎的歷屆評審名單都公布在其官方網站，曾虛白、吳舜文、金鼎獎的評審陣容也都會在每屆頒獎典禮上公布，傳播學者從未缺席（關於金獎的評審部分，可參見〈歷年金鼎獎評審名錄〉，行政院新聞局，1996：170-172）。本文並未特別討論新聞獎的評審團組成，一方面是因為除了卓越新聞獎有完整的歷屆評審名單之外，金鼎獎只有一個依姓氏筆畫排列的歷屆評審名單（而且是全部各類獎項的總名單，不僅是新聞獎部分），曾虛白、吳舜文的歷屆評審名單也尚無法完整蒐集；另一方面則著眼於以下的推論：新聞獎的給獎方向固是由評審團決定，但評審團的組成與聘任卻是由給獎單位決行的，因此給獎單位的各種思考與意向會決定評審團的組成成分與特性，並進一步影響給獎的結果。但即使有政治立場上的偏好與考量，對新聞專業義理的發揚，仍是各個新聞獎希望被外界認同的標準。

23 參見〈徐佳士：新觀念的創造者〉（楊蒨蓉，2012）。

airiti

不過另一方面，即使是由西方（主要是美國）引進的專業意理，其內部亦有分歧與爭論，其中最主要的是新聞記者究竟應是冷眼觀察的「中立者」？還是推動某些價值與理想的「鼓吹者」（李金銓，2005：36-48）？而後者又牽涉到「鼓吹什麼？」的問題。在美國社會中，採「中立者」態度的記者多於「鼓吹者」（同上引：39），但臺灣的狀況顯然不同，至少就獲得新聞獎的記者來看。不論是《中國記者信條》中對「增進民智、培養民意、領導民意、發揚民氣」的自我期許，或者曾虛白「三覺論」要求記者應擔任政府與人民間的橋梁；或如李金銓所指出的，「報人報國」、「文人論政」是中國自有報業以來的基本特色（李金銓，2011），甚至是吳濁流所說的以「社會的木鐸」自許，這些新聞獎得獎作品背後，幾乎都隱含有「記者該對社會做出某些貢獻」的前提。

問題是，如果記者的報導或評論不只是爲政策做宣傳、辯護，還試圖指出問題、匡正時弊，通常很容易衝撞政府，在政治權威與合法性不容挑戰的狀況下（尤其是臺灣政治解嚴前的階段），頒發新聞獎時要如何調解專業意理與政治上必要的限縮（尤其對官方或半官方新聞獎而言）？於是食品安全、公共衛生、環境生態、弱勢扶助這些既能表現社會關懷、媒體言責，但又不至於直接挑戰權力核心的議題便成上選。但在評論獎的給獎上，意識形態與立場的問題就很難迴避，如果官方新聞獎基於新聞專業意理的考量，也想強調新聞工作者的獨立性與專業角色，不想看起來像是政府施政的傳聲筒或應聲蟲，但又不願意忤逆當道，頒給財經議題便成爲一個適度繞路迴避的好辦法。這可以解釋官方新聞獎（金鼎獎）的評論類獎項對財經專業議題的偏好。但在無法迴避的狀況下，官方新聞獎評論獎的給獎，仍會傾向符應曾虛白「三覺論」的，對既有政治、社會秩序採肯定與維護立場的作品（見表 2）。

前面曾經提到過，卓越新聞獎的評論獎項也出現經常頒給財經議題的傾向，這種表面上的相似如果細膩的再分析下去，會發現其原因與金鼎獎不盡相同。卓新獎不是官方新聞獎，但與官方的金鼎獎相同的考量是，卓越新聞獎同樣不希望在給獎方向上被認爲具有特定政治立場。但與金鼎獎不同的是，當有政治性議題獲獎時，金鼎獎的選擇是傾向親官方立場的，卓新獎的選擇則是站在批判執政者立場的（見表 1）。最早頒發的曾虛白新聞獎直到 1997 年才開始設置新聞評論獎，依目前蒐集到的資料，頒出的評論獎共有 7 件（見表 3），其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的突出表現，在上文中已經有過分析。

有趣的是，由企業獨資贊助的吳舜文新聞獎，在評論獎的給獎上反而是在幾個新聞獎中最不迴避政治性議題的。扣掉從缺的 7 次（見表 4），共頒出 18 個

airiti

年	得獎人	發表處	獎項	作品名稱
1980	王作榮	《臺灣日報》	評論獎	「調整油電價格爲明智的措施」等 7 篇。
1980	楊乃藩	《中華日報》、《中央日報》	評論獎	「團隊精神」等 135 篇。
1980	楊選堂	《聯合報》	評論獎	「從經濟的角度看當前國是專輯」共 10 篇。
1981	王作榮	《中國時報》	評論獎	「何不對重要公營事業做一貫徹底體檢」等 24 篇。
1981	呂夢顯	《青年戰士報》	評論獎	「以新作法、新精神迎接挑戰的十年」等 23 篇。
1981	楊乃藩	《中國時報》	評論獎	「肯定建國七十年乃是三民主義勝利的年代」等 25 篇。
1982	吳啓仁	《大華晚報》	新聞評論獎	「大眾傳播事業絕非特權階級」等 20 篇。
1983	楊乃藩	《中國時報》	評論獎	「迅速成立民間組織推動法律扶助工作」等 10 篇。
1984	彭垂銘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對政府財經施政之評析」等 10 篇。
1985	彭垂銘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政府負責，大眾冷靜」社論等 10 篇。
1986	楊乃藩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中秋節不補假不合情理」等 21 篇。
1987	石齊平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必須以新陣容、新做法來迎接自由化的時代」等社論 10 篇。
1988	楊乃藩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翟宗泉首席爲司法尊嚴做了最佳詮釋」等 10 篇。
1992[1]	彭垂銘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經濟的良心。
1993	盧世祥	《經濟日報》	新聞評論獎	當前經濟建設的全方位努力。
1994	無資料			
1995	康復明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加強法制建設以改善工商投資環境。
1996	從缺		新聞評論獎	
1997	康復明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期勉政府提升效能履踐經世濟民責任」系列評論。
1998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兩岸關係的戰略思維。
2000[2]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從「臺獨公投」到「統一公投」——對民進黨轉型工程的看法。

表 2：金鼎獎新聞評論獎歷屆得獎者及得獎作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二整理而成。

註：1. 1989-1991 連續 3 年未頒發評論獎，是該 3 年間未設評論獎項或係給獎從缺，在所獲得的資料中並未顯示。

2. 因政府會計年度起迄時間調整，1999 年未頒發金鼎獎。

評論獎，其中只有 4 次是頒給經濟議題（愛國獎券與票據法、創建臺灣經濟現代化的架構、金融改革、租稅改革與最低稅負制），其餘 14 次給獎中有 5 次是與兩岸關係相關的議題（其中有 4 次是由《聯合報》主筆黃年獲獎，一次是由《工商時報》主筆石齊平獲獎），其餘 9 次則分散爲時政批評、政策建言、言論自由

airiti

年／屆	得獎人	發表處	獎項	作品名稱
1997／23	《聯合報》言論部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關懷民生問題，服務社會公眾」重視民生社會問題，符合公共服務目標。
1998／24	黃年、羊憶蓉、王麗美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引導改變白曉燕案兇嫌陳進興行爲取向並進行損害控制」。
2003／29	張瑞昌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追擊港都賄選風暴。
2005／31	何榮幸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
2006／32	江春男	《蘋果日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蘋論：司馬觀點」。
2007／33	杜震華	《臺灣時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追求臺灣教育的真善美」。
2008／34	康復明	《工商時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擘劃建設美麗家園系列社論」。

表 3：曾虛白新聞獎新聞評論獎歷屆得獎者及得獎作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一整理而成。

等方面。這樣看起來，大企業獨資贊助的新聞獎，在政治上似乎相對的較不怕被外界貼標籤，更不諱言主辦單位的立場與觀點。2012 年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卻又突然宣布從當年開始停頒評論獎，由於新聞評論獎是新聞獎的基本文類，其中的考量還需要進一步探究。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臺灣新聞獎的生態起了明顯的變化，除了官方的金鼎獎停頒，屬民間財團法人的卓越新聞獎繼起，在給獎方向上明顯不同於其他歷史較久的新聞獎之外，如前所述的，曾虛白新聞獎也多次出現與之前相當不同的給獎取向，得獎作品的政治光譜相較過去大爲放寬。唯獨由單一企業支持的吳舜文獎，受政治環境變化的牽動較不直接，給獎取向的變化也較不明顯。如果說新聞獎的給獎標準，代表社會對記者專業角色的期待，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發現，不論是從新聞獎的生態結構，或從實際的給獎取向來觀察，2000 年都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在這裡提供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模式是：從各新聞獎的評審團都一定會納入新聞傳播學者來看，新聞專業主義透過引進西方新聞專業意理的新聞高等教育機構及其人員（及擔任新聞評審的新聞傳播學者），很可能從一開始就以其高度正當性，試圖對新聞獎的給獎產生影響（如果假設新聞高等教育機構教師都會以新聞專業意理的捍衛者自居的話），但在臺灣政治解嚴，甚至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不時可以看到專業意理讓位於政治正確的給獎選擇，更常見的是，爲了避免內部新聞專業意理與外在政治結構限制的衝突，新聞獎的給獎傾向

airiti

年／屆	得獎人	發表處	獎項	作品名稱
1986／1	楊乃藩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1. 請停止愛國獎券發行以遏賭風。 2. 迎接正確使用票據時代的來臨以上等 120 篇社論。
1987／2	王作榮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昔也病在法度，今也病在紀綱」論處理當前局勢之道。
1988／3	石齊平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經濟力、社會力、政治力——我們對臺灣政經社體制改造的觀察」等 16 篇。
1989／4	彭垂銘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爲明日的政經大國紮穩根基——「經營李內閣的第一要務」等社論 10 篇。
1990／5	汪彝定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喁喁集——「一位新聞評論者對國家社會進步的關懷」。
1991／6	傅棟成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消弭亂象開創國家新局。
1992／7	盧世祥	《經濟日報》	新聞評論獎	創建臺灣經濟現代化的架構。
1993／8	石齊平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臺灣內部評論•大陸方面評論•兩岸關係評論。
1994／9	鍾俊文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金融改革。
1997／12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修憲，不可毀憲」系列社論 15 篇。
1998／13	從缺		新聞評論獎	
2000／15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政黨輪替的憲政轉型。
2001／16	林河名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等待法治國——司法、立法、及政治的異象與糾結。
2002／17	從缺		新聞評論獎	
2005／19	曾巨威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租稅改革與最低稅負制。
2006／20	倪炎元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言論自由沒有讓步的空間。
2008／22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第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
2009／23	黃 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請君入甕或與卿共舞。
2010／24	于國欽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動盪的內閣、消沉的文官、停滯的經濟。
2011／25	黃 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統一論」與「連結論」。

表 4：吳舜文新聞獎新聞評論獎歷屆得獎者及得獎作品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附錄三整理而成。

註：1. 根據吳舜文新聞獎官網公布的「獎項變革歷程」（http://www.vivianwu.org.tw/01-1.php），該新聞獎一直都設有新聞評論獎，但從同樣整理自其官網的上表可以發現，第 10、11、13、14、17、18、21 屆都沒有評論獎的獲獎資料，其中並僅有 13、17 屆明確標示從缺，依其「獎項變革歷程」推論，其餘沒有資料部分應該也是從缺的情形。

迴避政治性議題，轉而選擇環境生態、公共衛生、民生消費等較不會甘犯政治正確的議題。

2000 年之後，藉由臺灣一黨執政政治格局的被打破，新聞獎中試圖凸顯新聞專業意理的部分，才有機會順勢衝破過去的種種政治限縮考量，記者做爲社會

airiti

警鐘與木鐸的角色，終於可以真正超越「爲先覺覺後覺」的政府政策附隨或宣導者角色，開始盡情揮灑。甚至在新崛起的新聞獎的給獎方向上，更進一步的出現以給獎來鼓勵新聞工作與社會改革運動結合的趨勢。

肆、新聞工作者對自身角色的理解

前面都是從新聞獎給獎方向來談主流社會對記者所應扮演之專業角色的期待，接下來則要從記者自身的角度來看，這些曾經獲得新聞獎肯定的記者們，對自己專業角色與社會責任的體認，與新聞獎給獎標準間的符應或落差。以及在不同時期，不同世代的新聞記者（或主筆）之間，出現了哪些變化？下面將選擇幾個較顯著的例子來說明。

一、符應與落差

曾經長期受《聯合報》第一代老闆王惕吾重用，長期撰寫《聯合報》社論的楊選堂（筆名楊子，1921-2011），或可做爲第一代得獎者的代表之一[24]。他是在金鼎獎第一次頒新聞獎項（1980）時就獲頒評論獎，得獎作品爲「從經濟的角度看當前國是專輯——在國際經濟危機中開拓我經濟新境」社論共 10 篇，於 1980 年 4 月 22 日到 5 月 1 日間連續刊登。當時「美麗島事件」才剛發生 4 個多月，4 月 18 日，軍事法庭宣判受審的施明德等 8 人通通有罪，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楊選堂的 10 篇社論在這時刊出，說是從經濟角度討論政治問題，但其實是試圖在美麗島事件後，把島內長久積聚的政治不滿，轉以「拚經濟」來化解，希望轉移焦點、穩定人心，他在開題中寫道：

> 自從高雄發生「美麗島」暴力事件後，國人對於政治問題都很關懷……其實，這都是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表象。政治問題，在經濟的角度上看，不外乎兩種形態：一是因社會的貧窮衍生政治的動亂不安，一是因社會的富庶激發政治參與的衝擊。我們目前的情形，非前一形態而係後一形態，但是，由此可見，政治問題的正本清源，便是經濟問

24 楊選堂於 1967 參與聯合報系《經濟日報》創報，1970 年擔任《聯合報》總主筆，1975 年任《中國論壇》社長兼發行人，1987 年任《聯合晚報》創刊發行人兼總主筆。1990 年，再升任《聯合報》社長，並兼任《聯合》、《經濟》、《聯晚》三報總主筆。1993 年，轉任《經濟日報》副董事長至退休。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8A%E9%81%B8%E5%A0%82

airiti

題。……「美麗島雜誌社」那一批人使用暴力掀起社會動亂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主要的是他們錯誤估算了社會大眾的政治認識與心態……大眾在享受經濟發展的惠益中，會不期然的認識到經濟發展的政府功能與政績；因而對於顛覆政府及「臺獨」的荒謬宣傳，都會作自由獨立的判斷，產生了對那些荒謬宣傳的免疫性。（楊選堂，1980 年 4 月 22 日）

社論中反映以「經濟惠益」來鞏固一黨專政政權的統治邏輯，忽視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背後錯綜複雜的歷史文化與社會因素，對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欠缺同情。如果說社論反映的是報社立場，專欄應更能表達個人觀點，楊選堂曾經在專欄文字〈重視輿論〉一文中，批評有些短視的公務員不夠重視輿論，認爲輿論批評會影響海內外觀感，不利反共鬥爭，他指出這是「倒果爲因」，其實輿論的作用「是在高揚公意與民權中，加強海內外團結的一種精神動員；也正是提高政府威信，和號召力量的媒介」（楊選堂，1976）。這種說法雖然相較於「三覺論」已見精緻，但顯然在他心目中，輿論仍被納入爲政治動員的工具。

與楊選堂同年獲頒金鼎獎新聞評論獎的《中國時報》主筆楊乃藩曾經回顧：

臺灣於光復後 3、40 年中，因處境艱難，報社及執筆者為顧全整體利益，對於題材的選擇及評論的尺度，都有所規範。因此多數社論，都有「溫吞水」似的感覺，……如今民主政治，日趨落實；言論自由，倍見發皇。社論寫作，當然又要進入另一境界了。（楊乃藩，1996）。

楊乃藩在 1996 年的這一番坦誠不諱，透露在戒嚴時期，報社主筆即使有不同的想法，礙於當局言論尺度與報社整體經營，乃不得不自我設限。這個狀況也可以用在同輩評論家張繼高（1926-1995，筆名「吳心柳」）身上。

張繼高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科班出身，1949 年初到臺灣時，曾因爲「李朋匪諜案」做過 3 個多月的牢（郭冠英，1996：142-143）。王惕吾慎重其事的延攬他擔任《民生報》總主筆，主導報社言論立場（張佛千，1996：20-21），但私底下他卻對執政黨不盡認同。張繼高生前處事爲人受到新聞圈內外許多俊彥之士的一致推崇與景仰，他與後進記者楊憲宏私交甚篤，經常相談甚歡，楊憲宏回憶，張繼高曾經在好友相聚時，給他寫過一段遊戲文字：「秋高氣爽，好友來訪，齊聚一堂，罵國民黨」（楊憲宏，2004：6）。張繼高也得過金鼎獎（1984 年），

airiti

但得的是「副刊專欄獎」（聯合副刊「未名集」）。楊乃藩與張繼高的例子，反映出解嚴前的臺灣社會，新聞工作者對自身工作的理解與專業追求，是會與其客觀環境所容許的表現尺度存在落差的[25]。

二、批判與衝撞

楊憲宏比張繼高晚一個世代，也是他的忘年之交，他的得獎紀錄相當輝煌（4 次曾虛白獎、2 次金鼎獎），在當時新聞同業中頭角崢嶸可見一般，但得獎作品都是與環境、食安、消費者權益有關的報導，其實他最有文采與見地的作品應屬評論，但依照前述所分析的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的新聞獎給獎邏輯，評論獎是無份的。他 1989 年爲昔日《聯合報》同事、駐韓特派員朱立熙的韓國研究專著《漢江變》一書寫序時曾經提到朱立熙具有一種「『不受歡迎』的不妥協記者氣質」（楊憲宏，1989：1），而「不與現狀妥協」似乎也是他對記者工作的自我理解：

> 日日工作之後，看一篇篇登出來的報導，心中難免會沉思，這些文字，有多少是可以留下來傳世的？許多批評者常說，報紙文章盡是「一日文學」，記者捕風捉影的報導，有若生猛佳餚，隔日便索然無味。這是多麼嚴厲而穿透的批判。一名記者有可能汲汲營營一生於文字工作，到頭來什麼也不留，甚麼也不值得留。就這樣的過一生，能夠沒有半點遺憾嗎？幾年來，這樣的理念一直如針刺背，驅動著我去面對殘酷現實。（楊憲宏，1987：2-3）

他對記者工作懷抱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知識分子是架接刺激的橋，是引導、啓蒙民眾關心社會的燈。社會大機器如果沒有知識份子雷、火衝擊，很容易懈怠，許多應解決的問題，變成懸案……」（楊憲宏，1986：115），但也一度充滿知識分子經常具有的挫折感與焦慮：「『你無法對抗整個體系』這句話，強烈地震撼著我。難道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竟是同樣的困局：『一個不可能對抗的

25 張照堂有一段文字可以印證當時的政治氛圍，以及記者必須時時注意工作中政治風險的狀況。1971 年張繼高擔任中視新聞部經理，親自率領包括張照堂在內的轉播小組到美國威廉波特轉播世界少棒錦標賽的冠軍賽（中華巨人隊對美北區蓋瑞隊），當時球場上空，出現海外臺獨人士雇用直升機拉起「臺灣獨立萬歲」布條，張繼高在現場及時阻止了轉播車向空中取鏡，讓轉播小組逃過一次政治災難（張照堂，1996：164-165）。

airiti

體系』？」[26]（同上引：116）楊憲宏字裡行間對於被經濟發展犧牲的臺灣生態環境千瘡百孔、不堪聞問之慘境的痛切與焦慮，相較於 1950 年代《報學》雜誌所倡議的「反攻大陸新聞學」，記者楊憲宏在 1980 年代，對自身角色、任務及與所處環境間之關係的體認，顯然已是另一番光景。

但當時政治尚未解嚴，新聞媒體仍處在外在監控或自我檢查階段，對新聞專業意理有堅持，與對己身專業角色有期許的記者，在賺取薪資的主流媒體版面上往往無法呈現想呈現的新聞報導或評論內容，一小部分懷抱新聞專業理想的少壯自由派記者，私底下常爲當時的黨外雜誌寫稿。李金銓分析這種狀況認爲，由於臺灣的新聞教育是從美國整套輸入的，新聞自由與專業主義在這套專業意理中被視爲天經地義，但矛盾的是，也受這套意理浸淫的臺灣記者們卻不敢、也無法在解嚴前真正的政治現實中將其付諸實踐，替黨外雜誌寫稿，遂成爲將矛盾化爲統一的出路：「他們生活在兩種似乎彼此隔絕的經驗中，爲所屬的有錢媒體寫「恰當」的稿子賺取生活所需，同時也爲沒錢的黨外雜誌寫稿來安慰自己的良知。」(Lee, 1993: 31)。

林照真則是另一種例子。但因爲入行較晚，與楊憲宏要對抗戒嚴體制不盡相同，她所面臨的，是政治威權鬆綁之後，商業與政治力量無孔不入的「置入性行銷」。她以「達賴向返鄉採路」、「顫慄土石流」兩個題目得過兩次吳舜文獎（1999、2003），在《中國時報》向來以深度報導、調查報導見長。2003 年得獎後不久，她離開《中國時報》轉往《天下雜誌》任職，2005 年 2 月並在《天下雜誌》第 316 期發表〈誰在收買媒體？〉一文，揭露平面與電視媒體（包括她的老東家《中國時報》）近年來出賣新聞版面、接受政府預算廣告置入的種種失格作爲（林照真，2005）。並在那一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的一場「置入性行銷中，新聞與廣告的楚河漢界」座談中，與《中國時報》總經理黃肇松正面衝突，黃肇松坦言報社經營困難，很難侈言理想，並指出林照真當年在《中國時報》也曾參與內政部付費合作的家暴專題，反擊意味濃厚，林照真當場淚灑會場（沈伶鎂，2005 年 7 月 15 日）。林照真的眼淚，再度傳達了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往往必須隻身與體制對抗的無奈，不論其所面對的是威權高壓式的政治體制或攏絡滲透式的商業體制。

26 楊憲宏在這裡所指稱的「知識分子」，應可以被理解為不受限於自身階級利益與專業屬性侷限，經常在社會變動過程中扮演啟蒙、催化、領導作用的社會群體。黃順星在討論新聞記者角色轉變的《記者的重量》一書中，對「知識分子」意義的流變與分歧有專章討論（黃順星，2013：49-91）。

airiti

以上所舉的幾個例子中，除了楊選堂未顯示出自我角色掙扎，其他幾位顯然都對其所處的新聞媒體現況感到不滿，他們都已經獲得代表體制認同的新聞獎的肯定，但他們對體制現狀卻相當不滿意，也不認爲自己的專業角色在獲獎的當時已經獲得充分的實現，或專業上的理想獲得伸張，藉此凸顯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2000 年以前），新聞獎的給獎對記者專業角色所訂的標準其實有別於，或者說落後於記者對自我專業角色的期待。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希望能夠有更大的新聞報導或評論空間，能更直接有力的挑戰既有政治社會體制，遠超過那個時候新聞獎所願意給予肯定的程度。

三、不再依附於媒體機構——網路興起的催化

雖然 1990 年代，臺灣的新聞自由已有長足進步 (Rampal, 1994)，但由於官方新聞獎與半官方新聞獎的組成結構尚未改變，所以必須等到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政治力對新聞獎的影響才明確走向式微。不過在這個階段，市場經濟的牽引力，已經繼過去的政治控制，成爲影響記者在新聞工作上發揮專業主義的最大障礙。除了把新聞當商品販賣的「置入性行銷」橫行，嚴肅的公共議題不敵軟性八卦攻占版面，以浮面現象的報導取代對結構性問題的呈現是常態。要掌握結構性問題，記者非有點功力與對新聞工作的堅持不可，但資深優秀的記者對面對市場競爭的媒體機構來說，往往成本較高，不利獲利。所以政治解嚴以後，媒體記者的專業堅持面臨了另一種危機，威脅不再來自黨國機器的控管與監視，而是來自他們所堅持的工作方式，無法替老闆賺最多錢，無法讓自己「物超所值」。於是出現對新聞專業理想有堅持的優秀記者紛紛從媒體機構中流失的現象 [27]。拜網路興起之賜，這些爲數不多，但表現亮眼的一小群新聞工作者，因無法忘情記者工作的初衷，開始以架設網站、個人部落格、發行電子報的方式繼續經營他們的新聞志業，這種打破過去傳統，記者工作不再依附於媒體機構的模式，並不是只有在臺灣出現，歐美國家的先例已有許多 [28]。但對新聞獎的給獎來說，應該如何看待這股新興的趨勢，則是一個需要回歸給獎基本核心價值的關鍵抉擇。

---

27 根據羅文輝的研究，2004 年的調查數據已經顯示，許多經驗豐富的記者因為新聞自主性不足、薪水太低、對所服務的媒體機構評價不高、工作滿意度偏低而想要離職（Lo, 2012）。

28 這種「一人媒體」在 1950 年代的美國就已經開始出現。1953 年，曾擔任過紐約時報記者的 Isidor Feinstein Stone（史東）創辦紙本的《史東周報》（*I. F. Stone's Weekly*），對抗當時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與種族歧視（http://en.wikipedia.org/wiki/I._F._Stone）。1996 年以電郵寄送方式發行的《爪舉報導》（*Drudge Report*）則因率先報導柯林頓與白宮實習生魯文斯基的性醜聞而聲名大噪 (Russell, 1998)。

airiti

面對這個新的發展，2002 年才開始頒發的「卓越新聞獎」，從 2008 年開始決定依照其「促進新聞倫理，獎勵優秀新聞人才，提升新聞品質」的給獎宗旨，將「專業新聞網站」的作品納入評選[29]，2010 年並首度將獎項頒給經營個人新聞部落格的朱淑娟，而且是一人同時獲得 3 個獎（平面類即時新聞獎、電視類專題報導、曾虛白公共服務獎）[30]，一時在新聞圈內蔚爲話題。而在同一年的稍早，美國普立茲新聞獎也首度頒獎給由專業新聞網站所產出的作品[31]。

朱淑娟在 2009 年 3 月被《聯合報》資遣後，決定成立自己的「環境新聞」部落格，長期在主流大報工作，剛開始時她面臨身分適應的困難，時常自我懷疑：「部落格主可以是記者嗎？爲什麼可以採訪？」當時她每天面對鏡子反覆練習：「我是『環境報導』朱淑娟、我是『環境報導』朱淑娟……」。才逐漸適應新身分。她策略性地先擔任非主流媒體的特約記者，並漸漸讓官方知道她的新身分，甚至開始習慣看她的部落格。當部落格小有名氣後，她開始與電視臺、雜誌社合作，文章內容遍及《商業週刊》、《天下雜誌》等國內知名平面媒體。但在跟這些媒體合作時，朱淑娟堅持報導內容不接受刪改，以此來保有報導的獨立性（陳韻涵，2013）。

2013 年，曾擔任《聯合報》、《天下雜誌》記者的汪文豪，與合作夥伴林慧貞，以「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的「揭開僞米粉真相系列」報導獲頒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同年稍早，他的另一件作品「埔里小農與瓶裝水工廠的戰爭」獲得「臺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新聞媒體組公民記者組（含網路媒體）首獎[32]。「上下游新聞市集」是由幾個不滿當前新聞媒體環境的記者所創立的，他們共同的想法是：以專業記者的專題報導方式，建立一個關注農業、食物與環境議題的網站，主動進行農產品開發，提供友善土地、有益健康的在地農產品、食材相關

29 依據 2008 年第 7 屆卓越新聞獎獎勵辦法：「因網路普及化，網路媒體日益蓬勃發展，成為閱聽人重要的新聞管道，為因應此一趨勢，第 7 屆卓越新聞獎決定開放專業新聞網站之新聞從業人員參賽。所謂專業新聞網站，為以新聞採訪、編輯、發布及評論等新聞工作為主要功能之網站但實習性質之學生報網站及 user-generated content（使用者產生內容），如 YouTube、WIKI、部落格等不在本獎獎勵範圍」（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47）。同年稍晚，普立茲獎才公布將純網路媒體納入評選（http://www.pulitzer.org/new_eligibility_rules），顯示臺灣在這件事上做得比普立茲獎還早些。

30 2010 年的「曾虛白先生新聞獎」係委託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頒發。

31 2010 年 ProPublica.org 新聞網站記者 Sheri Fink 以〈紀念醫院的死亡抉擇〉（關於卡翠娜風災中一座醫院對於是否撤離病患所做的處置）獲普立茲調查報導獎，該作品是由 ProPublica 與《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合作。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曾全文譯介此作品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7/index.php?storytopic=133

32 該獎在 2013 年改由「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對「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金會」以冠名贊助方式頒發。

airiti

訊息，兼具網路交易平臺功能，活絡小農經濟，希望從改變消費文化與消費行爲，進而成爲促成相關制度結構改變的力量[33]。這些溫和的訴求，卻是有別於以往的創性的媒體通路來進行的。將專業新聞工作與強調自然健康、友善環境的消費者運動合而爲一，記者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同時，也在做社會運動，包括汪文豪在內的幾位創辦人，他們對自己所應該，以及可以扮演的專業角色的理解，顯然又已經不同於他們的前輩們，而這樣的專業實踐，很快就獲得了新聞獎（卓越新聞獎）的肯定與鼓勵。

2013 年獲得卓新獎新聞評論獎的孫窮理，用報導及評論來做社會運動比汪文豪更早，他在 1997 年闢建「苦勞網」時，就以「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來爲這個新聞網站下註腳，之所以是「媒體的運動」，可以從以下一段引文來解讀其思考：

> 我們的角色、定位，在這新的環境當中究竟還能是什麼？我們或許不容易寫出最快的即時報導……。不過，當訊息越來越碎片化，人們快速閱讀又健忘，每一件曾經發生過的事也都可以彷彿從未發生過，於是事事皆成新聞。或許，我們還能堅持講一些該講的話，在單點的時間切片中整理具有歷史延續性並真正可供辨認的「事件」。（王顥中，2014 年 1 月 6 日）

之所以是「運動的媒體」則可以從 2007 年「苦勞網」獲頒卓新獎「社會公器」獎時，卓新獎官方所發布的新聞稿內容來理解[34]：

> 「苦勞網」長期關注社會議題，使用網路媒體討論勞工、外籍新移民者、殘障者等弱勢團體在臺灣的社會適應及其問題，……相當程度上填補了當前主流媒體的若干資訊空檔。最近幾年並逐漸擴及人權、環保、文化議題的報導，並提供網路空間給數十個弱勢團體作為交換意見的平臺，重視弱勢者的傳播人權[35]。

---

33 參見「上下游新聞市集」網頁 https://www.newsmarket.com.tw/aboutus/

34 「社會公器獎」是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從 2005 年開始設立的獎項，不同於其他專業獎項依單一作品評獎，而是考察媒體機構長期表現。給獎宗旨強調媒體與公民社會互動：「為提倡公民社會，鼓勵媒體成為社會公共資源與公共論壇，促進大眾關心社會公義」（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4/article.php?storyid=65）。

35 摘自卓新獎基金會官網網頁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1/article.php?storyid=10

airiti

孫窮理說：「我們相信，發自於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集體自主的聲音和行動，才是改變這個社會的真正動力。和所有其他的媒體一樣，我們是有立場的媒體，不同之處，是我們從不以形式的公正客觀當作閃避我們社會實踐位置的藉口。」這段話可以代表他對自己記者角色的理解（苦勞社論，2007）。

相較於前 3 個 10 年的新聞前輩們，朱淑娟、汪文豪、孫窮理這幾位新聞獎得獎名單中的後起之秀，依舊懷抱著記者工作應推動社會進步、改革的理想，但顯然已經跳脫在主流體制內馴服或對抗的二元框架，進而思考以網路新聞游擊戰，結合社會運動能量，來顛覆主流媒體論述霸權的戰術與戰略。獲頒主流新聞獎所得到的社會聲譽，對他們來說可能比領報社薪水的前輩們更為重要，因為得獎光環這種社會資本，正是他們藉以轉換為持續實踐所需之經濟資本的有效籌碼[36]。

伍、結論

本文回顧臺灣 4 個主要的新聞獎得獎名單與作品，發現在 2000 年以前，新聞獎的給獎，雖也受專業意理的導引，但不論是官方（金鼎獎）或半官方（曾虛白）新聞獎，在給獎取向上，或對政治議題採取迴避態度，或傾向在當時政治正確的意識型態。由民間企業單獨支持的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對政治議題較不迴避，但也傾向對既有政治秩序的維護與肯定。在幾個新聞獎中，政治意識形態上批判官方立場的作品仍被排除於得獎名單之外，雖然 1980 年代之後，民間社會對記者專業角色的期待已隨島內民主化運動的發展逐漸轉變，記者對自我角色的理解也已經與過去不同，但新聞獎在官方與半官方的影響仍未全然鬆綁下，專業意理在新聞獎的給獎標準中只能選擇性的突破，而無法全面性的伸張。

於是在記者的自我角色理解，與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政治力對新聞媒體之間接控制與規訓的新聞獎給獎方向之間，逐漸出現了落差。但為了兼顧新聞專業意理，迴避給獎是在為政治服務的嫌疑，新聞獎給獎常常會刻意避開政治衝突性強的題材，轉而選擇財經、環境等對政治現狀挑戰較為間接的作品。得獎的雖然通常都是相對優秀的作品，但那些被新聞專業者認為最能反映當時臺灣社會之真實衝突與矛盾，凸顯時代脈動的新聞報導或評論，通常不會出現在新聞獎的得獎名單上。

36 雖然主要的原因不同，但與前面所提到的張繼高、楊憲宏與林照真等人一樣，朱淑娟、汪文豪、孫窮理對新聞媒體環境也相當不滿。但有別於前 3 位得獎的年代，新聞獎是在後面追趕著記者的新聞專業標準，並且明顯落後；後 3 位的獲獎則具有從側翼為其助跑的功能。

airiti

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上「結構」與「行動」的對張來理解這種現象，可以發現，在2000年之前，乘載國家政治力下向蔓延機制功能的新聞獎，作爲新聞記者所處政治社會大環境的結構，與記者個人或者經由新聞教育，或者在工作場域中透過與民間草根社會互動，以及不斷自我反省所醞生的個體實踐行動之間，已經明顯出現緊張與衝突。但這種緊張與衝突，必得等到結構出現鬆動後才能獲得解決。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是繼1987年政治解嚴之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的另一次大變局，政權更迭的衝擊，終於真正衝破了即使在政治解嚴之後，依然持續維持了好一段時間的新聞獎的給獎邏輯。拒絕繼續駐守主流新聞機構，尋求以個人媒體方式另創新聞專業舞臺的獨立記者；將新聞專業與社會改革理想熔冶於於一爐，自產自銷、自食其力的專業新聞網站經營者；甚至將專業新聞網站經營與社會運動倡議平臺合而爲一的另類媒體紛紛走上了新聞獎的舞臺，給獎結果的前瞻性，往往引發新聞同業與社會的紛紛議論。許多過去被政治或經濟現實壓抑的專業理想，甚至是實驗性的新聞專業實踐管道，透過新聞獎的得獎光環，獲得了可兌換的社會資本[37]。

整體而言，如同行動者在實踐中面對結構限制所經常會出現的緊張與拉扯，在2000年以前的臺灣社會，新聞獎的給獎邏輯在新聞專業意理的倡議與鼓吹上反而是落後於個別記者的專業自覺與社會實踐的；相反的，2000年之後，情況卻有點被翻轉過來，新聞獎可以透過發掘堅持專業意理或充滿實踐動能的非主流另類媒體及媒體工作者，加諸以新聞獎的輝煌桂冠，幫助他們在困難的現實條件中繼續前進，並藉以對主流媒體與主流媒體中的新聞工作者產生衝擊、刺激反省。如果這是肯定新聞媒體作爲社會第四權者對一個新聞獎的正當期待，那麼目前的發展方向確實是令人期待的。

參考書目

王洪鈞（1967）。〈發展中的中國新聞自律〉，《新聞學研究》，1：150-156。

王顥中（2014年1月6日）。〈訊息碎片中連結歷史〉，《苦勞網》。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6862。

行政院新聞局（1996）。《金鼎獎二十周年特刊：民國六十五年～八十四年》。臺北，臺灣：作者。

37 如果把卓新獎基金會另外頒發的「社會公器獎」得獎名單納入來看，可以更清楚看出該新聞獎對具理想、進步性或兼之以實驗性媒體的支持與鼓勵（見附錄五）。

airiti

吳濁流（1995）。《臺灣連翹》。臺北，臺灣：草根。

———（1988）。《無花果——臺灣七十年的回想》。臺北，臺灣：前衛。

呂東熹（2010）。《政媒角力下的臺灣報業》。臺北，臺灣：玉山社。

李金銓（2011）。〈民國時期的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二十一世紀》，126：52-63。

———（2005）。《大眾傳播理論》。臺北，臺灣：三民。

李筱峰（1996）。〈從《民報》看戰後初期臺灣的政經與社會〉，《臺灣史料研究》，8：98-122。

沈伶錤（2005 年 7 月 15 日）。〈濫用置入性行銷媒體不認錯〉，《立報》。取自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7551

林照真（2005）。〈置入性行銷踐踏新聞公信力誰在收買媒體？〉，《天下雜誌》，316：120-132。

林麗雲（2000）。〈臺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張苙雲（編），《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頁 89-148。臺北，臺灣：遠流。

邱家宜（2012）。〈戰後初期臺灣報人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新聞學研究》，112：117-158。

———（2012 年 5 月）。〈從《報學》看 1950 年代台灣的「反攻大陸新聞學」〉，世新大學「2012 中國新聞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施信民（2006）。〈導言——臺灣環保運動簡史〉，施信民（著），《臺灣環保運動史料彙編》，頁 1-8。臺北，臺灣：國史館。

苦勞社論（2007）。〈「禮失求諸野」苦勞網在社會公器獎的獲獎感言〉，《苦勞網》。取自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1/article.php?storyid=12

徐佳士（1997）。臺灣〈失去冠冕的無冕王〉，徐佳士（著），《冷眼看媒體世界》，頁 61-64。臺北，臺灣：九歌。

張佛千（1996）。〈與君世世為兄弟〉，楊憲宏（編），《Pianissimo：張繼高與吳心柳》，頁 20-41。臺北，臺灣：允晨文化。

張淑雅（2001）。〈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231-290。

張照堂（1996）。〈行走的大樹〉，楊憲宏（編），《Pianissimo：張繼高與吳心柳》，頁 161-170。臺北，臺灣：允晨文化。

郭冠英（1996）。〈不屑贏的人〉，楊憲宏（編），《Pianissimo：張繼高與吳心柳》，頁 139-155。臺北，臺灣：允晨文化。

airiti

陳韻涵（2013）。〈我獨立的日子：朱淑娟的記者生活〉。取自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7/article.php?storyid=1184

報學編輯委員會（1951）。〈創刊辭〉，《報學》，1（1）：1。

曾虛白（1990）。《曾虛白自傳（下）》。臺北，臺灣：聯經。

黃順星（2013）。《記者的重量：臺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臺北，臺灣：巨流。

楊乃藩（1996）。〈金鼎人談金鼎〉，行政院新聞局（編），《金鼎獎二十周年特刊：民國六十五年～八十四年》，頁 78-79。臺北，臺灣：行政院新聞局。

楊倩蓉（2012）。〈徐佳士：新觀念的創造者〉。取自 http://comm.nccu.edu.tw/02_list_detail.php?sn=552

楊憲宏（2004）。〈自序〉，作者（編），《羊入狼群：知識份子文字的原力與本懷》，頁 3-8。臺北，臺灣：知本家。

———（1989）。〈代序〉，朱立熙（著），《漢江變》，頁 1-2。臺北，臺灣：時報。

———（1987）。〈前引——風吹雨打雪滿頭〉，作者（著），《受傷的土地：一個記者的公害現場觀察筆記》，頁 1-4。臺北，臺灣：圓神。

———（1986）。〈一個記者對環境生態的省思〉，作者（著），《走過傷心地：一個記者的公害現場觀察筆記》，頁 115-122。臺北，臺灣：圓神。

楊選堂（1980 年 4 月 22 日）。〈從經濟的角度看當前國是——在國際經濟危機中開拓我經濟新境之一〉，《聯合報》，第 2 版。

———（1976）。〈重視輿論〉，作者（著），《感情的花季》，頁 205-207。臺北，臺灣：聯經。

溫曼英（1993）。《吳舜文傳》。臺北，臺灣：天下文化。

葉榮鐘（1985）。《臺灣人物群像》。臺北，臺灣：帕米爾。

蕭同茲（1951）。〈運用自由・善盡責任——紀念三十九年第七屆記者節〉，《報學》，1（1）：31-32。

薛化元（1996）。《「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49-1960）》。臺北，臺灣：稻鄉。

Lee, C.-C. (1994). Ambiguities and contradiction: Issues in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53*, 7-21.

--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of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138*, 1-37.

Lo, V.-H. (2012). Journalists in Taiwan. In D. H. Weaver & L. Willnat (Eds.), *The*

airiti

global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pp. 104-112). New York, NY: Routledge.

Rampal, K. R. (1994). Press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1*, 637-651.

Russell, G. (1998). *Pandora's web? Clinton-lewinsky allegations fuel debate about journalism and the Internet*. Retrieved from http://edition.cnn.com/ALLPOLITICS/1998/01/30/pandora.web/index.html.

Volz, Y. Z., & Lee, C.-C. (2009). American pragmatism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Importing the Missouri model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to moder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 711-730.

airiti

附錄一：曾虛白新聞獎平面類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1]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75／1				
1976／2				
1977／3				
1978／4	張寶樂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公車聯營問題相關報導。
1978／4	劉復興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揭發進口藥價過高問題。
1979／5	陳文澤、鍾文禮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青蛙腿危害中南部學童」連續報導
1979／5	楊玉盛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公路局貝特福客車瑕疵」連續報導。
1979／5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		特別獎	自 1951 年 7 月創刊《報學》雜誌，至 1979 年 9 月，共出版 6 卷 2 期共 52 冊，二十多年未曾中輟，理論與實務並重。
1980／6	劉復興、翁台生、楊憲宏、孟莉萍、伍齊美、李師鄭、鮑開先、陳尉、潘嘉珠、翁玉華	《民生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對「津津公司鮮奶案」、「撫遠街爆炸醫院拒收傷患案」、「食油中毒案」做有系統的報導和揭發。
1980／6	陳錫龍、張寶樂	《聯合報》（陳）、《中國時報》（張）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獨家報導米糠油中毒事件，引起衛生醫療單位重視。
1981／7	何美惠	《屏東周刊》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鼓勵國中畢業生留在屏東升學」運動。
1981／7	翟大龍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臺灣北部地區疥瘡」。
1982／8	王建屏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機場空廚垃圾的下落」讓民航局下令廚餘需焚化。
1982／8	蔡宗英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過期食品及食品標示管理」促使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
1983／9	秦正華、柯紀鋼、王敏、劉超、劉自濱、吳國棟、劉益宏、姜鎮邦、程哲仁、方寶柱、黃國漢、莊坤松、沈明杰、田克南、魏志德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臺灣發生竊嬰案及偵破法辦」。
1983／9	張溪木、李錦環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消除農田大害福壽螺」喚起政府及民眾重視。

airiti

附錄一：曾虛白新聞獎平面類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84／10	李涵宇	《中華日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飼料用奶粉之流用食品加工」獨家發掘弊端，使中央標準局修改管制措施。
1984／10	翁台生、楊憲宏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翡翠水庫集水區水源汙染問題等系列有關生活環境變遷的追蹤調查採訪」。
1985／11	梁華棟、陳承中、林雨鑫、黃素娟、王明耀、姚鷺、王麗美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彩色電視機及汽車售價偏高」。
1985／11	楊乃藩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	「六載耕耘除惡法」反映民意，行政院於 1984 年將票據法送立法院修正。
1986／12	楊憲宏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石門水庫大壩沉陷案及味全 AG-U 嬰兒奶粉引發底血鈣症問題」。
1986／12	楊憲宏、曾伯加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餿水提煉劣質食油危害大眾健康」揭發不法，引起社會重視，對消費者保護具有貢獻。
1987／13	林靜靜、胡遜、韓尚平、蔡宗英、賈亦珍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管制毒性物質、取銷住院保證金、B 型肝炎問題、推動器官移植及敦促公布中文資訊交換碼與公共建築安全」等 11 項報導。
1987／13	方寶柱、秦德川、劉益宏、曾志賢、陳繼仁、徐履冰、陳權欣、祁止戈、石常輝、宏博修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正視人口販賣，救助雛妓跳出火坑」促使警政署成立「正風專案」全面大規模檢肅。
1988／14	陳承中、林雨鑫、賈亦珍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百萬農民的歡顏，百萬漁民的心聲」促使臺肥連續降價，促成「肥料產銷自由化方案」，反映漁民心聲。
1988／14	姜雲龍	《中央日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國內同鄉會大量出具不實之華裔單身證明，掩護東南亞國家女子來臺結婚並設籍定居」揭發外籍新娘弊端。
1989／15	李師鄭、李淑娟、吳婉芳、林秀美	《民生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登革熱來了」促使撲滅登革熱成爲全面性活動。
1990／16	李淑娟、李師鄭、劉麗芳、詹建富、曾秀玲	《民生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守候國民健康環境的尖哨」。
1990／16	蔣家語	《中時晚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揭發臺灣屠殺野生動物的現場調查」。

airiti

附錄一：曾虛白新聞獎平面類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91／17	馬西屏	《中央日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公立學校職員任用資格考試」。
1991／17	林雨鑫、陳鳳馨、張仁豪、季良玉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日本過期食品傾銷臺灣及進口食品標示不實」。
1992／18	許哲彥、呂理德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河川環境系列報導」。
1992／18	張文燦（等 12 人）	《中央日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大地陸沉巡迴報導」。
1993／19	秦正華等 33 人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協尋失蹤兒童報導」引起各方重視。
1994／20	無資料			
1995／21	高泉錫	《民生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毒蘋果問題追追追」。
1996／22	楊珮玲、郭錦萍、梁玉芳、林珍良、姜炫煥、劉福奎	《聯合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臺北榮總院內感染瘧疾事件揭發及追蹤報導」首先發現問題，積極挖掘真相，呈現隱憂。
1996／22	呂理德、盧義方、劉坤明、張南詠、葉明憲、王祖弘、魏裕鑫、楊樹煌、黃興隆、王關麒、林銘忠、江俊亮、謝敏政、鐘武達、張澄輝、游忠義、林淳華、章樹、何瑞雄	《中國時報》	新聞事業公共服務獎（報紙）	「找回河川之愛系列報導」深入臺灣各地宣傳河川保育的重要性，促成社會運動和新聞報導的結合。
1997／23	鄭朝陽、胡明揚	《民生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報導獎	「搶救國寶級景觀道路」凸顯永續經營的本土環境觀。
1997／23	聯合報言論部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關懷民生問題，服務社會公眾」重視民生社會問題，符合公共服務目標。
1997／23	林錫銘、盧振昇、林建榮、程思迪、林永昌、杜建重、吳景騰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攝影獎	「火照夜路」促成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過，對維護婦女安全貢獻很大。
1998／24	陳英姿、李鋅銅、康秀麗、謝龍田、林崇鎣、郭金潤、李若松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報導獎	「國內地下水汙染調查」。
1998／24	黃年、羊憶蓉、王麗美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引導改變白曉燕案兇嫌陳進興行爲取向並進行損害控制」。

airiti

附錄一：曾虛白新聞獎平面類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98／24	吳景騰、盧振昇、林建榮、程司迪、林永昌、杜建重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攝影獎	機不可失。
1999／25	張耀懋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2000／26	張耀懋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2001／27	張耀懋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2002／28	無資料			
2003／29	楊肅民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遲來的正義。
2003／29	張瑞昌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評論獎	追擊港都賄選風暴。
2003／29	程司迪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攝影獎	SARS 風暴。
2004／30	謝素娟等 12 人	《蘋果日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泰瑞黑心電視內幕。
2004／30	杜建重、侯世駿、陳易辰、鄭超文、潘俊宏、張天雄、胡經周、黃義書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攝影獎	「教改叫改」系列照片 10 張。
2005／31	林全洲、游登茂、洪肇君等 7 人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全臺假溫泉」系列報導。
2005／31	何榮幸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評論獎	「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
2005／31	高政全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攝影獎	義勇急先鋒。
2006／32	劉力仁等 6 人	《自由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離島水泥化」系列報導。
2006／32	江春男	《蘋果日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評論獎	「蘋論：司馬觀點」。
2006／32	塗豐駿	《蘋果日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攝影獎	「救難突氣爆，七英雄焚身」。
2007／33	許敏溶等 5 人	《自由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平價旅館政策大追蹤」。
2007／33	杜震華	《臺灣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評論獎	「追求臺灣教育的真善美」。
2007／33	王爵暐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攝影獎	「香港回歸九周年」專題。
2008／34	王昶閔、胡清暉、蘇孟娟、洪素卿、田瑞華、許紹軒	《自由時報》	公共服務獎 報紙報導獎	「追尋失落的大愛——臺灣器官捐贈與移植的困境與出路」。

airiti

附錄一：曾虛白新聞獎平面類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2008／34	康復明	《工商時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評論獎	「擘劃建設美麗家園系列社論」。
2008／34	王遠茂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報紙攝影獎	「中共未來五年高層的權力分配與布局——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2009／35	李慧宜、陳添寶、葉鎮中	公視	公共服務報導獎	「農村生存遊戲」。
2010／36	朱淑娟	獨立媒體記者	公共服務報導獎	「中科三期・環評與司法的論戰」。
2011／37	劉力仁、周敏鴻、李容萍、湯世名、林嘉琪、吳爲恭、陳文正、林毅璋、楊金城、黃博郎	《自由時報》	公共服務報導獎	「爐碴亡國」。
2012／38	周傳久、鄭仲宏	公視	公共服務報導獎	「丹麥長期照顧」系列報導。
2013／39	彭漣漪、彭杏珠、紅綾襄、王怡棻	《遠見雜誌》	公共服務報導獎	「我們的老年誰來養」。
2013／39	居芮筠、張子午、陳世慧	《經典雜誌》	臺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報社及雜誌類）	「文明密碼」。
2013／39	汪文豪、章雅喬	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網站	臺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公民記者組）	「埔里小農與瓶裝水工廠的戰爭」。

資料來源：《中央社》。

註：1. 表格空白處表示未查到資料。因經歷時序較長、承辦部門異動，該獎項業務屢經交接，又未設置官網，致使「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的得獎資料相當分散，蒐集不易。此番非常感謝中央社承辦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的「人事暨行政室」主管及同仁們協助蒐集資料，雖仍未完整，但已是到目前為止所見最齊全的。

airiti

附錄二：金鼎獎新聞類獎項歷屆得獎名單及作品名稱[1]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80	戎撫天、盧世祥、楊士仁、黃政雄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	「改善漁業經營困境」等 21 篇。
1980	呂一銘	《臺灣新生報》	新聞報導獎	「群策群力建設自己的鄉里」等 67 篇。
1980	洪錦福	《青年戰士報》	新聞報導獎	「陳金龍的故事專輯」共計 15 篇。
1980	徐梅屏	《中央日報》	新聞報導獎	「學生暑假打工」等 18 篇。
1980	張秀瓊	《臺灣新聞報》	新聞報導獎	「需要 RHO 型血液急救」等 16 篇。
1980	田克南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	「滿臉笑容十女警，車站服勤助老幼」。
1980	朱立熙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辛苦了，讓我替您擦汗」。
1980	蕭勁旅	《青年戰士報》	新聞攝影獎	「躍身洪流、衛國為民」。
1980	王作榮	《臺灣日報》	評論獎	「調整油電價格為明智的措施」等 7 篇。
1980	楊乃藩	《中華日報》、《中央日報》	評論獎	「團隊精神」等 135 篇。
1980	楊選堂	《聯合報》	評論獎	「從經濟的角度看當前國是專輯」共 10 篇。
1981	李利國	《中國時報》	新聞報導獎	「歷盡苦難的一群，共產暴政的見證」6 篇。
1981	程榕寧	《大華晚報》	新聞報導獎	「探綠色大地及流汗在鄉土」等 23 篇。
1981	徐榮華、梁華棟、楊士仁、歐陽元美、盧世祥、曉光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	1. 每周專題 2. 公營事業問題 3. 日本採訪系列專文 4. 擴大民間參與 5. 韓國旅行採訪專文等 62 篇。
1981	王作榮	《中國時報》	評論獎	「何不對重要公營事業做一貫徹底體檢」等 24 篇。
1981	呂夢顯	《青年戰士報》	評論獎	「以新作法、新精神迎接挑戰的十年」等 23 篇。
1981	楊乃藩	《中國時報》	評論獎	「肯定建國七十年乃是三民主義勝利的年代」等 25 篇。
1981	李明（尼洛）	《中華日報》	副刊專欄獎	「淚眼相對」等 24 篇。
1981	吳魯芹	《中國時報》	副刊專欄獎	「我談、我訪、我喜歡的當代作家」等 16 篇。
1981	徐曉（佳士）	《中國時報》	副刊專欄獎	「記者的形象」等 16 篇。
1981	石建華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總統愛民，涉水勘災」1 幅。
1981	沈明杰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祖孫劫後親情」1 幅。

airiti

附錄二：金鼎獎新聞類獎項歷屆得獎名單及作品名稱（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82	楊士仁、徐榮華、歐陽元美、梁華棟、沈榮華、黃素娟、林進輝、周玉蔻、張長錦、鄧萬邦、林泉源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	「興舉國之力掀起新的投資運動及問題與解答」等 73 篇。
1982	吳啓仁	《大華晚報》	新聞評論獎	「大眾傳播事業絕非特權階級」等 20 篇。
1982	曹積仁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	「二千分之一秒的車禍」1 幅。
1982	馬以工、韓韓	《聯合報》	副刊專欄獎	「關懷、參與、開展——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等 14 篇。
1983	鄭水泉、李純浦、林漢清、何永證、陳嘉偉、黃廣道、徐慶明、張釗、李孟典、鄭杰民、江健男、毛清泉、林映廷、劉爲一、黃敬祥、徐克、毛文昌、王耀德、張榮發、鄭溫乾、韓愛琴	《中央日報》	新聞報導獎	「推行家庭計畫績效不彰的探討報導」等 21 篇。
1983	楊乃藩	《中國時報》	評論獎	「迅速成立民間組織推動法律扶助工作」等 10 篇。
1983	莊錦芳	《青年戰士報》	新聞攝影獎	「民之褓母，扶老濟弱」。
1983	林清玄	《臺灣新生報》	副刊專欄獎	「深情軒」10 篇。
1984	劉毅夫	《青年日報》	新聞報導獎	「外島專訪報導」等 10 篇。
1984	吳統雄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選民與選舉問卷系列」等 18 篇。
1984	彭垂銘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對政府財經施政之評析」等 10 篇。
1984	沈明杰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	「老驥伏櫪」照片 1 幅。
1984	張繼高	《聯合報》	副刊專欄獎	「未名集」等 10 篇。
1985	楊憲宏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	「味全嬰兒奶粉系列報導」等 11 篇
1985	蔡翠英	《自立晚報》	公共服務獎	「請還給下一代乾淨的大地」等 26 篇。
1985	彭垂銘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政府負責，大眾冷靜」社論等 10 篇。
1985	林錫銘	《中央日報》	新聞攝影	「國父兩曾孫，聰明又可愛」1 幅。

airiti

附錄二：金鼎獎新聞類獎項歷屆得獎名單及作品名稱（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85	陳其南	《中國時報》	副刊專欄獎	「文化的範域」共 10 篇。
1986	邱文信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	「從農業法規探討農業問題」等 11 篇。
1986	楊乃藩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中秋節不補假不合情理」等 21 篇。
1986	許振輝	《自由時報》	新聞攝影獎	「憲德三號十九名船員歷劫歸來」1 幅。
1987	馬西屏	《中央日報》	新聞報導獎	「船權宜，命也權宜——由三艘權宜貨輪失蹤事件探討權宜船上船員所面臨的困境」等 11 篇。
1987	曾原彰、陳民峰	《民生報》	公共服務獎	「喜洋洋社區飲水問題」等 32 篇。
1987	石齊平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必須以新陣容、新做法來迎接自由化的時代」等社論 10 篇。
1987	胡毓豪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	「會心的微笑」2 幅。
1988	姜雲龍	《中央日報》	新聞報導獎	「獵鼠專案」等 37 篇。
1988	陳炳宏、周美惠	《中時晚報》	新聞報導獎	「社會關懷」等 16 篇。
1988	曾原彰、方儉	《民生報》	公共服務獎	「進口馬肉何處去」等 31 篇。
1988	楊乃藩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翟宗泉首席爲司法尊嚴做了最佳詮釋」等 10 篇。
1988	吳景騰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雞鳴」等 5 幅。
1989	李玉梅、洪楊才、方紫苑、韓尚平	《聯合晚報》	新聞報導獎（一般）	「捍衛環境的平凡人」9 篇。
1989	《聯合晚報》經濟組	《聯合晚報》	公共服務獎	「進口貨價居高不下，消費者大反擊」49 篇。
1989	王震邦、高源流、蒲叔華、翁台生、景小佩、王麗美、孫揚明、汪士淳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專題）	「天安門事件特別報導」55 篇。
1989	程思迪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民主之春——撤而不退」。
1990	陳守國、夏珍、尹乃菁、吳南山、樊嘉傑、趙文慧、莊佩璋	《中國時報》	新聞報導獎（一般團體）	「凝聚朝野共識、規劃改革藍圖——國是會議專題報導」82 篇。
1990	翁台生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一般個人）	「搜尋失落的黑貓」11 篇。
1990	高惠宇、王麗美、王景弘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專題團體）	「共產社會幽明兩界」17 篇。

airiti

附錄二：金鼎獎新聞類獎項歷屆得獎名單及作品名稱（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90	周梓萱	《中國時報》	新聞報導獎（專題個人）	「臺灣漁業補破網」11 篇。
1990	方儉、李鍾梅、洪淑蓉、蕭世暉、楊憲宏	《首都早報》	公共服務獎（團體）	「媒體與不實廣告」15 篇。
1990	林金正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個人）	「廢止電信資費臨時捐六百萬電話用戶受惠」8 篇。
1990	徐燦雄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火劫」。
1990	程思迪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另一種代溝」。
1991	從缺		新聞現場報導獎	從缺。
1991	張建家	《中央日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末代行業專題報導。
1991	呂理德	《中國時報》	公共服務獎	「關懷河川環境系列」。
1991	吳景騰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倒立抗議。
1992	雷顯威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	國內發現罕見黑面琵鷺爭取設保護區。
1992	邱家宜	《自立晚報》	專題報導獎	大林浦公害事件調查報告一～七。
1992	高泉錫、薛荷玉、張耀懋、蔡鶯鶯、陳碧雲、虞煥榮	《民生報》	公共服務獎	市售包裝水問題追蹤報導。
1992	彭垂銘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經濟的良心。
1992	張家榮	《中時晚報》	新聞攝影獎	掌聲背後——二屆國代選舉。
1993	張銘隆、黃德雄、吳學銘、	《民生報》	新聞報導獎	「登峰造極」海峽兩岸聯合攀登珠穆朗瑪峰。
1993	胡文輝、高鴻飛、游其昌、王遠弘、吳景騰	《聯合報》	專題報導獎	鄉土情懷。
1993	李淑娟、林進修、詹建富、袁子倫、薛桂文、張耀懋	《民生報》	公共服務獎	醫院——毒品的中繼站。
1993	盧世祥	《經濟日報》	新聞評論獎	當前經濟建設的全方位努力。
1993	從缺		新聞攝影獎	從缺。
1994	林如森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	野生動物的「山林」在哪裡？兼談保育風潮。
1994	姜捷	《青年日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狩獵離島紀行。
1994	林淑玲	《中國時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臺北居——都市邊緣聚落專題報導。
1994	鄭朝陽、林福益、陳碧雲	《民生報》	新聞公共服務獎	海砂屋風暴調查追蹤報導。

airiti

附錄二：金鼎獎新聞類獎項歷屆得獎名單及作品名稱（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94	邢定威	《自由時報》	新聞攝影獎	千島湖慘案特別報導。
1995	黃昭國	《自由時報》	新聞採訪獎	板新自來水水源汙染。
1995	王紹典、戴淑芳、張銘坤、胡憶平、陳偉康、鍾國慶、陳威任、張明蘭、古聖基、林坤瑋、陳世英、謝進盛、邱德祥、陳宗維	《中華日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可怕的大地震地球生死戀系列報導。
1995	胡明揚、李忠義	《民生報》	新聞公共服務獎	揭開電信費率黑盒子。
1995	康復明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加強法制建設以改善工商投資環境。
1995	邱勝旺	《聯合晚報》	新聞攝影獎	岡山水災。
1996	呂紹煒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獎	中正機場 2 期航站黑道圍標、綁標報導。
1996	張平宜	《中國時報》	專題報導獎	終戰 50 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
1996	鄭朝陽、胡明揚	《民生報》	新聞公共服務獎	搶救國寶級景觀道路。
1996	從缺		新聞評論獎	
1996	楊光昇	《聯合晚報》	新聞攝影獎	民選總統路上你我他。
1997	陳騰芳、潘國正、羅浚濱、邱國堂、朱虔、何高祿、毛熾倫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獎	新竹少年監獄暴動。
1997	韓乃鎮、邱勤庭	《民生報》	專題報導獎	臺灣海岸濕地現況調查報導。
1997	萬礎等 36 人	《臺灣新生報》	新聞公共服務獎	309 基層建設座談。
1997	康復明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期勉政府提升效能履踐經世濟民責任」系列評論。
1997	黃國有	《聯合晚報》	新聞攝影獎	浩劫。
1998	張宗智	《聯合報》	新聞採訪獎	我國與南非斷交系列報導。
1998	陳承中	《聯合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臺灣 2 次土改系列報導。
1998	李淑娟、林進修、詹建富、林家家、張耀懋、薛桂文	《民生報》	新聞公共服務獎	爲藥物副作用通報系統催生。
1998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兩岸關係的戰略思維。
1998	林錫銘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浴火鳳凰。
2000[2]	張宗智	《聯合報》	新聞採訪獎	「沉重的喜悅：我國與馬其頓建交與援助科索伏」系列報導。
2000	于趾琴	《經濟日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1 + 1 ≠ 2 企業併購的風險。

airiti

附錄二：金鼎獎新聞類獎項歷屆得獎名單及作品名稱（續）

年份／屆	得獎者	發表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2000	高泉錫、李郁怡	《民生報》	新聞公共服務獎	橋樑危機。
2000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從「臺獨公投」到「統一公投」——對民進黨轉型工程的看法。
2000	楊光昇	《聯合晚報》	新聞攝影獎	震劫。

資料來源：前行政院新聞局、文化部。

註：1. 感謝文化部人文出版司在資料蒐集上所提供的協助。

2. 因會計年度起迄時間調整，1998 年到 2000 金鼎獎相距一年半。2000 年也是金鼎獎設新聞類獎項的最後一年。

airiti

附錄三：吳舜文新聞獎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所屬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86／1	謝邦派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1.「中船承造大貨櫃輪，甲板用料規格不符，陽明海運拒收」。 2.「中船、陽明獲協議，賠償六百萬美金，處理商務事件，維持事態本質」。
1986／1	陳長華	《聯合報》	新聞特寫獎	故宮一甲子。
1986／1	馬西屏、陳建宇	《中央日報》	新聞特寫獎	養殖業最寒冷的冬天。
1986／1	楊乃藩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1. 請停止愛國獎券發行以遏賭風。 2. 迎接正確使用票據時代的來臨以上。 等 120 篇社論。
1986／1	魏志德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	「愛與關懷」讓殘障者的才藝能自然發揮出來。
1987／2	梁華棟、顏光佑、王麗美、黃素絹、陳承中、林雨鑫、姚鷺	《聯合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銀行房屋貸款大搬家獨家新聞報導。
1987／2	林英、黃美惠、陳幼君、黃葳威、黃寶萍	《民生報》	新聞特寫獎	「智慧九十」系列專欄。
1987／2	王作榮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昔也病在法度，今也病在紀綱」論處理當前局勢之道。
1987／2	林錫銘	《中央日報》	新聞攝影獎	勇者之名。
1988／3	冉亮	《工商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透視中美經貿談判。
1988／3	王景弘、翁台生、陳承中	《聯合報》	新聞特寫獎	探索遠洋漁業的隱憂。
1988／3	石齊平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經濟力、社會力、政治力——我們對臺灣政經社體制改造的觀察」等 16 篇。
1988／3	林錫銘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風雨後的寧靜。
1989／4	呂理德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鎘米外流風波。
1989／4	從缺		新聞特寫獎	
1989／4	彭垂銘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為明日的政經大國紮穩根基——「經營李內閣的第一要務」等社論 10 篇。
1989／4	洪克紀	《自由時報》	新聞攝影獎	……ZZZZZ
1989／4	林奎佑（魚夫）	《自立》報系	新聞漫畫獎	解嚴之後李總統主政之臺灣時局。
1989／4	程思迪	《聯合報》	特別攝影獎	天安門事件——民主之春。

airiti

附錄三：吳舜文新聞獎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所屬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90／5	徐尚禮、林琳文、戴雪詠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揭開大陸中醫中藥的神秘面紗系列報導。
1990／5	從缺		新聞特寫獎	
1990／5	汪彝定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喁喁集——「一位新聞評論者對國家社會進步的關懷」。
1990／5	龍啓文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有驚無險。
1990／5	羅慶忠	《自立晚報》	新聞漫畫獎	海峽兩岸漫畫系列 。
1991／6	王淑珍、林雨鑫	《聯合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中日貿易逆差系列報導。
1991／6	傅棟成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消弭亂象開創國家新局。
1991／6	陳景清、陳寶容	《中國時報》	地方新聞獎	從空軍志航基地軍機噪音問題。
1991／6	李梅齡	《中國時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臺灣文化異象探討 ・ 文化比較 ・ 重大文化事件探討。
1991／6	程思迪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金牌的感覺。
1991／6	蔡海青	《民生報》	新聞漫畫獎	立法院系列。
1992／7	張平宜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愛滋病防治系列。
1992／7	盧世祥	《經濟日報》	新聞評論獎	創建臺灣經濟現代化的架構。
1992／7	陳玉蘭	《自由時報》	地方新聞獎	從濫墾到農業上山看草嶺潛伏的山林環保危機。
1992／7	李奕興	《中國時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古蹟搶救系列。
1992／7	黃子明	《中時晚報》	新聞攝影獎	資深立委四十三年任期的最後一天。
1992／7	鄭福源	《經濟日報》	新聞漫畫獎	國建六年計畫。
1993／8	李淑娟、詹建富、張耀懋、袁子倫、薛桂文	《民生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醫院：毒品流通的中際站？麻醉藥品流向追、追、追」。
1993／8	石齊平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臺灣內部評論 ・ 大陸方面評論 ・ 兩岸關係評論。
1993／8	邱家宜	《自立晚報》	地方新聞獎	隨水逝去的鄉愁—美濃客家庄反水庫記要系列。
1993／8	徐開塵、紀慧玲	《民生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喧蟬鬧荷說九歌。
1993／8	林少岩	《中時晚報》	新聞攝影獎	民主新頁「二屆立委選舉—我國民主憲政發展的里程碑」。
1993／8	從缺		新聞漫畫獎	
1993／8	莊素玉、游常山、林文玲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土地之怒 。
1994／9	張啓楷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搶救瀕臨破產的國庫——八十四年度總預算系列專題探討。

airiti

附錄三：吳舜文新聞獎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所屬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94／9	鍾俊文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金融改革。
1994／9	張耀懋	《民生報》	地方新聞獎	走過全民健保光芒照耀不到的死角《偏遠地區醫療問題探討》。
1994／9	陳政博	《中央日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文化城之源。
1994／9	馮金桁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火海亡命。
1994／9	鄭福源	《經濟日報》	新聞漫畫獎	大陸政策與外交關係。
1994／9	游常山、刁曼蓬、姚明嘉、姜雪影、李明軒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土地與財富的爭奪系列報導。
1995／10	池宗憲、吳靈芬、許金禾、萬華欣	《大成報》	新聞報導獎	無情火 ・ 命難逃。
1995／10	吳南山、張瑞昌、林志雄、張澄輝	《中國時報》	地方新聞獎	掃除非法垃圾場毒瘤。
1995／10	賴素鈴	《民生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國寶美蹤——承先啓後之旅。
1995／10	林少岩	《中時晚報》	新聞攝影獎	古今協奏曲——摩登新人類 ・ 古禮定終身。
1995／10	蔡海青（季青）	《民生報》	新聞漫畫獎	全民健保系列。
1995／10	刁曼蓬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公營事業落入財團私囊系列報導。
1996／11	吳靈芬	《大成報》	新聞報導獎	臺北，走調都市——生活品質的無奈。
1996／11	陳玉蘭	《自由時報》	地方新聞獎	我的海岸我的愁。
1996／11	李維菁	《中國時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一九九六年初故宮國寶赴美展出爭議始末。
1996／11	林永昌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雁鴨季 ・ 天地情。
1996／11	鄭福源	《經濟日報》	新聞漫畫獎	李登輝的十八套劇本。
1996／11	莊素玉、楊瑪麗、鄭一青、彭漣漪、林宜諄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美麗之島 痛山水。
1997／12	李彥甫	《聯合報》	新聞報導獎	日全食天象現場報導。
1997／12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修憲，不可毀憲」系列社論 15 篇。
1997／12	林明宏	《自由時報》	地方新聞獎	窮山惡水悲家園。
1997／12	紀慧玲	《民生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傳統戲曲的生態觀察與省思。
1997／12	包承平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	怵目驚心。
1997／12	楊瑪莉、鄭一青、莊宗憲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第二波土地改革——炒作惡夢又起？
1998／13	張宗智	《聯合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我國與南非斷交系列報導。

airiti

附錄三：吳舜文新聞獎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所屬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1998／13	從缺		新聞評論獎	
1998／13	林上玉	《民生報》	地方新聞獎	搶救臺灣十大民宅古蹟之首－摘星山莊系列報導。
1998／13	徐開塵、張夢瑞	《民生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尋找出路系列報導跨世紀思考臺灣出版的新未來。
1998／13	邱德祥	《聯合晚報》	新聞攝影獎	絕望的手喚親人。
1998／13	楊心怡（凌群）	《聯合報》	新聞漫畫獎	臺灣的飛航安全。
1998／13	鄭一青、孫曉萍、邱花妹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氣候風暴。
1999／14	林照真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流亡達賴向返鄉採路系列報導。
1999／14	卓亞雄、林如森、李彥甫	《聯合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不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育，侈談生技產業。
1999／14	林松青、林全洲、雷鳴、林昭彰	《聯合報》	地方新聞獎	「五股山垃圾山追追追」系列報導。
1999／14	施美惠	《聯合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臺灣的原音」群像。
1999／14	陳孔顧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	「快」意小市民。
1999／14	從缺		新聞漫畫獎	
1999／14	邱花妹、沈嘉信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廢土內幕探索。
2000／15	梁玉芳、江中明、林以君、林河名	《聯合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總統大選「深入現場」專題報導。
2000／15	李彥甫	《聯合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基因科技的社會意涵專題報導。
2000／15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政黨輪替的憲政轉型。
2000／15	潘國正、何高祿、陳權欣、陳愛珠、毛熾倫、羅際鴻、邱國堂、朱虔	《中國時報》	地方新聞獎	新竹社區與科學園區結構性衝突與矛盾 。
2000／15	趙慧琳	《聯合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文化家園重建系列報導。
2000／15	邱勝旺	《聯合晚報》	新聞攝影獎	大地悲鳴。
2000／15	從缺		新聞漫畫獎	
2000／15	李永通	《大地地理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探索地震島系列 1-4。
2001／16	陽湘鈞	《聯合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被遺忘在非洲的臺灣種籽系列報導。
2001／16	張運祥	《經濟日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現代西潮系列報導。
2001／16	林河名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等待法治國 —— 司法、立法、及政治的異象與糾結。
2001／16	周維新等 9 人	《聯合報》	地方新聞獎	「探索臺北」—— 結合民調的主動式深入報導系列報導。

airiti

附錄三：吳舜文新聞獎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所屬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2001／16	趙慧琳	《聯合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新興潮流 —— 國民美術」系列報導。
2001／16	曾吉松	《聯合晚報》	新聞攝影獎	明天在哪裡？
2001／16	從缺		新聞漫畫獎	
2001／16	楊瑪莉、陳良裕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全球沙漠化風暴強烈吹向臺灣系列 —— 阿公店水庫更新計畫。
2002／17	梁東屏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深入阿富汗系列報導。
2002／17	卓亞雄	《聯合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錯誤的重建是升高下次災害的肇因。
2002／17	從缺		新聞評論獎	
2002／17	林松青等 20 人	《聯合報》	地方新聞獎	荒蕪的美景 公共建設浪費的殷鑑系列報導。
2002／17	曹銘宗	《聯合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回來做番：當代平埔的族群認同與文化復興。
2002／17	方賓照	《自由時報》	新聞攝影獎	無奈的小市民。
2002／17	從缺		新聞漫畫獎	
2002／17	黃惠如	《康健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臺灣水產品重金屬污染世界第一。
2003／18	許峻彬	《聯合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SARS 風暴最前線 —— 抗疫全記錄。
2003／18	林照真	《中國時報》	新聞專題報導獎	戰慄土石流。
2003／18	林明宏	《自由時報》	地方新聞獎	閱讀心世界。
2003／18	曹銘宗	《聯合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另類西施：檳榔西施的文化觀察」系列報導。
2003／18	陳世顏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監護權的愛恨爭戰。
2003／18	從缺		新聞漫畫獎	
2003／18	楊艾俐、宋秉忠、陳良榕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臺灣變貌。
2005／19	王瑞伶	《聯合報》	新聞即時報導獎	電影「羅倫佐的油」臺灣真實版 —— 高雄張家三兄弟赴美求醫錄。
2005／19	何榮幸等 7 人	《中國時報》	新聞深度報導獎	「體檢公共建設」 —— 臺灣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的診斷與對策。
2005／19	曾巨威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租稅改革與最低稅負制。
2005／19	張慧英、陳一姍	《中國時報》	國際新聞報導獎	蛻變中的韓國。
2005／19	潘國正等 6 人	《中國時報》	地方新聞獎	耗費 63 億建內灣線捷運，通嗎？
2005／19	曹銘宗等 5 人	《聯合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數化 @ 文化 .tw。

airiti

附錄三：吳舜文新聞獎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所屬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2005／19	丁志寬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一線生機。
2005／19	殷允芃等 5 人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韓國 有夢所以躍升。
2006／20	陳怡如等 24 人	《聯合報》	新聞即時報導獎	洞燭 ETC 敗象系列報導。
2006／20	羅如蘭、沈揮勝、戴志揚	《中國時報》	新聞深度報導獎	毒品問題。
2006／20	倪炎元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言論自由沒有讓步的空間。
2006／20	張慧英、陳一姍	《中國時報》	國際新聞報導獎	裝上翅膀的大象 —— 印度專題。
2006／20	胡宗鳳等 57 人	《聯合報》	地方新聞獎	口號、建設、幻景系列報導。
2006／20	梁玉芳等 23 人	《聯合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家變與職變 —— 臺灣社會文化變貌的切片觀察。
2006／20	從缺		新聞攝影獎	
2006／20	劉佩修、賀先蕙、鄭呈皇	《商業周刊》	雜誌新聞報導獎	一個臺灣，兩個世界 ——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2007／21	唐秀麗等 8 人	《聯合報》	新聞即時報導獎	「脈優錠假藥追追追」系列報導。
2007／21	蕭美惠等 5 人	《工商時報》	新聞深度報導獎	「亞洲金融風暴 10 週年」。
2007／21	楊瑪利、黃漢華、林孟儀	《遠見雜誌》	國際新聞報導獎	不老革命。
2007／21	林宜靜女士等 7 人	《聯合報》	地方新聞獎	關渡平原土壤砷污染調查系列報導。
2007／21	林正峰、孫秀惠	《商業周刊》	文化專題報導獎	快樂國 —— 不丹。
2007／21	陳應欽	《遠見雜誌》	新聞攝影獎	上學好難 —— 我的學校不見了。
2007／21	蕭富元等 6 人	《天下雜誌》	雜誌新聞報導獎	全球暖化 —— 臺灣不願面對的真相。
2008／22	王瑞伶等 19 人	《聯合報》	新聞即時報導獎	烏龍運動測速器和固定桿感應式線圈測速器真相大追擊。
2008／22	吳錦勳、李盈穎	《商業周刊》	新聞深度報導獎	一間公司 幹掉一個王國。
2008／22	黃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第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
2008／22	楊瑪利、江逸之、徐仁全、高宜凡、林妙玲	《遠見雜誌》	國際新聞報導獎	全球飆機場。
2008／22	劉英純、黃馨儀、許俊偉	《中國時報》	地方新聞獎	丹頂鶴一家四口來臺記事。
2008／22	李雪莉等 8 人	《天下雜誌》	文化專題報導獎	15 至 24 歲關鍵十年的獨立與探索。
2008／22	于志旭	《聯合報》	即時新聞攝影獎	並非人人都是馬迷。

airiti

附錄三：吳舜文新聞獎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所屬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2008／22	高政全	《中國時報》	專題新聞攝影獎	「迷惘的雙頭鷹」俄羅斯專題報導。
2009／23	陳惠惠等 9 人	《聯合報》	新聞即時報導獎	波波起波瀾 —— 探討波蘭醫學生回臺系列報導。
2009／23	張毅君等 6 人	《商業周刊》	新聞深度報導獎	牛奶殺人。
2009／23	黃 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請君入甕或與卿共舞。
2009／23	單小懿等 6 人	《商業周刊》	國際新聞報導獎	冰島破產。
2009／23	劉力仁等 7 人	《自由時報》	地方新聞獎	煙囪裡的秘密 —— 雲林麥寮高罹癌率追蹤報導。
2009／23	劉佩修等 5 人	《商業周刊》	文化專題報導獎	百大特色小學。
2009／23	黃世麒	《中國時報》	即時新聞攝影獎	我怎麼會嫁給這種人。
2009／23	陳弘岱	《經典雜誌》	專題新聞攝影獎	「糧荒系列報導」—— 災後 緬甸 米。
2010／24	黃寅等 20 人	《聯合報》	新聞即時報導獎	官僚殺人 —— 小小曹自殺悲劇。
2010／24	蕭富元、彭昱融、江逸之、張漢宜、吳琬瑜、謝明玲、賴建宇	《天下雜誌》	新聞深度報導獎	要命的水。
2010／24	于國欽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動盪的內閣、消沉的文官、停滯的經濟。
2010／24	江逸之、李雪莉、賴建宇、謝明玲、馬岳琳	《天下雜誌》	國際新聞報導獎	中國 47 個超級城市崛起。
2010／24	劉力仁等 11 人	《自由時報》	地方新聞獎	毒水危機：高雄仁武廠地下水毒物超標 30 萬。
2010／24	何榮幸等 23 人	《中國時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民國 99，臺灣久久 —— 臺灣百年文化內涵與集體記憶」專題。
2010／24	侯永全	《聯合報》	即時新聞攝影獎	讓我回去救家人。
2010／24	劉子正	《經典雜誌》	專題新聞攝影獎	問天。
2011／25	施靜茹等 10 人	《聯合報》	新聞即時報導獎	塑化風暴全紀錄。
2011／25	亓樂義、劉正	《中國時報》	新聞深度報導獎	兩岸遷徙首部曲 —— 黃金大搶運系列報導。
2011／25	黃 年	《聯合報》	新聞評論獎	「統一論」與「連結論」。
2011／25	程嘉文、徐柏棻、鄭筑羚、甘育瑋、陳思豪	《聯合報》	國際暨大陸新聞新聞報導獎	大陳島特別報導。
2011／25	吳淑君	《聯合報》	地方新聞獎	變調的蘭陽溪。

airiti

附錄三：吳舜文新聞獎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所屬媒體）	獎項	作品名稱
2011／25	何榮幸、謝錦芳、高有智、楊舒媚、黃奕濚	《中國時報》	文化專題報導獎	「消失與重生」系列專題報導。
2011／25	從缺		即時新聞攝影獎	
2011／25	黃世澤	《經典雜誌》	專題新聞攝影獎	回收場裡的寧靜革命（8張）。
2012／26	詹建富等 12 人	《聯合報》	新聞即時報導獎	血汗醫院裡的病患血淚——塞爆的急診、等床的人龍……
2012／26	賴寧寧、劉佩修、吳和懋	《商業周刊》	新聞深度報導獎	阿共、銀彈、虱目魚。
2012／26	劉致昕、孫秀惠、張毅君、劉于甄、李光真	《商業周刊》	公共服務獎	臺灣海岸浩劫。
2012／26	蕭富元等 10 人	《天下雜誌》	國際暨大陸新聞新聞報導獎	「國家之路」系列報導。
2012／26	高彬原	《聯合報》、《聯合晚報》	即時新聞攝影獎	生死瞬間。
2012／26	安培潯	《經典雜誌》	專題新聞攝影獎	難行仍行。
2013／27	呂國禎、孫秀惠、陳筱晶	《商業周刊》	新聞即時報導獎	槍、海權、黑鮪魚。
2013／27	彭漣漪、彭杏珠、洪綾襄、王怡棻	《遠見雜誌》	新聞深度報導獎	我的老年誰來養。
2013／27	蔡惠萍等 19 人	《聯合報》	公共服務獎	公路正義——期盼在轉彎處遇見文明。
2013／27	呂國禎、張毅君、鄧麗萍	《商業周刊》	國際暨大陸新聞新聞報導獎	一顆石頭改變全世界。
2013／27	林澔一	《聯合報》	即時新聞攝影獎	國道五號收費暴力。
2013／27	蕭耀華	《慈濟月刊》	專題新聞攝影獎	敘利亞難民路。

資料來源：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官網 http://www.vivianwu.org.tw

airiti

附錄四：卓越新聞獎平面類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	獎項	作品名稱
2002／1	李宗祐、李誠偉、吳江泉、郭良傑等	《中國時報》	即時新聞採訪獎	核安何時能安 —— 核四工程弊案追追追。
2002／1	韓乃鎮、林秀美等 13 人	《民生報》	專題報導獎	體檢醫療網計畫 —— 為城鄉醫療資源把脈。
2002／1	倪炎元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獎	超越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對立的迷思。
2002／1	從缺		新聞攝影獎	
2003／2	洪淑惠、李樹人	《聯合晚報》	即時新聞採訪獎	世紀災疫 SARS 風暴的開端 —— 臺灣第一起 SARS 病例。
2003／2	翁台生、卓亞雄、韓尚平、李彥甫、黃煌權等	《聯合報》	專題報導獎	看海的願景。
2003／2	陳正杰	《中央通訊社》	國際新聞報導獎	戰斧飛彈直襲巴格達。
2003／2	陳世顏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好險。
2003／2	于趾琴	《經濟日報》	新聞評論獎	一往無前：金融改革可調整但不可停。
2004／3	梁玉芳	《聯合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南洋新婦過臺灣系列報導。
2004／3	徐錫滿	《慈濟月刊》	國際新聞報導獎	深入伊朗大地震現場。
2004／3	王遠茂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	生命之愛。
2004／3	從缺		新聞評論獎	
2005／4	何榮幸、高有智	《中國時報》	新聞採訪報導獎	休耕啓示錄 —— 農地休耕政策的破敗與出路。
2005／4	沈耀華、賀桂芬、吳修辰、郭奕伶、鄭呈皇	《商業週刊》	國際新聞報導獎	金磚四國系列。
2005／4	張為棟	《蘋果日報》	新聞攝影獎	海棠風災沖斷橋。
2005／4	康復明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政治紛擾不斷，苦日子難免再來。
2006／5	陳香蘭、鄭榮文、李瓊月	《目擊者雜誌》	新聞採訪報導獎	從林明樺案看媒體報導綁架新聞的脫序演出。
2006／5	張慧英、陳一姍、鄭漢良	《中國時報》	國際新聞報導獎	香港專題。
2006／5	曾吉松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統獨相逢。
2006／5	曾巨威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最低稅負制與稅改的持續動能。
2007／6	許雅靜、曹宇帆、李明宗	《中央通訊社》	新聞採訪報導獎	中國傾銷下的傳統產業調查採訪。
2007／6	王文靜、楊少強、鄭呈皇	《商業周刊》	國際新聞報導獎	人對了，事就對了。

airiti

附錄四：卓越新聞獎平面類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	獎項	作品名稱
2007／6	陳俊吉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雙十慶典捉迷藏。
2007／6	從缺		新聞評論獎	
2008／7	王文靜、呂國禎、尤子彥、楊少強	《商業周刊》	新聞採訪報導獎	中國變了，臺商大逃亡。
2008／7	蕭富元、王曉玟、蕭錦綿、吳琬瑜、吳迎春	《天下雜誌》	國際新聞報導獎	不可思議的印度。
2008／7	姜永年	《壹週刊》	新聞攝影獎	消失的學校——中國四川八級強震。
2008／7	曾巨威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推動本土性的稅改與 EITC。
2009／8	劉力仁、林國賢、謝文華、王昶閔	《自由時報》	即時新聞獎	煙囪裡的秘密——六輕麥寮高罹癌率大追蹤。
2009／8	梁玉芳、鄭朝陽、張耀懋、劉惠敏、魏忻忻、程嘉文	《聯合報》	專題新聞獎	「迢迢長照路」系列專題報導。
2009／8	蕭富元、黃亦筠、江逸之、張漢宜、孫曉萍	《天下雜誌》	國際新聞報導獎	駛向綠色好生活。
2009／8	夏珍	《中國時報》	新聞評論（漫畫）獎	舉步蹣跚的「二次政黨輪替」一周年。
2009／8	曾學仁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	太扯了。
2010／9	朱淑娟	獨立媒體記者	即時新聞獎	中科四期・風暴從這裡開始。
2010／9	王宛茹、孫秀惠、賴寧寧、呂國禎、邱碧玲	《商業周刊》	專題新聞獎	臺灣天空浩劫。
2010／9	楊少強、孫秀惠、賀先蕙、呂國禎、蘇鵬元、吳怡萱	《商業周刊》	國際新聞報導獎	實物強權。
2010／9	曾巨威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漫畫）獎	財政改革須要宏觀與創意。
2010／9	孫仲達、王飛華、郭日曉、盧太城、鄭傑文、徐肇昌、張皓安、蘇聖斌	《中央通訊社》	新聞攝影獎	惡水。
2011／10	郭芷余、陳安琪、陳郁凱、賴心瑩、王吟芳、林益民、邱俊吉、劉昌松	《蘋果日報》	即時新聞獎	白玫瑰震撼——「性侵幼童輕判引人民怒吼」系列報導。
2011／10	呂國禎、萬年生	《商業周刊》	專題新聞獎	影響全世界的 60 公里。
2011／10	從缺		調查報導獎	
2011／10	楊紹華、楊卓翰	《今周刊》	國際新聞報導獎	以色列荒漠奇蹟。

airiti

附錄四：卓越新聞獎平面類歷屆得主及得獎作品（續）

年份／屆	得獎人	發表處	獎項	作品名稱
2011／10	于國欽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漫畫）獎	政府施政準則應置於社會正義的基礎上。
2011／10	蕭耀華	《慈濟月刊》	新聞攝影獎	巴基斯坦 世紀洪患後。
2012／11	劉金清、陳信利、蔡維斌、高堂堯、陳文星	《聯合報》	即時新聞獎	割稻機難求 ・ 老農吞藥；風雨無情 ・ 不老割稻班有義。
2012／11	燕珍宜	《今周刊》	專題新聞獎	消失的醫生。
2012／11	林倖妃、蕭富元、黃靖萱	《天下雜誌》	調查報導獎	獨家追蹤調查：一塊牛排背後的秘密。
2012／11	梁玉芳	《聯合報》	國際新聞報導獎	「2012 大國風雲 —— 俄羅斯大選」。
2012／11	于國欽	《工商時報》	新聞評論獎	治國之本在熱情而不在數字。
2012／11	陳信翰	《中國時報》	新聞攝影獎（單張）	它，抓得住我。
2012／11	程思迪	《商業週刊》	新聞攝影獎（系列）	臺灣海岸浩劫。
2013／12	陳洛薇、陳乃綾、鄭宏斌、蘇位榮、劉峻谷	《聯合報》	即時新聞獎	一字之差！會計法覆議烏龍修法歸零。
2013／12	賴寧寧、劉佩修、劉于甄	《商業周刊》	專題新聞獎	臺灣黑狗兄的全球戰爭。
2013／12	汪文豪、林慧貞	「上下游新聞市集」	調查報導獎	揭開僞米粉真相系列調查報導。
2013／12	張子午、黃子珊	《經典雜誌》	國際新聞報導獎	紛分和合。
2013／12	孫窮理	「苦勞網」	新聞評論獎	《服貿》爛透了？沒錯！這就是「自由貿易」。
2013／12	高彬原	《聯合報》	新聞攝影獎（單張）	天外飛鞋。
2013／12	鐘聖雄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新聞攝影獎（系列）	南風。

資料來源：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官網網頁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1/index.php?storytopic=10&start=0

airiti

附錄五：卓越新聞獎社會公器獎歷屆得主及得獎理由

年份	得獎媒體	得獎理由
2005	《山城週刊》	《山城》完整走過臺灣社區報草創、由盛而衰、以及 921 地震後，在地市民參與式社區媒介興起至今的歷史，是臺灣社區媒介發展過程的縮影。26 年的堅持出刊，除提供新聞資訊，它也爲社區居民提供了討論、分享與交流的機會，充分發揮社區論壇與平臺的角色，相當程度實現了新聞學上的媒體近用理想。
2007	「苦勞網」	「苦勞網」長期關注社會議題，使用網路媒體討論勞工、外籍新移民、殘障者等弱勢團體在臺灣的社會適應及其問題，在主流媒體之外，發表另類觀點和相關資訊供社會大眾參考，相當程度上填補了當前主流媒體的若干資訊空檔。最近幾年逐漸擴及人權、環保、文化議題的報導，並提供網路空間給弱勢團體作爲交換意見的平臺，重視弱勢者的傳播人權。
2009	《環境資訊中心》	《環境資訊中心》率先由人類中心主義進入生態中心主義，關心弱勢的生態環境，並以網路日報的型態持續十年報導國際、中國與本土環境新聞，彰顯環境正義，推動友善環境的社會教育。率先帶動國內的環境信託、工作假期等先驅理念，可謂促進公民社會（環境公民）與公益社會（環境信託）不遺餘力，堪稱爲：替環境發聲的行動型網路媒體。
2011	《四方報》	臺灣是移民社會，但長期以來，主流的權力社群卻吝於讓不同的群體有平等使用媒體，展現自我文化與與情感的公共空間。這樣的歷史不斷的複製，《四方報》卻主動、積極地讓臺灣新移民自主、多元發聲，並試圖成爲和本地主流社群相互理解與看見彼此的公共空間。美中不足的是，受限於經費或編輯政策，《四方報》對其它社群而言或有門檻，但無損於其存在的重要價值。
2013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	PeoPo 給予遍布臺灣各地的公民記者發聲管道，報導議題多元且能兼顧偏鄉。近年幾件具有重大爭議的土地徵收案如灣寶、大埔事件等，都是 PeoPo 的公民記者率先報導而引起主流媒體跟進，不僅填補了主流媒體在商業利益導向下日益忽視公共議題的新聞缺口，也在後續的運動上帶動了公民力量的匯集。PeoPo 團隊並積極投入公民記者培訓計畫，與社區大學或在地 NGO 等組織合作，培養公民記者，產生很強的在地連結。

資料來源：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官網網頁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1/index.php?storytopic=11&start=0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pp. 117-173, July 2014

Reviewing the Professional Roles of Taiwan Journalists from News Awards Conferred 1974-2013

Chiu, Chia-Yi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News awards are meant to promot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nd advocate cherished values or awareness. In reality, however, this might not always be the case. Based on a close study of the conferring of Taiwan's mainstream news awards, such as Zeng Xu-bai News Prize, Golden Tripod Prize, Vivian Wu Prize, Excellency for Journalism Prize, during the period of 1974-2013, this essay shows that the Year 2000 marks a watershed which implies changing professional roles for Taiwan journalists. Before 2000, reasons for conferring these awards actually promoted/advocated little, especially if compared with what got consciously conveyed by those awarded individual journalists in their self-portrait narratives and their respective awarded pieces. After 2000, the scenario began to change, as these awards tended to favor non-mainstream, alternative news media and professionals fighting for journalistic ideals and principles in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environment. The conferring of news awards thus served as tokens of official supports and encouragements.

With this contrast,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classical tensions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as experienced by local journalists in their professional practice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respective socialization process, grass-root engagements and on-going self-reflections as conscious agents, individual journalists were inevitably caught in tens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News awards, being extensions of state political powers, symbolize such top-down structural constraints with specific regulatory mechanisms. The author therefore concludes that, until the structure itself changes and its grip loosened, such tensions would not be truly resolved.

Keywords: news awards,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changing roles of Taiwan journalis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regulatory mechanisms

---

* Email: eve59chiu@gmail.com
Received: 2014.02.21
Accepted: 2014.05.02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175-206．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4

虛實之間：Cosplay 中的反串行為與性別認同 *

何欣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學士

王孝勇 **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Cosplay 中的反串行為與性別認同。援引文本盜獵（textual poaching）與性別展演（gender performance）的觀點，本研究嘗試提問的是：Cospaly 中的反串行為究竟是種暫時性的性別踰越，或是具有鬆動主流性類目的政治意涵？透過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Cosplay 玩家的反串行為必須服膺於一套團體內部的性別規範。這套性別規範雖然與主流社會的性別價值觀並無本質上的差異，但是反串行為所營造的虛擬空間在（男性）玩家於實體世界形塑多元性別認同上，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基於研究發現，本研究進一步指出，Cosplay 中反串行為的性別政治意涵，有待後續研究持續探索與評估。

關鍵詞：反串、文本盜獵、性別展演、性別認同、虛擬空間

* 本文改寫自第一作者之學士論文，第二作者為指導教授與通訊作者。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3 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南華大學，2013 年 5 月 10 日）。作者特別感謝所有的受訪者，以及《傳播研究與實踐》2 位匿名評審的肯定和建議。

** Email: hywang2@pu.edu.tw

投稿日期：2013 年 8 月 18 日
接受日期：2013 年 11 月 2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前言

研究者（本研究的第一作者）第一次接觸到 Cosplay（以下簡稱 COS）是在 2005 年在國立臺灣大學舉辦的開拓動漫祭 6（Fancy Frontier 6）[1]。開拓動漫祭是當時也是現今 COS 主要的活動場合之一。踏入 COS 的會場，會讓人有種身在嘉年華的感覺，熱鬧非常。只是大家扮演的人物以 ACG 爲主[2]，不是我們一般對嘉年華的印象。當下研究者體驗到的是：COS 是一種非常重視「感覺」的活動，因爲雖然有些動漫迷並不懂得爲什麼要扮演漫畫中的角色，但絕大多數的動漫迷表示，扮裝就是表達我對這部作品的「愛」。研究者當時也立刻發現，自己不需要透過任何人解釋就可以懂得 COS 的宗旨和語言，並深深爲其所吸引。

由於研究者本身對 COS 的喜愛與深刻著迷，進而產生研究 COS 的想法，特別是反串行爲與性別認同的關聯性，更令研究者感到好奇。相關研究指出，在 COS 的領域裡，爲了扮演一個角色而去反串是常見的行爲（王鈺琴，2007；宋丁儀，2002；林宜蓁，2006；莊雅惠，2011）。透過反串行爲，Coser[3] 有機會跨越性別的藩籬（林宜蓁，2006）。換句話說，COS 是一種將虛擬接合於真實的管道，透過玩家本身對於動漫角色的喜愛，將原本只存在於虛構文本中的角色活生生地展演在現實生活中，而現實生活中的許多束縛（例如：僵化二分的性別框架與性別認同）也得以被暫時懸置。因此，不同於現實生活中的性別邏輯對於男、女性別行爲的應然規範（例如：生理男性應該「像個男人」，女性應該美貌聽話），COS 反串行爲中的性別踰越是極爲普遍的現象。在反串行爲中，性別認同似乎亦呈現出流動、多元、未定的樣貌。

然而亦有相關研究指出，性別疆界在 COS 中看似得以踰越，卻是有條件、有限度地踰越。因爲所謂的性別踰越僅建立在參與者必須小心翼翼掩飾自己原先的身體性徵，並進一步展演出另一個性別的性別特質之前提上。易言之，男性 Coser 如果能夠儘量地讓自己看起來像女人或具有女性特質，他的扮裝才容易在團體內部被接受（王鈺琴，2007；林宜蓁，2006；張世倫，2006）。對此，研究者不禁開始思索：COS 縱使能在團體內部暫時地創造出一個性別扮演的虛構空間，但反串行爲本身是否仍受到現實社會中的性別規範所制約？亦即，玩家在

1 開拓動漫祭（Fancy Frontier）是由《Frontier》雜誌所舉辦的大型同人活動。第一次舉辦的活動時間是 2002 年 10 月 5 到 6 日，之後固定在每年暑假和寒假各舉行一次活動（VAIO，2006）。

2 ACG 是 Animation（動畫）、Comic（漫畫）以及 Game（遊戲）三者的簡稱（高詩涵，2010）。

3 Coser 是 Cosplayer 的簡稱，指的是角色扮演者，亦即 COS 的玩家（許芳瑋，2007）。顧及中文書寫的行文流暢性，本研究在接下來用到這個詞彙時，會跟「玩家」、「同好」等字眼交替使用。

airiti

COS 中看似得以拋開現實社會的性別枷鎖，然而虛擬的空間是否依舊複製並鞏固了傳統的審美觀和性別邏輯，並據此檢視反串的 Coser 們？

以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爲基礎，本研究試圖探索 COS 中的反串行爲與性別認同。具體的研究問題有：

一、COS 中反串行爲具有何種性別意涵？

二、COS 中的反串性別如何形塑玩家的性別認同？

貳、文獻探討

以下，本研究首先爬梳 COS 在臺灣的歷史，並探討其行爲意涵。其次，本研究嘗試初步推敲反串行爲與性別認同的關聯性，並提出性別展演與文本盜獵的觀點作爲後續詮釋和分析的理論基礎。

一、Cosplay 在臺灣的發展史

COS 在臺灣的發展史，有兩個不同的說法。第一個說法是 2005 年由傻呼嚕同盟所編纂的《COSPLAY・ 同人誌之秘密花園》一書（傻呼嚕同盟，2005）。本書將 COS 分成 3 個世代，著重 Coser 的成長與改變（禾子，2005）。第二個說法來自《COSmania》2006 年的創刊號。本書將 COS 在臺灣的發展歷史分成 4 個世代，並特別著重於同人會場活動的發展進程（VAIO，2006）。本研究採用的是後者的說法。原因在於 COS 是同人文化下的其中一個活動，所以用同人活動的發展史來瞭解 COS 應屬適當。以下將概述 COS 在臺灣發展的 4 個歷程[4]：

（一）啟蒙期（西元 1990-1994 年）

臺灣最早期的 COS 活動，在 1990 年代便可以看到蹤跡。不過由於當時社會的一般大眾對 ACG 多半存有負面的印象，漫畫店、電玩遊樂場、錄影帶出租店等，與 ACG 有關的環境總是出入複雜。因此啓蒙期的 Coser，只能在私下聚會的場合互相交流（VAIO，2006）。

4 值得說明的是，臺灣特有的本土布袋戲同人活動，則有另一個發展歷程，而這並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內。原因有二：(1) 在日本的同人誌概念傳入臺灣以前，布袋戲迷早就零星在書寫迷誌（fanzine）。雖然日本同人活動因其完整且細緻，它在傳入臺灣後，確實使得臺灣布袋戲同人活動更加蓬勃發展（陳明秀，2011）。但是這些活動並未與同人活動產生密切的連結（邱雯祺，2009）。(2) 此外，布袋戲的第一場 COS 活動是在 1997 年 2 月 5 日，由霹靂布袋戲官方所舉辦的戲偶節（席珍，2006），這個時間雖與第一個在臺灣舉辦的 ACG 系 COS 活動約略同一個時期，但前者是由單一公司主導（例如：霹靂布袋戲公司），這與和 ACG 系的同人活動通常由多家公司合作舉辦的模式大不相同。

airiti

其中，日文較好的 Coser，則可以透過閱讀日文雜誌中對於 ACG 的報導，來滿足求知的慾望。此外，Coser 還會相約好友們一起來改造衣服，或是請教對裁縫有入門工夫的同好一起自己動手做造型。服裝完成之後，他（她）們便會趁著同好聚會的時候，展現自己的成果，並拍照留念。雖然啓蒙期的 Coser 面臨了不少來自一般大眾的不解或誤解，卻也意外使得團體內部形成了非常團結的氣氛（VAIO，2006）。

（二）草創期（西元 1993-1996 年）

1993 年始是臺灣的同人活動草創期。當時臺灣北部及南部都已開始零星有了小型的活動，這些大多都是由同好們自行發起且不具有商業性質的活動。同年 8 月於松山外貿展覽館（現爲松山機場第二航廈）所舉行的「93 臺北國際漫畫、動畫聯合展示會」（邱雯祺，2009），是較爲正式且大型的商業活動。當時有一群鋼彈的同好們穿著聯邦軍的制服在場內扮裝，這是臺北最早出現的 COS 活動（VAIO，2006；邱雯祺，2009）。

1995 年，臺灣南部知名的同人誌創作團體 ACG Station 於高雄舉辦了名爲「95 變裝天王——臺灣第一屆電玩變裝大會」的活動。這是臺灣第一場對外公告並進行文宣的 COS 活動。雖然現場也有同人誌社團擺攤，但是不論是活動名稱、主題與現場都是以 COS 爲主。因此一般認爲，1995 年是臺灣 COS 活動的正式開端（邱雯祺，2009）。

1995 年之後，隨著社會風氣的逐漸開放，網際網路、媒體資訊更爲普及。這時期的 Coser 相較於啓蒙期，更加積極地展現自我。他（她）們還以分工合作的模式，向外尋求新的資源挹注。這時還出現了「湊團」形式的活動。所謂的湊團，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玩家來扮演同一部作品的各個角色。而爲了更精確地扮演好動漫角色，這時期的同好也會開始尋找店家製作衣服。由於這些店家通常是一般做女裝或制服的裁縫店，同好們便試著以半溝通、半訓練的方式，讓店家逐漸瞭解 COS 服裝的製作（VAIO，2006）。

（三）成長期（西元 1997-1999 年）

1997 年 10 月，臺灣捷比漫畫便利屋與日本 SE（艾斯泰諾）株式會社合作，引進原屬日本 SE 的「Comic World」活動，這也是日本 SE 首次跨海舉辦的活動。

此次活動雖然在北部舉辦，但中南部的同好們也慕名而來，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活動。該活動亦開啓了臺灣以商業手法來經營 COS 的模式。其後，逐漸有

airiti

許多單位開始舉辦類似的活動，較具知名的有導航基金會所主導的「同人文化節」。然而，在 1999 年發生了 921 大地震之後，由於經費短缺，再加上導航基金會本身認爲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於是便毅然退出主辦活動的行列（VAIO，2006）。

成長期的 Coser，有許多是經由媒體報導或是網路訊息才開始加入同好的行列。由於當時網路拍賣盛行，不少 COS 的服裝、道具、配件等都可以在網路上購買，這使得 COS 開始有「速食化」的現象，亦即自己動手做造型的 Coser 逐漸減少。但這卻也促成 Coser 人數的增加，並讓社會大眾有更多機會接觸或瞭解 COS 的文化和意義——儘管當時的媒體報導還是經常把「同人誌」（志同道合的人合辦的雜誌）與「COS」（角色扮演）給搞混（VAIO，2006）。

（四）穩定發展期（西元 2000 年至今）

千禧年之後，臺灣 COS 的主辦單位重新大洗牌。先是捷比公司與日本 SE 由於場內攤位的問題產生了分歧，於是捷比的活動名稱改爲「Comix World」。日本 SE 則沿用原本的「Comic World」。在 2004 年 8 月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行完「Comic World 臺北 27」後，日本 SE 就離開了臺灣的市場。捷比也因爲公司內部的經營虧損，最後只好將經營權轉賣給臺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手後，將「Comix World」改名爲「Comic World Taiwan」（簡稱 CWT）。CWT 於 2002 年 3 月正式成立至今，一直努力經營相關的活動，而其活動風格偏重在布袋戲與女性向同人創作[5]（VAIO，2006；邱雯祺，2009）。

與 CWT 相同規模的則是在 2002 年 10 月由杜威廣告公司舉辦的「Fancy Frontier」（簡稱 FF）活動。其活動籌備委員會的成員幾乎都是動漫迷或資深的同人誌作家。他（她）們在日本業界擁有人脈與良好的媒體操作實力。與以往同人活動不同的地方是，FF 會舉辦許多舞台活動（例如：邀請日本聲優來與動漫迷現場互動）、競賽，並與異業合作，爲同人活動拓展了新視野。FF 重要的創舉是設立了「媒體組」，主要負責製作與發送新聞稿，且在會場內擔任媒體公關，讓一般大眾得以透過媒體報導而對同人活動有正面的認識。FF 的活動走向偏重於日系動漫與男性向同人創作，與 CWT 的走向有著微妙的市場區隔（VAIO，2006；邱雯祺，2009）。

5 女性向同人創作指的是以女性讀者為主要客群的同人誌創作。相對而言，男性向同人創作則是以男性讀者為主要的客群。

airiti

同人活動發展至今，爲了配合主要客群學生的作息時間，每年寒暑假都會有固定的大型活動場次。學期中的假日也會固定或不固定地舉辦小活動，這些活動遍及臺灣各地。隨著大型同人活動的蓬勃發展，COS 的媒體曝光度也大幅增加。再加上網路上傳頻寬的放寬，數位相機、照相手機等科技產品的普及，COS 的參與人數於此一時期不斷地快速激增。坊間也開始出現許多與 COS 相關的產業，像是專門製作衣服與道具的工作室，或是衣服出租店（羅資民，2008）。

本研究從上述歷史脈絡的爬梳中發現，資訊的快速流通以及傳播科技發展的進步，是造就 COS 迅速擴張的主因。在這樣的科技條件下，一般大眾也有更多的機會看見 COS，甚至逐步瞭解其意義。而 COS 中的反串行爲究竟有何意涵？這點值得持續進行探討。

二、Cosplay 的行為意涵

一位知名的 Coser 在《COSMORE》雜誌專欄中表示，大家應該以一般休閒娛樂來看待COS，因爲那是「非常非常普通、平凡的一種生活小小樂趣」（STAY，2007：67）。也就是說，COS 的行爲乃是出自於「喜歡」，這就跟喜歡唱歌而去 KTV 的道理並沒有兩樣（同上引）。本研究在閱讀相關文獻後，發現所謂的「喜歡」又可歸納爲以下兩種行爲意涵。兩者皆強調 COS 在玩家心中的主觀認定，或對其帶來的影響。

首先，COS 對玩家而言，是一種休閒娛樂。也就是說，COS 是玩家對某個角色懷有熱愛，因此希望透過扮裝而達到玩樂和自我滿足的目的（STAY，2007）。馬士傑（2008）強調 COS 是一種玩樂，不管是去會場或外拍，能夠和朋友一起出角，或認識新的朋友，都是其玩樂的本質。另外，在汪佳妮（2006）的研究中還提到，COS 除了提供了一種自我放鬆的管道，還能讓玩家暫時逃離現實生活及課業的壓力，並有機會結交到各行各業的朋友。簡言之，COS 爲玩家提供了一個交友玩樂與生活舒壓的管道，這和一般休閒娛樂的性質十分雷同。

其次，COS 對玩家而言，亦是一種自我實現。王鈺琴（2007）認爲 Coser 不只在服裝上扮演角色，也會在情感上認同該角色，並將該角色的特質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事實上，在 Coser 選擇要扮演何種角色時，特別可以看出這點。許多 Coser 基於「同理心」，會選擇與自己個性高度相似的角色；但另外也有一些 Coser 表示喜歡嘗試與自己完全不同個性的角色，藉此滿足當另一個人的感覺。其中，跨性別的扮演也是 Coser 們喜歡嘗試的，因爲日常生活中不太有機會能夠

airiti

去反串異性（王鈺琴，2007；汪佳妮，2006；張立嵐，2007）。透過 COS 挑戰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包括反串），Coser 得以從中獲得他人的讚賞，達成自我實現。

綜合以上兩點，目前已有研究將 COS 的行爲意涵歸納爲一大前提、三大精神，並以此延伸出 6 個樂趣（倪逸蓁等，2006）。所謂的一大前提，是指 Coser 對於該角色產生「萌意」，並且有「我想要成爲那樣子」的想法。三大精神有「表現」、「幻想」、「美感」。其中，「表現」指的是 COS 具有公開表演和展現的特質，近年來更常成爲媒體用來豐富其畫面的題材。由這裡所延伸出的樂趣是「分享」，亦即藉由 COS 替自己喜歡的作品做宣傳，吸引其他的相關同好們一起討論分享；第二個樂趣爲「成就」，這是由於一整套的 COS 流程需要耗費相當大的精神與體力，因此當 Coser 聽到別人的稱讚時，會特別有成就感。

COS 的第二個精神是「幻想」。這是由於 COS 的角色形象許多是現實中看不到的，所以如果能將想像具體化，角色扮演本身就更吸引人。由這裡所延伸出來的樂趣分別是「夢想成真」和「更多的夢想」。把虛幻世界的人物，以具體的方式呈現出來，那便是夢想成真；有了第一次的成功，Coser 就會開始計劃下一次要扮演什麼角色，此時玩家便擁有更多的夢想。

COS 最後一個精神是「美感」，這是最重要、最困難的部分。許多 Coser 一直強調扮裝是一種藝術，其中的美感更必須討喜。因此，Coser 在穿上細膩的製衣後，皆盡力透過肢體語言詮釋出角色的原本個性，並於過程中加入玩家的個人特質（包括對扮演角色的理解和詮釋），試圖讓 COS 達臻完美。「詮釋」和「工藝」便是以此延伸出的樂趣。本研究將上述 COS 的行爲意涵繪製爲圖 1。

綜上所述，本研究初步發現，COS 的行爲意涵，除了是一種玩家所喜好的休閒娛樂，更具有自我實現的意義。另外，爲了呈現出完美的樣貌，Coser 會去學習如何化妝、製衣、攝影、修圖等，這一切的努力都是想讓自己更爲貼近欲扮演的角色並展現美感。在此，COS 不僅僅只是一種換上奇裝異服或引人注目的行爲，而是蘊藏著豐富的（性別）意涵和動機，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反串行為與性別認同

（一）反串（cross-dress）的定義與性別文化

在教育部的國語辭典中，將「反串」解釋爲「男扮女裝或是女扮男裝」。換句話說，一個人穿著打扮成異性，便是反串。但什麼是男生（或女生）的服裝？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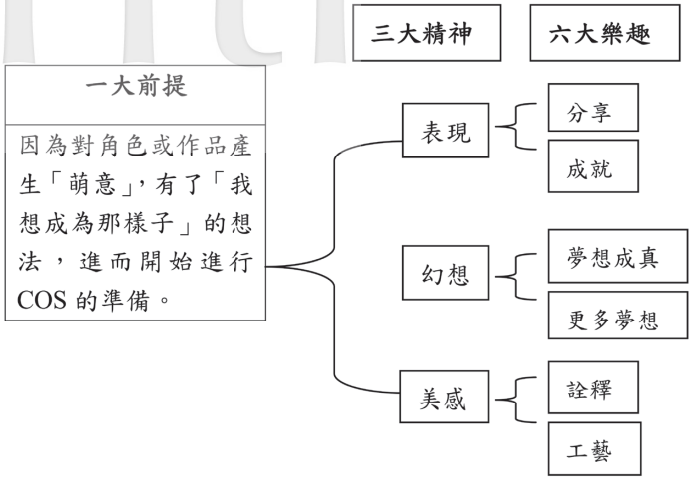

圖 1：COS 的一大前提、三大精神與六大樂趣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整理自倪逸蓁等（2006）。

這與服裝的社會象徵意涵有關。衣服除了本身保暖的功能外，更多時候是文化認知與社會價值觀加諸於人們身上的載體與界線（莊雅惠，2011）。其中，性別便是服裝所承載的價值觀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通常是透過穿著打扮來分辨性別。而不遵守服裝的性別劃分與性別意涵並隨意越界的性別行爲（例如：反串），則容易遭受到大眾的恥笑與鄙視（同上引）。

然而，即使反串在當代社會中經常遭受道德的批判，但若從特定的時代與文化脈絡來看，反串行爲其實有其存在的文化脈絡或市場。相關文獻指出，最早於 12 世紀的表演藝術中，則可見反串行爲的公然展演。反串於此時已具有了社會意涵。到了 18 世紀末期，表演藝術中的反串逐漸蓬勃發展並成爲大宗。這是因爲當時清朝政府爲了杜絕娼妓，禁止女演員在公共場合演出，所以戲班子只能挑選具有陰柔特質的男孩，訓練他們扮演旦角。透過制式化的表演訓練，男演員們特定的舉止動作（例如：蓮花指、小碎步）可以比現實生活中的女性還要嬌媚誘人。另外，男演員在反串行爲的眼波流轉之際，與男性觀眾間亦逐漸產生了曖昧幽微的情慾互動。此舉在某種程度上開啓了同性情慾流動的空間，並默許了性別認同的踰越（張靄珠，2000）。

到了 20 世紀中期，臺灣的歌仔戲裡開始有了女演員反串男角。在那個年代的臺灣，女性情慾備受壓抑，透過女演員反串男角所體現的一種遊走於陽剛與陰

airiti

柔之間的風采魅力，爲當時許多的女性編織了情慾的幻想（張靄珠，2000）。1994 年由蔡頭和蔡斯聰成立的「紅頂藝人」，是臺灣第一個反串團體。紅頂藝人除了開啓了臺灣反串表演的風潮，類似的表演還陸陸續續地出現在臺灣的綜藝節目中（嚴玉鳳，200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反串通常不是反串者出自於自身意願的行爲，而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政策或商業考量下的反串「表演」。

相較於此，由學生團體「紅綾金粉劇藝工坊」所做的反串表演，便直接地呈現出喜歡反串的個人意志。透過「反串是爲了取悅自己」的宣示，他們指陳男生的女性特質應具有其正當性（紀大偉，1997）。另外，同志團體也會透過反串扮演，藉以凸顯異性戀性別角色的虛構性、模仿性與可變性（嚴玉鳳，2001）。對此，張小虹（1996）表示，反串的意義是多重交疊；它錯亂模糊了原本涇渭分明的男女二元界線，並啓動了性別越界的認同以及性別顛覆的想像。

綜上所述，反串行爲在表演空間中似乎較易被接受和認同，甚至會使得台下的觀眾產生性別逾越的情慾流動。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反串行爲則可能指涉出反串者所處的文化情境仍充斥著許多超驗／先驗的性別規範，難以徹底地被撼動。在此，反串行爲似乎存在於一個虛實之間的性別文化空間：當 Coser 換上服裝，他（她）就化身爲扮演的角色，其反串行爲亦同步進入了一個虛擬的空間，與 Coser 本身（的生理性別或性別認同）毫無關係（莊雅惠，2011）。然而，當 Coser 換下服裝、卸去妝容後，一切又回歸傳統的性別秩序，否則他（她）很可能面臨路人的白眼，或來自朋友家人的不解與批評。這裡，反串行爲與 Coser 的性別認同之間的關係，值得持續加以推敲。

此外，上述針對反串文化史進行的歷史爬梳亦透露出，即使在性別意識相對保守甚至是性壓抑的年代，反串行爲從未消失，而是透過諸多性意識機制（deployment of sexuality）不斷地於性別權力關係中生產、再製。在此，反串並非奠基於線性歷史脈絡中的行爲實踐（a founding act），而比較類似 Foucault（1980 ／尙衡譯，1990）所述之鑲嵌於歷史片段與權力網絡中的性知識生產。而反串行爲與性別認同間的互動折衝體現於何種社會文化脈絡與政治條件？又如何對其加以鬆動和挑戰？更是值得高度關切的問題意識。

（二）性別認同及其與反串行為的關聯性

Connell（2009 ／劉泗翰譯，2011）認爲，要體認個人生活中的性別存在，最常見的方式或許就是透過「性別認同」這個觀念。「認同」（identity）一詞在哲學與文學中已有很久遠的歷史。在哲學或宗教學的認同具有「一致性」（unity）

airiti

的意思，在文學中則代表著「相同」（sameness），不過有時候也用來強調「我是何許人」（Who I am？）。最早將認同觀念應用在性別研究上的，是美國精神病學家 Robert Stoller。Stoller (1968) 指出，「核心性別認同」（core gender identity）應該在青春期之前就已形成，而「性別認同」乃是描述個人參與性別關係與性別實踐的情況，它本身即是多元性而非單一性的概念。

一般而言，性別認同是指個體對自我所歸屬性別的自我知覺，這種認知程度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很大。幼年期的核心性別認同，在出生後 18 個月始能建立。到了青春期，由於荷爾蒙對於體型、性慾亢進及身體心像（body image）產生影響，進而形成了成人的性別認同。人的性別在生物學上雖然被歸類爲天成的，但性別認同乃至於隨之而來的性別行爲模式、性別理想，乃是高度社會化的結果。（張春興，1989；游莉玫，2008；鄭玄藏，1993）。個體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透過模仿、學習，逐漸成爲符合社會性別期待的性別主體，並發展出服膺於社會主流的性別認同（何春蕤，2003；Anne, 1996）。

延續這樣的說法，相關文獻指出（方剛，2000；池元蓮，2005：黃國書，2007，2008），如果反串行爲跳脫了前述可被接受的表演空間時，而出現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玩家便經常會被人揣測其是否性別認同「異常」。這樣的揣測隱含兩種假設與文化共識。第一種假設和共識是將反串行爲視爲性別認同的錯亂。在這樣的思考邏輯下，不同於變性者（transsexual）仍是服膺於性別二元邏輯而尚可被接受，扮裝的異性戀男人則被視爲一種情慾偏差的病態。第二種假設和共識則將反串視爲陽剛氣質的敗壞與墮落，這與主流性別價值觀長期推崇男性特質，貶低陰柔特質有關 (Mills, 1996)。在這上述兩種價值觀的交相規範下，尤其是異性戀男人若從事反串行爲，極易受到社會大眾對其性別認同的質疑與貶斥，中外皆然。

然而，亦有論者指出，隨著後現代社會的到來，諸多傳統的規範與價值觀正面臨著顛覆與挑戰，性別認同也逐漸具有更多元異質的樣貌（林宜蓁，2006；Kacen, 2000）。在男、女的性別特質都開始具有自由拼貼與轉換的可能性之際，性別認同亦逐漸成了個人的選擇與創作，而並非僵化穩定的實體 (Kacen, 2000)。從這個觀點出發，本研究試圖推敲的是：當社會中的性別界線不再僵固二分、性別規範也不再不證自明的同時，Coser 是否得以藉由反串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多元的性別認同？反串行爲究竟是種暫時性的性別踰越，或是具有鬆動主流性類目與性別劃分的政治意涵？文本盜獵與性別展演等觀點，相當程度啓發了本研究接下來的思索。

airiti

（三）文本盜獵與性別展演：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de Certeau（1990／方琳琳、黃春柳譯，2009）在 *The Prctuce of Everyday Life* 一書中，提出文本盜獵的概念，用以探討每日生活的閱聽人如何在接收訊息之際進行文本意義的改編創作。de Certeau 拒絕傳統的「閱讀者只是被動吸收作者傳輸」的說法，認爲讀者並非被文本預先設定的意義所控制。他進一步指出，閱讀這個行爲具有某種生產性，讀者透過閱讀得以消化挪用文本的原初意義，並生產出另一個意義系統與文本。此外，de Certeau 也指出讀者對他人文本的斷章取義乃是基於滿足自身的愉悅。對此，de Certeau 比喻文本就像是一個租用的公寓，而讀者作爲「租戶」，他（她）的閱讀是一種主動積極的高明藝術和介入。在當代消費的程序中，租戶深知如何在支配文本中，偷渡自己無數的歡愉。這種對文本的主動消費和改編即是文本盜獵：讀者是文本中的旅行者，他們在屬於別人的土地上漫遊，在他們不曾書寫的田野上盜獵爲生，就像遊牧民族一般（亦見 Storey, 1999 ／張君玫譯，2002）。

de Certeau（1990 ／方琳琳、黃春柳譯，2009）進一步表示，在文本盜獵的過程中，讀者依循著自身的想像藍圖將文本肆意拆解重組。他（她）的閱讀位置不是文本作者的位置，亦不自許爲作者的位置。透過發明一些與文本原先意圖或意義不同的想法，讀者得以將文本拆解成碎片後，再重組製造出另一種不知名的混合物與新的意義系統。在此，讀者既是在文本內，又是在文本外。閱讀位置的游移不定讓讀者得以從文本的原初法則中逃離，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微型世界。

從文本盜獵的觀點來看 COS 中的反串，本研究預設的是，Coser 基於對文本的喜愛因而沉浸於文本的閱讀活動中。同時，玩家又得以將其想像或喜愛付諸實踐，進一步將原本屬於書中的角色盜獵出來並加以扮演，對特定的角色加諸自己的創作概念和詮釋。據此，文本盜獵的觀點有助於本研究探討 Coser 如何在反串行爲中進行性別文本的創作，並藉此形塑自身的性別認同。

然而，並不是每個性別文本的個人性創作都具有性別政治的意涵。de Certeau 原初的理論模型也並未論及從想像到實踐的性別展演如何可能。對此，Butler 的性別展演論相當程度延續了上述對於性別文本創作的討論，並開始了本研究接下來從個人層次過渡到巨觀社會面向的推敲歷程。

Butler (1999) 認爲社會性別是由話語所維繫建構的，爲的是把性慾管控在以生殖爲目的的異性戀強制性框架內。藉由重複僵化的身體行爲、姿勢和運動，性別被以一種「社會暫時性」（social temporality）的方式創造出來，但卻被錯誤認

airiti

知（misrecognize）爲永恆的真理（亦見王孝勇，2007，2009；Spargo, 1999 ／林文源譯，2002）。

Butler 的認識論立場源自於 Foucault 對於精神分析的批判和再詮釋。Butler (1997) 指陳，不同與 Freud 將壓抑和依附於禁制（attachment to prohibition）視爲主體性建構的憑藉，以及 Lacan 在此基礎上將象徵秩序的規範化力量視爲獨立於權力關係之外的法律／律令，Foucault 藉由操作尼采的「符號鏈」（sign chain）概念所揭櫫的符號與原初指意之間存在的時間性斷裂，直指主體的形構和解構（de-constitution）並非座落於權力關係之外，而是權力關係本身即蘊藏的失序想像。

對此，Butler (1999) 進一步指出，透過言過其實的（hyperbolic）諧擬展演，性別主體得以暴露出性別本身的僞造結構。而在「性別是後天人爲建構的展演」此一前提下，所謂的正確或錯誤、真實或表象的劃分因此並不具有知識上的正當性，性別也變得完全不可信。在此，性別本身成爲了一種模仿（imitation），模仿的目的在重複引述（reiteration）所有僵化的性別意義系統並將其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e）與再意義化（resigniflcation），據此揭櫫性類目、性別權力關係的偶然性（contingency）。

事實上，Butler 的性別展演論在 COS 的反串行爲中，應具有相當的解釋力。例如從男性 Coser 爲了扮演好女性角色，通常會刮除腿毛，墊假胸部，並在肢體上盡可能做到輕柔溫婉；或是女性 Coser 爲了扮演男性角色，通常會穿起束胸，畫上粗粗的眉毛，動作也會變得大又粗魯，我們都可看出性別本身是一種後天人爲的模仿。而透過（扮裝者）言過其實的展演，傳統強迫性的性類目如何被引述，但同時又得以被伺機而動地加以挑戰與顛覆，亦是本研究欲透過經驗資料加以探討的議題。

然而，本研究在此必須釐清的一點是，反串和「扮裝」（drag）或許不宜被立即劃上等號。美國學者 Newton (1979) 曾經透過訪談酒吧、表演化妝間的扮裝皇后，探討美國 1960 年代的同性戀男子如何透過性別展演公然暴露（camp）異性戀性別文化的矛盾弔詭。Newton 在行文中舉出許多不同的扮裝種類。其中一種「戴耳環、擦口紅、穿高跟鞋但卻穿著男性服飾」（同上引：101）而登場表演的角色模式，是 Newton 眼中富有性別政治意涵的性別角本。因爲在這樣的性別展演空間中，我們看到的正是扮裝皇后透過諸多衝突元素的體現（incongruity），試圖裂解男子氣概文化並藉此宣稱其陰性／娘娘腔本質的戰略。或許正因如此，Newton 的訪談對象多半是同性戀者，而某些扮裝皇后「在日常生活中」雖然以直男的身分存在（他們業已組織異性戀家庭並以此掩飾自己的性別認同），但「理論上」他們絕非異性戀者，因爲「一個樂於扮裝表演的男人，

airiti

如何讓人相信他沒有任何性別認同的障礙？」（同上引：100）。上述討論可以清楚看見，Newton 所挑選的研究對象，在性別身分與慾望的型塑上已跨越「認同政治」的層次，而進入「行動政治」的範疇。這雖與 Butler 後續的性別展演論具有高度的理論構聯性，但卻不一定得以等同類比爲 Coser 在反串時的心理機制。因爲至少就本研究的受訪者而言，反串的出發點是基於對角色的喜愛；此外，玩家在出角乃至於在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性別認同流動，更有些時候是透過反串的媒介而被「回溯性地」激發喚起的（詳見正文後續的分析）。這與扮裝皇后有意圖地性別展演，或有些許差距。對此，本研究在借用性別展演論時，宜將其視爲一種性別與認同政治的藍圖或投射，而非應然或規範性的分析架構和詮釋依據。

臺灣的 COS 研究（以碩博士論文爲例）最早出現於 2002 年（見宋丁儀，2002），至今已累積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以性別做爲研究主軸的論文，目前仍相對較少。這些研究對於反串究竟具有何種性別（政治）意涵，仍有相當分歧的看法，例如林宜蓁（2006）認爲 COS 確實有踰越性別疆界的能力，但莊雅惠（2011）卻認爲在「反串必須扮得像」這個 COS 團體內部的價值觀與共識規範下，反串其實是對主流性別價值觀的靠攏與複製，而並非真的具有打破性別疆界的政治性。從這些研究成果出發，本研究將避免斷然二分的思維去任意論斷反串究竟是種性別政治的棄守，或是具有某種顛覆性。透過文本盜獵與性別展演的觀點，本研究嘗試以更爲彈性的視角觀察 Coser 在反串行爲中，如何與主流的性別價值觀對話或對峙，並據此建構自我的性別認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 COS 中反串行爲具有何種性別意涵，以及玩家如何在反串行爲中型塑其性別認同。基於研究需求，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並選取適當的研究對象執行半結構式的訪談。

一、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有別於日常談話，而是一種帶有目的的對話。這樣的對話是基於研究者和受訪者在一個特定的議題上產生交流。由於在執行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和受訪者得以有較親近的互動，也能藉此取得較爲深入的研究素材（林淑馨，2010），因此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應屬適當。深度訪談法有助於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實際體會 Coser 內心的感受並進行紀錄和分析。

airiti

一般將深度訪談法分成三種類型：「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無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結構式訪談又稱爲「封閉式訪談」（close interview），是一種高度控制式的訪問，由研究者主導訪談的走向和步驟，受訪者不得更進一步追問。無結構式訪談又稱做「開放試訪談」（open interview），研究者無須先制定一套訪談依據，訪談的過程隨著受訪者的談話而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法」則擷取上述兩種方式的優點。訪談者會依著事先準備訪談大綱進行訪問，遇到有興趣的話題，或者受訪者願意講述更多，訪談者可以視情況追問並邀請受訪者積極參與對談（林淑馨，2010）。由於每位 Coser 在反串扮演時的心境多少有些不同，因此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訪談，一方面有助於從個案出發盡可能地蒐集（不符合原先期望的）研究素材，另一方面得以讓訪談的執行較易系統性地聚焦於本研究的關懷之上。本研究的訪談大綱請見附錄[6]。

二、研究對象

臺灣究竟有多少人是 Coser ？其性別與年齡的分布爲何？目前並沒有相關的統計資料。過去相關研究多半是以親身進入會場的感受，以及 CWT 或是 FF 等大型的同人活動所提供的人數統計來做推斷。這些研究指出，臺灣 COS 人數較多的年齡層在高中到大學左右的青少年，女性的比例占絕大多數（王鈺琴，2007；吳寧馨，1999；張立嵐，2007；羅資民，2008）。也正因如此，女性受訪者在過去研究中似乎是大宗。對此，張立嵐（2007）、馬士傑（2008）及高詩涵（2010）在研究建議中都曾提到，往後的相關研究可以增加對男性 Coser 的研究，讓 COS 的研究成果更爲完整。

呼應上述的發現與研究建議，本研究將研究母體的年齡層設定爲 16 至 25 歲，並以反串的角色數占 COS 經歷一半以上的玩家爲樣本，並刻意增加男性受訪者的人數，以增進對男性 Coser 的認識。在抽樣上，本研究主要透過人際網絡及網

6 必須說明的是，附錄僅是參考用的訪談大綱。本研究在執行訪談時，會以較為口語的方式進行。如果受訪者對問題有不瞭解，研究者也會進一步加以解釋。此外，訪談的順序也會視臨場狀況而作適當的調整，甚至增加或減少問題。另外，從研究者的觀察印象中發現，許多曾反串的男性玩家，很少會去 COS 其原生的男性角色。為了瞭解這樣的狀況，研究者會針對這方面再增加一些特定的問題。最後，為了使訪談更加順暢，研究者會先瞭解受訪者常去哪些社群網站，並藉此觀察他（她）們所喜愛的角色類型或是最近扮演的角色為何。此舉是因為本研究希望在訪談前能盡可能地熟悉受訪者，讓訪談的執行更為順利且更為深入。

airiti

路社群（例如：Plurk、Facebook）尋找適合的 Coser，並利用滾雪球抽樣法[7]，請他（她）們推薦其他適合的受訪者。在本研究進行書寫之前，共完成了 9 位受訪者的訪談。其中包括了男性 7 位、女性 2 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表 1[8]：

編號	職業	年齡	扮演過的角色數	反串過的角色數	反串比例
F1	大學生	19	4 個	3 個	75%
F2	大學生	22	12 個	10 個	83%
M1	高中生	17	2 個	1 個	50%
M2	大學生	19	2 個	2 個	100%
M3	自由業	22	5 個	4 個	80%
M4	服務業	24	3 個	3 個	100%
M5	技術員	24	5 個	4 個	80%
M6	上班族	23	6 個	6 個	100%
M7	待業中	25	約 30 個	約 30 個	100%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肆、Cosplay 中的反串行為與性別認同

以下，本研究先探討 COS 中反串行爲的一般性動機。其次，本研究嘗試摸索反串行爲所體現的有別於現實社會的性別邏輯。最後，本研究試圖探究的是反串行爲對 Coser 日常生活的性別認同產生何種影響，及其周遭親友們對 COS 的看法。

一、以愛之名：Cosplay 中反串行為的一般性動機

每到寒、暑假，總有個周末的臺大體育館，會湧進大量人群，一早就在體育館前排起長長的人龍。在人聲鼎沸處，有人開心的提著動漫圖樣的紙袋，有人興奮的交談，更有一群色彩鮮豔、穿著華麗，打扮成動漫角色的人們穿梭在其中，他們就是 Coser。形形色色的 Coser 於同人誌即賣會場外，或坐或站地讓人拍照，

7 滾雪球抽樣（snowballing sampling）是在特定母群體中成員難以找到時所採取的抽樣方式。抽樣的程序是先蒐集目標母群體的少數成員，同時再向這些成員徵詢資訊，以找出他們恰巧認識的其他成員（林淑馨，2010）。

8 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所選擇的玩家在反串扮裝時皆有特定具體的模仿對象，而這些模仿對象皆是玩家所喜愛的動漫角色。本研究在研究執行的期間，並未蒐集到沒有特定模仿角色的反串行為或個案。這可能是因為此類反串行為在 COS 中較為少見。坊間目前也僅有一篇研究提到其受訪者因為跨性別的身分，在動漫社中意外發現「圈內人」都可以接受男扮女裝而加入 COS 的行列（吳詩媛，2009）。本研究認為，這點研究限制或許是後續研究可以持續努力的方向。

airiti

更替每次活動掀起了許多高潮。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女生出男角或是男生出女角的情況非常普遍，不足爲奇。原本存在漫畫或動畫裡的角色，透過 Coser 精細的擬仿，像是活了起來般，走入現實之中。據此本研究發現，Coser 運用扮裝的方式，讓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產生了連接，參與其中的人更彷彿掉入幻想的國度。

COS 的扮裝與一般的表演或者萬聖節化妝舞會的扮裝有些差異，因爲 COS 的玩家特別強調扮裝是出自心中對角色的喜愛。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皆表示，扮裝的動機是「因爲愛」，而反串的動機亦同。例如：受訪者 M2 即表示「爲什麼想反串角色？應該說一開始讓我想 COS 的就是女角」。此外，反串被諸多受訪者認爲是「理所當然」的行爲，就像「女生天生都喜歡男生一樣」（F2）合乎情理。「喜歡」或是「愛」這樣的說法有些抽象。研究者將其具體歸納爲以下三種情形：

（一）對角色的熱愛

使 Coser 去 COS 和反串最普遍的原因便是喜歡角色。然而，許多動漫迷雖然喜歡角色，但不會真的去COS，而只選擇閱讀作品或購買相關產品。相對而言，多數 Coser 更強調自己在扮裝中感到確切的「歡愉」。他（她）們指出，扮演自己喜歡的角色使其暫時存在現實中，如此才能真正表現出自己對該角色或作品的熱愛。

例如受訪者 F2 表示，「因爲實在好喜歡他（角色），很希望他真的存在，就算是由我自己來扮演也可以」。另外，受訪者 M4 剛開始接觸 COS 時，只是單純的拍拍照。由於他所喜歡的都是些冷門的角色，在即賣會場上幾乎看不到 Coser 扮他喜歡的角色，於是他決定自己投入 COS 的行列，將自己所熱愛的角色扮演出來。換言之，Coser 因爲閱讀文本而對角色產生熱愛，進而主動地進行扮演並於其中感到愉悅，是 COS 和反串行爲的其中一個一般性動機。

此外，受訪者 F2 表示，只要「順眼」而且角色具有正義感，無論是男角、女角（甚至角色不是人類）她都可以扮演。受訪者 M4 亦表示自己曾扮演過多重人格、可男可女的角色（例如：奇幻小說《空之境界》的「兩儀式」，該角色雖是女性，但同時用有兩性的人格特質，並因應不同的情境而交替出現），而他挑選角色的判斷依據，主要是該角色是否具有獨特性與新奇性。這顯示 Coser 在反串之初，性別或性別認同的面向或許並不是玩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二）朋友的慫恿

因爲朋友的慫恿而開始 COS 的玩家不在少數。本研究發現，許多 Coser 的

airiti

第一次扮裝或反串，都是在朋友慫恿或是邀請組團下發生的。例如受訪者 F1 在談她如何踏入 COS 圈時，便開心的說：「是被朋友推坑的」[9]。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 M1 身上，M1 第一次 COS 是在學校友人起鬨下，學姐故意拿套女角服裝讓 M1 穿上。M1 在 COS 的過程中逐漸對反串產生興趣，之後發現自己最喜歡扮演女僕類的動漫角色。受訪者 M5 則是因爲看到網友在徵團[10]，進而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經驗。除此之外，多數 Coser 還表示，COS 好玩之處在於「可以結交到很多朋友啊！」（M3）。由此可見，透過 COS，玩家得以拓展其交友圈和生活圈，並進而形成特定的興趣社團。

（三）對服裝的著迷

Coser 所扮演的角色種類不外乎是 ACG、視覺系、布袋戲或電視電影等類型。其服裝並非日常生活的普通衣著，而是極其華麗、誇張、特殊的反串裝扮。有部分 Coser 便是對這些一般不會去穿的反串服裝感到著迷。受訪者 M7 認爲，扮演女角的自己很迷人可愛，所以女僕（和小丑）是他在約 30 個 COS 角色中，經常選擇反串的角色類型。M5 也有相同的經驗，他表示「去同人展的時候看到僞娘[11]，想說他穿得這麼可愛，我也想穿這麼可愛的衣服」。可愛的服裝是促使他 COS 的原因之一。此外，Coser 在選擇要不要反串該角色時，亦會仔細地斟酌：這服裝做不做得出來？這服裝所需的花費？這服裝是否能讓自己扮到別人看不出原生性別？由此可見，Coser 對於反串服裝的著迷，具有許多理性思維的面向。而追求完美的反串，可能是其中最令 Coser 在意的點。

綜上所述，無論是基於對角色、對服裝的喜愛，或是在朋友慫恿下誤打誤撞地進入 COS 的世界，玩家皆在扮裝的過程中感到滿足踰越、甚至對此耽溺迷戀。而 COS 反串行爲是否或如何展現出不同於主流價值觀的性別邏輯？以下持續對此加以探討。

二、Cosplay 反串行為的性別邏輯

COS 是一種流動的藝術。此時此刻的一個動作、一個眼神，在下一秒鐘又

9 推坑是同人界的流行用語之一。所謂的「坑」就字面上的意思為一個洞或陷阱，但此處指的是一個作品或一個角色。「推坑」便是把人推進洞中，有一同瘋迷某部作品或角色的涵意。

10 徵團是指召集者公開徵求某部作品的同類型角色，一起參加活動、外拍或交流（倪逸蓁等，2006）。

11 偽娘為 ACG 界的慣用語，意指雖生理上為男性但容貌天生有女性化的美，或是喜愛做女性打扮的男性。

airiti

會有完全不同的風貌。爲了留住剎那的美麗，Coser 會透過攝影將自己扮裝的樣貌保留下來。照片更成爲了 COS 圈內主要的交流工具。研究者觀察發現，在 Facebook 或 Plurk 等社群網站的 COS 社團裡，Coser 們經常會上傳公開自己的反串扮裝照，其中也有許多人會分享國內外 Coser 的照片。這些照片的分享經常引發圈內同好的熱烈討論。

仔細觀看這些照片，通常在 Coser 的精心打扮再加上後製修圖技巧，這些照片往往令人難以清楚辨別玩家的真實性別。本研究更發現，如果 Coser 的反串扮相與原著角色相似度極高且讓人完全看不出其原生性別，則會被圈內同好大力讚賞。因此，以「COS 到別人看不出我的原生性別」（M5）或「扮什麼像什麼」（M2）作爲最高指導原則，是此一興趣社團的團體共識或規範。即使達不到完美，Coser 也要力求接近完美，否則反串就會令人覺得「很失敗」（M2）。

比方說當一位男性 Coser 丟出自己的反串照到社群網站上，好友們便會以半開玩笑的方式調侃對方，像是「你可以當我女朋友了！」或「女孩好漂亮」之類的句子，故意戲稱對方爲「女生」。不過，男性 Coser 並不會有被嘲弄的感覺，反而認爲這是一種稱讚。類似的狀況亦發生在女性 Coser 身上。受訪者 F2 表示，要扮到讓人完全認不出原生性別有些困難，但只要別人稱讚她「你好帥」，心情就會很愉悅。她覺得這樣的讚美是一種認同，而這樣的認同讓她想一直 COS 下去。綜合上述觀察印象與訪談紀錄，本研究將反串所體現的性別邏輯歸納爲以下兩點：

（一）原生性徵的淡化

原生性徵的淡化，是 Coser 反串時注意的重點。例如男性 Coser 在扮演女角時，必然會刮除鬍子與腿毛以淡化其性徵。受訪者 M2 特別強調處理好體毛是非常重要的，因爲有些男生鬍子長很快，即使早上刮了鬍子，常常下午就長出來，如果沒有補刮的話，這樣的女角扮像就很糟糕。M3 亦認同這點，他認爲男生長鬍子這點，在扮女角上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此外，受訪者 M5 更強調，由於自己的身高較高，所以他會刻意選擇長髮、胸部大且身形較高的女角，因爲這樣的角色扮演得以符合他的生理條件或侷限，更能盡情展現他內心女性化的一面（M5 表示自己表面上是男生，私底下是女生）。日本遊戲「東方 Project」中的美少女角色，是他的首選。

胸部的處理則是男女 Coser 皆在意的重點。胸部是男女性徵最明顯的差異，女性 Coser 若能淡化此特徵，即可讓反串接近完美。對此，女 Coser 通常在扮演男角時會穿上束胸，掩蓋自己隆起的胸部。例如受訪者 F2 扮演過 10 個男角，經

airiti

驗豐富的她，仍對穿著束胸難以習慣。然而，即便穿束胸令她不適，但爲了扮得像，F2 還是勉力爲之。受訪者 F1 則提出另一種情形。她表示自己在扮演男角時尚未有穿束胸的經驗。這是因爲一方面她的胸部不大，再加上她所扮演的角色是有點胸肌的身材，所以胸部些微的隆起並不會顯得怪異。

如何讓胸部在反串時不顯得突兀，除了是女 Coser 在意的點，更是男 Coser 細心處理的部分。受訪者 M2、M3 與 M5 皆表示如果胸部沒有調好位置，視覺上會極爲不佳，令人無法接受。他們並且表示，原生性徵的淡化是對角色的尊重。如果沒有做到這點，很容易招致同好們的非議。

（二）原生性徵的極盡掩蓋

除了淡化原生性徵，還有些 Coser 們試圖竭盡所能地完全掩蓋其原生性徵，讓其反串無可挑剔。在化妝上錙銖必較是最直接的方式。例如透過加深、加粗眉毛增添陽剛氣息，或在唇部塗上粉色的唇彩以呈現柔媚。再加上模仿異性的神韻、姿勢和小動作，便能使得 Coser 在反串時唯妙唯肖。化妝及模仿動作神韻，是玩家們用來盡力掩蓋原生性別的方式。另外，受訪者 F2 還提到：「還有儘量不要笑，因爲很多動漫裡的男生都不笑的，幾乎啦！眼神的話則要專注，看起來就會比較像一點」。

男性 Coser 亦十分在意於反串時掩飾其原生性徵。例如女角扮相精細的受訪者 M6 表示，他是透過日常生活中對女性的觀察，藉以學習模仿女生的動作及談吐。而他喜歡具有姊姊氣質的女角，例如護士。另外，受訪者 M7 即使已有 8 年的 COS 經驗，仍努力學習如何更貼近女角的儀態：

> 我覺得全部都要注意耶！就是你自己能改的部分。像說話的方式、體態，不過還是很多人說我體態像男生，有朋友還教我女生走路的方式。反正就是你扮的時候，要讓整個舉止看起來還像是個女生，不然你都反串了還用男生的方式走路，那真的不太好看。總之就是讓自己所有舉止像女生，如果你講話不 OK 的話，甚至可以不要講話，用點頭搖頭之類的。（M7）

此外，新手 Coser 在第一次嘗試反串扮演時，往往會因爲原生性別的掩蓋做得不好，而感到挫折。M4 提到自己第一次扮女角，覺得自己的扮相很怪異。事後回想，他發現是因爲當時自己還不太會化妝，加上他的體型和日常打扮皆「很

airiti

男性」，所以看起來不像女生。F2 也表示自己第一次扮男角時，完全抓不住男生的眼神。對此她感到有些沮喪。

綜上所述，不管是原生性別的淡化或是極盡掩蓋，皆是 Coser 爲了更加貼近反串的角色而念茲在茲的課題。對此，本研究發現，在 COS 圈內讓人訝異或責難的並非反串行爲本身，而是反串角色時卻沒有盡己所能，將原生性別淡化或掩蓋到最好。

三、美夢一場？從反串行為到日常生活的性別認同

許多社會大眾認爲 Coser 是群愛作夢的孩子。事實上，COS 所提供的現實與虛幻交錯的空間，確實會讓身歷其中的 Coser 覺得宛如身在夢中、美夢成真。但是當 Coser 卸下裝扮、離開會場，並回歸生活之後，是否如夢初醒？曾經發生的一切對 Coser 的生活而言是否或如何帶來影響嗎？過去的研究指出，反串行爲確實會讓 Coser 產生性別認同的流動。但是這樣的情形乃是有限度的。因爲性別（認同）的踰越僅停留在反串的當下，Coser 在日常生活中仍多半從屬於主流社會的性別規範（林宜蓁，2006；莊雅惠，2011）。不過，本研究嘗試提出另一種思考和推敲。本研究於前述文獻探討時曾指出，COS 與反串對玩家來說，是一種自覺的「樂趣」。既然是「樂趣」，應或多或少會影響到 Coser 的日常生活，或難以在卸妝後完全地切割撇清。

以下，本研究先陳述 Coser 在反串時所產生的性別認同轉換。接著，本研究試圖探討反串行爲對 Coser 日常生活的影響，包括玩家如何面對親友們的評價。

（一）美夢之中：性別認同的轉換

2012 年 10 月 27 日，研究者跟著受訪者 M4 一同來到於臺大體育館舉辦的 PF 會場 [12]。在體育館三樓平台處，有許多正在著妝、換裝的 Coser，其中不少反串女角的男 Coser 聚集在此處。研究者觀察男 Coser 彼此間的互動發現，換裝時他們彼此會像玩耍般嬉鬧對方，也有人直接掀起裙子調整起大腿襪，完全不是一般女生會有的行爲。當 M4 介紹已著完裝的 M5 給研究者認識時，M5 不只舉止像女性，連聲音也刻意用輕柔的假音，性別認同彷彿在 Coser 穿上角色的衣服、化完妝戴上假髮後產生了轉換。同樣的情形研究者也在 M2 身上看到。研究者第一次看到 M2 時，完全看不出他的原生性別是男生，而且他堅持就是不說話，讓

12 PF 為 Petit Fancy 的簡稱，是杜葳廣告公司所於臺大體育館所舉辦的同人誌即賣會活動。

airiti

人難以猜出他的性別。M2 在訪談時曾向研究者說明，因爲覺得自己的聲音很難像女生一樣，所以扮女角的時候，他都很少說話。

本研究發現，Coser 反串角色時，特別強調精神與心態上的轉換。轉換得宜，扮出來的角色就能夠更完美。更重要的是，在心態轉變後，即使 Coser 要做平常不會做的異性姿勢，內心也不容易有疙瘩。訪談中問到，在反串角色時內心是否有「我在當異性」的感覺？對此，受訪者 M5 指出，因爲心態上有轉換，所以做女生的動作時，就像是一個女生一樣自然。由此可見，性別認同的轉換在 Coser 反串時，是常見的一般現象。

此外，多數 Coser 認爲，如果在內心沒辦法轉換成你所扮演該角色的性別，產生不同的性別認同，則將難以將角色呈現得很好。例如受訪者 F2 回想起第一次扮演男角，因爲沒有做精神上的轉換，而無法融入該角色，她提到：

> 我第一次扮的那個男角還蠻可愛的，所以沒什麼特別感覺，可能是因為第一次吧！很多都在嘗試，因為不知道男角的眼神要怎麼扮。那次拍的時候就不是很滿意，就覺得我內心還是個女人，只是穿著男生的衣服，覺得自己不夠融入那個角色。所以我之後出男角，就會想像自己是個男生這樣。（F2）

上述情形呈現出，在 Coser 反串角色時，性別認同幾乎必然呈現出流動的態勢。無論是主動地在扮裝之前進行心態上的調適，或是在後續持續的反串過程中自主性地開始意識到性別認同轉換的重要性，在在顯示出流動的性別認同是 Coser 建構美夢並持續身處美夢之中的憑藉。

（二）美夢成真：從性別認同到性別的日常實踐

過去研究指出，在 COS 的國度裡，Coser 可以盡情的玩耍嬉戲，恣意扮演自己喜歡的角色（汪佳妮，2006；馬士傑，2008）。但在玩樂結束回到日常生活中，Coser 們亦回到社會的性別框架中，並從屬於其中的性別規範。然而，本研究研卻發現，性別認同的踰越悄悄從 COS 的虛擬世界跑到日常生活的性別實踐中。而且這樣的情形，男女有別。

本研究的女性受訪者們表示，在卸下裝扮之後，她們即回歸平常的性別角色。COS 對她們而言像是一塊休閒的寶地，讓她們偶爾在裡頭嘗試當另一個人、另一種性別的滋味。對她們來說，COS 所創造出的虛擬時空與現實之間乃是分割的、不連

airiti

續的。研究者進一步觀察 F1 與 F2，發現兩人有許多相似的特質。除了兩人的外貌與妝扮皆是甜美的風格，她們在個性上面也顯現出溫馴的傳統女性特質。這或許是兩人在暫時性地踰越性別框架之後，仍選擇回到了主流性別秩序之中的原因。

然而，在男性受訪者身上，研究者則看到了多元性別認同與性別實踐的可能性。男性 Coser 在產生性別認同轉換之後，會選擇將認同的轉換進一步於日常生活中實踐。透過在日常生活中穿女裝，有人開始探索新自我並發現生活樂趣，也有人藉此得以找回真正的自我和存在價值。受訪者中，僅有 M4 沒有在日常生活中穿過女裝。而將男性受訪者於日常生活的多元性別實踐，大致可歸納成以下兩個原因：

1. 探索新自我，女裝是種新樂趣

許多受訪者表示，扮演過女角後發現，穿著女裝其實很好玩、很新鮮，並沒有想像中討厭。例如 M1 說：「穿上女生的衣服，雖然會緊張，但是新鮮感還是占最大，就覺得因爲這是從來沒有做過的事」。受訪者 M2 也有相同感受，他表示：「我是小時後就穿過女生的衣服，就第一次反串給我的感覺是，能當一次女生也不錯，像那種感覺」。類似情形也出現在 M3。他表示在 COS 之前從未穿過女裝。因爲在公開場合出過女角後得到了很好的評價，甚至興起了「偶爾穿女裝跟朋友逛街」的念頭。由此可見，男性 Coser 透過暫時的性別轉換，得以體會到以往不曾感受過的愉悅。

個性上很具男子氣概的受訪者 M6，則完全無法想像自己會去做「這種事」。因爲在會場上看到許多 Coser 玩鬧得很開心，讓 M6 也想加入反串的行列。但是，剛開始化妝、穿女裝時，他「完全不敢看自己的臉」，難以接受。後來，M6 因爲其女裝扮相受到他人的稱讚，使他漸漸有成就感，越發喜歡女裝打扮。M6 現在偶爾會趁著工作閒暇之餘，到朋友家一起穿女裝拍照，或是去景點外拍。

本研究發現，多數的男性 Coser 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反串的原因可能是，「在公開的場合出過女角後，就會發現穿女裝自己能接受，別人也能認同你，你就會進而想說私下跟朋友在一起，或是逛街，偶爾穿一下女裝，也不是不能接受的」（M2）。對於這些 Coser 而言，反串是件探索新自我且有樂趣的事情。而自己覺得有趣，顯然比一般人的異樣眼光或責難來得更爲重要。

2. 找回真自我，女裝讓我很自在

本研究的男性受訪者中，M5 及 M7 是比較特別的情形。他們同樣對穿著女

airiti

裝感到愉悅。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反串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是基於樂趣，而更是種呈現真實自我的方式。M5 向研究者提到，「我覺得我算是 CD」[13]。他認為自己在工作或是與家人相處的時候是男生，但和朋友在一起的私人聚會場合裡則是女生。而「因為 COS 打開那個開關」，才讓他有機會開始探索和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真正的性別認同。M5 在扮女角之餘，有時也會與朋友一起穿女裝去逛街。他對於自己這樣的性別認同轉換感到十分自在，目前並未有變性的念頭。

受訪者 M7 是本次受訪者中 COS 年資最長，且僅 COS 女角的玩家。他表示在很小的時候，便有穿著女裝的經驗。之後因為 COS，讓他「回溯性」地喚起自己「遠古的記憶」。他非常喜歡反串時的自己，穿著女裝讓他感到「找回真自我」，體驗真正的存在價值。M7 還向研究者表示「我恨不得自己不是生理男」，甚至有了變性的念頭和打算。但是這個念頭卻在醫生評估與勸阻下暫時作罷：

> 我知道自己生理性別是男性，其實我有去看過醫生，他說我這個靠變性手術是沒辦法解決的。我自認自己是中性的，比較像男生或比較像女生的部分，是從服裝來判定的，像我現在穿男裝，個性就比較開放。（M7）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因為覺得穿女裝很有趣，或是認為穿女裝才是真自我，COS 的反串行為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對 Coser 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實踐帶來影響。雖然若冒然地宣稱 COS 的反串行為得以挑戰或鬆動社會的性別劃分，恐怕太過武斷。但是 COS 的反串行為確實使得多數的 Coser 有機會將其性別認同的流動付諸實踐，並於日常生活中展演。對此，Coser 即使在性別認同上自我認定為異性戀者，但是他們對於跨性別、同性戀等非主流群體，也開始產生了相當的認同或支持。

（三）夢醒時分？來自周遭親友的評價

許多受訪者表示，周遭親友的支持或反對是影響其反串意願的重要因素。臺灣社會的一般家庭對於 COS 仍存在著較多負面的看法。亦有許多家長（以父親為主）完全無法容許孩子去做反串扮演。對此，有些 Coser 嘗試與家人進行溝通。例如受訪者 M5 的父母，在幾經溝通之後答應 M5 可以去扮女角，但是絕對不能以女裝的打扮回到家中。M5 並且表示，由於他是家中的長子，傳宗接代的壓力

13 CD 為 cross-dressing 的縮寫，意指對於穿著異性服裝會有特殊情感，或是感到性興奮的人。這與單純因為喜歡可愛扮相而反串 Coser，有著根本的性別認同差異。

airiti

和期待迫使他只能儘量低調地掩飾自己對 COS 的熱愛以及自身的性別認同。對此他必須經常向家人澄清自己「是正常的」。M6 甚至被「嚴格規定」在家中一概不得提及任何有關 COS 的事情。此外，有部分的家長因爲不懂 COS，因此對此不表示意見。例如受訪者 F1 的家人，以爲 COS 是在扮歌仔戲，他們也並未多作評價，而 F1 也順其自然地不打算跟家人解釋。

然而，不同於一般大眾對 COS 多採負面的評價，仍有少數的家長支持自己的孩子 COS 和反串。受訪者 M2 表示，雖然父親對他的反串「不做表態」，但母親卻給了自己高度的認同和支持，甚至會教導他如何化妝或擺姿勢。受訪者 M3 的媽媽和阿姨還會跟他分享化妝品。另外，受訪者 M1 的母親在看過他的女角照片後，還開玩笑的表示，自己好像多了一個女兒。上述案例雖爲少數，卻顯示出並非所有家長皆排斥孩子反串。對 COS 稍有認識的家長，便會發現那並不是媒體所塑造出來的「浪費錢」、「搞怪」的活動。而 M1 與 M2 更表示，親人的支持是支撐他們繼續進行下去的動力[14]。

Coser 除了面對來自家人的贊成或反對，亦面臨其它朋友的看法。相較於家人，Coser 的朋友年紀尚輕，屬於較新的世代。他（她）們對 COS 這類較新穎的文化多半能夠接受。另外，雖有少數幾位 Coser 表示朋友中亦有些嘲諷的聲音，但他（她）們並不以爲意。例如：受訪者 M2 則直接說「反正是我穿又不是你穿」，來反擊對他反串有意見的朋友。受訪者 F2 還表示，週遭有朋友很討厭 COS，不過她不會因此討厭他（她）們，因爲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好惡。對此，F2 會避免將自己反串的照片放到這些朋友會看到的社群網站上。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相較於一般朋友對 Coser 的評價，家人對 Coser 的影響力更甚。如果遇到朋友不支持自己，Coser 多半予以尊重，不會要求每個朋友都要接受自己。但是家人如果反對或阻止，Coser 通常就無法用置之不理的方式。這可能是因爲家人畢竟是一起生活的人，而爲了 COS 傷害彼此感情，是 Coser 所不樂見的事。簡言之，家人的認同對 Coser 是否能繼續享受美夢時分，或是只能夢醒以對，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 COS 中的反串行爲與性別認同。透過對 7 位男性、2 位女性受訪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本研究發現多數 Coser 起因於「因爲愛」而開始

14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受訪者並未遭受到家人大力的阻撓，主要是因為：(1) 受訪者已成年，在金錢的使用上有較大的決定空間；(2) 受訪者的年齡與心智較為成熟，和家人的溝通技巧亦較佳。

airiti

進行反串，他（她）們並且在反串中確切體會到愉悅快感。其中，尤其是男性 Coser 在反串時，有逐步體現性別認同的流動，或藉此找到真實自我之可能性。COS 的反串行爲與性別認同，可從以下三方面加以統整和討論。

一、Cosplay 中反串行為的性別意涵

本研究發現，Coser 無論其原生性別爲男性或女性，皆因爲喜愛角色進而產生反串的慾望。而 COS 則提供一個沒有性別限制，能夠自由扮裝、無慮的「異裝空間」，讓玩家得以沉浸於扮裝反串的美夢之中。本研究發現，COS 是一個讓玩家不用擔心外界眼光，並且得以放心、恣意的扮演任何性別角色的場所。因爲在 COS 的世界裡，不會因爲扮演的角色與 Coser 的原生性別不同，而被投以異樣眼光。對此，相較於性別類目壁壘分明的現實社會來說 ，COS 所營造的虛擬空間顯得更爲包容與開放。

然而 COS 團體內部對於反串的寬容，並不全然意味著 Coser 可以隨意隨興地扮演。Coser 仍必須遵照團體內部的性別邏輯，並努力淡化或極盡掩蓋自己的原生性徵。假如 Coser 能夠扮演到讓人看不出其原生性別，便會受到大力讚賞。否則，Coser 極有可能招致同好的責難。這裡我們不難發現的是，COS 團體內部的性別空間雖然看似較爲多元、寬容，但其審美觀和一般大眾的審美觀恐怕並無本質上的差異，亦即男性必須帥氣，女性應要柔美。在這套規範性的審美觀制約之下，所有反串的 Coser 們汲汲營營追求和扮演的，仍是社會主流的性別刻板印象。所以女性 Coser 要扮得像男性，則必須有著銳利的眼眸、霸氣的動作，或呈現出惜字如金的冷漠形象。男性 Coser 則要在反串時用輕聲的語氣、甜美的笑容來凸顯其柔美氣質。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爲在虛擬的扮裝空間中，現實世界的性別價值觀並未消逝，反而在反串行爲中弔詭地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鞏固和確認。

此外，雖然有些動漫角色在性別氣質光譜上，呈現出曖昧或流動的狀態。然而這些角色仍有原初的性別設定，Coser 在受訪時亦可清楚交代自己在扮演的是男角或女角（唯一具有扮演曖昧性別氣質角色的 M4 說明，自己挑選「兩儀式」的原因，只是因爲角色本身較少人扮，所以比較不會跟別人「撞角」）。後續研究或可特意挑選具有高度性別跨越自覺的玩家，以及經常扮演曖昧性別氣質角色的玩家，並深入探索其扮裝行爲和性別認同的關聯性。

二、反串行為與玩家的性別認同形塑

本研究發現，反串行爲對於 Coser 性別認同的型塑，因爲「夢境中」與「夢

airiti

醒後」兩種情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所謂「夢境中」意指 Coser 在諸如同人誌即售會場或是外拍等場域中，爲了更貼近所反串的角色，因此會在心境上做轉換，並體現性別認同的流動。然而這樣的性別認同流動乃是有極爲有限的，因爲部分的 Coser 一卸下裝扮後，他（她）們便會從美夢中甦醒，回歸於其原生性別。

然而本研究也發現，有些 Coser 在離開 COS 的場域並回歸現實生活後，反串所造成的性別認同轉換並未全然了無痕跡，而更可能在玩家心中留下記憶，甚至影響其日常生活的性別實踐。尤其是男性 Coser 藉由反串，除了開啓了探索自我的機會，更有些玩家藉此肯認到真我的存在價值，並對於自身的性別認同困境有不同面向的省思。對此本研究認爲，COS 反串行爲中的性別認同流動，確實具有潛力得以挑戰現實社會中僵固的性別劃分。這點發現值得未來相關研究加以深入探討。

三、Cosplay 的文本盜獵與性別展演

按照 de Certeau 的說法，讀者主動的閱讀和詮釋行爲可稱之爲盜獵。而透過對文本加以片段式地拆解和竊取，讀者得以有意識地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意義成品。從文本盜獵的觀點來看 COS 與反串，本研究認爲反串行爲儼然就是一種文本盜獵的實踐。因爲 Coser 在閱讀、理解現實社會中的性別框架之際，進一步透過扮演的方式試圖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性別文本，這本身即是一項具有高度理性和自覺性的閱讀行爲和意義創作。

此外，Coser 透過反串行爲進行的性別文本創作，亦可能對傳統的性類目進行改編與嘲諷。性別在 COS 的虛擬世界裡，不再只是二元對立的僵化空間，而更存在著多元性別認同和性別實踐的可能性。這除了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實體性別化社會所塑造的性別規範，更彰顯出性別與性別認同之間的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與不確定性。而這樣的不連續性與不確定性，更得以透過 Coser 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反串逐步走出虛擬世界，並進而在現實社會中體現和展演。

Butler (1999)（亦見王孝勇，2007，2009）在其性別展演（gender performativity）論中提及，性類目、性別認同並非本質存在，亦非超驗／先驗的奠基行爲。而異性戀社會中的性別劃分雖是強迫性的產物，更是歷史偶然性的社會建構。因此，原生的性別並不存在，性別本身乃是一種模仿。透過性別的重複模仿，我們得以對權力關係加以顛覆的、諧擬的重新援用／部署（redeployment）與再意義化。事實上，Coser 透過言過其實、以假亂真的反串，亦間接折射出性別本身的能動性特質（agency）。他（她）們除了認知到生理男性不見得非得表現出陽剛特質、生理女性不必然要嬌柔順從，更有幾位男性 Coser 走出虛擬的扮裝空間，卻仍選

airiti

擇在穿上異性的服裝，享受其中的愉悅並自我肯定。這種從個別性別主體出發並實踐的性別主體化動力，或許並未立即等同於 Butler 所揭櫫的扮裝皇后在諧擬展演之際進而嘲諷、解構異性戀權力關係的認同政治戰略，亦尚未足以撼動主流社會的性別劃分與性別框架，但其潛力仍值得後續研究持續探索與評估。

參考書目

STAY（2007）。〈灰色眼神〉，《COSMORE》，3：66-68。

VAIO（2006）。〈臺灣 Cosplay 活動的源起與發展〉，《COSmania》，1：98-101。

方剛（2000）。《神話中的男女關係》。臺北，臺灣：上游。

方琳琳、黃春柳譯（2009）。《日常生活實踐：1. 實踐的藝術》。南京，中國：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de Certeau, M. [1990].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 1. Arts de faire*. Paris, France: Gallimard.）

王孝勇（2009）。〈掙脫語言的枷鎖？從 Mikhail Bakhtin 論「表述」談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0：203-244。

———（2007）。〈女性主義立場論的主體與權力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1：89-146。

王鈺琴（2007）。《穿越時空愛上你——關於角色扮演者「觀看」與「被觀看」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禾子（2005）。〈什麼是 COS ？〉，傻呼嚕同盟（著），《COSPLAY・同人誌之秘密花園》，頁 144-149。臺北，臺灣：大塊文化。

池元蓮（2005）。《性革命的新浪潮：北歐性現狀紀實》。高雄，臺灣：萬有。

何春蕤（2003）。《跨性別》。中壢，臺灣：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吳詩媛（2009）。《邊緣／異己之歌：五位性別少數的性別認同與學校生活適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吳寧馨（1999）。〈繁花下水道——集體串連的同人誌文化〉，《張老師月刊》，262：66-73。

宋丁儀（2002）。《消費社會的閱聽人——以霹靂布袋戲迷爲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汪佳妮（2006）。《角色扮演現象分析研究與服飾設計應用》。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碩士論文。

airiti

尚衡譯（1990）。《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臺北，臺灣：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80]. *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Paris, France: Gallimard.）

林文源譯（2002）。《傅科與酷兒理論》。臺北，臺灣：貓頭鷹。（原書 Spargo, T. [1999]. *Foucault and queer theory*. New York, NY: Totem.）

林宜蓁（2006）。《Cosplay 角色扮演的反叛：以消費與性別爲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淑馨（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臺北，臺灣：巨流。

邱雯祺（2009）。《臺灣同人文化再現與實踐——以「開拓動漫祭」爲案例》。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紀大偉（1997）。《酷兒啓示錄：臺灣當代 Queer 論述讀本》。臺北，臺灣：元尊文化。

倪逸蓁、陳永修、楊佳蓉、姜漢威、Thalia、Ukon 等（2006）。《變身天使寇詩兒》。臺北，臺灣：文藝復興。

席珍（2006）。〈席珍的隨想。記趣專欄〉，《COSmania》，2：72-73。

馬士傑（2008）。《與他人一起扮演「他人」：角色扮演活動的建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詩涵（2010）。《Cosplay 青少女玩家部落格相簿的自我形象呈現——以 G. H. Mead 自我概念爲分析》。慈濟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小虹（1996）。《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臺北，臺灣：聯合文學。

張世倫（2006）。〈人人都是主角——幻想與真實交織的 Cosplay 文化〉，《臺灣光華雜誌》，31（12）：86-96。

張立嵐（2007）。《扮誰像誰？迷的行爲特質、實踐與認同研究——以青少年 Cosplay 爲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君玫譯（2002）。《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高雄，臺灣：巨流。（原書 Storey, J. [1999].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Arnold.）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臺灣：東華。

張靄珠（2000）。〈性別反串、異質空間、與後殖民變裝皇后的文化羨嫉〉，《中外文學》，29（7）：139-157。

莊雅惠（2011）。《性別圖像與迷群思維——以霹靂布袋戲爲研究對象（2000－2009）》。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芳瑋（2007）。《臺灣同人活動歷程及創演經驗初探》。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airiti

陳明秀（2011）。〈文化的遷徒與變異：以臺灣的同人誌活動中布袋戲 Cosplay 現象爲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0：151-178。

游莉玫（2008）。《宜蘭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性別認同認知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國書（2008）。《扮裝異男的性別逾越／愉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認真穿著洋裝的異性戀男人〉，《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0：83-88。

傻呼嚕同盟（2005）。《COSPLAY・同人誌之秘密花園》。臺北，臺灣：大塊文化。

劉泗翰譯（2011）。《性別的世界觀》。臺北，臺灣：書林。（原書 Connell, R. W. [2009].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Polity.）

鄭玄藏（1993）。《性教育：主題輔導工作坊研習手冊》。臺北，臺灣：教育部。

羅資民（2008）。《身體書寫下的自我認同、交融、與通道儀式 —— 臺灣 Cosplay 文化之表演研究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嚴玉鳳（2001）。《電視談話性綜藝節目與性別反串之再現》。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Anne, B. (1996). Traversing gender: Cultural context and gender practices. In S. P. Ramet (Ed.), *Gender reversals and gender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p. 22-51). New York, NY: Routledge.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1997).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acen, J. J. (2000). Girrrl power and boyyy nature: The past, present, and paradisal future of consumer gender identity. *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 *18*, 345-356.

Mills, M. (1996). “Homophobia kills:” A disruptive moment in the educational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7*, 315-326.

Newton, E. (1979). *Mother camp: Female impersonators in America*.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oller, R. J. (1968).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London, UK: Hogarth Press.

airiti

附錄：本研究的採訪大綱

一、你（妳）的基本資料

（一）一開始是怎麼接觸 COS 的？

（二）爲什麼會想 COS ？

（三）請述說一下第一次 COS 的情形？

二、COS 對你（妳）的影響

（一）COS 對你（妳）來說最好玩的部分是哪裡？

（二）COS 對你（妳）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

（三）COS 對你（妳）的意義爲何？

三、你（妳）偏好扮演的角色種類

（一）以動漫迷的身分來說你（妳）喜歡哪個種類的角色？

（二）經常扮演的是哪一個種類的角色？

（三）如何決定要扮演一個角色？

四、COS 的反串行對你（妳）的意義與感覺

（一）你（妳）爲什麼會想做反串扮演？

（二）你（妳）覺得反串在 COS 中有甚麼樣的意涵？

（三）第一次嘗試反串扮演是甚麼樣的感覺？

（四）你（妳）反串時會注意哪些地方？

五、你（妳）自己本身的性別認同

（一）你（妳）的性別認同是？

（二）在日常生活中的打扮是否偏向中性？

（三）覺得自己的個性比較偏向中性化嗎？

（四）有在非 COS 或表演的情形下做異性的打扮嗎？

（五）會想變性嗎？

airiti

六、你（妳）COS 時的性別認同

（一）你（妳）在 COS 反串行爲時有「我在當異性」的感覺嗎？

（二）爲了 COS 反串行爲而必須做一些異性的動作你（妳）有什麼感覺？

（三）你（妳）會覺得 COS 反串行爲是樂趣的一種？

（四）你（妳）會追求「我要 COS 到別人看不出來我的原生性別」嗎？爲什麼？

七、反串對你（妳）的影響

（一）透過 COS 反串行爲讓你（妳）更加瞭解異性？

（二）透過 COS 反串行爲會讓你（妳）覺得在日常生活中做異性打扮很有趣？

（三）你（妳）認爲透過 COS 反串的扮演，是否會對社會主流的兩性劃分產生鬆動或挑戰？

八、你（妳）在反串時，大眾社會與週遭親友的想法

（一）家人知道你（妳）有在 COS ？有的話瞭解的程度與支持的程度爲何？沒有的話又是什麼原因不想讓父母知道？

（二）非 COS 圈的朋友知道你（妳）會 COS 並且很常反串出角嗎？有的話評價是什麼？

（三）COS 圈的朋友對你（妳）的反串扮演有怎樣的評價？

（四）你（妳）覺得同人活動會場中，攝影玩家或路人對反串看法爲何？

（五）你（妳）覺得一般大眾對 COS 的看法如何？

（六）你（妳）覺得一般大眾對反串看法爲何？

（七）是否有因爲反串而遭受攻擊？有的話你（妳）是如何面對與調適？

（八）會因爲別人對你（妳）的扮相攻擊？而不想再反串了嗎？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pp. 175-206, July 2014

Between the Imaginary and the Real: Cosplay Transvestites and Their Gender Identification

Ho, Hsin

Bachel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Wang, Hsiao-Y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ransvestitism and gender identification in cosplay behaviors.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ual poaching and gender performance, it asks whether transvestitism merely a temporary gender transgression, or a specific tactics aiming to dismantle the compulsory categorization of sex inherent in the gendered socio-culture. Base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author finds cosplay transvestites have to follow in-group rules which tend to echo mainstream gender values. The imaginary space deriving from transvestitism, however, do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ale) cosplay transvestites' gender identification, as multiple or flexible gender values could be encouraged and introduced in real life. As conclusion, the author suggests further examination for probing the degree to which gender politics is implied in cosplay behaviors.

Keywords: cosplay transvestites, textual poaching, gender performance, gender identification, the imaginary space

* Email: hywang2@pu.edu.tw
Received: 2013.08.18
Accepted: 2013.11.02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207-227．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5

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之概念、方法與方法論初探 *

施伯燁 **

國立政治大學數位人文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本文將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中相關概念、方法與方法論進行回顧。針對什麼是社群媒體？什麼是社群媒體使用者？如何理解社群媒體與使用者研究的後設觀點？如何從社群媒體的巨量資料中萃取意義？社群媒體與使用者研究的可靠度與限制為何？分別提出討論，並以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例，初步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者間的意義建構與解構。

關鍵詞：社群媒體、使用者、意義建構方法論、Web 2.0

* 本文改寫自作者博士學位論文部分章節，感謝論文指導教授、口試委員與兩位匿名評審的意見。
** Email: howard624@gmail.com
投稿日期：2013 年 9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14 年 3 月 2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前言

近年來，資訊科技領域，關注社群媒體所帶來的巨量資料（big data），希望透過電腦演算理解人機互動。行銷或管理學門，則關注社群媒體如何讓消費產生認同、轉換率及商業模式。研究者認爲，傳播領域應該從社群媒體中，重新探索媒體形式、文本意義以及以人爲本的溝通行爲。

因此，本文主要問題意識爲如何進行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並逐一建立研究概念，搜集研究資料，理解使用者間的溝通。具體而言，研究者提出 5 個問題，包括：什麼是社群媒體？什麼是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如何理解社群媒體與使用者研究的後設觀點[1]？社群媒體成員之間的互動與意義爲何？如何進行社群媒體－使用者的經驗研究？本文分別從社群媒體、使用者、後設觀點及方法論進行說明，並以社群媒體 Facebook「粉絲專頁」（pages）[2] 爲例，探討社群媒體研究所可能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貳、什麼是社群媒體？和「Web 2.0」、「UGC」有何不同？

第一個問題，本文先借幾個相關概念，來說明社群媒體「不是」什麼。在社群媒體相關概念中，最常被同時提及的討論，包括了 Web 2.0[3] 與 UGC（user-generated content）。

從網路發展歷史來看，自 Truscott 與 Ellis 於 1979 年創造「Usenet」以來，最早可能被稱作爲社群媒體的便是由 Bruce 和 Abelson 於 1998 年所提出的「Open Diary」網路社群服務，他們集合網路使用者，共同在一個網站上撰寫線上日記。近年，則是在 My Space 與 Facebook 等社群形態的網路服務出現後，社群媒體的概念才被人們大量提及 (Kaplan & Haenlein, 2010: 60)。

由此可見，社群媒體誕生的同時，和 Web 2.0 與 UGC 等概念幾乎同時被提

1 研究者以後設觀點意指研究或理論裡隱而未顯之「後設想法」或「世界觀」，與「後設理論」意涵接近。例如，Littlejohn (1999: 31) 指後設理論意涵為針對事物本質而超越任何特定理論之思辨。研究者以觀點稱之，尚因理論概念尚未完整成型。

2 粉絲專頁比較通俗的用法為「粉絲團」，受訪者通常以粉絲團稱之，兩者同義。

3 Web 2.0 一般認為是由 O'Reilly (2005) 提出，認為未來以 Web 2.0 為主的商業模式應具有以下特色：將網路視為平台、運用集體智能、將資料視為核心、以試用版取代升級版、輕量化的程式、分散式的軟件、豐富使用者的感受。

airiti

及。Kaplan & Haenlein (2010: 63) 認爲，Web 2.0 是相較於從傳統網路應用（或稱作「web 1.0」），延伸出相異功能應用與技術規格。例如 Blogs（部落格）、Wikis（維基）、Collaborative projects（合作計畫）、RSS（簡易資訊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或 AJAX（非同步 JavaScript 與 XML 技術，asynchronous java script）等，探討網路服務功能與技術規格上的轉變。因此，Web 2.0 是形成社群媒體「平台」（platform）的重要「觀念」（ideological）與「技術」（technological）基礎。

另一個 UGC 的概念，則是將社群媒體所產生的主要現象，賦予使用者面向的討論。例如，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Vickery, Wunsch-Vincent, & OECD, 2007) 從全球社群媒體中的現象進行觀察，提出UGC（或稱爲 UCC，user-created content）主要有 3 個特點，包括了「公開」（內容透過網路公開傳散）、「創意」（於該內容中投入許多個人的巧思）與「非專業」（往往不是專業人士或組織所提供的內容）。而其商業模式有別於過去的傳統網站，而是以捐款、服務加值、廣告、內容加值、社群行銷等，建立起新的網路產業形態與互動關係。

也就是說，借 Web 2.0 與 UGC 兩個概念，可以更清楚知道社群媒體是什麼。Kaplan & Haenlein (2010: 61) 技巧性將社群媒體定義爲「透過 Web 2.0 觀念與技術所形成的相關網路基礎應用，以提供 UGC 性質的內容進行創作與交換」（social media is a group of internet-based applications that buil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s of Web 2.0, and that allow the creation and exchange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因此，透過此一定義，可以說明社群媒體是由一群網路使用者，透過 Web 2.0 相關網路應用技術，所形成以興趣、創意性質內容爲主的網路媒體平台。實際從國內外現象觀察，目前最主要社群媒體包括 Wikipedia、YouTube、Facebook 或 Second Life 等。

然而，社群媒體現象，不只是相關資訊技術與商業模式的問題，也引起了社會科學研究重視。例如，Beer & Burrows (2007: 1-2) 認爲，Web 2.0 不僅改變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田野、對象，也改變了學術生產工具、生產速度、出版型式與學術論述。又如，社會學者 Housley, Williams, Williams, & Edwards (2013: 173) 認爲，如何從「即刻」（real-time）及「近乎即刻」（near real-time）變化的社群「母體」中萃取使用者自然或刻意生成的巨量資料，形成了社會科學研究重要問題，必須嘗試建立「數位社會研究」（digital social research）。

研究方法上，Beer (2012: 2) 也指出，社群媒體不只在內容層面提出新文本型

airiti

式，而且也帶來某些「副產品」（by-product）。這個副產品，就是社群媒體將使用者後設資料加以演算後所取得的巨量資料分析程式「SMDA」（social media data aggregators）。Beer (2012: 9) 認爲，從這個巨量資料演算程式中，可以觀察到使用者行爲中的特定「模式」（pattern），更重要是如何從量化分析，進一步以質性方式，觀察媒體內容與社群成員間的互動。

參、什麼是社群媒體使用者？閱聽人、產用者或法拉尼

第二個問題，本文從媒體轉向網路使用者。學術界自 1980 年代左右，開始認識到網路使用者的多重角色，以「prosumer」或「co-creators」等名詞探討使用者，因爲這些使用者逐漸具有積極行動力，而且兼具「生產者」（producer）、「消費者」（consumer）及「資料提供者」（data provider）等意義 (van Dijck, 2009)。近來，也有諸多論述，如 Tapscott & Williams (2006) 提出《維基經濟學》（*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Leadbeater (2009) 提出 *We-Think*，或 Bruns (2008) 提出「產用」（produsage）與「產用者」（produsers），來解釋新媒體的內容生產者與接收者，以及商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

具體而言，使用者已經不只是被動科技接受者或消費者，而是一個能夠賦予科技物生命、意義的文本創作者。正如，UGC 形式的社群媒體越來越多，無非就是希望使用者參與訊息生產，讓使用者成爲媒體一部分。如此一來，傳統傳播模式，媒體訊息從傳播者手中生產，再傳達到接收者手中的傳播觀點無法充分解釋，原本科技末端的使用者也改變此一訊息生產與交換過程。

以 Facebook 爲例，其成立之初，強調對應真實社會中的人爲出發點，進行各式各樣網路交往。個人可以發現真實生活世界中的關係，而不再是以「匿名」、「去線索化」的使用者爲設計。研究者認爲，「實名制」將使用者身分對應到一個真實世界中的人，成爲社群媒體有別過去網路媒體的重要關鍵。也就是說，使用者不再只是「虛擬化身」，而是具有相對應的社會身分，可以如同真實世界般進行社會交往，在網路上分享美好（負面）經驗、訴說感受，一起做（說）一些有（無）意義的事，這也是社群媒體非常重要特點之一。

因此，研究者認爲，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概念，不只是傳統傳播學所指稱的閱聽人，強調透過閱讀與收聽的接收式行爲。同樣，社群媒體接收對象，也不僅止是接收者，亦是生產與消費關係中的產用者。此外，研究者認爲，社群媒體除了生產與消費的關係外，更重要是「社群」概念。必須有社群存在，才能稱之爲社群媒體。

airiti

在社群與使用者的概念中，研究者認爲波特萊爾（Baudelaire, 1863 ／郭宏安譯，2012）、班雅明（Benjamin, 1971／王涌譯，2012）所形容的「法拉尼」（flâneur）概念，更足以形容置身社群之中的使用者。例如，Benjamin（1971／王涌譯，2012）透過隱身於咖啡廳的生活經驗，或者身處於巴黎街頭的遊走概念，來形容人們無所事事，只是希望存在於群眾中相互依存的感受。他們將這種感覺形容爲法拉尼，近似於無所事事、漫無目的，存在於人群之中的都市生活經驗。這種經驗，在百貨公司與大型賣場出現後逐漸消褪，必須回到商店街式的環境中才能感受。

此一概念，Featherstone (1998)、Hartmann (2004) 和 Holmes (2005) 等人進一步延伸，提出「數位法拉尼」（cyber flâneur）概念，認爲在虛擬空間中遊走，並不在乎真實的社群關係，即使是陌生人，目的只在沉浸於群體中便可以獲得滿足。數位漫遊者尋求群集，同時也追求「看見」或「被看見」。

研究者認爲，社群媒體的設計，不只是讓街道、商店與人群重新置換於網路平台，而是將感覺與互動過程，透過言說建立起群集關係。這些經驗讓街道上的閒逛型態置換到網路平台，扣連起鄉村與城市、認識與不認識、過去與現在，都同步在網路節點上移動。看似無所事事、無意義的人與對話，卻是能夠在人群與事物間發現關係與建立意義。使用者間彼此既熟悉又陌生，既親熱又冷漠，共同找尋意義，構築社群關係，追求短暫邂逅，形成一種對看見與被看見的想望。

肆、社群媒體－使用者理論基礎與後設觀點

接著，面對社群媒體中的巨量資料，以及想望於群體中存有的使用者，研究者借 Meyrowitz (1999) 所提出的隱喻觀點，進一步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者背後的理論基礎。他認爲，討論當代媒體觀點時，可以用 3 個隱喻來加以形容，分別是「媒體如器皿／管路」（medium-as-vessel/conduit）、「媒體如語言」（medium-as-language），以及「媒體如環境」（medium-as-environment）。

以器皿隱喻而言，是指媒體被視爲傳送、儲存內容的器具或通道。因此，媒體研究關注在傳送內容層面，視其爲媒體研究重心，此一隱喻最具代表的觀點即「傳送模式」。例如，傳送模式主張由資訊來源，通過傳送器，將訊息傳送給接收者，從而建立訊息的傳送與接收模式 (Meyrowitz, 1999: 45-46)。

其次，媒體如語言的隱喻，則是將媒體視爲語言，認爲每種媒體都有其「表意潛能」（expressive potential）。因此，媒體研究關注在其「文法選擇」（grammar

airiti

choice），認爲這些文法選擇決定了訊息意義。例如，運鏡風格、編排手法、文字大小等，這些媒體生產變項的選擇決定了內容表意 (Meyrowitz, 1999: 46-48)。

另一方面，媒體如環境隱喻，則是回到了一個媒體形式分析角度，認爲使用媒體時的物理、心理與社會條件，決定了媒體所表現的基本面貌 (Meyrowitz, 1999: 48-51)。例如，用電話和書信在情感溝通上表現出不同的心理效果，並不是因爲內容或意義而改變，而是媒體本身所提供的環境承載訊息的可能性。此一觀點，將研究問題回到傳播形式的本質，探討種種溝通形式所帶來心理、生理及社會條件，著名倡議者正是延續麥克魯漢論述的科技社會學、媒體環境學[4]等，認爲媒體形式及其使用時的外在條件，得以主導媒體及使用者。

研究者認爲 Meyrowitz (1999) 所提出的隱喻，有助於建立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的理論基礎。因此，研究者嘗試透過傳送模式、意義建構方法論及實踐取徑三個部分，並以媒體隱喻、社群媒體－使用者、認識論、方法論及本體論等切面，融合比較分析（請見表 1 媒體隱喻與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比較表）。

後設觀點	傳送模式	意義建構方法論	實踐取徑
媒體隱喻	媒體如器皿／管路	媒體如語言	媒體如環境
社群媒體－使用者	使用者即媒體－內容	使用者即意義－方法	使用者即資料－系統
本體論	實在論	建構論	行動元
認識論	心／物二元	唯心	境物
方法論／方法	實證法／問卷	詮釋法／訪談法	民族誌／參與觀察

表 1：媒體隱喻與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比較表[5]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透過此一表格，研究者試圖說明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 3 個不同層次後設觀點，包括使用者即媒體－內容、使用者即意義－方法、使用者即資料－系統。

第一個層次關注在媒體內容與生產機制，也就是使用者即媒體－內容。最主要觀點如 Bruns (2008) 所提出的產用者理論。認爲使用者已經成爲內容生產者，是新媒體重要特點。

第二個層次，關注在使用者意義建構，探討使用者使用資訊時的意義與方法。也就是說，使用者是意義建構者，使用者才是訊息意義來源。最主要觀點

4 媒體環境學基本上分為多倫多與紐約兩個學派，繼承 Innis、McLuhan 的媒體和傳播研究思想，精神領袖是 N. Postman（林文剛，2003）。

5 在不同取徑間對應關係並無法完全分割，亦可能同時存在，研究者只是為了進行媒體隱喻及後設觀點比較、參考之用。

airiti

研究者借 Dervin (1983, 1999, 2003a, 2003b, 2003c, 2003d) 的「意義建構方法論」（sense-making methodology）加以延伸。

第三個層次，研究者認為使用者即訊息，還可以從資料與系統的關係來審視。可以放置在使用者整體運作環境中思考，並且使用者也不只是人，當代人機互動間發展出了許多程式，取代了人與人對話。最主要的觀點可參考「實踐取徑」（practice approach）(Callon, 1999; Latour, 2005; Schatzki, Knorr-Cetina, & Savigny, 2001)。

第一個層次，可以觀察到社群媒體將單向傳送過程，轉變為雙向或多向的溝通模式。而且，社群媒體的媒體形態，改變了資訊生產與使用二元關係，社群媒體沒有終點，資訊流動都在節點上，透過連結而持續延伸。而且，早期資訊傳播模式中「噪音」（noise）概念也應該重新思考。也就是說，社群媒體的溝通互動，如同「閒話家常」，干擾了訊息原本的意義，無法有效傳送，但並非減損訊息的有效性，而是增加了某種效益存在。

其次，研究者提出使用者即意義－方法的探討上，同樣希望能夠初步將意義建構方法論，應用於社群媒體與使用者研究上。透過媒體如語言的隱喻及使用者即意義－方法的觀點，加以思考如何進行社群媒體研究，觀察使用者的對話、意義、目的與策略等。

第三個環境隱喻，是將媒體視為主導溝通與使用者行動的內外在條件。例如，麥克魯漢 (McLuhan, 1964) 認為媒體本身的形式特質（如印刷術），決定了何謂內容，以及內容所衍生的一切思考、言說、認知。因此，科技形式形塑了溝通形態以及溝通內容。借麥克魯漢持續而來的修正式觀點，有些學者著眼身體與認知，有些學者持續對媒體所形塑環境加以探究，不管如何，這些觀點建立在媒體本身或媒體所形構的內外在因素，著重在物理、心理或生理所構成的傳播環境。

在本研究中所提出使用者即資料－系統的概念，亦嘗試從實踐取徑中，瞭解使用者互動時的環境。例如，研究者認為，社群媒體提供了一個讓使用者參與的環境，但相對也建立起了一個資料庫與行銷程式，讓生產、使用與對話進入一個適合社群互動及資訊傳散的網絡環境。

伍、社群媒體——使用者意義建構方法與方法論

初步澄清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的理論與後設觀點後，下一個問題是，必須透過何種方法與方法論，從社群媒體巨量資料中萃取意義。研究者認為得用意義建構方法論進行初探。

airiti

意義建構方法論從「知溝假說」（knowledge gap hypothesis）的預設及批判切入。意義建構方法論認為，知溝假說是傳送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它將資訊視為一種可以被持有的物質，因此資訊分配會產生不均，產生「資訊富者」（information rich）與「資訊貧者」（information poor），並且以兩者取得資訊的多寡來衡量。然而，Dervin (2003a: 24-38) 認為，知溝假說並不符合真實世界的想像，忽略了使用者需求，因此對知溝假說提出以下兩個重要挑戰。

第一，沒有取得資訊，並不能認為接收者有所欠缺。在知溝假說中，最主要將使用者在資訊相較上的「鴻溝」（gaps），以「饋乏」（deflcit）角度來詮釋，認為使用者沒有接收到資訊，便會與接收到資訊者之間產生差距，形成資訊富者與資訊貧者。但是，Dervin 指出，若是將鴻溝界定為傳送過程中，無法影響到使用者的概念，並以饋乏角度詮釋使用者，將落入責備使用者心態，是傳送者導向觀點，只能從系統角度進行修正 (Dervin, 2003a: 24-28)。

第二，資訊並不是實質物體，可以從腦袋傳到另一個腦袋。因此，她認為所謂的鴻溝間應該還有更豐富的接收過程，必須重新概念化，從接收者身上瞭解意義如何被接收，如何對接收者的生活產生意義，才能真正瞭解資訊傳送與影響。因此，她認為應該反過來從使用者的角度詮釋，探討如何使用這些資訊，跨越使用者生活經驗與資訊間的鴻溝，形成對使用者有意義的訊息 (Dervin, 2003a: 28-29)。

上述第一個挑戰，屬於「實用層次」（pragmatic）上的挑戰，第二個挑戰則是「哲學層次」（philosophic）上的問題。在第一個挑戰中，傳統觀點用發展主義來處理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認為第三世界在經濟、政治或資訊流通上均落後於先進國家，鴻溝在強者越強及弱者越弱的狀態下，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只能通過先進國家的挹注，才能彌補兩者的鴻溝。而第二個挑戰，則必須重新思索接收訊息者的角色，以及接收訊息後的身體及心智過程，也就是理解使用者如何在不斷生成的鴻溝中求得生存，這也是知識論上的問題。

因此，從知識論觀點來看，傳統傳播知識或系統科學中如何看待使用者，將使用者化約為「非有即無」（haves and have-nots）的接收者圖像？

Dervin (2003b) 認為，在傳統傳播知識與資訊系統當中，使用者被分類為「擁有」（haves）或「缺乏」（have-nots）兩個族群，因此傳播過程被視為是接收訊息的有／無，是一種機械傳送模式下的產物。使用者只是一組被系統決定的對象，而不是一個社會行動者的角色。而所謂的傳統的使用者觀點，大致上將使用者視為人口學上的統計變項，觀察其科技使用的有或無，以及科技使用後的滿意程度。反過來說，從意義建構觀點來詮釋使用者的行動時，則應該關注使用者

airiti

在行動境態（the actor’s situation）、意義建構中鴻溝（gaps in sense-making）、行動者定義之目的（actor-deflned purpose）、資訊使用策略（information-using strategy）、資訊價值（information values）、資訊特質（information trait）等 6 個面向 (Dervin, 2003b: 48-55)。

透過上述 6 個面向，可以將傳統傳送觀點，轉換成以使用者爲出發點的意義建構觀點。Dervin 認爲，這種觀點轉換，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因爲意義建構方法論，從哲學層次對傳送觀點提出挑戰。對資訊科學領域而言，意義建構方法論價值在於從系統中心轉向使用者中心，在傳播領域中，則是將研究觀點從傳統資訊傳送接收模式轉向「特定時空情境下訊息所代表的意義」。在訊息接收人各有其文化與生活情境的狀態下，訊息自然就產生了不同的解讀。Dervin 的理論以現象學爲基礎逐漸發展成爲一般性的傳播方法論，當操作意義建構研究方法時，嘗試讓「後設理論」（meta-theory）、「理論本身」（substantive theory）、「方法論」（methodology）及「研究方法」（method）同時運行，讓方法層次與理論層次聯繫建立起來 (Naumer, Fisher, & Dervin, 2009)。

而且，意義建構方法論認爲，人人不僅都有理論，而且都能夠創造理論。人們就像理論家一樣，永遠在辨認著世界中的各式名詞，以及尋找意義，儘管大部分的想法是很粗糙的。意義建構理論的意義在於尋找出人們多樣化的意義成形過程。而且，人們之所以能夠產生理論，就是因爲人們生活世界中存在著諸多不連續性，也就是鴻溝。這些鴻溝存在於人們心智、身體與外在世界之間，時間、空間之間，行動、結構之間，結構與結構之間，促使人們產生位移、連結或獨自行動。另一方面，意義建構方法論認爲研究應該保有反思及辯證的態度。研究者不能取代被研究者的詮釋，應該是扮演一個發現與推動者的角色，從論述與辯證中發覺「橋接」（bridge）的可能性，做爲論述實踐的推動者，因爲研究者本身也是一個意義建構者 (Dervin, 2003c: 143-145)。

也就是說，早期資訊尋求研究偏向系統導向觀點，認爲資訊獨立於使用者及社會系統外客觀存在之價值，資訊存在之目的在於協助人類降低不確定感，並且描述與預測真實，資訊接收者則處於被動角色，而當時研究重心主要關注於系統工具及服務藉以促進資訊近用性與分享。Dervin 的理論通常被認爲是使相關領域研究從系統導向轉爲使用者導向的重要原因，將資訊視爲主觀的，使用者可於不同情境下主動建構意義，資訊是使用者經由詮釋資訊內容而判斷其價值性與可用性，不同使用者對於相同資訊內容將產生不同價值判斷。

airiti

具體而言，Dervin (2003c: 149-150) 指出，意義建構在研究方法上最主要應用在 3 個面向，特別是研究問題的框架、訪談過程設計、研究分析與作結過程。因此，在資訊搜尋的行爲上，應將資訊搜尋的行動者視爲專家或學者，他們具有直覺、假設與推論的能力，而且可以連結資訊、覺察世界及發現權力流動；最後必須瞭解行動者處在何種權力及外在條件下，促使行動者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之中使用／不使用特定資訊。

此外，意義建構方法論並不只從理性及認知的角度看待使用者，而是將資訊使用的過程視爲由心智、身體、精神及情緒所共同形成，必須瞭解使用者如何跨越鴻溝，在過程中的感覺爲何、意義爲何。而且，意義建構在資訊搜尋的研究上，不同於一般研究的看法，認爲資訊使用的過程與結果大多是正面。意義建構方法論認爲，資訊搜尋的結果可能是「有害」或「沒有任何意義」。因此，意義建構式研究必須不斷協商與體會，對任何結果抱持開放態度。對意義建構觀點而言，外在世界是一種動態的「真實化」（factizing），應重視資訊使用的過程而非結果，關心行動者內心的意義如何形成 (Dervin, 2003c: 152)。而且，過去資訊尋求觀點，大多採取傳送模式，認爲人們沒有擁有資訊，便是有所饋乏的資訊貧者。對意義建構觀點而言，則必須反過來將資訊接收者視爲資訊生產取用的專家，處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之中位移，並透過資訊取用的過程來填補意義之間鴻溝。

總之，意義建構方法論主張在研究中透過不斷對話，來理解使用者在資訊取用上的過程與意義。對意義建構方法論而言，資訊並不是實存的事實，而是人們處理特定時間－空間中，以其心智、身體及精神所覺察的產物。因此，將「資訊即事實」（information-as-thing）的觀點，轉向了「資訊即建構」（information-as-construction）的觀點，認爲資訊並不是直接對應於外在真實，而是必須從情境中解構人們覺察過程，才能獲致資訊傳遞與意義建構。具體來說，Dervin (2003d: 201-206) 認爲以意義建構方法論爲出發點的資訊搜尋分析，應提出以下 4 個問題。分別是：人們於何時使用訊息？人們在何種情況下使用訊息？人們將這些訊息用於何處？以及人們如何預測這些訊息的用途。也就是說，意義建構方法論關注人們內在與外在的溝通要素，他們認爲真正重要的是將焦點放在溝通過程與動詞，人的意義建構過程是隨著情境不斷變化，試圖從每一個人身上，追溯他們如何整合資訊、結構意義。

從傳統大眾傳播的傳送模式來看，人與外在世界的構成，如同資訊運算原理，傳送者創造訊息，經過媒體而傳遞給接收者，便完成了傳送的目的。同樣，在傳統大眾傳播研究中，往往植基於傳送模式的觀點上，認爲閱聽人往往容易受新聞傳播媒體所「涵化」或「設定」，而忽略了閱聽人自行建構意義的能力。

airiti

也就是說，意義建構方法論所探討的不只是使用者，而且包括傳播研究方法論。例如傳送模式中往往使用者視爲被動的接收端，因此使用者研究往往是站在採用或接收的角色，使用者研究也以「科技採用模式」（technology accept model, TAM）或「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等爲主。而新媒體的接收與訊息生產模式，則對傳統科技與傳播行爲引起了重大挑戰。面對這般挑戰，諸多論述認爲轉向意義與實踐取徑分析，將是刻不容緩的工作。例如，Baron, Patterson, & Harris (2006) 認爲，對於 TAM 模式所提出的「有用性」（useful）、「易用性」（easy to use）和「樂用性」（enjoyment）等變項缺少質性研究支持，因此他建議將使用者視爲實踐者，從他們生活脈絡中，瞭解新科技（如手機）如何被使用者所接受與採用，而且這些新科技的意義與價值往往是由使用者們共同創造而來的。

因此，研究者嘗試借 Dervin 所提出意義建構方法論予以延伸，切入社群媒體與使用者意義層次分析，建立一個從使用者出發的理論觀點。例如，從空間與時間來看，可以發現社群媒體非常重視時間、空間的意義機制。使用者可以在時間軸上對話，可以跨地理空間尋求客戶服務。而且，爲了讓社群媒體的社會線索更加完整，地理、虛實、情感連結同時存在，透過社群成員間不斷對話而不斷連結。也就如同意義建構方法論所主張，應該視使用者爲意義起點，而非終點。

陸、社群媒體——使用者意義研究如何操作與建立可靠度

上述問題，研究者分別說明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所面對概念、後設觀點與方法論。最後一個問題，則回到操作層次與可靠度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者意義研究如何可能。

近年，Facebook 成爲重要社群媒體之一。其中，Facebook 所提供的粉絲專頁設計，讓企業、組織或品牌成爲了網路上的社群互動之一，符合新媒體中所具備的特色，包括由一群使用者組成、分享的互動機制。例如，從國內百大品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 2011 年調查）來看[6]，由企業或使用者成立的粉絲專頁超過半數（約 58%，研究者 2012 年 1 月 30 日 2 月 8 日調查）。

研究者認爲，透過粉絲專頁分析，得以初步瞭解社群媒介概念以及使用者的意義建構如何形成。首先，從粉絲專頁使用者角色而言，使用者不僅是一般網路使用者，也加入了訊息內容生產者角色，從單方向訊息傳遞者，成爲雙向或多

6 臺灣百大品牌選拔評選主要依據有財務、品牌資料等量化數據進行初步篩選，第二階段則是區分 B2B 及 B2C 業者，進行初選入圍業者互評、企業及消費者問卷調查。

airiti

向訊息交換者，符合本研究所提出要素之一。其次，社群媒體使用者並不只是被動資訊接收者，而是社群媒體意義建構者，亦是意義建構方法論中重要假設，使用者不僅可以發布訊息，也是具備創造情感、情緒與社會連結的意義建構者。第三，從社群媒體介面觀察，所有粉絲專頁都主動搜集使用者數據資料，提供給粉絲專頁管理者參考，讓粉絲專頁管理者投入廣告，取得更多潛在消費者，能夠針對「SMDA」現象進一步觀察。

因此，研究初期，研究者選擇以親身訪談（紙本問卷輔助）、資料分析以及參與觀察等 3 個方法搜集資料。

一、親身訪談（紙本問卷輔助）

研究者認爲，由企業、組織、品牌所成立的「官方粉絲專頁」，其社群形態較爲明確。因此研究初期去除由公眾人物、業餘組織或以興趣爲主題的粉絲專頁。訪談大綱借 Dervin (2003b) 所提出的 6 個資訊取用面向（行動境態、意義建構鴻溝、行動者目的、資訊使用策略、資訊價值、資訊特質），以開放式問題進行設計，期望能夠深入瞭解粉絲專頁管理者的想法與概念。

「身分」（identity）是網路社群研究重要議題，也是最難處理的問題 (Turkle, 1995)。粉絲專業管理者往往是使用者，使用者也可能是管理者之一。本研究爲避免混淆管理者與使用者多重身分問題，在訪談中要求受訪者以管理者身分進行探討。研究者認爲，用管理者的角度去回應問題，優點是能夠對粉絲專頁在管理及經營社群層面有更多資料回應，缺點是會流失參與其他社群媒體活動面向。然而，研究者認爲受訪者具管理者身分，可以更爲理解 SMDA 運作形態。

經預訪意見搜集後，研究者於正式問卷與訪談大綱上提出以下問題：（一）「請問您是否有參與（或管理）任何粉絲專頁？」、（二）「請問您瀏覽（或管理）粉絲專頁的頻率爲何？」、（三）「請問您加入（或建立）此一粉絲專頁的主要因素爲何？」、（四）「請問您在此一粉絲專頁上通常會進行什麼樣的活動？」、（五）「請問您對粉絲專頁的介面設計有什麼樣的看法嗎？」、（六）「請問您對於粉絲專頁的資訊內容有什麼樣的看法嗎？」、（七）「請問您在粉絲專頁上，是否有讓您印象最爲深刻的互動經驗？」、（八）「請問您參與（或經營）粉絲專頁，是否會影響到您的日常生活？」、（九）「請問您對粉絲專頁上的廣告行銷有什麼樣的看法？」、（十）「請問您還有參與其他的粉絲專頁嗎？爲什麼會參與多個粉絲專頁？」。

社群媒體使用者與粉絲專頁，都是近年出現的新媒體與新使用者，在過去研

airiti

究上沒有太多研究基礎與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應先傾聽，才能貼近被研究者內在邏輯，從被研究者角度與立場思索意義結構與互動關係。研究者在訪談時，也借研究初期所設計的問卷，輔助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互相認識與對話，讓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訪談間建立理解。基於以上考量，研究者在正式訪談時，將原先所設計的問卷做爲訪談前「暖身」，或訪談後「補充」，讓受訪者受訪前後填寫。受訪者在填答中，往往和研究者透過溝通，將研究者所提問的問題釐清，在「提問」與「被問」對話往返間，貼近彼此所傳達的問題與指涉。也讓粉絲專頁是什麼？粉絲專頁意義爲何？使用者如何使用？以及粉絲專頁與使用者間所產生的目的、意義與關係逐漸浮現。接著，研究者將國內百大品牌所經營的粉絲專頁清單，透過研究者人際網絡逐一訪查後[7]，於 2012 年 7 月 4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9 日，陸續與 5 個粉絲專頁管理者取得同意，願意接受研究者進行研究（請見表 2 研究個案基本資料表）。

二、個案資料搜集

第二階段，經過粉絲專頁管理者訪談後，研究者聚焦在這 5 個粉絲專頁，進

粉絲專頁名稱	類型	社群人數（2013.6.5 調查）	社群規模	研究方法
E ○○粉絲專頁	圖書百貨	20 萬	大型社群	親身訪談（問卷） 資料分析 參與觀察（參與者）
M ○○粉絲專頁	食品百貨	16 萬	大型社群	親身訪談（問卷） 資料分析 參與觀察（參與者）
I ○○粉絲專頁	便利商店	82,404	中型社群	親身訪談（問卷） 資料分析 參與觀察（參與者）
L ○○粉絲專頁	藝品百貨	7,000	中型社群	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 參與觀察（參與者）
A ○○粉絲專頁	服飾精品	3,051	小型社群	親身訪談（問卷） 參與觀察（管理者）

表 2：研究個案基本資料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7 企業組織對於資料保護度較高，通常不願意接受陌生人進行研究。因此，受訪者皆是透過研究者人際網絡所接觸。受訪者中，一位是研究者大學學長，一位是研究者碩士班同學，兩位是受訪者介紹，一位是研究者親友，一位是研究者親友介紹。

airiti

行個案資料搜集，特別是從歷時性角度瞭解粉絲專頁規畫、介面及使用者的互動形態。例如，意義建構方法論觀點指出，媒體中的時間、空間及使用者參與，都是構成意義建構的重要線索。研究者認爲，在使用者即訊息分析上，必須深入瞭解社群媒體的介面，與時間－空間組成的情境，這應該是瞭解使用者意義的重要環節。而且，社群媒體中的文本，源自於使用者自願提供、自行揭露，並不是透過研究者要求而書寫，其文本真誠性與真實性都較爲貼近使用者原意。因此，研究者將嘗試以粉絲專頁上公開的資料爲研究對象，探討使用者（間）對話與互動。從粉絲專頁的「對話」進行觀察，研究者所設定的 5 個粉絲專頁資料量十分龐大，研究者無法處理全部對話。研究者一開始認爲可以採用「內容分析法」，進行網站的抽樣分析。然而，觀察粉絲專頁資料後發現，粉絲專頁的對話與留言都十分「簡短」、「零碎」（幾乎只有一到兩句話），發表文章頻率及類型也差異很大，內容分析調查有其困難，無法取得完整內容，抽樣代表性也有所不足。

因此，研究者認爲，應該從文本本身特性（如「按讚」數量、「留言」數量或被「標記」的文章）、文本類型以及研究者的主要關懷，重新思考如何進行資料搜集。因此，研究者嘗試提出 3 個簡易資料篩選標準，包括「互動品質」、「文章性質」及「理論效標」，再進行粉絲專頁資料搜集工作。

三、線上－線下參與觀察與民族誌

此外，研究者認爲參與粉絲專頁，能夠觀察「表面」以下意義結構。參與觀察是實踐取徑研究重要工具，得以更清楚描繪社群關係。因此，第三階段，研究者認爲藉「網路民族誌」（netnography）方法，得以說明網路使用者及其社群的形態。然而，網路的特殊性，讓民族誌方法必須重新檢視。例如，唐士哲（2004：73-83）認爲，網際網路空間概念、身分認同或社群型態等特殊現象，雖然適合運用民族誌學的田野觀察來產出研究資料。但是，運用於網路研究，仍有 4 個技術問題必須加以探討，包括「田野觀察的時空條件」、「身分建構的真實性」、「研究價值與倫理的兩難」、「對詮釋巨型與微型意涵的掌握」。因此，在進行社群媒體民族誌研究前應先行思考以上問題。

網路民族誌研究有些研究者以「潛伏者」（lurker）的方式觀察，也有研究者以實際「參與者」（participator）的方式參與觀察。然而，Hine (2000) 認爲，民族誌研究者不要只當一名潛伏者，只是默默觀察與搜集資料，而是應該積極投入田野，與參與者互動。從消極分析論述到主動參與，更能深入瞭解意義形成的

airiti

過程（同上引）。因此，研究者認爲，粉絲專頁的「參與」，從最消極到最積極可以從「純粹瀏覽」（低度參與）、「按讚」、「參與互動」（如留言、分享、轉貼）到成爲粉絲專頁「內容生產者」（高度參與）。因此，研究者於 2012 年 1 月份起，陸續以「瀏覽」、「按讚」、「留言」、「分享」的方式，參與研究個案，進行個人日常生活的「非正式參與觀察」。以有效掌握粉絲專頁的更新狀態，並觀察、感受、搜集個案的資料。

另一方面，粉絲專頁後台，必須是粉絲專頁管理者身分，才能明確瞭解粉絲數量、行銷機制與行銷效益。而且，研究者認爲，成爲粉絲專頁管理者身分，對於 SMDA 概念，可獲得一定程度理解。因此，研究者透過人際關係，自 2011 年 6 月份起（迄今 2 年以上），與訪談個案之一長期參與經營、討論。而且，該粉絲專頁於 2013 年 2 月起陸續投入「廣告」。也就是說，研究者同時以「局內人」、「多重」身分進行長期日常生活中非正式參與觀察。一個是潛伏型參與觀察者，另一個是較爲積極參與觀察者，最重要是具有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雙重身分。實際執行上，研究者還是維持田野間承諾與默契，並未揭露研究身分，也不希望破壞田野規則，並沒有使用工具記錄，而是不斷地學習與了解。研究者認爲，民族誌並不在於工具與目的，而是參與過程。其過程必須從陌生到熟悉，再從熟悉到陌生，才能有所體會。

四、資料飽和度與可靠度

最後，回到研究資料飽和度與可靠度的問題，研究者分別從方法可行性、同質性、倫理性、參與度、詮釋過程等幾個部分進行討論。

在研究方法可行性，研究者原先預計進行問卷郵訪，但預訪中發現，問卷調查在開放性問題自填效果不佳。而且研究個案有其特殊性（企業組織粉絲專頁），無法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且題目設計遇到許多新媒體與使用者研究的困難（如身分難辨）。因此，研究者轉而以質性方法嘗試，建立研究基礎。

其次，研究個案同質性部分，研究者認爲，雖然個案數量不多（5 組），但同質性高（零售百貨業），文章發表頻率與數量已十分可觀，研究者認爲超過此一數量研究者無法顧及。其中，有 4 組是國內百大品牌（或旗下子品牌），以代表性而言應該已經足夠，只是尚待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建立。研究者認爲，研究初步階段，最重要是理解方法與方法論可行性。

接著，研究資料倫理性，研究者本身具有被研究者身分，可以感受到研究者

airiti

與被研究者間兩難。尤其是企業組織內個人，其資料複雜性高，倫理問題較難克服，資料不是「研究者個人」，或「被研究者個人」所有，而是企業組織及社群媒體參與者共有。也就是說，不是個人意願就可以公開與否，而且就被研究者立場而言，本身也不希望被當成研究對象看待。對社群成員而言，都有其互信與承諾基礎。因此，研究者在訪談與參與觀察時，捨棄寶貴資料，僅做爲協助研究者有效詮釋與發揮想像的素材。

另外，研究者經 2 年以上時間，於日常生活中長期瀏覽（每 1-3 天）粉絲專頁（包括個案內與個案外），並參與實作與討論，對粉絲專頁的內容設計、介面操作（時間軸改版前後、改版時間、前後台）、語法（FBML）、外掛程式（歡迎頁、自訂頁籤、購物車等）、行銷策略（廣告投入、廣告效益）等都有實際經驗，且與國內百大品牌粉絲專頁管理者進行訪談。對研究者而言，已初步理解粉絲專頁的內容、介面，以及對管理者、參與者而言的意義與社群關係體系。

最後，研究者以多重方法取得資料，也涉及對「真實」認識的歧異。研究者盡可能採「稜鏡」（prism）[8] 觀點，從客觀詮釋出發（訪談資料），再以個案資料分析爲輔（主要是文本中對話）；最後，融合研究者主觀見解（參與觀察）。也就是說，研究者透過與受訪者對話，共同建構真實。並從研究者親身「體會」，重新詮釋受訪者觀點，是一種不斷對話及意義建構式溝通過程。透過這種稜鏡式及迴遞式詮釋，試圖更深入理解受訪者意義爲何，也協助研究者將個人經驗加以敍說。

柒、結論：社群媒體－使用者－訊息之意義建構與解構

本文主要問題意識爲如何進行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依序從社群媒體、使用者、後設觀點、操作方法及方法論進行說明，並以社群媒體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爲例，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者如何成爲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因此，研究者從傳送模式、意義建構方法論、實踐取徑等不同取徑，理解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後設觀點，包括使用者即媒體－內容、使用者即意義－方法、使用者即資料－系統。其中，研究者主張先由意義建構方法論切入，追溯社群媒體－使用者間的意義建構與解構，重新探索傳播研究方法、方法論，如何進行社群媒體－使用者研究與觀察。

---

8 Richardson (2000) 認為應該以「稜鏡」（prisms）及「結晶」（crystallization）概念而非「三角交叉驗證」（triangulation）檢驗質性研究效度。因為三角交叉只是為單一真實（客觀真實）進行三個面向的檢驗。而稜鏡概念認為，真實是隨著觀看角度而隨之轉變，必須將多重觀點予以整合（轉引自 Saukko, 2003 ／李延輝譯，2008：37-50）。

airiti

然而，實際研究中發現，社群媒體大部分是由圖片構成，傳統傳播研究方法（如內容分析）如何進行、能否進行？研究者認為，研究方法是依附媒體內容、特性而形成的分析方法，面對新媒體必須有所調適。例如，社群媒體敍事片斷、大量圖像、時間軸式拼貼等。因此，研究者建議先傾聽新媒體文本，認清本質，再思考如何進行資料搜集。研究者認為，社群媒體是透過對話所形成的媒體文本，在對話上有其特殊性。雖然資料還是流於片面、零碎，但仍有助於研究者尋找到部分線索，進行初步解釋。

其次，一般媒體研究方法也需有所調整。例如，進行開放式網路問卷，網路使用者自填效果不佳；進行親身訪談，使用者在問題的敏感度、網路參與時的多重身分以及人際關係間，會影響到資料品質；而在網路參與觀察，研究倫理、線上與線下身分，亦會使研究資料取得或公開困難。例如，進行訪談時，在敏感問題、涉及組織因素，受訪者會有所保留。若同時有紙本問卷在訪談前後填寫，可以讓雙方共同進行問題的對話與溝通，讓研究者能夠從題目設計、問問題、研究者、被研究者與現象產生彼此理解，這也是意義建構方法論的意義所在。而且，若受訪者不願意錄音，還有文字資料做為研究說明。

另外，網路參與觀察可以分為潛伏與實際參與者，而潛伏是較為普遍、可行方法之一，研究者只要旁觀、記述，以第三人姿態觀察事物。然而，研究者在社群媒體的參與觀察過程中發現，如果只是低度參與，對被研究者感受不會深刻、無法同理，甚至是以對等立場處理。但是，當研究者也是高度參與者，優點是較能感同身受，缺點是理論建構上會失去陌生感，將事物視為理所當然。而且，研究倫理也必須加以反思。在不同參與程度比較中，研究者認為，結合線上及線下參與觀察是較佳途徑，對經驗理解、事物關係能較充分覺察。

研究者在實際研究中體會，意義建構並不是一套工具，而是發生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對話、文本間對話、研究分析間對話與方法論間的對話，透過這些對話的探索，讓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清楚意義為何，尋求更多橋接與理解。正如 Dervin (2003c: 63-64) 所說，真實既混亂又有序，必須在穿越鴻溝時而尋求。研究者認為，此一尋求真實的複雜與矛盾過程，才是主要意義所在。

參考書目

王涌譯（2012）。《波德萊爾：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南京，中國：譯林。（原書 Benjamin, W. [1971]. *Das Paris des second empire bei Baudelaire*. Berlin, DE: Aufbau Verlag.）。

airiti

李延輝譯（2008）。《文化研究取徑：新舊方法論的探索》，臺北，臺灣：韋伯文化。（原書 Saukko, P. [2003]. *Doing research i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nd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London, UK: Sage.）

林文剛（2003）。〈媒體生態學在北美之學術起源簡史〉，《中國傳媒報告》，2（2）：4-16。

唐士哲（2004）。〈民族誌學應用於網路研究的契機、問題，與挑戰〉，《資訊社會研究》，6：59-90。

郭宏安譯（2012）。《現代生活的畫家》，上海，中國：上海譯文。（原書 Baudelaire, C. [1863].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Paris, France: Fayard.）

Baron, S., Patterson, A., & Harris, K. (2006). Beyo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Understanding consumer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17*, 111-135.

Beer, D. (2012). Using social media data aggregators to do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7*(3). Retrieved from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17/3/10.html

Beer, D., & Burrows, R. (2007). Sociology and, of and in Web 2.0: Some initial consideration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2*(5). Retrieved from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12/5/17.html

Bruns, A. (2008).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Callon, M. (1999). Actor-network theory. In J. Law & J. Hassard (E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pp. 1-20). Oxford, UK: Blackwell.

Dervin, B. (2003a). Communication gaps and inequities: Moving toward a reconceptualization. In B. Dervin, L. Foreman-Wernet, & E. Lauterbach (Eds.), *Sense-making methodology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renda Dervin* (pp. 17-46). Cresskill, NJ: Hampton.

-- (2003b). Users as research inventions: How research categories perpetuate inequities. In B. Dervin, L. Foreman-Wernet, & E. Lauterbach (Eds.), *Sense-making methodology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renda Dervin* (pp. 47-60). Cresskill, NJ: Hampton.

-- (2003c). Sense-making's journey from metatheory to methodology to method: An example using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use as research focus. In B. Dervin, L.

airiti

Foreman-Wernet, & E. Lauterbach (Eds.), *Sense-making methodology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renda Dervin* (pp. 133-164). Cresskill, NJ: Hampton.

-- (2003d). Mass communicating: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audience. In B. Dervin, L. Foreman-Wernet, & E. Lauterbach (Eds.), *Sense-making methodology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renda Dervin* (pp. 197-214). Cresskill, NJ: Hampton.

-- (1999). On studying information seeking methodologically: The implications of connecting metatheory to metho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35*, 727-750.

-- (1983, May). *An overview of sense-making research: Concepts, methods, and results to d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Dallas, TX.

Featherstone, M. (1998). The flâneur, the city and virtual public life. *Urban Studies*, *35*, 909-925.

Hartmann, M. (2004). *Technologies and utopias: The cyberflaneur and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online."* München, DE: R. Fischer.

Hine, C.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UK: Sage.

Holmes, D.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UK: Sage.

Housley, W., Williams, M., Williams, M., & Edwards, A. (2013). Special issue: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trategies, design and metho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6*, 173-175.

Kaplan, A. M., & Haenlein, M. (2010).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 *Business Horizons*, *53*, 59-68.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adbeater, C. (2009). *We-think*. London, UK: Proflle.

Littlejohn, S. W. (1999).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Meyrowitz, J. (1999). Understanding of media.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56*, 44-53.

airiti

Naumer, C. M., Fisher, K. E., & Dervin, B. (2009). Sense-making: A ma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Retrieved form http://sites.google.com/site/dmrussell2/sensemakingworkshoppapers

O'Reilly, T. (2005). What is Web 2.0: Design patterns and business model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oftware. O'Reilly. Retrieved from http://oreilly.com/web2/archive/what-is-web-20.html

Schatzki, T. R., Knorr-Cetina, K., & Savigny, E. V. (2001).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New York, NY: Routledge.

Tapscott, D., & Williams, A. D. (2006).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NY: Portfolio.

Turkle, 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van Dijck, J. (2009). 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generated conten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 41-58.

Vickery, G., Wunsch-Vincent, S., & OECD. (2007). *Participative web and user-created content: Web 2.0, wikis and social networking*. Paris, Franc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4(2), pp. 207-227, July 2014

Social Media and Users Research: Concepts,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Shih, Po-Yeh*

Postdoctoral Fellow,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cepts,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social media and users. Taking Facebook Fan-pages as examples, the author tries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their users, which is typically Web2.0-based, with user-generated contents (UGC). The issues concerned are: What are social media? What are social media users? How to grasp 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behind a research of social media and users? How to do text mining from the big data of social media? To what degree could a study of social media and users be deemed as reliable? What are its potential limitations?

Keywords: social media, users, methodology of sense-making, Web 2.0

* Email: howard624@gmail.com
Received: 2013.09.30
Accepted: 2014.03.02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229-241．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6

最後一哩或斷尾求生？數位匯流與臺灣派報業的變化

The Last Mile, or Tail Rip-Off for Survival?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the Changing Newspaper Delivery Industry in Taiwan

蕭旭智 *

Hsiao, Hsu-Chih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Assistant Researcher,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壹、前言

近 10 年來，數位匯流與報紙銷售量下降，經歷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全球的傳統媒體不堪財務虧損，陸續停止發行紙本或求售、編輯部裁員。臺灣報業同樣面臨類似問題（見表 1），2008 年，《中國時報》裁撤地方新聞中心及印刷廠。《蘋果日報》經銷商勤力書報社之派報業務，主要爲超商及零售點。《中時》與《聯合》成立物流公司除了新北市以外，已不再積極介入派報。各地分社仍兼營各大報紙，但搶地盤、壟斷等現象減少，派報業面臨新的問題：派報區域範圍整合擴大、受到生存經濟規模的挑戰、部分偏遠地區送報路線擴大，改以郵發、送報生老化、閱讀人口老化等等。本文訪談重點是：由於全球的行動電話、印刷成本、數位裝置、電子紙、數位新聞產製經銷方式的改變，數位匯流所造成的派報生態改變。從 2017 年開始到 2040 年之間，不同地區、國家產生交互影響，而

* Email: d90553@gmail.com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報業受到技術升級、經濟發展、工業結構、人口變化、政府管制及消費行爲各方面的影響，發達資本主義，以及開發中國家的報業將會逐步消失[1]。

2013 年底，我開始進行一個「數位匯流與派報發行變遷，2003-2013」的訪談（見附錄），原本的目的是要瞭解數位匯流之後，派報市場與勞動的生態變化。原先的研究企圖與目的，在 3 個月的訪談過程中，受限於這個問題本身是一個需要從巨觀的產業結構來探討；然而在這些訪談中，一個個從個人經驗出發的訪談，反而在黃昏時分襯著報販與送報生逐漸淡去的輪廓與身影，指引出另一個問題的切入點。我遂決定以有別於一般學術寫作的方式，記錄下這些生命中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臺灣報業打拼、廝磨的受訪者，他們在 21 世紀的開頭，所面臨的這場數位匯流，以及紙媒沒落的黃昏之旅，他們在內心及在口頭上的回憶、掙扎與摩擦。

分類／年份	每百戶報紙數份[1]	新聞出版業（家數）[2]	昨日閱報率[3]	廣告量（千元）[4]	昨日閱報率[5]
2000	46.9	184	80.1		59%
2001	41.4	190			55%
2002	40.4	195			50.8%
2003	37.9	195	64.8		50.2%
2004	35.4	200	58.8		49.0%
2005	33.7	192	59.6		50.0%
2006	29.5	173	57.8		45.8%
2007	27.9	190	55.3	13,667,978	45.1%
2008	24.5	198	59.0	11,078,926	43.9%
2009	22.5	189	55.1	10,008,866	42.2%
2010	22.0	193	57.9	11,955,662	43%
2011	19.3	207	59.1		
2012	20.0		59.7		
2013	18		61.3		

表 1：各類報業統計數字

資料來源：2000-2013 年，相關報業統計數字，由本研究整理。

註：1. 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11 年後為 E-ICP 統計數字）。
2. 財政部統計處。
3. E-ICP 東方行銷。
4. AC 尼爾森。
5. Nielsen 媒體大調查。

1 Future Exploration Network 趨勢預測，2024 年臺灣報業將會消失，http://futureexploration.net/future-of-media

airiti

貳、臺北市：如何測量報紙的厚度

陳兩傳，臺北市派報職業工會前理事長說：「阮，現在的報紙，丟是了尾囝仔（按：我們現在的報業，就是好像把家產都敗光的敗家子）」。他感嘆，這幾年來的報紙產業，把前面幾十年的報業榮景給一筆勾銷了。陳兩傳長久在新北市經營派報業，曾經是擁有 1 萬報份的大報頭，前 2 年報份剩下 3,000 份，年事也已經高了，想退休，就把報份盤給別人。臺北市派報職業工會的鄭景標總幹事表示，如今臺北市派報職業工會的投保人數，從 2011 年 1,880 人，到 2013 年底下降到 1,680 人，40 歲以下的參加工會的派報人員，只剩下 300 人。

「報費 300 元，繳給報社 210 元，剩下的 90 元就包含請送報生、派報社開銷，也就是一份報紙只有 30 元的利潤，所以一定要送得多才行。其實，現在整個送報 3 百份也可以送，但它要會成長，但是現在是萎縮呀！我現在 3,000 份，從古早 10,000 份，大概從 4 年前開始，做到現在剩下 3,000 份。所以我就不幹了。我以前有 10,000 份的時候，30 個送報生，一條路線還有 3 個人在送，現在每條路線只剩下 1 個，我們是論件計酬，一份報紙 50 元，可以送 300 份，本來 200 份一條路，2 個小時可以送完，現在區域擴大，卻只剩下 3,000 份，一個人要跑多遠？送報生會甘苦，做老闆的也會甘苦。只能夠兩個三個區域合併，最後只能夠你做 3,000 份，我也做 3,000 份，就合併或者委託。像我就放掉，乾脆退休。」陳兩傳前理事長這樣說。在發報市場上看到的送報生，很少看到新的，要找一個新的送報生，先問你一個星期休息幾天？往昔行情好的時候，一個訂戶的報份轉手可以賣到 2,000 元，現在 600 元就很好了。

林世忠先生，從 1976 年兼差送《工商時報》，後來 1986 年，有個機緣進入《聯合報》，長期擔任全省各地的督導的工作，他戲稱他是高級送貨員。現在他已經從《聯合報》退休，但是自己有一個送報單位，大約有 10 個送報生，他笑說現在這份工作是爲了還在青少年的兒子而做的，這樣他可以參與小孩的成長，早上起來處理送報工作，下午到小巨蛋跑步，順便等小孩放學，每天跑 1 萬公尺，已經持續了 10 年了。他認爲從 2006 年以後，報量就很明顯地下滑，原因是因爲訂戶報下降，訂戶報的下降，對於他來說，若是當時能夠增加報紙通路的附加價值，那麼送報生可能是全臺灣最棒的送貨員。不像現在送報順便送水、送米的附加價值，送報生可以是最好的宅配。他說，報紙是「資訊」，送報是資訊流通的行業，但卻是一個長久資訊化不演變的領域。例如送報的電腦系統到不久之前都還有些單位在使用 DOS 系統管理訂戶，而且還不能連線，列印還是用報表紙列印，即

airiti

使他曾經想要改良，還是不能擴及其他同業。例如忠孝東路單號雙號依序列出訂戶，但是送報卻不是按照門牌號碼來送，因此就要靠經驗來送，每個送報生都要1、2個月來上手，經驗老道的送得快，新手就要想辦法熟悉。現在的GPS定位軟體可以讓送報更方便迅速，但是送報這個行業的勞動力結構卻很難改變。

方桃忠先生，任職《聯合報》總公司，他說他跟報紙的淵源很久很深，1963年就讀建中時曾經送過報紙，他說那時候高中生獨自到臺北就學，因爲家境因素要送報紙的並不少。清晨從館前路領到報紙以後，騎到中和去送報紙。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畢業以後進入《聯合報》工作，曾經掌管電話行銷部門6個小組，共90人，他提到1990年代到2000年代之間，電訪曾經讓訂戶報大量擴張。而如今訂戶報占總報份的成數，從原本的8成下降到7成。大趨勢是多樣化與電子化使得紙媒的時代看似已經成爲過去。但是他認爲紙媒曾經代表的社會意義並沒有改變，例如對於送報到偏遠地區，如阿里山地區，這種送報的社會意義比利潤或者營收來得更重要。

成鳳鳴先生自1980年開始進入報業工作，從送報的基層工作做起，最後於《中國時報》發行部副總經理一職退休。退休後他擔任臺北市重型機車公會之秘書長，擁有過4輛哈雷機車，他說臺灣太小，一天就跑完了。身形壯碩的成鳳鳴是政治作戰學校畢業，至今，不拐彎抹角的談話，還可以看出昔日幹練的行爲處事。提到2003-2013年的報業的變遷，他認爲從1996年開始，《聯合》、《中時》將零售價調漲爲15元，而《自由時報》維持10元，銷售量下降，直到2003年因應《蘋果日報》發行，將零售價格調降爲10元，但仍無法提高銷售量。他認爲在報紙的閱讀市場，失去的版圖就無法挽回。

《蘋果》進軍臺灣之後，並沒有從3大報挖角發行、廣告企劃人才，《蘋果》的策略爲零售報。成鳳鳴回憶當時他曾經找3大報的主管喝咖啡，聯合抵制《蘋果》，要求分社與派報社不准送蘋果的報紙，否則就不發報給這些分社與派報社。這個步驟的確起了嚇阻的作用，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執行。

張數多，對送報生造成負擔，騎機車送也送不多。送一份報紙仍舊是只能賺5、60元。所以張數一多，就有增張津貼，但是一般來說增張津貼不會反應在送報生的薪水上，而是落入派報社的老闆手中。而《自由時報》的發行系統與《中時》、《聯合》不同，《自由時報》的送報生多半與總社直接拿報，一份報紙可以直接拿到120-130元，所以對《自由時報》的向心力較強。成鳳鳴曾經建議報社管理階層在增張時發送餐盒給送報生，他說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送報生就心甘情願地送報。送報生的生態變化，成鳳鳴觀察到，近10年來，年輕的送報生很

airiti

少，大部分是中年以上，或者年輕人的父母親在送報。年輕人寧可去便利商店，也不會去送報。送報很辛苦，早上 4、5 點就要去疊報夾報，一年 365 天不能休息，所以現在幾乎沒有年輕人願意做。如果他遇到送報紙送很久的人，他會懷疑，難道這麼不長進，都在送報紙？一般來找送報工作的，都是要增加收入，一旦經濟狀況緩解，也就會離開，所以送報一般都做不久。

臺北大安區良友派報社的朱先生提到派報生是個體戶，有案子就接，有需要就送。派報的廣告傳單現在比較多的是房仲業、服飾、貴金屬、烘培業，而且這些傳單也有季節性，也不是每天都有。至於 KTV 等傳單，則是區域選擇性比較明顯的派報業務。派報生的薪資結構，大約送 1,000 份可以領 500 元，而凌晨給送報生夾報的費用則是 250 份 100 元。30 年下來，廣告業的業務大約只剩下 1/3 左右，不過其實沒有差，有案子就接，工錢也不會拖欠。他認爲派報是良心工作，腳踏實地，是沒有辦法膨風的工作。

參、新北市：偏遠地區沒人要送

新北市派報職業工會位於板橋府中站附近，一日晨起，我從新北市的最東北邊的半山腰上離家，搭上板南線，近 1 小時的路程，早上 10 點，我站在府中捷運站出口，捷運站旁的鬧街，鬧區服飾店鐵門挎著臉不發一語，早餐店鐵板漢堡肉蛋餅鐵板麵，蓬蓬煙。好想吃，不能停步，往目的地直直去。老舊的辦公樓梯間塞滿雜物，電梯貼著警示載重 5 人，基諾李維的捍衛戰警加上自由落體轟入地下室的心理地理學。不安地放棄電梯，閃過沿途雜物拾級上了 4 樓。職業工會辦公室裡竟然有個櫃台頂到天花板的鐵窗。空空地幾張會議桌，江湖兄弟般海派的理事長招呼我坐到長桌邊。

一坐下來，李國隆理事長就表示他以前也接受過訪問，說道：「現在平面媒體哪有什麼好發展的？現在都是數位化了，年輕人哪有在看報紙的？我們這一緣（按：指我們這一世代）的要是死掉，哪還有人要看報紙？時勢所趨，廣告都跑到第四台與網路上面去了。如果那一天廣告沒有了，那就嘿嘿嘿。」講到夾報的趨勢在 4、5 年前就開始減少，以前主要是建築的夾報，現在房仲業者也都開始自己做廣告，所以也沒有廣告夾報。

> 大環境不好、少年不看報紙、老年閱報人口凋零。分銷單位的老前輩退休、送報生沒有人要送，我們是非常非常弱勢的行業。我們現在的生態就是落，不會漲，一直萎縮。夾報量變少，沒得賺，板橋車

airiti

站的夾報比較多，還好，若是其它地方就沒有那麼好了。你送 200 份報紙，1 個月大概 1 萬元。沒有夾報，怎麼生存下去？

新北市有 20 幾個鄉鎮，偏遠地區沒有人要送。一份報紙，送報費用若是沒有超過 100 元，沒有人要送。例如木柵、深坑、石碇、淡水的山上，一份若沒有超過 100 元，也沒有人要送。烏來就沒有人要送，送一份就要 1、2 小時。像坪林山上，還是有人送，但是要送到中午以後，而且工資一定要提高，他才願意送。偏遠地區若是要靠送報來維持生計，也是很困難。都會區的報份很難增加，現在大樓訂報也少。如果公費報、鄰長報消失，如果這些都取消，那這個行業就消失得更快。

現在賤賣報份，現在賣掉報份的權利金，大概就是 2 個月，以前賣到 1,000 元以上很多。加上報社會給我們傭金 3 成，3 成的利潤加上業績獎金、廣告夾報，現在沒有了。錢難賺，只要是送報紙，就要繼續做。

我從民國 73 年（西元 1984 年）開始投入這個工作，這個工作的好處，就是讓人不會太懶惰，每天早上都要起來工作。以前手下送報生最多 30 個左右，現在也只剩下 10 個，最年輕的也已經 30 歲了，他已經是這個行業中很難得的少年人了。

送報紙大部分是副業，你若是中午在路上看到送便當的，那可能早上就在送報紙，白天送快遞，不然無法維生。不然怎麼辦？我們住在都會區，早上睜開眼就要花錢。基本上就是這樣。

半小時，一面吐苦水、一面兩個眼睛骨碌地邊打量我斤兩，擺明了小子你在浪費我時間。陸續坐到桌邊的中年報頭們隨意接話奚奚落落三言兩語處理會務與雜事。夕陽報業的無奈，最想忘記的就是現在。

又一日往土城《聯合報》某單位訪問，不願意跟我交換名片的王先生表示，送報紙是一個沒有人要做的工作，就是沒有辦法才來送報紙。「沒有什麼好說的！現在年輕人都不看報紙，你看你，以前記者訪問都用紙筆。你呢？你只帶錄音機？」其實我是因爲一進門就被罵，說沒時間陪我聊無聊的送報話題，罵我做

airiti

這個研究沒有意義。15 分鐘就說接下來有事，把我趕走了。把送報業的沒落，一股腦地出氣在我身上，所以我還來不及拿筆記出來，就被罵到臭頭。

肆、蘭陽平原：慢慢放棄

1 月中旬下午，我開上 5 號高速公路往宜蘭羅東去，飄著雨的蘭陽平原在眼前展開，下了羅東交流道往市區，時間還算寬裕，在羅東市區左彎右繞找路。我腦袋想著，像蘭陽平原上的獨棟房舍這般多，到底送報紙要怎麼送才划算，想起去年中跟住在宜蘭市區的返鄉小農四處農調，每日往員山去種田，時不時還到大同、三星去拜訪朋友，光路程就花掉大半光景。若是轉換成派報工作，幅員之廣，送報距離之遠，恐怕不若臺北市、新北市等都會地區簡單。

派報職業工會黃正雄理事長與《中國時報》基宜花區的陳道銘主任在門口招呼我上樓。黃理事長體格健壯肩膀厚實，完全看不出來已經 75 歲了。一問到這幾年報業的變化，他說「我那些小孩也都是吃報紙長大的，我現在已經 75 歲了，還能夠做幾年？現在資訊太發達了，現在撥一撥（按：智慧型手機的觸控動作）就有了，電視 24 小時都在播。」

黃理事長從 1962 年開始派送報紙，當兵退伍以後，當時父親已經在辦報（按：經營《中國時報》分社），所以待在家裡幫忙。他說早期騎腳踏車送得比較少，大概 100 多份，後來有了機車，就可以送得比較多比較遠。宜蘭縣現在送報生 1 個人大概送 150 份到 200 多份，鄉下地區，送 1 份的距離遠，可能只能送 100 份，這部分變化相對比較大，但是也一直在變化。「老的死一個，訂報紙的少一個。少年仔沒有在訂報紙，有的是去超商買《蘋果》啦。尤其，老的是綠的，死了就少《自由》；若是藍的，就少《中時》、《聯合》。老的比較少看《蘋果》，看不習慣，因爲沒有地方版。」宜蘭縣，稱得上城鎮的地方只有宜蘭跟羅東，其他都屬於鄉下，陳道銘說：「現在找送報生越來越難找，年輕人晚睡可以，早起不行，所以我們只能夠靠那些老人、老前輩。這是現在理事長最擔憂的事，找不到送報生，偏遠地區送不到就沒有辦法送，偏遠地區就必須放棄，慢慢地不去爭取，慢慢地讓它消失。例如大同、南澳、三星、東山的中山村等等有些地方，就很難送。沒有就算了。油錢以前 20 多元，現在 35 元，這樣不敷成本。現在，報紙厚，油錢貴，客戶少，夾報少。像是礁溪觀光客多，但是飯店頂多只訂 1、2 份報紙，不然就是不訂，只有羅東、宜蘭算是宜蘭線的都會區，不過羅東也只有 8 萬人口，一個分社就夠了。」

airiti

伍、新竹：三代祖傳

新竹市《聯合報》分社的劉祝江女士，目測年紀大約在六十幾歲左右，我到新竹的派報社找他的時候，她正好外出去社區大學上課，等了一會，與櫃台的小姐聊聊天，期間她的兒媳婦過來打個招呼，櫃台小姐表示，剛剛有人打電話要應徵派報生，還說只有下午有空。我說，那他就只能送傳單囉。小姐說，嗯，而且他才 17 歲。其實我不太知道 17 歲跟 30 歲有差嗎？一樣工資而且都要保勞保。我自己暗自揣度，櫃台小姐的言外之意是：年輕人送不久，而且現在找不到人送報，即使面對失業的壓力，一般人也不願意來應徵。

接著，聽到社內的幹部打電話給要應徵的人，跟他說明派報的時間，以及沒有經驗沒有關係等等，反正都有地址，按照地址送就可以了。過沒多久，社長騎車回來，放下安全帽，走進辦公室，跟我說，你有什麼事？我說我在研究這幾年派報、送報的變化，想來拜訪社長，跟社長請教一下，這幾年的派報變化。他說，好，我們裡面聊。坐定，社長的聲音跟蚊子一樣小聲，營業處鬧哄哄地，市井人物都是扯著喉嚨說話，社長的聲音聽起來就更加吃力了。

社長說從他的父親在 60 年前開始送報，一開始騎著腳踏車在往南寮方向 15 份日報開始，隔月成長到 30 份，最高時有 12,000 份的報份，現在已經下跌到 5-6,000 份。他估計整個新竹市大約有 2 萬份的水準，確定的數字他沒有辦法知道。這一家派報社是新竹市最大的派報社，也兼營夾報、廣告傳單等，三代都從事派報的事業，剛開始只送《中時》，現在《聯合》、《自由》、《蘋果》都送。劉女士表示，送報紙沒有什麼，就是辛苦。早上 3 點要開始套報整理，送到 7 點半左右送完，1 個月只有 1 萬到 1 萬 2 千元左右的薪水，送得多的可以送到 3 百多份全勤加上油錢補貼最多可以領到 1 萬 5 千元。

她說早年她先生退伍回來幫忙，報份有高達 8 千份左右，等到她自己辭掉工作也回來幫忙，最高曾經高達 1 萬 2 千份左右。那時候是報業最好的時候，也就是說 1 個月可以賺到 5、60 萬元左右。我看看外面，報社門口停了一台舊款的 Infinity QX4 休旅車，以及一輛蘋果綠的福斯金龜車，殷實的派報社，這種規模也不意外。

劉女士舉了一個送報時間十幾年的老送報生為例，說他早上送報、白天在民營郵局送信、晚上送羊奶。這樣每月薪水可以到 6、7 萬，她說，這樣子的人，送的區域有重疊，而且區域也比較集中，所以送得比較快，例如早上來報社，就先走路把附近的送一送，然後再騎車開始送比較遠的地方。類似的情況，例如新

airiti

竹市的老市區，城隍廟附近，或者大樓，因爲在市區就可能可以送較多的報份。遠一點的地方，送起來就比較辛苦。

她對於送報的看法：就是很辛苦。我說，你們一家三代都辦報紙，現在第二代願意接家裡的事業的不多，這樣很難得。她說，是呀！時代不同了，如果知道現在報業會這麼差，我也不會叫我兒子回來接。我兒子從小學就開始送報，小時候騎著腳踏車去送報，退伍候就回來幫忙，不然家裡實在忙不過來。以前送報紙的薪水不錯，1 個月 5、6 千元，軍人或公務人員的薪水大約 8 千元。我的先生退伍以後就回來接，不比外面的工作差。送報的月薪也不差，等於外面的一份薪水。現在 1 萬元左右的薪水，一年四季沒有休息，寒流颱風都要送，一年只有春節休 4 天，這種工作有哪個年輕人要做？現在的送報生大多都是送很久了，送習慣了。那時候雖然辛苦，但是送報紙的收入不錯，現在 1 萬多的收入，實在太少了，沒有人要做。

陸、雲林縣：從《自由時報》訂報送黃金開始沒落

王自由老先生，雲林縣口湖鄉人，生於 1936 年，日治時期曾經唸過 2 年公學校。謙稱自己沒有讀書，但是從 1979 年起就開始經營派報。曾任 2 屆的雲林縣派報職業公會理事長，也曾擔任《民眾日報》雲林縣總管理處處長，《中華日報》營業處主任。他說現在報業沒落了，現在他已經退休，妻子前陣子跌倒摔斷腿，所以不能送報，現在只好請送報生送報。在斗六經營派報社三十幾年，手底下的派報生曾高達十餘人，1 個送報生送 250-300 份，總計近 3,000 份報紙，是斗六相當具有實力的報頭。整個雲林有 5 個區，山線與海線，在雲林縣最興盛的時候，全縣的報份，《聯合》、《中時》、《民眾》、《中央》等等加起來大概有 4、5 萬份。他反覆提到，報業正好的時候，一個榮民之家，《中央日報》就 3、40 份，一個機關各處室就要 1 份，斗六的公家機關加起來就有上百份《中央日報》。2006 年《中央日報》停刊對於當時的收入有很大的影響。《民眾日報》最多的時候，整個雲林縣有 1 萬 1 千份，那是因爲大家樂、六合彩的關係。以前年年選舉，地方記者有影響力，現在很多報社的地方記者都裁撤合併，加上選舉都是集中辦理，沒有選舉，就沒有地方新聞。現在每個機關單位都有發統一稿，不用跑什麼新聞，不用跑新聞，報紙的影響力就變差。他說：「一份報紙 300 元，報社拿 180-230，要給派報生 60，自己拿 60。以前督導來，都要去高腳（粉味的），一個晚上花的錢，咱做穡人就要拼很久。」

airiti

他說大家都知道印報紙是賠錢生意，但是有段時間的確送報紙會賺錢，有人送到房子一棟一棟的買。只要不要去賭博，通常現在都可以過得很好。他說現在這棟房子也是靠送報紙攢下來的。他當雲林縣派報工會理事長期間，很多支出也是他自己掏腰包的。

雲林山線的古坑，近來也整併成一個單位，最長的一條送報路線，送完 1 次要 5 個多小時。海線的鄉鎮大多也都單位整併了。各報在雲林縣管理處也都撤掉了，只剩下《自由時報》還在。

我問他送報業這幾年的沒落，大概何時開始？他說，其實從《自由時報》開始送黃金就開始不好了。因爲《自由時報》是訂 1 年送 3 個月，那 3 個月都是免費報，他們就沒有辦法收到錢。訂戶爲了看免費報紙訂《自由時報》，其他的報紙銷路就變差。大家說水果報進來以後，其實沒有什麼受到影響，因爲訂《蘋果》的也是少數，人客有需要才幫忙買來送。一樣是要交權利金，但是沒有訂戶，所以跟我們的生意沒有很大關係。提到現在派報職業工會的人數，他說以前最多的時候有 5、6 百人，現在只剩下 2 百多人。他說原因很多，例如勞保跟健保都要繳，負擔太大，加上現在年輕人也不送報紙。不過，週六、週日在街頭發傳單的派報倒是不少。

現在雲林縣的報份，各個報紙的份數，王老先生只是說很糟，並沒有說還有多少。只有說像是《中華日報》在臺南應該還有 4 萬份的實力，但是在雲林也只剩下 1 百多份。《民眾日報》則還有 4、50 份，王太太在一邊表示應該還有 1 百份上下。王老先生說，大部分是因爲人情壓力的吃報。不然一下子說不送了，也不好意思，送報送這麼久了，一下子說不要送，太傷感情了。他指著騎樓下整捆的報紙說 :「就是那些，看到沒有！」

柒、高雄、花蓮、彰化：影響不大

前高雄派報工會黃理事長表示，現在高雄市的派報份數大約 20 萬份左右，比起最之前少了 5 萬份，現在整併的情況，以區域爲主。轉手的權利金大概也只是 1 個月份，不多。高雄的派報生態與北部不太一樣，小份數的報販比較多，全高雄市大約有 2 千個單位。所以每個單位的規模比較小。現在的報業相較於 20 年前，當然比較差。但是差並不會影響到送報生，比較小的單位因爲報份減少，就交換或者轉手，生態雖然有變化，但是變化並不大。他說：就是送報紙，有什麼差別嗎？花蓮的理事長蔡先生也提到，現在全縣除了《更生日報》以外，約有

airiti

8 千份的派報量，之前有 1 萬 2 千份，少了 4 千份。送報生也少了 21 名，現在只剩下 40 餘名。他自己也在送報，《中時》、《聯合》、《自由》、《蘋果》都送，他認爲雖然不好經營，但是東部的報業規模就是如此，如果有人要訂報就派報，已經不期待如十幾年前還能夠擴展市場規模了。

賴秀珠女士，彰化大村人，約 4、50 歲，她已經送報 10 餘年了。並沒有說爲什麼開始送報紙，只說，每天早上送報紙、之後會去打打零工、下午有時間就要去田裡幫忙。最近報業景氣不好，但是她沒有什麼感覺，是有聽說報老闆的同業，把報份轉給她的報老闆。報老闆可能是員林最大的報老闆，跟她一樣的送報生大概有十來個。每天 3 點要到員林地方法院對面疊報、套報、夾報，然後送到 6、7 點，大張的海報 4 角，小張的便宜一點。然後她就急忙說，剩下的我不知道，那都是老闆的事，我只是剛好遇到而已。賴女士的一日工作由 2、3 份工作組成，也呼應了文中的訪談內容，派報生的收入由好幾份兼職所構成，而對於長期從事派報工作的派報生而言，派報是一種勞動，不是一種商業活動，不管報業沒落或者逐漸走入歷史，在他們還能夠送報的歲月裡，每天還是只能夠 2、3 百份地挨家挨戶地放到信箱或門口，雙手雙腳遞嬗。每天有人送報、有人讀報，或許是最平凡無奇的一件晨間工作，默默地在日常生活與文化史，難道只能慢慢地走進黃昏斜陽的盡頭？

捌、結語

臺灣在過去 10 年間每天凌晨 3 點到早上 8 點套報、夾報、送報，挨家挨戶的送報生，年齡正逐漸老去。以物流車輛或機動車輛將報紙流動到超商及零售點，或者以個人裝置爲主的數位匯流新聞推播的景象，已經逐漸取代晨間信箱或門口的報紙。但是從許多與派報這個行業相關的回憶中，可以發現這種經驗並非獨一無二的經驗，反而可能是大多數臺灣人在 20 世紀 70 年代之後的共同經驗與記憶。

梅耶（Philip Meyer）2007 年於《正在消失的報紙》（*The Vanishing Newspaper*）一書中指出，信息時代的新聞業，由於利潤下降，大規模的壟斷不再可能。以銷售報紙作爲獲利來源、控制市場的手段幾乎不復可能。全國版廣告、地區廣告或分類廣告，占了利潤主要來源的時代。如何以編輯內容的正確性、可讀性吸引廣告才是最重要的任務，維持新聞業存續唯一的途徑，必須認清新聞內容仍然是價值唯一的來源。顯然大多新聞學研究者的看法認爲：受到數位資訊的衝

airiti

擊，印務及發行派報除了是邊緣以外，還可能是即將走入歷史的一部分。然而舒森（Michael Schudson）在《新聞的力量》（*The Power of News*）一書中認爲，美國報業 3 百年史，新的技術使得美國人成爲讀報的動物（newspaper-reading animal），新聞或者日報，不只承載資訊，而且也是作爲一種社會機制。新聞不會消失，但是發行與派報逐漸萎縮，對於當代的新聞媒體來說，可能就是最後一哩或者斷尾求生之間的抉擇。

airiti

附錄：訪談名單

受訪者	訪談時間	訪談方法	訪談者	地點
鄭景標	2014/01/07	面訪	蕭旭智	臺北市派報職業工會
陳兩傳	2014/01/07	面訪	蕭旭智	臺北市派報職業工會
方桃忠	2013/12/12	面訪	蕭旭智	臺北市《聯合報》（汐止）
成鳳鳴	2013/12/02	面訪	蕭旭智	新北市板橋誠品書店
朱副理	2013/12/31	面訪	蕭旭智	臺北市良友派報社
李國隆	2014/01/22	面訪	蕭旭智	新北市派報職業工會
黃正雄	2014/01/14	面訪	蕭旭智	宜蘭縣派報職業工會
陳道銘	2014/01/14	面訪	蕭旭智	宜蘭縣派報職業工會
王自由	2014/02/22	面訪	蕭旭智	雲林縣派報職業工會
黃朝欽	2014/03/04	電訪	蕭旭智	高雄市派報職業工會
劉祝江	2014/03/11	面訪	蕭旭智	新竹市《自由時報》分社
蔡先生	2014/03/07	電訪	蕭旭智	花蓮市派報職業工會
賴秀珠	2014/02/23	電訪	蕭旭智	彰化縣大村鄉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243-251，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7

新左派公共知識份子與批判思想遺產——紀念史都華 · 霍爾 *

A New Left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the Legacy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Memory of Stuart Hall

羅世宏 **

Lo, Shih-Hung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壹、前言

史都華 · 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是《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的首任主編，文化研究巨擘，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最尖銳的批評者，也是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旗手。

今（2014）年 2 月 10 日霍爾辭世以來，各界紀念霍爾的文字甚多，散見於英國各大報刊的專文，以及英國黑人學會（Black British Academics）架設的向霍爾致敬的專屬網頁 [1]。目前為止，也有多個紀念霍爾的學術會議正在籌備當中 [2]，若連同去（2013）年《管治危機》（*Policing The Crisis*）(Hall, Critcher, Jefferson,

---

* 本文主要改寫並擴充自兩篇文章：羅世宏（2014）。〈真正的新左派——斯圖亞特 · 霍爾（1932-2014）〉，《新世紀》，*8*：87；以及羅世宏（2014）。〈「熟悉的陌生人」—— 向一代宗師霍爾致敬〉，《騰訊大家》。取自 http://dajia.qq.com/blog/380948101012349

** Email: shihhung.lo@gmail.com

1 參考網址 http://blackbritishacademics.co.uk/about/prof-stuart-hall-1932-2014/

2 包括倫敦大學 Goldsmiths 學院文化研究中心籌辦的「在急迫性與抽象化之間：在霍爾之後的文化研究」（Between Urgency and Abstraction: Cultural Studies after Stuart Hall）研討會，以及線上學術社團——文化對話（Culture in Conversation）（http://cultureinconversation.org）——籌辦的「記憶史都華 · 霍爾：軌跡與排列」（Remembering Stuart Hall: Trajectories and Permutations）研討會。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riti press

airiti

Clarke, & Roberts, 1978) 出版 35 週年激起的學術討論[3]，以及《五月天宣言》（*May Day Manifesto 1967-68*）發表 45 週年之後得以重新出版的盛事，在在顯示霍爾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力，將不會因爲他的辭世而消散，反而會持續發酵、擴散。

出生於迦納、兼有反殖民主義行動者身分的英國紀錄片導演 John Akomfrah，去年（2013）適時完成了《史都華 · 霍爾方案》（*The Stuart Hall Project*）紀錄片，以傳記影片的方式重現了霍爾璀璨的一生，爲廣大公眾提供了一個貼近了解霍爾充滿活力的學術與社運生涯的機會。該片片長 103 分鐘，片中配樂使用了 18 首出自 Miles Davis 那些最能觸動霍爾本人靈魂深處的爵士樂曲，並且廣泛蒐集各種有關霍爾的影像紀錄，特別是霍爾爲開放大學製播的電視節目、霍爾以公共知識份子身分介入社會議題並接受電視訪問的影片，以及珍貴的家庭錄影帶片段 (Greenberg, 2013)。

貳、回顧所來徑：霍爾走過的道路

霍爾生前是全世界媒體傳播和文化研究領域共同認可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大家，更是諸多社會社運倡議行動的巨人。他同時還擁有多個頭銜，包括：多元文化主義教父、英國文化研究大師、新左派思想陣營旗手，以及柴契爾主義最尖銳的批判者。這每一個頭銜，他都當之無愧，因爲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霍爾出身牙買加的黑人中產階級家庭，其父是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當地雇用的會計師，也是被該公司拔擢爲高級幹部職位的第一位非白種人，而霍爾具有蘇格蘭白種人血統的母親一直視英國爲祖國，認爲英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殖民地牙買加的一切（包括人），都是次等的。霍爾一家人比一般牙買加黑人的膚色要淡些、白些，但霍爾自己卻是家族成員當中膚色最黑的，一直感到自己是家族的外來者。

霍爾後來回憶，他的家族血統其實並非只有單一的來源，而是具有多重的來源，有蘇格蘭白人、非洲黑人和葡萄牙猶太人的血脈，甚至摻雜了東印度群島的血統。但諷刺的是，霍爾的母親就像後殖民主義學者法農（Frantz Fanon）所描繪的「黑皮膚，白面具」那樣，外觀上雖然更接近黑人，但意識卻徹徹底底是白人的。他的親姊姊爲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原來姊姊年輕時曾與一位年輕醫師相戀，但母親因爲這名醫師是個黑人，而堅決阻止了這樁戀情和婚事。姊姊爲此悶悶不樂，甚至因此罹患心理疾病，嚴重到了必須接受電療的程度，而且終身未能痊癒。

3 參考網址 http://www.mdx.ac.uk/aboutus/news-events/events/policing-the-crisis.aspx

airiti

年輕的霍爾出乎本能的想要反抗這個家族、特別是母親給他的重重限制。他沒有直接反抗認同大英帝國的母親，而是成爲一個反帝國主義者，親自參與了牙買加的獨立運動，對帝國主義施加給殖民地子民的壓迫展開逆襲。

1951 年，也就是霍爾 19 歲那年，出於母親的殷殷期盼，也因爲自己想要「逃離」限制重重的殖民地，他以優秀成績獲得羅德獎學金，搭船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就讀。抵達英國的霍爾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與眾不同」，儘管他從小在殖民地接受的是正統的英式教育，但他和牛津大學的同學無論在階級出身或是膚色都有極大差異。置身英國的霍爾，感到自己雖然熟悉英國的一切，但他從一開始又同時感到格格不入，終其一生，以一介生活和工作在英國的黑人自居，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英國的他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Morley & Schwarz, 2014)。

參、美好世界的想像與追求：霍爾的思考、論辯與行動

在牛津求學期間，他開始了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想像和追求，一個尊重和珍視人類各種差異的世界。

面對英國社會幾波排斥移民的社會爭議，他曾說當年來到英國是爲了留學，從未想過學成後會留在英國生活和工作，後來成爲「移民」，更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發展。而留在英國越久，他的黑人意識和身分認同感越發強烈，對英國主流社會對待移民弱勢群體的方式感到不滿，主張對當今英國社會現狀的詮釋不能缺少黑人及移民弱勢群體的觀點，否則英國即不成其爲英國。

牛津求學期間，他團結了當地來自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移民弱勢群體，公開倡議移民應得到公平待遇的公民權利。1956 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一是英法聯軍入侵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一是蘇聯揮軍鎮壓匈牙利的民主革命，更觸發了霍爾產生更獨立和批判的政治自覺，走向「新左派」的思想路徑。

嗣後，霍爾放棄撰寫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爲主題的博士論文，從牛津移居倫敦，積極參與了 1963 年前後倡議解除核武的示威抗議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也在運動中結識了他的妻子、後來成爲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凱薩琳（Catherine Hall）。同一期間，霍爾參與共同創辦了《新左派評論》。白天他在黑人聚居的布里斯頓區擔任代課教師，晚間則在位於蘇活區的《新左派評論》雜誌社處理編務。參與這份雜誌的成員相濡以沫，成員包括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愛德華・湯普森（E. P. Thompson），也包括去年底（2013）去世的知名小說家桃莉絲・萊辛（Doris Lessing），左批在

airiti

各地實際表現出極權性格的共產主義，右批多行不義的英美帝國主義。這份雜誌歷久不衰，至今仍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的左派、進步知識份子的旗艦刊物[4]。

在倫敦的布里斯頓區和蘇活區兩地遊走，比在牛津那種濃重的學究和貴族氣息更令霍爾感到如魚得水。布里斯頓區那種活躍和多樣的黑人庶民生活文化，以及蘇活區市井常民和藝術創作者的自由氛圍，讓他得以親近許多藝術創作者、策展人和社會運動倡議者，也讓他得以貼近原本在英國主流社會排斥或邊緣化的底層群體和文化。他後來能夠在伯明罕大學開創文化研究的理論和實踐，重視底層邊緣群體及其真實生活經驗和文化的價值，可以說是得益這段期間的生活經歷。

1964 年接受作家兼學者的霍加特（Richard Hoggart）[5] 的邀請，任職於伯明罕大學甫成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於 1972 年真除爲該中心的主任。文化研究在當時並不顯眼，但在霍爾充滿魅力與能量的領導下，半世紀後的今天已在全球各地開枝散葉，成爲人文歷史與社會科學交匯點上最具活力的學術領域，開展了同時關注社會底層、性別、青少年文化、族群與國族身分認同、流行文化與媒體再現的學術新疆域。

他從未以傳統學院人士自限，也不熱衷追求學術評價體系提供的酬賞，而更樂於作爲一個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公共知識份子。大學於他，（只）是一個基地，是讓他在教學中獲得樂趣，並與各路師友合作共同介入公共論辯的基地。

1968 年前後，霍爾和兩位新左派健將威廉斯和湯普森聯名起草了《五月天宣言》，對麻木不仁的資本主義現狀提出猛烈批判，尤其對於當時雖是工黨政府執政、卻對勞工階層的苦痛無動於衷的吊詭情狀，感到不滿與憤怒。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工黨辜負甚至背叛了它對選民的承諾，執政後反而受制於當代的「新資本主義」，汲汲於爲管理主義和金融資本的權（與利）服務，卻將普通民眾的就業、醫療和教育需求放在次要的地位。此一宣言當時獲得了 70 位作家、學者和社會運動倡議家的簽名連署，至今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歷史文獻[6]。

此後，霍爾很少在英國的公共生活和辯論中缺席。1979 年，他離開了任教 15 年之久的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轉赴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任

---

4 霍爾一生中參與創辦了 3 份重要的學術與運動刊物，包括他在學生時期與 Raphael Samuel 及 Charles Taylor 等人共同創辦的《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1960 年與威廉斯、湯普森等人共同創辦的、並且由兩份左派刊物合併而成的《新左派評論》、以及 1995 年他與 Doreen Massey 和 Michael Rustin 共同創辦的《探索》（*Soundings*）。關於他在這三份刊物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另見 Blackburn (2014)。

5 同樣令人傷悲的是，霍加特也於今年（2014）4 月 10 日逝世。

6 去年（2013）5 月，適逢《五月天宣言》發表 45 周年之際，這份宣言在英國重新公開出版，並通過網路自由傳布分享，參考網址 http://www.lwbooks.co.uk/ebooks/mayday.pdf

airiti

教，剛好遇到柴契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政府上台，從而展開了他對於柴契爾主義和他稱作「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批判，並預言柴契爾主義將比柴契爾夫人存活得更久[7]。證諸 1997 年工黨以「新工黨」名義和姿態重新執政後，緊緊影隨著柴契爾夫人的財經與社會政策，同樣不把普通民眾的民生迫切需求放在執政方針的首位，霍爾確實是一語中的。

以新左派自居的霍爾，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來都不是盲目的。馬克思主義於他，一開始是用來對抗蘇聯入侵鎮壓匈牙利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後來則是策略性地用來爲底層和邊緣群體發聲的行動武器。他反對老左派教條主義的態度十分決絕，用他的話來說，他所認可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強調理論的開放性，反對封閉的、自我生成的決定論，而應該在實踐和反思中不斷辯證和修正，敢於超前時代去想像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並超越任何主義與現實之間名實不副的鴻溝，回歸馬克思主義追求美好價值的初衷，是他始終不懈堅持的社會改革方案。就在去年，即使已入風燭殘年，霍爾強忍長年飽受洗腎和換腎之苦，與一群進步學者公開共同發表一份名爲《在新自由主義之後：基爾本宣言》（*After Neoliberalism? The Kilburn Manifesto*）的社會運動倡議書 (Hall, Massey, & Rustin, 2013)，希望爲飽受新資本主義危機的世界尋找新出路。霍爾老矣，對這個他深愛的世界仍然充滿念想，而這位一代宗師的思想和關懷仍然熠熠發光，必將啓發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繼續走上追求社會改革的道路。

此處必須強調的是，霍爾從未放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他甚至對文化研究在學院建制化後逐漸與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的趨向表達深刻的不滿。2012 年，在加力（Sut Jhally）對霍爾所做一場精彩訪談中[8]，霍爾清晰地指出，只要資本主義還活著，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將不會止息，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必須重新肯認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源的重要性：

> 批判思考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在文化研究中的缺席，…… 是（當前文化研究）真正的軟肋。……我想要重新介入這類議題，而這正是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的本色。……文化研究曾經企圖與經濟化約論劃清界線，但卻因此淡忘了經濟的根本存在，而這並不是一個可喜

7 事實上，霍爾正是「柴契爾主義」一詞的發明者，他在 1979 年 1 月即已開展對他所預示的柴契爾主義的批判，在時間點上甚至比柴契爾正式上台就任英國首相還早了 4 個月！

8 這段訪談視頻可見於 http://vimeo.com/53879491

airiti

> 的論事立場。……對政治經濟學有興趣的文化研究學者必須回歸（馬克思主義），並且反身自問：（政治）經濟因素在物質和符號生活在生產過程中的角色是什麼？

霍爾除了活躍於大學和社會運動場域，也熱衷於平民教育和電視教學，更是積極入世的公共知識份子。1979 年，告別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霍爾婉拒了許多名校邀請，轉赴英國開放大學社會系任教，爲的是在開放大學他可以接觸到更多英國弱勢家庭子弟，同時他也爲開放大學製播一系列的電視教學節目[9]，爲許多英國普通民眾開啓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視窗。打從年輕開始，面對英國社會發生的各項公共事件，他也透過學術研究、公開撰文和發表宣言，不只提供了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新左派的聲音，也提供了難得且深刻的黑人群體及社會底層的觀點。

多位英國黑人學者最近紛紛回憶霍爾曾經扮演的那個不可取代的公共角色。早年出現在的英國電視的黑人，不是歌聲嘹亮的娛樂表演者，就是四肢發達的運動員，但霍爾當時頻繁在電視上的現身，給了英國黑人青年極大的啓發和鼓舞：看著同是黑人的霍爾如何以他字正腔圓的英語和深厚的學養去評論與分析公共事件，看著霍爾如何以雄辯和睿智的論證折服白種上流社會菁英，看著霍爾如何爲底層民眾發聲……，著實令許多英國黑人青年興起「有爲者，亦當如是」的自我期許。

同樣是新左派思想與行動者的阿里（Tariq Ali）指出，霍爾留給那些想改變世界的人一項重要的遺產：從不停止思考、辯論和行動 (Ali, 2014)。他是令柴契爾夫人最感到敬畏的原創思想者與批判者，也是新工黨（New Labour）在 1997 年得以重新執政的關鍵啓蒙者之一，可惜新工黨重新執政後的實際表現背棄了對選民的承諾，令霍爾相當失望。

霍爾不只是一位傳播與文化研究學者，更是一位社會理論家，並且曾在 1995 年至 1997 年間擔任英國社會學學會（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除了在社會學領域的影響力之外，在媒體傳播和文化研究的領域，霍爾更是一位多產而富有原創性的學者。除了提出「製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 model）此一影響廣泛的傳播模式，爲原本毫無生氣的主流傳播研究領域注入活水之外，他也引進並擴大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概念，另在批

9 霍爾在 BBC 2 晨間播出的開放大學教育文化節目裡經常現身講課，持續不輟近 20 年之久。

airiti

判媒體妖魔化所謂「社會偏差」人群和道德恐慌現象的研究，國族與文化認同、後殖民主義以及視覺文化／藝術的研究，以及他所示範的接合理論（articulation theory）和局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也有難以估量的巨大貢獻和影響力。

霍爾也對視覺文化藝術的研究和發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記。1994 年，在霍爾的啓發與奔走下，國際視覺藝術中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在倫敦成立，致力於爲來自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及英國本土視覺藝術創作者和策展人開拓展演機會，並提供有關視覺文化藝術的教育和培訓陣地。該中心設有館藏豐富的視覺藝術文化圖書館，對公眾和兒童開放，並且命名爲史都華•霍爾圖書館（Stuart Hall Library），透過視覺文化藝術的公共介入與倡議，延續著霍爾念茲在茲的多元文化再現的香火。

1997 年前後，倫敦政經學院爲慶祝建校百年而設立了地位崇隆的拉夫•密立班講座（The Ralph Miliband Programme），並且聘請霍爾擔任該系列講座的首位講座教席，爲跨領域的研究生主持爲期半年的公開課。筆者曾有幸聆聽其中數場講座，霍爾當時的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出入課室時必須拄著一根拐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說自己從來不放棄社會批判的原因是他始終對這個世界仍懷抱著美好的想望。他還說，他有時也不免對某些學術理論的時髦趨勢或是同在左派思想陣營的同志發出異議之聲，其實這是故意的，也是策略性的。他用了一個相當形象的比喻：同在一船上的我們若都一股腦地坐在右舷或左舷，這船遲早要翻覆，所以他必須唱反調。當時聽霍爾此番言辭，覺得他頗有「予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的風範。

肆、通往更美好社會的道路漫長

經過了一甲子的歲月，心存抗拒的霍爾最終還是從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子民，變成了英國的公民，不生於英倫，但死於斯土。不過，在他的靈魂深處，在他的政治和社會想像裡，當今的英國並不是他理想和夢想中的祖國，因爲它距離一個公平正義、尊重差異的社會的實現，道路依然漫長。霍爾去（2013）年在接受訪問時一度消沉了他慣常的樂觀意志，對於 2011 年發生在倫敦等地的（主要是、但不限於黑人的）青年騷亂事件，他沈痛地指出：

> 一些處在社會底層的孩子遭遇的是深刻的社會疏離，（因此）他們只能被迫地向柴契爾主義、布萊爾主義（Blairism）的結盟勢力發出這

airiti

> 樣的訊息：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是喧鬧（what you have to do is hustle），因為沒人會來幫他們，而且沒有政治組織為他們說話，缺乏有組織的黑人發聲，也缺乏理當同情他們的、來自左派的聲音。（轉引自 Jeffries, 2014）

霍爾以 82 歲之齡離開了他所愛的這個世界，但毫無疑問地，他的影響力將在身後持續發酵。原因很簡單，只要世界上還有不公不義，還有任何形式的歧視和暴力，就永遠需要像霍爾這樣的多元文化主義者，以及向他這樣的真正的新左派。

最後，借用希臘詩人卡瓦菲斯（C. P. Cavafy）詩作《伊薩卡島》（*Ithaca*）的名句向霍爾致敬：

> 當你啟程，
> 前往伊薩卡島，
> 但願你的道路漫長，
> 充滿奇跡，
> 充滿發現。

爲了通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霍爾無意提供一條捷徑，但他用精彩的一生爲我們示範、並開啓了一條漫長的道路，而且爲我們探索、並發現了處處奇跡；這條道路霍爾自己或許還沒能夠走完，身爲後輩學人的我們應當循著他的足跡，繼續前行。

參考書目

Ali, T. (2014). Stuart Hall's message to those who want change: Think, debate -- and get off your backsid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feb/10/stuart-hall-radical-thinker-thatcherism

Blackburn, R. (2014). Stuart Hall, 1932-2014. *New Left Review*, *86*, 75-93.

Greenberg, J. (2013). The Stuart Hall project: Sundance review. *The Hollywood Repor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review/stuart-hall-project-sundance-review-415792

airiti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Hall, S., Massey, D., & Rustin, M. (Eds.). (2013). *After neoliberalism? The Kilburn manifesto*. Retrieved from http://www.lwbooks.co.uk/journals/soundings/pdfs/manifestoframingstatement.pdf

Jeffries, S. (2014). Stuart Hall's cultural legacy: Britain under the microscop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4/feb/10/stuart-hall-cultural-legacy-britain-godfather-multiculturalism

Morley, D., & Schwarz, B. (2014). Stuart Hall obituar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4/feb/10/stuart-hall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253-260．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8

典範與起源之外：側寫霍爾的反新自由主義思想

Besides Paradigm and Origin: A Profile Contextualizing Stuart Hall's Anti-Neo-Liberalism Thinking

唐士哲 *

Tang, Shih-Che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壹、前言

作爲英國二次戰後最重要的批判理論學者，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的公眾形象有別於許多出身學院體制的博學大家。霍爾出身自加勒比海前英屬殖民地牙買加的中產階級家庭，17 歲時到英國求學，在英國定居就業，也在英國見證自己的家國脫離殖民統治。殖民文化的階級矛盾與客居社會的離散體驗，成爲灌溉霍爾批判思想最重要的社會養分。

霍爾的「公共知識份子」形象最早源於他是英國新左派的發起人之一。新左派修正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主張任何社會結構性改革的契機，必須重新思考新型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社會關係與動態，並對這些不同層次的要素作總體性的思考 (Hall, 2010: 185)。霍爾對於馬克思陣營裡缺乏對族群與種族宰制的論述，以及忽略文化與文學的重要性深表不滿。受到英國文化主義者如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影響，他將文化視爲人類生活的整體型態、是瞭解階級意識轉變的要素 (Hall, 1958)，然而他也批判

* Email: telsct@ccu.edu.tw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文化主義者偏狹的國族中心意識。霍爾認爲文化除了凝聚社群意識，更是整體社會中差異認同的競技場。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性別、種族等集體或個體政治，皆在文化的再現衝突中建構。他主張文化的問題即是政治的問題，文化既是以行動介入社會的關鍵，也能夠建立或鬆動特定的權力關係，鞏固或再造政治 (Hall, 1981)。

霍爾在 1968 年接替賀加特，成爲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主任。CCCS 在 1970 年代儼然扮演批判理論的匯聚地與轉運站。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語言學、心理分析、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批判中，英國文化研究援引、提煉並建構文化批判的理論語言。由 CCCS 草創到他於 1980 年轉赴公開大學社會系任教的這十多年間，「文化研究」成爲一個跨學門、跨國的顯學。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閱聽眾民族誌學觀察，以及純理論的探索，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向文化轉」的重要路標。在傳播研究學門裡，文化研究喚醒了酣睡已久的方法論爭議，所謂質性／量化、批判／實證的區分，因爲文化研究而更顯立場分明。文化研究與批判政治經濟學關於閱聽人消費的論爭，更掀起批判理論傳統的茶壺風暴。

霍爾曾被批評爲批判立場的反本質傾向、理論的趕時髦 (Eagleton, 1996; Rojek, 2003)，但與其說這是他個人治學態度的機會主義，不如說首尾一致並非他對學術勞動的想像。霍爾曾說：「理論僅是岔路，爲了通往更至關緊要的他處」(Wark, 2014)；「理論化的目的並非爲了提升個人智識能力或學術聲望，而是能使我們更能掌握、理解與解釋這個歷史的世界及其過程——即生產更適切的解釋；並藉以啓迪我們的實踐、促成這個世界的轉型」(Hall, 1988a: 36)。對他來說，隨著社會脈絡的改變而保持彈性，且持續位移，理論才能夠「介入」複雜多變的權力過程。在文化研究開枝散葉、蔚爲國際化的學術風潮之際，他不曾試圖定義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或方法。正如他在一次訪談中強調：「我只能聲稱我在文化研究的場域中從事某種類型的文化研究，我不會試圖合法化什麼是或不是文化研究」(Hall & Jhally, 2012) 即便被封爲精神起源，他卻抗拒成就一家之言的學術桂冠。

隨著國際化與學院化，文化研究成爲龐雜且異質的學術實踐。但霍爾始終主張「文化的」與「政治的」之間的版圖鬆動背後，更關鍵的目的是要找出文化與社會整體狀態的「接合」（articulation）。在任何時期或地點，社會權力關係的複雜與易變。任何文化分析不能偏廢的問題，是「它與整體社會有何關聯性？」文化或社會生活實踐的種種，對霍爾而言皆是接合點，可以指引出整體霸權狀態。

霍爾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現勢的局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

airiti

of the present）的奉行者。「局面」是特定歷史時刻裡，社會、文化與經濟勢力交織成的政治結果，交雜了個體或集體的實踐所構成複雜的權力關係。當這些不同層次的關係在特定歷史時刻被串連、結合並壓縮爲特定的「局面」，現狀有可能被強化、阻礙改變。但在裂隙產生的偶發時機點，新局面也有可能產生，造成社會結構的翻轉。因此，局面總是「多重決定」的（overdetermined）(Grossberg, 2014; Hall, 1988b)。據此，霍爾主張特定事物的意義在「關係」中顯露，也在關係的脈絡中，彰顯「局面」的整體與特殊性。文化分析即便無法窮盡構成特定局面的所有權力關係，卻應該見微知著，在特定的歷史局面中，觀察不同的勢力如何匯聚，並思考打造新政治局面的可能 (Grossberg, 2014; Rojek, 2003: 12-13)。

即便文化分析順勢易變，霍爾始終如一的關懷，仍是資本主義社會裡文化如何捲動社會轉變，與建構平民民主政治的可能。霍爾與威廉士及湯普遜（E. P. Thompson）是 1967 年發布的《五月天宣言》（*May Day Manifesto 1967-68*）主要撰稿者。當時英國社會的種種跡象顯示經濟新自由主義思維即將粉墨登場。46 年後，霍爾再度與 Doreen Macey 及 Michael Rustin 等人發表了《在新自由主義之後：基爾本宣言》（*After Neoliberalism? The Kilburn Manifesto*）。此時經歷全球金融風暴、銀行債信崩盤、中產階級流逝，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是千瘡百孔、危機滿布。主導社會與政治生活許久的自由化經濟思維即便備受質疑，支持此模式得以持續宰制的「社會共識」仍舊紋風不動。如果「宣言」是時代徵兆的顯影劑，串起這兩個歷史時期的結點，則是霍爾在 1980 年代發動一系列對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主義的解剖與批判。

貳、柴契爾主義？憑什麼？

2013 年 4 月 18 日，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過世。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接受《週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訪問時推崇她道：「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柴契爾信徒」。社群網站 Youtube 上則流傳一首慶賀「女巫已死」的嘲諷歌曲。蓋棺未論定，英國在位最久的首相死後遺留下來的究竟是資產或負債，猶如柴契爾剛上台時操縱的社會氛圍一般，兩極化且針鋒相對。

時序倒回至 1979 年，柴契爾領導的保守黨終結工黨執政，贏得大選。霍爾在當時便準確預測到，柴契爾造成的衝擊，將會遠比這個政權的壽命要長久許多 (Hall, 1979)。果不其然，英國的政治社會自二次大戰後便建立起來的「社會民主」

airiti

共識，在柴契爾上任後快速崩解。而她厲行的自由化政策，包括將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中產階級減稅，以及大幅刪減社福與教育預算等，僅是開展日後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全世界的前奏。

究竟柴契爾有何能耐，將一個經濟自由化口號操演成社會整體的改造計劃？霍爾認爲柴契爾「主義」的起始點，並非什麼新時代的新思維，她所達到的，僅是善於操作社會潛藏的共識危機，並成功掀起具號召力的民粹運動，創造新局面 (Hall, 1988a)。即便她的自由化政策使得私人資本快速膨脹，市場意識強壓公共價值，但真正促使新自由主義攻城掠地的危機，卻在她執政前早已湧現。

此話怎講？「社會民主」共識的內部矛盾是主因。英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社會民主」共識，奠基在凱因斯式總體經濟政策（Keynesian economics）的「強國強本」（big state, big capital）上。這個共識強調政府基於維護公共利益，有權介入民間經濟活動，並以特定產業國有化的手段，杜絕私人資本的坐大、保障勞動權益。社會政策上則是推崇集體主義，打造社福與教育權益均等的福利國家。以議會作爲協商政治的樞紐，不論是工黨或是保守黨執政，大抵不會偏離這個大方向。

然而這個共識是建立在危殆的社會與經濟基礎上！二次戰後，英國社會經歷短暫畸形的經濟榮景，快速累積的財富撐起福利國之所需，但勞工意識也在安逸的社會氛圍中日趨渙散。代表大部分勞工階級的工會在工黨的整編下，走入體制，成爲議會政治過程中政府、資本之外，可以討價還價的第三勢力。但工黨於 1966 年執政時，榮景已是強弩之末，整體經濟走勢呈現衰退。面對冷戰中美國的國際擴張主義、日益國際化的市場，以及財團勢力的坐大，政府迷信以銀行體系主導的貨幣經濟政策，推崇現代化的效能管理、企業的獲利表現與勞動條件的限縮作爲挽救經濟衰退的強心針。工黨在議會和稀泥式的統合政治過程中，淪爲消極的「危機控管者」。內外政經因素交疊下，廣義的議會政治，或窄義的工黨策略，早已與社會民主的均富理想背離，更與民間社會的需求形同陌路。

「社會民主」的共識到了 1970 年代更是危機四伏。隨著中東石油禁運而來的全球經濟恐慌，以及英國國內產業經濟委靡不振，階級矛盾持續擴大，「社會民主」的均富理想在勞資衝突、罷工擾攘中備受挑戰。在保守黨與工黨，以及保守黨內的派系惡鬥下，柴契爾代言的激進右派趁勢竄起。「社會民主」被極右論述再現爲狹隘的「局部」利益，是「階級到政黨」政治下的產物，與整體的「國家利益」相違背。極右派因此標榜站在「全民」這邊，要向壓制個人差異或選擇自由的國家集體主義宣戰 (Hall, 1988b)。

airiti

作爲保守黨內極右勢力的掌門人，柴契爾多方拉攏，公開挑戰社會民主的共識政治。她由學院取得論述正統性，將新自由主義學者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與傅立曼（Milton Friedman）捧爲國師，並與凱因斯經濟決裂；另一方面則取道民間，挖掘並集結散落社會各個角落的活生生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並以簡化二分法將小老百姓的怨懟與不滿連結至右派的意識型態與策略。她質疑「福利國家」所揚舉的平等主義或集體共享等價值，將其貶抑爲「老態龍鐘的社會主義」（creepy socialism），並主張社福支出應該大幅刪減，還自力更生的中產階級一個公道，並杜絕坐享其成的「社福無賴」。她強調人民應該有權自主處置資產，因此只有「自由的市場交易」能實現自由的社會。她將工會組織貶抑爲阻礙英國進步的營私團體，去國營化才能挽救英國破敗的經濟。她揚舉「法律與秩序」的重要，打壓犯罪、鼓勵婦女走進廚房，喚起傳統英國社會尊重權威、父權的道德價值。她批評英國的教育制度過分迷信受教權的均等，卻與產業的需求脫節 (Hall, 1979, 1988b)。

霍爾認爲，在這場英國社會「向右大步跨」的戲碼中，柴契爾以民粹式的語言指認出經濟、文化與市民社會正經歷的結構性改變 (Hall, 1979)。在操縱舊階級矛盾、同時營造新社會共識的過程中，柴契爾的論述本身便是矛盾的綜合體：它融合了傳統的集體價值觀，如國家、家庭、父權、責任、權威等，與新自由主義揚舉的個人化意識型態，如私有化、競爭邏輯，以及反國家集體主義 (Hall, 1988b: 106)。在她的二分法中，一方是人民，另一方都是陳舊的官僚集體主義，而柴契爾則是站在人民這一邊。社會民主的「強國強本」走向，經她的扭轉，成了「自由資本、強勢國家」（free capital, big state）。一如霍爾指出，柴契爾主義成功之處，正在於「走進市民社會自身的抗爭並贏得一席之地；利用市民社會的城郭與戰壕，作爲打造自外於國家的意識型態與智識的權威。在正式取得國家權力之前，藉由內部的論戰與既有權力集團形成對抗」(Hall, 1988a: 47)。

但「新」自由主義終究一點也不新。霍爾引用葛蘭西的說法，強調在任何時代中意識型態促成的社會轉型，往往不是新思維取代舊作法，而是將新、舊成分交揉，以嶄新的論述再現之。英國，乃至全球社會所經歷的市場化改造，充其量是新瓶裝舊酒。既有的權力結構並沒有因爲意識型態的更迭而鬆動，反倒在新、舊觀念與價值觀交融、重組過程中，更形鞏固。因此，他將柴契爾政治形容爲「威權式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被資本的邏輯主宰的國家始終是鐵板一塊，但圍著這些權力機構的是新的、被建構起來的民粹共識。這個共識將曾經附屬在「公共福利」價值下的言談氛圍，成功的翻轉爲「私有化」邏輯，成爲任何事皆可私有化 (Hall, 1988a: 40, 2012)。

airiti

因此，所謂柴契爾主義或雷根經濟（Reaganomics），得利於掌握政治與經濟變遷（movement），或收編散落在市民社會各處的常民需求或想望，並將它們以特定的論述主體召喚之、藉以壟斷詮釋權，並建構霸權。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代表的不僅是經濟領域的市場放任，它更是將市場意識普遍化爲社會發展的準則。然而市場宰制並非一蹴可幾，它必須倚靠特定的權力體系鞏固，且揉合了複雜的利益與特權。新自由主義便是建立在這些複雜的利益或特權所達到的「共識」上，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將政治個人化與消費者化，同時在過程中消解任何對其權力或意識型態構成挑戰的抗爭，因此是社會意識的漫長改造工程。

參、改變的漫漫長路

作爲「市場化」字眼的敲門磚，「柴契爾主義」如今已成爲歷史名詞。然而柴契爾奉行不悖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仍宛如巨靈，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的全球化腳步四處複製，甚至產生變異。即便歷史的巨輪仍在其軌道上運行，但隨著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內矛盾叢生，「局面」已入崎嶇險境。

霍爾曾主張，柴契爾主義由「社會民主」的共識矛盾中長出。如果要對抗這個如八爪章魚般的新自由主義，也必須由這個意識型態改造下的資本主義社會矛盾中，醞釀及匯聚改變的能量。在霍爾對於柴契爾主義展開的「新時代」（New Times）批判中，他提醒左翼應該摒棄與資本主義社會「非敵即友」的成見，強調左翼的戰場並不應只存在於傳統經濟領域裡的工廠或職場，而應深入敵營，進入消費社會的內部。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政治，應當將「政治的」概念擴大，開啓「私人的麻煩」與「公眾議題」之間的批判辯證，並與鮮活的社會或文化經驗結合，在社會場域中廣泛擁抱各種因社會矛盾而觸發的抗議政治或社會運動。正所謂「個人的即是政治的」，尋常生活的個人經驗都具備「潛勢」（hidden dimension），蘊含被再現爲政治的論述，也是召喚集體行動實踐的原料 (Hall, 2010: 187)。對霍爾而言，抗爭是一場持久戰，且戰場就發生在市民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場域中。

霍爾的批判路線，跳脫左翼狹隘的階級窠臼，強調社會主義應該無懼於擁抱差異與多元，甚至更應投入再生產差異與多元。因此，性別、族群、家庭乃至身體都是再現與生產對抗政治的場域 (Hall, 1988c)。他對於權力政治的敏感，使得他始終跳脫「陣營」的鮮明標籤，並且在偶發、開放的現勢局面中思考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可能。霍爾認爲政治的意義在於擴展群眾的能力，社會主義的政治正是將批判作爲增權的工具，爲市井小民代言。

airiti

霍爾的人民民主路線，是近年來湧現街頭民主場景的理論先行。從茉莉花革命到占領華爾街運動，從中國大陸的上訪維權到臺灣的反服貿運動，資本主義全球化所衍生的矛盾，既起因於個人的生存困境，也是對於制度化經濟圈地暴力行徑的反撲。反抗政治在不同地域，以不同的抗爭形式或強度被接合至集體的意識或行動。以占領華爾街或占領立法院運動而言，這些發生在號稱民眾有投票權、言論自由社會的「逆民主」（counter democracy）抗爭，隱含對於當代議會代議民主路線失靈的反撲，也成爲「不信任」政治的具體實踐 (Rosanvallon, 2006/2008)。

一如葛蘭西體認到每個危機都是重構社會的轉機，從危機中構思、號召「超越新自由主義」的契機，霍爾的鬥士形象始終如一。如今鬥士已卸甲歸田，但邁向公平公義的人民民主仍是一場漫長的革命。

參考書目

Eagleton, T. (1996). The hippes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8*(5), 3-5.

Grossberg, L. (2014).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a light: Stuart Hall (1932-2014). Retrieved from 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21895-rage-against-the-dying-of-a-light-stuart-hall-1932-2014

Hall, S. (2012).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In J. Rutherford & S. Davison (Eds.), *The neoliberal crisis* (pp. 8-26). Essex, CT: Soundings. Retrieved from http://www.lwbooks.co.uk/ebooks/The_Neoliberal_crisis.pdf

-- (2010). Life and times of the flrst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61*, 177-196.

-- (1988a). The toa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35-57). London, UK: Macmillan Education.

-- (1988b).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New York, NY: Verso.

-- (1988c). Brave new world. *Marxism Today*, *October*, 24-29.

-- (1981).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pp. 227-240). London, UK: Routledge.

-- (1979).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Marxism Today*, *January*, 14-20.

-- (1958).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5, 26-32.

airiti

Hall, S., & Jhally, S. (2012). *Stuart Hall interviewed by Sut Jhally*, *Aug. 2012*. [video]. Retrieved fro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yuKRwd5Lqg

Rojek, C. (2003). *Stuart Hall*. Cambridge, UK: Polity.

Rosanvallon, P. (2008). *Counter-democracy: Politics in an age of distrust* (A. Goldhammer,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6)

Wark, M. (2014). RIP Stuart Hall. *Public Seminar Commons*. Retrieved from http://www.publicseminar.org/2014/02/rip-stuart-hall/#.U4PbsyiLO0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4 卷 第 2 期．頁 261-274．2014 年 7 月
DOI: 10.6123/JCRP.2014.019

口語在人間：評述 Walter Ong 的 *Orality and Literacy*

Speech in the Human World: A Review of Walter Ong's *Orality and Literacy*

蘇碩斌 *

Su, Shuo-Bin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壹、關於本書 [1]

本文成稿前夕，正是 318 學運如火如荼之際。原本在家閱讀新聞、瀏覽臉書的個人，前仆後繼來到現場，不停吶喊口號、高唱歌曲，在場群眾莫不感受心靈糾結在一起。這就是社會運動，內含冷靜的理性，訴諸長篇的論述、不紊的分析，鼓勵獨立思考的個人判斷；同時也需要躁熱的感動，訴諸有力的呼號、動人的情緒，驅動共同行動的集體命運。

歷史的吊詭也是如此——支配現代社會的理性，從未獲得全面勝利。這個道理也蘊含在翁恩（Walter Ong, 1912-2003）這本《口語文化與書寫文化》：原本口語世界的最高技藝「修辭術」，雖經過書寫文字與活字印刷的改造，在 16 世紀變身成爲書面的能力，但絕對不會甘於沈寂在冷靜的文字裡。

因此，我們理解人類歷史不可目光如豆，不可誤將刹那供奉爲永恆。我們必須警惕，訴諸白紙黑字、講求理性證據的今天，只是人類歷史的某個階段，既不

* Email: sbsu@ntu.edu.tw

1 原著為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ld*，於 1982 年出版，之後在 2002 年、2012 年均重新出版。中譯本由何道寬於 2008 年譯出，日譯本桜井直文等於 1991 年譯出。請參見 Ong (1982, 2002, 2012)，Ong 著（Ong, 1982 ／何道寬譯，2008；Ong, 1982 ／桜井直文、林正寛、糟谷啓介譯，1991）。

airiti

代表進步，也不代表不朽。用翁恩的舉例，將科學理性等同於人類終極的能力，一如「將馬理解爲沒有輪子的汽車」，都窄化了人類意識的可能性。人類由口語文化走到書寫文化，再走到混雜書寫與口語的電子文化（二度口語文化），人的本質已然迴旋大半圈，唯有懂得這些遞變，才能尊重人的力量。或許溫雅的翁恩沒有強烈反叛理性社會之意，但這篇書介將盡力挖掘其中改變社會之潛在感受。

翁恩雖是晚熟的學院教授，卻是早慧的宗教哲人。他的人生是跨領域的典型：耶穌會教士，專長是英美文學及宗教史，並曾任美國現代語言學會會長，而在媒介史最爲知名。至於這條文學與媒介的因緣，來自他 1941 年在聖路易大學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的指導老師，亦即較翁恩年長 1 歲的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兩年在聖路易的相遇，開啓了翁恩繼續往媒介與意識的思想前進，也造就他在教士生涯中於 1954 年再取得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

翁恩最著稱的「口語文化」與「書寫文化」之二分，是一種以溝通媒介來思考文明史的策略。然而前有麥克魯漢（McLuhan, 1995 ／汪益譯，1999；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區分「聽覺時代－視覺時代－觸覺時代」，後有波斯特 (Poster, 1990) 區分「面對面或口語媒介的交換－書寫或印刷媒介的交換－電子媒介的交換」，甚且共同被歸爲媒介生態論（media ecology）脈絡[2]，那麼翁恩一書有何獨到？正是本文所欲介紹。

簡單來說，與麥克魯漢亦師亦友的翁恩，雖然對於媒介斷代史有類似的理解，但卻明顯不同於麥克魯漢奔放樂觀的理論預言家風格。翁恩在書中曾明確提及，麥克魯漢精準發現口語、書面、電子文化轉變的意義，固然有巨大的啓發性，但是卻「太快速從一種探測跳躍到另一種探測，極少停下腳步爲他『線性式』（分析式）的分類做出仔細的解釋」(Ong, 2012: 29)。翁恩援用同時代人類學、語言學的高質量研究基礎，包括 Goody (1977)、Havelock (1963, 1978, 1982)、Parry & Parry (1971) 等，細膩且紮實地勾勒出初民社會「口語人」的意識、社會，以及更重要地，鋪陳了兩種對立文化如何困擾人類命運。

翁恩沈浸到初民的「口語文化」，去體會腦袋裡只有聲音而看不到任何文字的「人」，意識如何運作？如何思考個體自我？與集體關係是什麼？這一連串的想法，都歸結到人的本質問題。

由「口語文化」理解到人與人藉由「聲音媒介」串在一起，翁恩的貢獻也才彰顯出來。他一再強調，沒有文字的人們，擁有完全不同的意識狀態，雖然人類

2 媒介生態學「學派」形成的脈絡，可參見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MEA）之相關出版資訊 http://www.media-ecology.org/media_ecology/index.html，或 Lum（2005 ／何道寬譯，2007）等著作。

airiti

勢不可擋地「以媒介技術追求生活便利」，但並沒有從一而終的「人的本質」。所以我想，翁恩既然認爲人的本質可以改變，也將相信社會沒有道理停留在原地不變。

貳、「歷時」烘托「共時」的寫作架構

這本書除了廣爲人知的顯赫主標 *Orality and Literacy*，還有個重要的副標 *The Technologizing of Word*（語詞的技術化）。按翁恩自身在〈序言〉的提示，其實正好分別呈現「共時」與「歷時」的研究旨趣。

本書的 7 章之中，略去第 1 章導言性質的〈語言的口語屬性〉，第 2 章交代材料的〈原生口語文化的現代發現〉，以及第 7 章回應老本行文學理論的〈一些定理〉，第 3 至 6 章大致就分爲「共時」與「歷時」二部分。

第 3 章〈口語文化的心理動力學問題〉及第 4 章〈書寫改變意識的構造〉，篇幅最長，論證最豐，極爲紮實架構出兩種文化的情境，是「共時性」之研究成果。翁恩的共時研究旨趣，指出以口語爲主要溝通形式的世界，與書寫爲主者，根本是斷裂的兩種世界，人活在其中，各有獨特的溝通形式與意識狀態。所以「口語人」絕對不是以文字表達、以電腦表達者的「未進化」版本。

第 5 章〈印刷、空間與封閉性〉、第 6 章〈口語記憶、故事情節與角色化〉，則是「跨時性」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將文明的「斷代」回歸到歷史的串流之中，尤其是第 5 章細論了人類由表意文字、拼音文字、印刷術、及至電子媒介的變化史，是本書作爲歷史研究（而非理論架構）的用心所在。

這裡先停住一看翁恩 (Ong, 1967, 1977, 1982) 的學術關懷。他一生著作雖然不豐，但幾部主要作品，包括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Ong, 1967)、*Interfaces of the Word* (Ong, 1977)，以及本書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Word* (Ong, 1982)，都可見到 word（語詞）這個關鍵字。翁恩對「語詞」的關注，也就是對於人的修辭表現（rhetoric）之歷史變化的關注。借由圖 1 楊金 (Youngkin, 1995: 58) 這一幅圖解，簡要勾勒出翁恩之斷代史觀。

圖 1 中的 4 種修辭表現的時代，分別由書寫語詞、印刷語詞、電子語詞 3 種時點隔開。若要更精準的考察，翁恩其實也很細心的提供了幾個線索。

第 1 個斷裂是書寫語詞的出現，指的是西元前 1500 年拼音文字母的發明。翁恩援用美國心理史學家 Julianaynes 對初民社會的人類大腦結構（及自我意識）的「兩院制」（bicameral）研究，論證大腦最初的分工，是右腦主司接收神靈傳達、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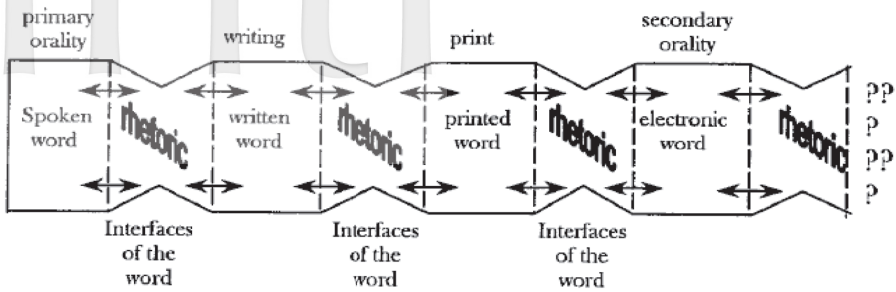

圖 1：翁恩思想中的四種語詞表現方式

資料來源：Youngkin (1995: 58)。

人類不能控制的聲響（voices），左腦則負責製造言語來與他人溝通。因此，人的語言有如過耳秋風，人的意識總是流動不停，既不須自我反省、也不須辨別分析，當然也不會有我們今天這般強悍的自我主體。大約西元前 2000 年到前 1000 年之間，初民右腦接收「聲響」的機能而後逐漸失效（用翁恩的話來說，人的意識也將由外在逐漸轉向內在），恰就符合拼音文字的發明 (Ong, 2012: 30）。

第 2 個斷裂是印刷語詞的出現，指的是 1451 年古騰堡爲歐洲引進活字印刷。印刷術改變了修辭學的變革，是翁恩自博士論文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Ong, 1958) 即開始注意的主題。「近代修辭學」變革始祖是法國人文主義者拉莫斯（Peter Ramus, 1515-1572），他主導推動了理性分類的學科分野概念，興革教育課程並制定了「教科書」。此後，修辭學自原本古希臘以來位階超高的知識之王（遠高於哲學），降級成爲與辯證、邏輯、文法、算術並列的一般課程，上課方式也只由教師採用封閉的教科書講授，失去了統攝雄辯的開闊豪氣。這個發展，對應了活字印刷的發明。

第 3 個斷裂點在書中雖然沒有明確界定，但不難想像，就是廣播、電視以及（翁恩剛見識到的）電腦湧現支配的年代。電子語詞的使用，構成的世界是人重新由封閉的書寫支配解放開來的口語文化，但又殘留書寫文化的特質，翁恩特別以二度口語文化（secondary oral culture）來界定。

3 個斷裂、4 個階段，是翁恩構築全書的基本歷時性背景，雖然份量比不上他對口語文化、書寫文化的共時性研究，但無疑是重要的理解線索。

參、「對立」的口語文化與書寫文化

翁恩以極爲對立的觀點來看待口語文化、書寫文化。口語文化是一種「渾然

airiti

不知有書寫文化」的情境。這一點與我們今天「已濡沐於書寫文化」的口語文化不同，例如我們會先寫文字稿、再據以逐字發言，就是遭到書寫「殖民」的口語者。也就是翁恩所界的二度口語文化，以別於前述的原生口語文化（primary oral culture）。

長期以來語言學、文學太過偏重「書寫下來的文本」，以致口語文化也長期被當作書寫文化的「未成年狀態」，當今很多學者以口頭文學（oral literature）來爲傳統的民歌俗謠命名，就是一種詭異「文字中心」的霸權思維。因爲「文學」（literature）一字，字根源於拉丁文 literatura，所以文學的血統就是「文字」，與「口語」全不相干，口語文學根本是「竹篙湊菜刀」一般的誤接。因此翁恩才創造了與書寫性（literacy）對立的口語性（orality）概念，用來指涉口語傳統的語詞表現產物[3]。

口語人的生活交談當然也會使用非格律、非套語，但講過就可以遺忘，沒有記憶的必要，也沒有必要對言詞字斟句酌、錙銖必較。而當思想開始複雜，又無法搜尋，就必須發展出記憶語詞的文化，對稱的音節、韻律的節奏，是全世界口語文化的必然，包括口傳故事（traditional oral stories）、箴言（proverbs）、祝詞（prayers）等表現類型（或者像是臺灣俗諺的四句連）。簡要來說，就是一種公式化表現的「套語」（formulaic expressions）(Ong, 2012: 10-11)。

翁恩對口語文化的解析，主要就在彰顯「記憶」如何必要、如何可能。聲音媒介的世界，語詞是「一被表現隨即消失」的夢幻存在。因此，語詞表現的最高修辭原則，就是爲了「可以記憶」。透過 1960 年代以來哈夫洛克 (Havelock, 1978) 等人有關西元前 7、8 世紀對荷馬史詩（Homer’s epic）的解讀，翁恩釐出史詩中不斷重複的語詞、音韻明確的節奏、大量使用的對句及押韻，都是「爲了記憶」。

翁恩有一段著名的論證，是引用南斯拉夫吟遊詩人的田野訪談記錄。這些古稀的耆宿，個個都有能力「一分鐘吟唱十幾二十行十個音節詩句」。他們堅稱每次詠唱的詩歌都完全相同，但是經過現代錄音比對，其實雖有相同旋律及韻腳，卻絕不會唱兩次相同的歌詞。亦即，語詞的表現是詩人根據自己的心情、觀眾的反應、現場的氣氛等社會心理因素而隨興轉換的「拼音」（spelling）而已 (Ong, 2012: 69)。翁恩強調，他們不識字且拒絕識字，爲的是避免損傷創作力。這種創作力，不是「無中生有」的書面原創性，而是因地、因時、因人制宜的口語即興

3 口語文化的產物，Ong 認為類似 David Byrum 使用過的詩歌性（epos）一詞 (Ong, 2012: 13)。

airiti

創作力。因爲他必須融入情境與人互動。他們的養成是經年累月的聽學、反覆練習成格的套語（同上引）。

口傳史詩的一大特色是大量厚重的英雄形象，這並不是文學風格，而只是爲方便記憶。出場人物必定附加形容詞，否則無法被記憶傳誦。因此英雄或主角不能只有單一一個名字，必須是聰穎的奧德修、勇敢的武士、美麗的公主，甚至天真無邪的小紅帽、窮兇極惡的大野狼，都是成組套詞的產物。口傳時代的英雄，不是浪漫、偉岸的特異個人，而是爲了共同記憶而模塑的集體產物 (Ong, 2012: 38, 69)。唯有一再重複、使用套語、才能讓瞬間即逝的語詞「召喚回來」；若與人舌戰，也須掏出記憶中所有強力語詞來痛宰對方。這種場景在電影《九品芝麻官》裡包龍星在鳳來樓橫掃來敵的吵架王場景，大概可見一斑。

所以，口傳詩人雖然必須背誦詩歌，但不依賴書寫文化，他們需要時間將別人的故事滲透進自己的生命之中；他不「記住」別人的故事，而是「忘掉」別人的故事。但是反過來，說出口的語詞也絕對都與他人緊密扣連，人不可能長時間自言自語，更不可能回憶修改自己說過的語詞，也沒有「絕對正確」的概念。當今綜藝節目盛行《百萬大歌星》之類要求猜出正確歌詞的遊戲[4]，當然是文字時代的規矩。

翁恩還整理出 9 個口語文化的語詞特色：一、附加的而不是等級從屬的；二、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三、爲了記憶以致堆疊、冗餘且豐厚的；四、保守、固守傳統；五、貼近生活世界；六、鼓勵對話的戲弄、嘲諷、叫陣等對抗性；七、對話者具有高度的移情式參與感、而非與對象疏離；八、社會處於一種衡穩狀態；九、重視對話的情境，而非抽象的理性 (Ong, 2012: 39-49)。

因此翁恩歸結口語世界的語詞，重點在於社交性、外在性，以共同的「套語」作爲思考的基準便於外在互動交流，而非內在的深化自省。

肆、書寫「技術」改變的人類

人的這種生命狀態，一旦「書寫文化」出現，就被迫改變。

翁恩認爲，人必定學會言語交談，但未必會書寫交流。因此相對口語是「自然」的文化，書寫則是人類使用某種「工具」來交換有意義的語詞，所以是技術（technology）的文化。書寫注定要將人類由聽覺世界帶到全新的視覺世界，注定要「重構了人的意識」，故而絕對不是口語形式的補充或延伸 (Ong, 2012: 84)。

4 源起於美國綜藝秀 Don’t Forget the Lyrics !，已被複製到全世界數十個國家。

airiti

翁恩以書寫爲技術的思維，其實可以追循到海德格 (Heidegger, 1977)〈對於技術的追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一文主張技術的意義不在於「製作的物」，而在於對世界的「解蔽能力」（aletheuein，reveal），至現代技術更上一階，轉而「促逼」著人類去解蔽世界。翁恩主張書寫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技術，與海德格思想「傳統技術／現代技術」的概念其實頗爲合拍。翁恩認爲，口語語詞以一種「自然」的表現呈顯，而書寫語詞則以人爲的、反自然的方式強行解開世界的潛藏規則（例如理性、科學帶動的除魅化過程）。在這個思維脈絡下，翁恩討論書寫文化的特質，最欲凸顯人類意識走向「內在化」的不歸路，與海德格描繪的現代人類圖像走向主體化，也有相當神似之處。

當然，關於文字人（尤其是活字印刷人）的研究成果，在麥克魯漢的《古騰堡星雲》（McLuhan, 1966 ／賴盈滿譯，2008）以及愛森絲坦（Elizabeth Eisenstein）《作爲變革動因的印刷機》（Eisenstein, 1979 ／何道寬譯，2010）已有大量討論。麥克魯漢是奔放的理論思維，愛森絲坦有綿密的歷史論證，都指出活字印刷使得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推到全歐洲、使得天主教傳統權威重新定向、使得宗教改革發生、使得現代科學全面興起。這些因果，都不是「因爲人的思維發生新革命，所以借用印刷術來傳播」，而是反過來，「因爲印刷術改變了人的思維，所以促使藝術、宗教、科學出現新革命」。

但是既然翁恩主張文字書寫就是最重要的技術，印刷文字當然只是其中一種變化，而不是最根本的技術變革。翁恩在這一點與麥克魯漢、愛森絲坦，甚至安德森（Anderson, 1983 ／吳叡人譯，2010）說印刷資本主義推動想像共同體的設想不同。但翁恩的論證更往人內心意識的深處探討。他討論眼睛、耳朵兩種器官優位支配的不同歷史：視覺的作用是分離，聽覺的作用是結合；看只能由一個方向映入眼簾，聽可由四面八方接收聲息；看是分析性的感覺（dissecting sense），聽是整體性的感覺（unifying sense）；視線停在觀察對象之外部（exterior），聲音深入交談對象的內在（interior）(Ong, 2012: 70)。

「語詞雖植源於口語，但文字卻將它們暴虐地禁錮在視覺領域裡」(Ong, 2012: 11) 語音本身的「稍縱即逝」，決定人類生活命運的心理動力學。其中一個主要特徵是語音和內在性的特殊關係，和其他的感覺相比，兩者的關係更爲特殊。這個關係之所以重要，即因爲人的意識與人的交流本身的內在性。

書面把人鎖進「個人主義」的內在性之中，而口語的聲音並不。在口語人的世界裡，人們面對面進入他人「內在」而集體互動的交流；書本人的世界，人們「外在於人」去察看並進行個體性的交流。

airiti

書寫這回事，將不斷躁動的口語文化，鎖到一個靜止封閉的空間，讓被講出來的語詞，與它所存在的活生生當下分離開來。「語詞技術」的變化，帶動了「語詞表現」的變化，徹底改變了人的意識基礎。自此，抽象的、分析的思考，需要長時間苦想的腦力工作，都是字母文字（以及後續的印刷文字）爲西歐及全人類帶來的資產與負債。書寫文化時代擺脫了口語性的野性躍動。語言成爲思考的道具，幾何圖形能被理解、康德範疇分類、形式邏輯推論、現象定義、自我分析等等，都隨著「書寫」技術的出現而成爲可能。因爲，超過某個長度、複雜的長句子，只有借助文字才能反覆查看，若非如此，分析不可能，知識的累積和更新不可能，科學也不可能。

借用顧迪（Jack Goody）的逆向掃描（backward scanning）(Goody, 1977: 47-48) 概念，人開始反思地字斟句酌、自我審查，先行挑走不好懂的語詞，爲不知名的讀者而滴水不漏地自我審視，使寫作的過程極爲痛苦。成果若能惹人共鳴就罷，要是束之高閣無人聞問，真不知人生爲何而戰？

簡要來看，翁恩對二種對立文化的的結論就是：口語一體化，書面是分離性；口語使人聯結，書寫使人孤僻；口語人是外在性的人，書寫人是內向性的人 (Ong, 2012: 68)。

伍、敘事的變化與文學的誕生

翁恩的本行畢竟是文學研究，因此敘事與文學也就構成本書最深沈而獨到的關懷點。書寫人的意識，就是非常注意人的「內在性」，敘事（narrative）隨之往人的內在轉向，就成爲文學的重要突破點。

口語文化的聲音，雖然也是一套符號結構，但稍縱即逝的聲音迫使人們必須共同在場，口語文化也無法想像不在場的聽者如何享用同一套符碼。書寫人則不然。透過文字，作者與讀者跨越時間、空間被拉攏進入同樣一組符號結構。因此，文本（text）必然與死亡關聯在一起，亦即文本必須與活人的生活世界離別，成爲僵直不變之視覺定本，以確保其續命、確保其在無數活生生讀者的呼喚下能復活成爲無比活生生的文脈（context），所以「每一本書都是你的墓誌銘」(Ong, 2012: 80)。書寫人不再爲某個群體而生，他可以超脫他所生活的世界。自我保存（self preservation）的意義，也由外在的群體之保存，轉變爲內在的個人自我之保存。

當封閉的文本世界形成，書寫人也就習慣、並且被迫朝向內在而思考。翁恩

airiti

認爲書寫文化「內在化」的極致案例，就是日記。日記是虛構寫作人及本身閱讀人之結合，原是純粹爲自己而寫，卻又必須虛構一個閱讀的對象。人能夠假裝對自己說話，唯有「內省」的在書寫人才有可能 (Ong, 2012: 101)。

書寫文化鼓動一種在紙面上反覆修改、把敘事鎖進「封閉的場所」的習性，使得文學文本全新誕生，成爲書寫人的「對象」，且可以不斷模塑直至合情合理，徹底打破口傳敘事的傳統，我們今天熟悉的小說（不論是虛構劇情的 fiction、或是創新經驗的 novel）方於焉成形。這種敘事經驗的改變，創造了與口語文化完全斷裂的文學，其實也呼應班雅明（Benjamin, 1969 ／張旭東、王斑譯，1998）在〈說故事的人〉（The story 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所觀察到的轉折。

翁恩透過派里（Adam Parry）及哈夫洛克等人的研究，闡述荷馬的高超詩藝，並不是以「原創者」姿態表現出來的。荷馬史詩固定反覆使用的套語，顯示他腦裡實有一本前人累積的詩歌集萃，而他只是以「裝配線工人」的姿態將之拼湊成詩 (Ong, 2012: 22)。

如此看來，西方始終將荷馬史詩尊奉爲文學起點的看法，該是一天大的誤會。西方現代文學不屑使用的慣用句、套語、反覆修飾詞（貶抑爲陳腔濫調），荷馬時代的詩人卻無比重視、代代相傳。其實，現代西方文學之能夠成立，並不是因爲承繼了古老的口傳文化，而是斷絕了口傳文化。

文本（text）是在書寫文化出現後的產物，在非讀寫人的世界裡，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觀點下，第 7 章的箭頭一轉，翁恩批判了當代的文學理論（甚至哲學理論）都太過偏重「文本」的解讀，文學理論的「俄國形式主義」及「新批評主義（New Criticism）尤其典型，這些 20 世紀具有支配性的文學理論，都將文學的詩歌傳統摒除在外，而訴諸文本自身具有的獨立、內在生命，且與作者無關 (Ong, 2012: 157-158)。

陸、二度口語文化的新境界

若再回到「跨時」的斷代裂開，柏拉圖（427-347 AD）就是一個關鍵，代表了古希臘將文字內化至身體，使知識的保存不再依賴口說套語、而改爲依賴白紙黑字 (Ong, 2012: 24)。因爲柏拉圖將浪漫的詩人逐出理想國之外，形同將荷馬的詩意智慧打爲無用的惡習。察看〈斐德羅篇〉（Phaderus）這個史上最著名的文字與記憶章節，可以更明瞭翁恩的論證重點。

airiti

柏拉圖〈斐德羅篇〉記述了不留著作的口語人蘇格拉底，對著友人斐德羅說的寓言。文字發明者透特（Theuth，埃及智慧之神）向法老王薩姆斯展示他的重要發明——文字書寫（writing），稱許這是可以幫助記憶的療藥（pharmakon）。但是法老薩姆斯並沒太熱情，只說「多才多藝的透特啊……如果有人學會這項技藝，就在他們的靈魂中製造遺忘，這不是記憶的治療，而只是一種提醒罷了」（Plato, 1997 ／王曉朝譯，2003：197-198）。法老顯然不喜人們只依賴外在的書寫，而不努力精進內在的記憶，爲這段寓言留下感傷的氣氛。

過去的解讀都認爲柏拉圖在此表達了他對記憶的珍視，以及對書寫的恐懼。然而，就如德希達 (Derrida, 1981: 94) 讀出書寫既是療藥、也是毒藥（pharmakon 的兩義性），翁恩精彩地點醒，柏拉圖雖然批判了文字的機械性、無人味，對問題不加回應，對記憶造成損傷，但更重要的，他還是選擇以文字表達了對此的批判。自此，口語和書寫的緊張與對立，就無從顯露，進而潛藏在人類社會 1、2 千年。柏拉圖及古希臘文明，代表著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口語的記憶、書寫的便利並存發展，結果是逼使人們將這種緊張安置在心靈深處。亦即「內化」。儘管感到不安，但柏拉圖和其他人都沒有、也不可能清楚意識到正在發生的衝突 (Ong, 2012: 24)。

因此，並不如麥克魯漢所稱「聽覺世界／視覺世界」的階段圖示那般清楚分裂，翁恩表達了一種「口語泥中有書寫、書寫泥中有口語」的心理糾葛，也爲口語文化在電子時代的復興埋下伏筆。

這種人類意識潛藏的糾葛，在書中第 5 章討論語詞表達的電子變革時代，乃重新浮現爲必須面對的歷史場景。如果原生口語文化的語詞表現著重在舌戰雙方的直接互動、聲嘶力竭、筋疲力盡是修辭的常態。電視上的競選辯論則呈現另一套口語秩序，講者輕快地站在講台，陳述短小精練的語言，不在場、不露面、不出聲的聽眾只能被動的接收理性的安排。電子媒介似乎塑造了一個更嚴密封閉的空間。

翁恩堅定表示，「二度口語文化」是全新的語詞表現世界，不只是錄音，還有電話、電視（當然包括翁恩只看到其萌芽的電腦），這種電子技術把我們帶回到另一種口語文化的境界，至少，集體參與的神祕、社群共感的形成、專注於當下一刻的興奮、押韻套語的使用，都彷彿跳過了書寫文化而回到以前。但是「二度口語文化」不同於初民的「原生口語文化」，因爲受到書面文字洗禮的人們，是經歷書寫文本而轉向內在的「個人們」，這種口語的回歸，也是具有意識、自覺、選擇的口語文化。因此較之原生口語文化的小群體，二度口語文化的規模可以是難以估量的大、速度也是難以想像的快，也就是麥克魯漢「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理想圖案。

airiti

翁恩提醒目睹電子文化的人們，處在這個歷史情境不可有進步主義的樂觀，也不須有人性沈淪的悲嘆，而應該更敏銳去探查文化的底蘊。原生口語文化人面對外部世界，其實是因爲他們沒有機會進入內在，而我們已活在高度內在化的世界，也並非沒有機會轉換。

柒、結論

尼采在《輕盈科學》（*Gay Science*）一書說，「還有什麼能比韻律（rhythm）對古代迷信人類更加有用？它驅使我們以魔幻方式去做任何事；驅使一個神現身、徘徊、聆聽、以其意志模塑未來……沒有韻文（verse），一個人什麼都不是；透過韻文，一個人幾乎成爲神」(Nietzsche, 1974/2001: 85)。

古老的時代，詩歌的存在就是因爲功利，因爲有韻律的詩歌易於背誦，幫助人們傳遞集體的生命。如此看來，翁恩的解釋已不僅是知識的趣味，而是告誡我們更認真去感受歷史與未來。今天世界仍然有許多文化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我們的周遭也有不少人善於交談、無法讀寫。無法理性抽象思考，並不等於愚笨。年邁的阿嬤可能不識字、可能一輩子沒讀過書，但他們記得必須記的、忘掉不必回憶的，其實是保障小規模社群的智慧。這不是落後、無知的人生，而是另一種有思維、有文化、有智慧的世界。

只是，書面一統江湖的力量始終勢不可擋。回溯知識前進的歷史，不論世界或臺灣，消除文盲一直都是現代文明人努力的目標。1920 年代臺灣的知識分子高聲提倡白話語文、鼓吹以歌識字的行動[5]，以及今日學者走進田野記錄鄉野奇譚、訪問人間國寶探求失傳技藝的事跡……，有人感嘆、有人尊敬，但不論如何，多少抱著「可惜」的心情，並期許以「書寫記錄」幫助這些時代淘汰的「口語文化」長長久久維繫下去。但由翁恩的論點得來的警示，就是這種「可惜」的態度大可不必，而必須更深入去理解以四句連、韻尾歌傳誦智慧的「口語文化人」，如何經營他們的生活哲學。

傳播學界似乎總是「進步史觀」的擁護者，新科技的發展被歌誦、被當作時代腳步。但是媒介科技改變了人的思維、改變了互動模式、改變了世界結構，或許應該得到更多的警覺。口語文化，轉變爲文字發明、活版普及、電子連結，是「革命」，而不應該視爲「進步」。長期以來，臺灣的媒介研究習於美國大眾傳

5 關於日治時代知識分子的口語／書面文明化問題，臺灣文學界近年已重新給予評價，可參考李承機（2013）、陳培豐（2013）等。

airiti

播（mass communication）脈絡的思維，倚賴「主動發送者－被動接收者」的傳播模型，偏重以實證資料驗證「傳播效果」，亦即，發送者的意圖是否被有效理解。或許有一些左派批判會加入政治經濟的分析（如德國新馬克思主義、英國文化研究、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但大體上，仍將媒介視爲「傳遞訊息／意義的工具」。因爲是工具，所以媒介研究的要角，就一直是有力人士及機構，而不是「媒介自身」。

如果總在追隨新技術，而把班雅明、麥克魯漢、翁恩等人視爲過時的教材，傳播學界將只能尾隨在科技業之後幫忙撰寫「改良建議」、「使用說明」。翁恩的媒介理論，不啻爲臺灣傳播學界需要重新閱讀、重新拾回的智慧之作。

參考書目

王曉朝譯（2003）。《柏拉圖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國：人民。（原書 Plato [1997]. *Plato: Complete works*. Cambridge, MA: Hackett.）

何道寬譯（2010）。《作爲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北京，中國：北京大學。（原書 Eisenstein, E.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北京，中國：北京大學。（原書 Ong, W.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7）。《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北京，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Lum, C. M. K. [2005].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Cresskill, NJ: Hampton.）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臺灣：時報。（原書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李承機（2013）。〈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文字の文化と音声の文化：リテラシーの近代性を乗り越えたオラリティーの（大衆）〉，《言語社会》，7：47-62。

汪益譯（1999）。〈花花公子訪談錄〉，《預知傳播紀事：麥克魯漢讀本》，頁 25-76。臺北，臺灣：臺灣商務。（原書 McLuhan, M. [1995]. Playboy interview: A candid conversation with the high priest of popcult and metaphysician

airiti

of media. In E. McLuhan & F. Zingrone (Eds.), *Essential McLuhan* (pp. 233-269).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張旭東、王斑譯（1998）。《啓迪：本雅明文選》。香港，中國：牛津大學出版社。（Benjamin, W. (1969).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NY: Schocken.）

陳培豐（2013）。《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臺灣：群學。

鄭明萱譯（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臺北，臺灣：貓頭鷹。（原書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Signet Books.）

賴盈滿譯（2008）。《古騰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臺北，臺灣：貓頭鷹。（原書 McLuhan, M. [1966].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桜井直文、林正寛、糟谷啓介譯（1991）。《声の文化と文字の文化》。東京，日本：藤原書店。（原書 Ong, W.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York, NY: Routledge.）

Derrida, J. (1981). Plato's pharmacy. In B. Johnson (Ed.), *Dissemination* (pp. 61-171).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ody, J.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E. A. (1982). *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8). *The Greek concept of justice: From its shadow in Homer to its substance in Pla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3).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Heidegger, M.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M. Heidegger (Ed.),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pp. 3-35). New York, NY: Garland.

Nietzsche, F. W. (2001). *The gay science: With a prelude in rhymes and an appendix of songs* (W. Kaufmann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4)

Ong, W. J. (201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UK: Routledge.

airiti

-- (200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UK: Routledge.

--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ld*. London, UK: Methuen.

-- (1977). *Interfaces of the word: Studies in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67).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58).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rry, M., & Parry, A. (1971).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Poster, M.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oungkin, B. R. (1995). *The contributions of walter J. Ong to the study of retoric: History and metaphor*.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